

共和国回顾丛书

中国1968

上山下乡

SHANG SHAN XIA XIANG

·王增如 李向东 著·

◆
千古荒原上的“北京红”
南京的“燕子”飞到了鄂伦克—黑土地上的“白毛女”
独自穿越原始森林的城市姑娘
大哭了，大绝食，大逃城



解放军出版社

共和国回顾丛书

中国1968

上山下乡

SHANG SHAN XIA XIANG

·王增如 李向东 著·



解放军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山下乡：中国 1968/王增如，李向东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9

(共和国回顾丛书)

ISBN 7-5065-3519-X

I. 上…

Ⅱ. ①王… ②李…

Ⅲ.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史料

N. 125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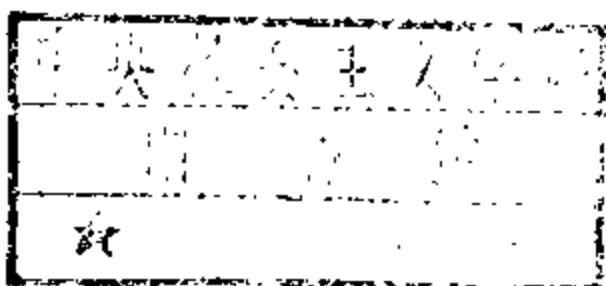
北京市门头沟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5

字数：320 千字 印数：10500 册

定价：14.60 元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燕子报春 [9]

千古荒原上的“北京庄”·胡耀邦说：茅草棚只能三岁，不能万岁·解决粮食问题·燕子报春·从董嘉庚到董加耕·“特别的姑娘”来到窦家桥·马寅初大声惊叹：不得了！·飞向雁窝岛·几百万中学生何去何从·毛泽东发出号令

第二章 挺 进 [27]

第一支队伍·“北京五十五”·南京的燕子飞到了鄂托克·1968年12月21日，一个漆黑寒冷而又热闹喧腾的冬夜·不让下的硬要下·六口之家走了四口·不想下的也得下·两个心酸的故事

第三章 磨 炼 [57]

在杨武兵站的一场误会·和苏联一江之隔·“我要回上海！”·女孩子的腿泡弯了·难割的麦子·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在大兴安岭打山火

第四章 求学之梦

[85]

大学之门砰然关闭·大学之门悄然打开·八仙过海·强者落马·周晓红大胆唱了一声反调·一块石头伤了一大片人·幡然醒悟

第五章 扎根和拔根

[109]

老工人的“绝招”·爸爸,我不同意你这拔根教育·真的要扎根?·典型的苦衷·典型的堕落

第六章 要把孩子们安置好

[129]

陌生的农村·睡在一口棺材下面·安置费不翼而飞·“领袖像事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李庆霖告状·姗姗出台的知青政策

第七章 魂系荒原

[155]

他们过早地消失了·“两不怕”精神·火中凤凰·雨中凋零的花朵·悲壮的一幕

第八章 典型们

[180]

蔡立坚百感交集·苦难也是一种财富·小燕的“忧国忧民”意识·跟好人在一起·黑土地上的“白毛女”

第九章 黑土地：辉煌的兵团史

〔219〕

开发建三江的有功之臣·打仗为主,还是打粮为主?·无处不在的大批判·亮相亮出来的积极分子·有家难回·兵团里的现役军人·小包的两块“敲门砖”——知青与现役军人的关系之一·“三个志愿你都给我报复旦!”——知青与现役军人的关系之二·“你是首长的什么亲戚?”——知青与现役军人的关系之三·“我最佩服的一个人”——知青与转业官兵的友谊之一·“我们家不怕传染”——知青与转业官兵的友谊之二·兵团的结局

第十章 绿草原：蒙古包内外

〔255〕

走进锡林郭勒·虱子的故事·最可信赖的朋友·奇特的解手方式·可爱的牛粪·在暴风雪中

第十一章 黄土高原：到革命圣地干革命

〔279〕

走进圣地·窑洞里住进了北京娃·老资格的放羊汉·饿着肚子咋搞阶级斗争·安贫乐命的陕北老乡·寄希望于下一代·勇敢的饥饿者

第十二章 红土壤：惊心动魄的最后一幕

〔313〕

西双版纳：决不仅仅是个种植橡胶的地方·独身穿越原始森林的姑娘·京沪渝昆四地知青的恩恩怨怨·负重的探亲·上海女知青死于医疗事故·累积成山的问题·1978年11月景洪农场开始罢工·1978年12月昆明火车站上剑拔弩张

• 1978年12月末赵凡飞往昆明 • 1979年1月勐定农场千人
绝食 • 知青大返城

第十三章 在希望的田野上 [342]

两个境遇悬殊的女知青 • 茅春：这一辈子心灵都不会安
宁 • 张志香：退休了还得回哈尔滨去！ • 过去是父母替咱们担
忧，现在咱们替子女担忧 • 孙英：留场知青的老大姐 • 张春
娟：黑土地上的劳动英雄

第十四章 牵肠挂肚一片情 [370]

刘红英：还在思念那片橡胶林 • 小雨：在上海打工的外省
人 • 雁莎：搅乱了宁静的心绪 • 陈兴桥圆梦 • 跪拜父老乡亲
• 他们仍然是农场职工眼里的“宠儿”

后 记 [386]

主要参考书目 [395]

引 子

已经是年终岁尾，上海进入了一年里最难捱的冬季。

从印度洋上迢迢远来的暖湿气流，裹挟着一场霏霏淫雨，在上海滩上整整飘洒了一天一夜。阴雨过后紧接寒风，又潮又冷，温度表上的水银柱急骤下降，接近了零度。马路上行人骤见稀少。

可是上海火车站却是一个例外，站台上是少有的热闹，少有的喧嚣。一队队即将启程远行的人，一群群赶来送行的人，把站台拥得满满当当。英气勃勃的青年人有组织地走进来了，他们手里擎着车票和乘车证，泪水和欢笑同时聚集在脸上，有些做母亲的呜呜地哭起来了，哭得儿女们心也酸酸的，而站台上的大喇叭里却使劲播放着激昂雄壮的乐曲。一些家长找不见自己的孩子，急得扯着嗓子大声呼喊，他们的呼喊声淹没在人群中，淹没在一片嘈杂中。

这一天是1968年12月21日，这一天是上海市首批赴云南省国营农场下乡青年出发的日子。

就在这一片嘈杂混乱之中，有五个神色异样的学生走进了站台。他们既没有出征者那般激动，也没有送行者那样的悲哀，他们闷声不响，低着头挤过摩肩接踵的人群。他们不像是寻找什么人，倒像在躲避什么人，脸上带着几分紧张。在车厢门口，一位穿铁路制服的中年妇女拦住他们。他们伸出手，每人手里有一张送客的站

台票。

“送客的不要上车了，就在下面送好了，过会儿火车要开了。”

“我们没有找到我们的同学。火车还要过一会儿才开呢，让我们上去吧，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要不就见不到他们了。”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

中年妇女被孩子们那近乎哀求的神色和声音打动了：“你们快点哟，别误了下车！下不来，就把你们也一道拉走了！”

五个孩子高兴得噌噌踏上踏板，冲进车厢。他们面露喜色，小声地嘀咕了几句，便分作两组，一组奔向车头，一组朝着车尾，分头而去，像机警的猫一样，很快就消失在车厢的尽头。

上午十点，开车的时刻到了，揪心的呼喊声、哭叫声，混和着激越的鼓乐声，轰然响作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向火车尾部滑去，黑压压的人群开始跟着火车奔跑，火车的速度渐渐加快，把黑压压的人群甩在了后边，越甩越远……

5号车厢里，一位40多岁的女同志开始清点人数，核对名单。她姓徐，是南市区革委会毕业分配小组的组长，她的任务是把南市区的学生平安送到云南。

忽然，她看见三个同学把头伸到窗外去了，还挥舞着胳膊冲着前方惊喜地呼喊，她认得其中的一个女同学，她叫沈瑾瑾，是嵩山中学的，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他们异样的举动，引得许多同学也都把头探出去。“这样很危险的，不允许的！”她要阻止他们，她也想看看，火车的前方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刚把头探出窗外，就看到了前面不远的车窗里也探出三张熟悉的脸，三个女同学的脸，每一张脸上都溢满了得意和狂喜。“她们怎么也来了？她们没有被批准呀？”徐老师心里有些疑惑。这时，她听见从列车尾部也传来呼喊声：“我们在这里——”她把头转过去，又看到了一个车窗里探出两张熟悉的脸，同样是两张充溢着得意和狂喜的脸，那是一男一女，挥舞着手臂，向沈瑾瑾他们示意。

“他们也上来了？！”徐老师一下子明白了：他们五个人是偷偷

混进来的，名单上根本没有他们的名字！

徐老师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区革委会办公大楼里，那是一个半月以前。那天有个毕业生分配会议，徐老师路上耽搁，所以晚到了一会儿，刚走上二楼，就看见了八个孩子，他们聚在会议室门口，叽叽喳喳地小声商量着什么事情。看到徐老师走过来，他们不作声了，八双眼睛一齐向她射过来。

“你们有什么事情？要找谁？”

“老师，您是来开会的吗？请您把这份决心书交给区革委会领导行吗？”

她接过来一张纸，那纸上的字是暗红色的，她心里一惊：“你们写了血书？”

血书只有一句话：“最坚决要求去云南边疆干革命”。下面是八个人的签名。她心疼地抓起一个女同学的手，看见右手的食指上缠着纱布条，纱布渗出了红色的血迹。

“老师，我们要求去云南，请你帮帮我们吧！”

徐老师被这些孩子感动了，她把“内部情况”一下子都和盘托出了：

“这一次去云南的名额相当紧张，整个上海市只要 1000 名同学。这 1000 个名额分到 10 个市区，每个区里只能有 100 个，再分到各个学校，一个学校只能有两三个，顶多三四个名额。这一次报名的又非常多……你们都是一个学校的吗？”

“我们都是嵩山中学的。”

“我可以把你们的情况反映上去，但能不能成功……”徐老师轻轻摇了摇头，“很难说。”

她记下了那八个同学的名字：沈瑾瑾、温融雄、吴鹤翔、程玉庆、胡澹……

被批准同学的名单很快就贴出来了，八个人里边只有两人，其余六个，倒不完全是由于名额的限制，恐怕更主要是受到了政审的限制。温融雄，尽管本人是班长，可是父亲母亲都在受审查，有特务

嫌疑；吴鹤翔，虽然父母都是老工人，可是有个哥哥在香港当海员，他在入团问题上已经尝过“海外关系”的苦头；还有一个小同学，母亲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那当然是“走资派”了！

就在公布名单的当天下午，区革委会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又接到一份血书，血书上还是那一句话：最坚决要求去云南边疆干革命。血书上签名的还是八个人，六个未被批准的和两个已被批准的。当时领导小组正在开会，徐老师见到这份血书，心里有些激动了：

“他们要求去云南是革命行动，他们是要去干革命，搞建设的，不是要去叛逃的嘛。他们已经写了两份血书了，我们应该支持他们！”

徐老师的话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未被批准的六个同学又被过了一遍政审“筛子”，这个“筛子”的网眼稍微大一些，这一次有幸通过筛网的只有吴鹤翔一个人。

徐老师有好多天都在替那几个没有被批准的同学惋惜。但是她没有料到，今天八个同学全都上了这列火车。这就不能允许了，总要有点组织纪律性嘛！她找了两个老师一起行动，要在这趟列车上来一次“围剿”。他们很快就在一节车厢的洗脸间里找到了那三个女同学。

三个女同学都是初一的，都是学校宣传队的队员。徐老师跟她们说，你们还不到毕业分配的时候，行李也没有带来，家里父母也不知道吧，这怎么能去农场呢？

“我们行李带来了！”“我们已经跟爸爸妈妈讲好了！”“我们的行李跟沈瑾瑾他们的行李打在一起了。”

“到了云南要核对名单，名单上没有你们的名字，肯定要退回来！”

“老师，你帮帮我们吧，我们到云南一定会好好干的！”

“不行，我要对你们负责任，下一站是杭州，到了杭州你们就下车，我跟车站上的人讲好，你们搭下一班火车回上海去！”

“我们的行李都拉到云南去了！”

“我会让人给你们寄回来，一件也少不了！就这样说定了！”徐老师的语气很硬，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在杭州火车站，三个女孩子眼泪汪汪地走下火车，眼泪汪汪地向沈瑾瑾告别，眼泪汪汪地看着去云南的火车开走。

“这些孩子！”徐老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情感。现在她要去找那两个高中生，他们可不像小姑娘那样好对付。她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搜过去，一张面孔一张面孔地辨认，最后在几个老师的帮助下，查出了温融雄和胡澹！

当然少不了一番口舌，徐老师说不服他们两个，索性不讲了，只有一句硬邦邦的话：“下一站是金华，你们两个必须在金华下车！”

火车减速了，火车进站了，缓缓地，“哐当”一声停稳了。

“走吧，下车！”徐老师在前，胡澹、温融雄在后，跟着列车员朝车门走去。

温融雄的脑子里一直在打主意，他一眼看见厕所的门虚掩着，决定把那里作为藏身之地。他像一只灵巧的猫，一闪身就钻了进去，回手“咔”地一声把门锁死，任徐老师怎样大声呼喊使劲拍打就是不开。

徐老师抓不住温融雄，又担心胡澹乘机跑掉，她死死拽住胡澹的胳膊，把她拉下火车，她实在让这几个学生闹怕了。

胡澹哭丧着脸，从站台上向车厢里面张望，看见温融雄正在冲她做鬼脸。她有些怨恨温融雄：为什么不拉着我一道躲进去？！

火车重又启动，驶出金华。徐老师隔着一扇紧锁的门，开始了“政策攻心”：“温融雄，我劝你还是把门打开，你自己不打开，我们会找乘务员来，他有钥匙。”她知道，对付温融雄，唬是没有用的，她开始许愿：“我知道你下乡很坚决，我也很同情你，我保证，下次有云南插队的，第一个批准你。”

一位老师把车上的乘警找来了，乘警可不像徐老师那样婆婆

妈妈地讲道理，他重重地拍着门大吼：“赶紧出来，有人要用厕所！”

门开了，温融雄无可奈何地走出来。通道上站满了人，他一眼就看到了吴鹤翔，在他旁边是沈瑾瑾、程玉庆。

“温融雄，赶紧把你的东西收拾好，火车下一个停靠站是株州，你必须在那里下车！其他同学，赶紧回到位子上坐好！”

人群渐渐散去，过道里只剩下温融雄、沈瑾瑾、吴鹤翔、程玉庆四个同学。他们阴沉沉的心绪挂在脸上，谁也不讲话。

“徐老师，让我们在一起说说话吧，我们就要分手了呀！”沈瑾瑾打破了沉寂。

“你们就在这里讲好了。”

“把我这间乘务室让给你们。”乘务员是个比温融雄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她一直站在旁边，被几个孩子感动了。“你们就坐在这里面讲好了。”

四个人挤坐在一起，都默不作声，他们内心充满了沮丧。看来，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任何其他的选择都没有了，只好下车，只能分手了。整个这次云南之行都是温融雄牵头张罗策划的，现在他这个牵头人却要打道回府了。暮色越来越浓，余晖越来越暗，而株州却越来越近了……

忽然，温融雄喊了一声：“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快说呀！”几个人急不可耐地喊着。

温融雄诡秘地一笑，他站起身打开门，向通道两边张望了一下，又把门关好。

“你们给我一张车票和一张乘车证，到了株州，我下车以后就去找站长，说我是下车买东西的时候误了火车，让他们帮我联系一辆去昆明的火车！”

“徐老师会亲自把你交给车站的。”

“所以到了株州，我要晚一点下车，我们要装作恋恋不舍的样子，等到火车快要开了再下车，这样徐老师就来不及跟车站上的人讲话了。”

孩子们的情绪一下子又活跃起来，七嘴八舌地补充着这个方案，使它更圆满更完善，更加无懈可击。

株州近了，火车停了，徐老师把门推开了。

“怎么样，话都讲好了吧，温融雄，你该下车了。”

“哎呀，等一等，温融雄，我有件东西你给我带回家去。”吴鹤翔煞有介事地叫了起来：“我马上去找啊！”他一边说着一边慌慌张张地走进车厢里边去了。

“来不及了嘛，马上火车要开了。温融雄，你必须要在这一站下车！”徐老师警惕地用一种斩钉截铁的语调说。

“徐老师，我肯定要在这一站下车的，你看，我东西全在这里了。”温融雄指指一个提包和一个书包。他把书包背了起来，一只手抓住了提包的带子，作出一副马上就要下车的样子。

吴鹤翔拿着一包东西跑过来了：“你把这包东西交给我妈妈，你要的东西也都在里面了。”

“明白了。”两人会心地一笑。

站台上的铃声响了，徐老师过来拉温融雄的胳膊：“快走，快走，要开车了！”

“徐老师，我下得去的，你放心好了。”

“这是一份证明，你下了车直接去找站长，他会帮你安排火车回上海的。”

“好的，徐老师，谢谢你对我的关照！”他用力握了一下徐老师的手。

火车猛烈地摇晃了一下，缓缓启动了。

“再见，温融雄！”

“再见——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

暮色淹没了房屋，淹没了原野，车窗外除了偶尔闪过的灯火，什么也看不见了，三个孩子却依然凝神望着窗外。他们这一天几乎没有吃过什么东西，谁也不想吃，没有心思吃，他们都在想着同一件事情。很难预料他们的计划能否成功，因为这一天他们遇到的倒

霉事情太多了。“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吴鹤翔忽然想起《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他笑了，他觉得这个比喻有些滑稽，谁会是狐狸，谁又是猎手呢？

车厢里的广播喇叭响起来，传出了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声。八点半了，这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喇叭里传出播音员庄重的声音：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有人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又有人在喊：“坚决拥护最高指示！”喊声此起彼落，车厢里响起一片欢呼声。

1968年12月21日，在这一个漆黑的夜晚，在湘黔铁路线上，一列驰跑的火车车厢里，有1000名“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当最高指示公布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发登程，已经在“去”的途中，这使他们感到得意和自豪：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走在了前面！他们当时绝对不会想到，这一段最高指示对他们的一生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对他们这一代人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对整个国家的前途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发表过一系列重要指示，若论直接涉及到的人之多，波及到的面之广，恐怕要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一条，它改变了1700万中学生的命运，它在1700万个家庭中掀起了大小不一的波澜……

第一章 燕子报春

千古荒原上的“北京庄”

时间倒转到 13 年前,也是在一个火车站台上,也是一次激动人心的送行。

1955 年 8 月 30 日下午 6 时,疲惫的太阳懒洋洋的目光,被北京前门火车站上的热烈场面吸引去了。行者,是一支 60 人的队伍——清一色的青年人,他们簇拥着一面鲜红的旗帜,上书金色大字: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这面旗帜,是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刚刚授予的。60 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自豪和骄傲:他们是从 700 多个报名者中挑选出来的,十里挑一呀!

这 60 名青年,刚刚参加完北京青年举行的欢送大会。王照华,当时的北京团市委第二书记在讲话中说:“首都青年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组织了祖国的第一支垦荒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说:“你们是光荣的第一队,你们的行为是光荣的行为,是爱国的行为。”他给他的发言拟了一个题目:《向困难进军》,并尽情地发挥说:“有一千条困难,就要打破一千条,有一万条困难,就要打破一万条。”胡耀邦的情绪感染了礼堂里的每一个人,1500 双手

起劲地鼓起掌来。

会场里的中心人物不是胡耀邦，而是一位 23 岁的健壮小伙子、垦荒队长杨华。在全场敬佩和羡慕的目光中，他从胡耀邦手中接过了那面“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大旗，神色庄重地表示：要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建起新的团支部，建立起新的村庄和新的生活。

半个多月之前，杨华等五个人联名向共青团北京市委递交了一封申请书，提出：“请批准我们发起组织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开荒，使我们能够为祖国多贡献一分力量。”“要是我们组成一个 60 人的垦荒队，我们就可以不要国家掏一个钱，为国家开垦 3000 多亩荒地，增产 30 多万斤小麦。”

8 月 16 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这封申请书，并发表了《让我们高举志愿垦荒队的旗帜前进》的文章，不久又在头版登出杨华等五个青年的照片。这件事一下子在全国引起轰动，到 8 月 25 日，北京市报名者近 600 人，全国的报名者 9800 人，鹤岗煤矿送来了帐篷，内蒙古牧民送来了骏马，捐赠的现金将近七万元。

50 年代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年代，刚刚步入新中国的人们还沉浸在“解放了”的欣喜之中。“只要是党号召的，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去干。我们定了三条原则：第一，必须是绝对自愿；第二，不要国家一分钱投资；第三，去了就不回来。”事隔 40 年后，一位当年的垦荒队员这样说。

10 天之后，阡无人迹的黑龙江省萝北县大荒原上竖起了一面红旗，红旗下举行了开荒仪式。中共萝北县委书记阮永胜特地赶来，为仪式剪彩。队长杨华一声令下，六匹马拉着四台大犁，在沉睡千年的荒原上蹚开了一道道黑色的泥浪。

60 名青年人在桦树林里支起了帐篷，歌声和欢笑声惊动了荒原上的大雁、野鸭和狼群——这里原本是它们的世袭领地。愤怒的狼群夜晚围着帐篷嚎叫，青年人就点起篝火，端起枪在帐篷周围守护。最终退却的不是垦荒队员，而是狼。

半个月后，他们开垦出 1200 亩耕地，第二年生产了 27 万斤粮

食,60万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中国青年志愿垦荒史的第一页,就这样翻开了。

紧随其后,第二批第三批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哈尔滨、天津两市,河北、山东两省的两千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分来到萝北县,荒原上很快出现了“北京庄”、“天津庄”、“哈尔滨庄”等一个个以青年籍贯命名的生产点。1956年春天,这些“庄”又按照“苏联老大哥”的叫法,改为八个集体农庄,再后来,又按中国的叫法改成国营农场。

胡耀邦说:茅草棚只能三岁,不能万岁

就在萝北荒原上的开荒仪式举行一个月之后,10月22日,在远距万里之遥的江西德安县九仙岭下,也竖起一面红旗,上书“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良田”。擎旗人是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

在北京的影响下,上海也掀起一股青年志愿垦荒的潮流,五个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发出倡议,上万名青年人响应,要求到淮北去开荒。这件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被毛泽东知道了,他想到前一年淮河刚刚发了一场大水,便给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提建议说:淮北的条件太差,还是去江西为好,那里气候和上海更接近,吃的也是米饭。这样,挑选出来的96名男女青年组成了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副市长宋日昌亲自把他们送到江西省德安县的九仙岭下。

一个月之后,11月29日,胡耀邦专程赶到德安县看望他们,他仔细询问了解青年人的情况,察看了他们住的茅草棚,问他们苦不苦,青年人齐声回答:“我们不怕苦!”为了表示决心,有人喊了一句“茅棚万岁!”胡耀邦听后大笑:“茅棚终究是临时的,我们只能让它三岁,不能万岁!”当晚,他用小山竹片夹着药棉,在油灯下写了“共青社”三个字。他勉励大家说,我们面前还有两条大河,一条是愚昧,一条是贫穷,我们一定要闯过这两条大河,把共青社办好。

这个共青社,后来发展成以生产“鸭鸭”牌羽绒服闻名全国的

江西共青垦殖场。

一个北京庄，一个共青社，一个在北国荒原，一个在江南山岭，两拨青年分别来自祖国的首都和繁华的商埠，总数不过一百五六十人，但他们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是新中国最早的两支由城市青年组成的下乡队伍。在他们的影响下，1955和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温州青年去重建刚刚被解放收复的大陈岛。全是边远偏僻的地方，全是艰苦贫穷的地方，一共有十几个省市的青年人，组织了五十几个志愿垦荒队，参加者约有3.7万人！新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第一次垦荒务农之风就这样出现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就这样奏响了。

解决粮食问题

发生在50年代中期的那场城市青年志愿垦荒运动，实际上是党和国家号召和组织，其主要的背景是粮食问题。

新中国诞生之初的那些年，粮食的产需矛盾一直十分突出，产量的增长幅度远低于消费的增长幅度。1953年小麦受灾，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又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灾，1955年8月初，胡耀邦在团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透露了毛泽东讲的一句话：“粮食问题是我国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我们当前和资产阶级斗争的重要问题之一。”

为了多产粮，就要多开荒。当时一切学苏联。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详细了解了他们的经验。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代表团回国后，团中央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并提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的初、高小毕业和无职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他们的意

见,得到了党中央的首肯。紧接着,团中央就向全国青年发出了“向荒山孤岛进军,积极参加垦荒运动”的号召。

缘由是解决粮食问题,形式是学苏联的——这就是五十年代中期那场青年垦荒运动产生的背景。

但是严格说来,这第一股青年上山下乡潮流的主体,还不能称之为“知识青年”。以萝北荒原上的八个农庄为例,2600多名青年中,高小以上文化的仅占36%,三分之一稍多一点,文盲却占到了将近40%。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长杨华,原本是石景山区西黄乡的乡长、劳动模范,他是在北京市农村工作会议上,听到领导讲话说全国还有四亿多亩荒地等待开发时,产生了一种到边疆去开荒的强烈愿望,后来团中央筹建青年垦荒队,《中国青年报》的一位记者从石景山区选中了他。

特别是山东、河北的支边青年,大部分是从农村组织和招募的。这一切只能印证这样一个观点:垦荒需要的是劳动力,垦荒者文化水平的高低并不重要。

燕 子 报 春

六十年代初,是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二个小浪潮。如果说,五十年代那一次的影响面主要是在社会青年中间,那么这一次的影响面主要是在中学生中间,参加者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及紧随其后的严重自然灾害,大大削弱了我国的农业基础,1960年的粮食总产量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谷底,比1951年还少19万吨,全国城乡农产品供应出现了全面紧张的状况。解放后出生的孩子,第一次尝到了挨饿的滋味。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1960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以邢燕子、董加

耕、侯隽为代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引发而出，这是一批真正的“知识青年”。

邢燕子的父亲是天津一家工厂的副厂长，她的父母兄长都在城里工作，只有她和爷爷在唐山地区汉沽市司家庄生产队。她从学校毕业后没有去城里就业，而是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她是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回乡的，回乡不久就赶上1959年秋天的水灾，灾后面临着饥荒，还有一个寒冷漫长的严冬。肚子里没食，这冬天可不好过呀……村干部直发愁。

邢燕子倒有主意，她说，秋天水大，肯定鱼多，咱们去打鱼吧！她跟几个姑娘组成一个治渔队，在寒风中破冰捕鱼；晚上，她们又点上马灯，用割来的芦苇打苇帘。这样干了三个月，增加了4000元副业收入。队长高兴了，度荒年心里有点谱了。村党支部给这支治渔队起名叫“燕子突击队”，邢燕子当队长，人数由7个人增加到16个人。转过年来，邢燕子又带着突击队的姑娘们，在天寒地冻的“六九”里把麦子抢种下去，获得了丰收。在吃不饱肚子的1960年，“丰收”这个字眼意味着什么，谁都想象得出来。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接见她，还在《河北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我们“需要千千万万的邢燕子”。1960年8月19日，河北团省委和省妇联发出了向邢燕子学习的通知，一个月后，她站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这时，《人民日报》也登载了她的事迹，邢燕子从河北走向了全国。

邢燕子的脱颖而出，主要不在于她下乡的举动，而在于她体现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北戴河会议精神。

从董嘉庚到董加耕

邢燕子回乡时只有高小文化，董加耕的情况就不同了，他是江苏省盐城县龙冈中学高中三年级的的高才生，各科成绩平均在96分以上，又是团支部书记、优秀运动员、文娱积极分子，可谓德智体俱佳。但是1961年的春夏之交，他在升学志愿表上只写了“回乡务

农,立志耕耘”八个字,并将原来的名字董嘉庚改为董加耕。

在关于他的先进事迹报道中有这样两段对话:

“党培养你十几年,难道是要你去扶犁把子吗?”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第一线,解放前第一线在枪林弹雨的战场,现在的第一线就是广阔的农村,我去农村正是党所需要的。”

“青年人应有远大理想,你的理想哪去了?”

“我的理想是从我做起,发动群众,共同搞好农业生产。”

在全国范围宣传的青年典型中,对下乡务农有这样清醒的认识,董加耕是第一个。他十分清楚他的举动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他身上有着更多的自觉成分,思想基础很稳固。

董加耕干得很出色,1963年当上了生产队长。1964年江苏省委号召“学习董加耕自觉革命的精神”,团省委发出了开展学习董加耕活动的通知,《人民日报》在《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社论中,称赞他是“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他走的道路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

邢燕子这个典型告诉人们的是,要大办农业,多打粮食,度过灾荒,而董加耕则成为“一个知识青年的好榜样”,他提出了一个“道路”和“方向”的问题,这样,上山下乡这个老问题就有了新的内涵。其实,它只不过是回到了毛泽东在1939年讲过的那段著名语录上去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考察新中国青年上山下乡史,董加耕是一个重要的分区,从他开始,上山下乡的目的和意义有了重要的变化,由主要是为了多打粮食,变为青年实现革命化的重要途径,这一命题开始带上了越来越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一变化,不能不同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指示有关,不能不同1964年毛泽东强调要重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讲话有关。

这里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邢燕子和董加耕不是“下乡”而是“回乡”。邢燕子虽然父母都在城里，但是她多年与乡下的爷爷住在一起。董加耕的家就在农村，那里有他的亲人和伙伴，他从农村里走出来而后又回到农村去，所以他不会感到寂寞和孤独，也不惧怕农村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劳动强度。与下乡相比，回乡青年自身的思想斗争及引发的矛盾都要小得多。

“特别的姑娘”来到窦家桥

在董加耕回乡的第二年，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走来了一位“特别的姑娘”，她戴着一副白塑料框架的眼镜，显得那么文静，她的名字也透出文静——侯隽。当时不少人还不认得那个“隽”字，读不准音，更搞不清字义。侯隽的父亲是华北电力设计院的工程师，母亲是教员，也只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才起得出这样隽雅的名字。

与邢燕子和董加耕相比，侯隽身上的知识分子气味更浓一些。她在北京房山县良乡中学读高中的时候，曾经获得过北京市教育局发给的“品学兼优”奖章，1962年初夏高中毕业考试时，7门功课全都是5分，大学校门在冲着她微笑，她也在心里一次次勾画过当文学家、艺术家的设想。但最终她还是舍弃了这一切。十年之后，她在谈到下乡的动机时回忆道，她“只是看到农村连遭三年自然灾害，对各方面影响很大，感到发展农业很重要，决心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做点贡献。”

下乡以后，侯隽给农民读报，办墙报，办夜校，教他们唱歌，学文化，领着年轻人建果园，改造盐碱地，给村里带来一股新鲜活泼的空气。她自然受到农民的欢迎，赢得了五好青年五好民兵五好社员等一连串的光荣称号，第二年她又被评为河北省的优秀团员。侯隽在农村的作用，似乎主要不在于务农方面，而在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授科学知识方面，她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更是一个

文化的传播者,所以她尤其受到农村里青年人的拥护和喜爱。

侯隽是怎么来到宝坻县窦家桥大队的呢?原来,窦家桥是她一个中学好友的老家,中学好友在窦家桥还有房产——她父亲土改时分到的一间小屋,但是除此之外,好友在窦家桥已没有一个亲人。这个从窦家桥出去的姑娘,不久就再次离开了窦家桥,去当代课教员,而北京来的姑娘却留在了这无亲无故的异土他乡。她形单影只,内心常常涌起孤独和悲凉。

这时,黄宗英来了。

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到宝坻县蹲点,偶然听说了侯隽的情况,她想鼓励一下这个遇到困难的姑娘,跟她做几天伴,于是就搬进了侯隽的小土屋,并且与张久荣合作写下了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发表在1963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样,侯隽就出名了,引起了关注。周总理也派人来看望过她,还带话给她,说这是一个方向。外界舆论和上级领导的关怀,坚定了侯隽在窦家桥扎根的决心。邢燕子给她写了信,她也去司家庄看望过邢燕子,从此这一对相距不过100多里地的姐妹,就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邢燕子成名于1960年,董加耕回乡于1961年,侯隽下乡在1962年,他们都成了全国青年的学习榜样。但他们又有所不同:邢燕子是高小毕业,董加耕和侯隽是高中毕业,品学兼优,可谓名副其实的知青;邢燕子和董加耕是回乡,侯隽是下乡,遇到的困难和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要大得多;邢燕子和董加耕偏重于搞好农业生产,侯隽则在发展农村文化教育方面有更多贡献。

1964年12月,22岁的邢燕子和23岁的董加耕出席了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他们被选为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坐在一些仰慕已久却未曾谋面的领导人中间,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董加耕恰好与董必武坐在一排,董老握着董加耕的手说:“好哇,青年人,路子走得好,我的侄女董良泽,跟你一样,1957年高中毕业,就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到甘肃去了,她也在那里安家落户了,你们都是有志气的好青年,有志青年志在

四方!”

会议期间,12月26日晚上,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费,宴请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人大代表,其中有王进喜、陈永贵、钱学森、余秋里等,都是在各自的战线上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邢燕子和董加耕则是青年人的代表,他们两人的年岁最小,安排的位置却最好,一左一右坐在毛主席的身旁。毛主席赞许地对他们说:你们都干得好,干出了成绩!他还对董加耕说:读了12年书,再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这样很好!光是读书,就把人读傻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赞成青年人读完书再到实践特别是农业生产实践中去,这是他一贯的主张。

马寅初大声惊叹:不得了!

今天的中国知识界,恐怕没有谁不知道马寅初这个名字,这位蒙受冤屈屡遭批判的老人仍然活到了100岁,1982年5月10日去世。去世前最使他欣慰的一件事,是他的《新人口论》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政府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付诸行动。

1954年,70多岁的马寅初以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浙江视察。在他的家乡嵊县,几个侄儿都来看他,还领来了侄孙儿,他数了数,侄孙儿有九个,马寅初心里一怔:一下子生了这么多!在一次会上,他讲完这件事后大声惊叫道:“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建国以后,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人口数量激增。1949年全国人口是5.4亿,1954年突破6亿,1955年达到6.1亿,在1950年到1957年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期内,全国平均年增加人口1300万,年均增长率达到22‰,八年净增人口10486万。

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教育事业和就业机会的增长。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披露,全国将有57万多初中毕业生、236万高小毕业生不可能升学。如何安置他们?1957年4月

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说：“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到了1963年，这个日益突出的矛盾终于引起了中央的足够重视。1963年在中国城市青年下乡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国家把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作为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作为今后精简城市人口的主要内容。周恩来总理指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编制出15年的安置规划。

15年！它的漫长性充分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1964年1月，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关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它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阐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它是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之后起草形成的。

决定中说：“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城乡青年结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稳定农村青年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队伍，也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决定还说，今后每年要拿出一笔专款作为安置经费，主要用于解决住房问题，其次用于生活补助等。国家用于安置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的经费，1963年约1.5亿元，1964年约2.8亿元，1965年约2亿元。

决定一出，举国响应，1964年城市知识青年的下乡人数达到32万，超过了以往历年。

飞向雁窝岛

1963年到1965年那几年,每到临近毕业,许多中学里都有人提出要放弃升学、下乡务农的申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们被一种革命的激情所激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成了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口号。

1964年4月,北京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来了一批年轻的乘客,他们一上车就忙活开了,扫地、擦窗户、倒开水,满车旅客夸他们是“活雷锋”。这是由国家农垦部和北京团市委组织的一个赴黑龙江垦区参观团,团员是北京一些中学的高三毕业生,全都是优秀共青团员或学生会干部,一共49名。他们先到了东北农垦总局,听了垦区的情况介绍,然后分头乘坐汽车,到国营农场去参观。

女14中的沈宝英坐在解放牌汽车上,心情异常兴奋:北京城里没见过这么蓝的天、这么黑的土、这么广阔无垠的田野,她尤其羡慕那些拖拉机驾驶员:坐在驾驶台上,一拉操纵杆,机车就轰隆隆地启动了,在一马平川不见边际的黑土地上,你就只管开吧,开多快都行。她怦然心动,跳出一个念头:我到这里来开拖拉机吧!

那次行程的高潮是在雁窝岛——853农场的四分场。雁窝岛面积有200多平方公里,土壤肥沃,但三面环水一面是沼泽,进岛的惟一通路,是那片被称作“大酱缸”的沼泽地。当年为了开发雁窝岛,26岁的共产党员罗海荣一人推着两个柴油桶凫水前进,不幸被沼泽吞没;一个进岛的家属要临盆,可是没有大夫,也没有其他女同志,两个小伙子用一个刮胡子刀片,为雁窝岛上的第一个女婴接了生。这一个个或豪迈或悲壮的故事撞击着北京学生的心,他们激动地提出:毕业后我们要到雁窝岛来,现在就签名!沈宝英抢先把她的名字留在了雁窝岛上。

回到北京,沈宝英他们就写出了上山下乡的申请书。学校、教

育局和团市委,都舍不得把这么多优秀学生骨干放走,他们想出种种理由挽留,但是学校没能留住他们,北京也没能留住他们。1964年9月,正当大雁南飞的时候,32名北京各校的优秀共青团员乘车北上,来到雁窝岛,落户在雁窝岛。他们最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特点:坚决听党的话,热情,具有献身精神和崇高的理想。

比沈宝英他们早一年,也是在大豆摇铃的秋季,也是在雁窝岛,来了一个个子不高,脸庞圆圆的北京姑娘,身上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衣服,脚上穿一双半旧的农田鞋,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她说话不多,老爱抿着嘴笑。到生产队的第二天,队长照顾她,让她去食堂帮助择菜,她却说:“大家都下地,干嘛偏把我留下?”她拿起一把镰刀,跟着大伙儿一道割大豆去了。

她的名字叫朱玉珍,谁也没有想到她是朱德的孙女儿,连队长贺铁军也没想到。一直到八年之后,贺铁军才知道了她的真实身分。“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娇气都没有,根本看得出来是中央首长家的孩子,可朴实了,后来当了卫生员,还给队里的妇女接过生呢!”贺铁军感叹地说。

原北京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万里同志的长子万伯翱,18岁高中毕业,就穿着父亲在战争年代穿过的灰军装,按照父亲的嘱咐,带着家里给的15元钱,到河南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园艺工人去了。他住的是草房,睡的是通铺,点的是自制的煤油灯,每月吃九块钱的大锅饭伙食。春节到了,大部分老职工都回家和亲人团聚去了,宿舍里几乎走空了,万伯翱心中涌起一种孤独,一阵凄凉,他真想回家去看看,又怕爸爸不答应,就给妈妈写了一封信。

他很快就收到了信,信是爸爸写的,既有挂念之情,又有勉励之意,信中还抄录了一首郑板桥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愿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万老大”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下乡一年半之后,就成为河南省上山下乡积极分子报告团的成员,周恩来、贺龙和当时的北京

市长彭真,都对万伯翱的表现和万里送子务农的行动给以赞扬。

原农垦部副部长兼东北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张林池的长女张晓华,1963年高中毕业后,到当时全国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友谊农场,在五分场二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张家素有俭朴的家风,子女穿的是带补丁的衣裤,吃的是食堂大灶的伙食,身上没有一点“娇”气和“骄”气,所以张晓华下去之后很快就跟队里的职工搞得很熟,融入他们之中。

《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中说:“应当号召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动员自己在城市不能升学、就业的子女下乡务农”,这“对于移风易俗,改变社会风气,推动城市的动员工作,有重大作用,应当大力提倡。”一些党的负责干部甚至高级干部,都响应党中央的这个号召,动员子女或孙子女上山下乡,这一举动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推动了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务农的浪潮。

1965年9月25日,《人民日报》的一则消息称,自五十年代到1965年,全国有“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成为新农民”。另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提供的数字,1962年秋至1966年夏,全国有129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插队87万,到国营农场42万。

几百万中学生何去何从

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讲到“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的背景时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

上山下乡这一运动最实际最直接最明显的效果,是一下子就解决了已经积压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的分配去向问题。

当时在校的中学生有多少?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中说：全国66-68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有近400万人。而整个老三届学生的总数，则超过了1000万。中小学都人满为患，无法接收新生。要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当务之急是解决毕业生的分配问题。

有关这方面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在1968年4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工作报告。这一文件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一个是第一次援引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再一个是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分配方针，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四个面向”，按顺序排在首位的，是“面向农村”。两个半月以后，6月20日，《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又提出：“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四个面向”成了“三个面向”，独独少了“面向工矿”。

1967、1968两年，全国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一些工厂停产，城市就业机会大大减少。而农村是一个容量相当大的“广阔天地”，理所当然地成了吸纳城市毕业生的主要场所。

从青年人的政治方向上考虑，上山下乡这条道路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作为正确路线给以肯定。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最鲜明不过地表明了中央的观点：“上山下乡”的方向是“正确的，属于革命路线”。所以，尽管过去的许多做法许多理论都在“文革”中间被颠了个个儿，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面大旗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依然被广大的红卫兵所信奉，所高举。

对上山下乡的宣传也大大地加强了。先是老标兵出来发言，邢燕子和侯隽的文章同时刊登在1968年6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接着是新典型引路在前，7月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的通讯《杜家山上的新社员》，同时配发了《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的评论，此外还有旅大市15名

女青年落户山村、山东三万名知识青年在农村做出贡献、黑龙江省两万名城镇青年到边疆安家落户等一系列报道，形成了一个小气候。

从1968年4月4日的中央文件下达开始，许多城市都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开始了对“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的高中初中毕业生）的分配。京津沪杭等毕业生数量多的大城市，都把眼睛盯向了黑（龙江）蒙（内蒙古）陕（西）山（西）等地域辽阔人口容量较大的省区，纷纷派人前往联系。此时是城市求助于农村。北京知青曲折记得在一次安置会上，北京市几位领导“恳求”几个省的安置办领导：“内蒙古的同志已经说了，再安置六万，哪个地方能不能再安排一些？再给我们减轻点压力！”市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甚至“双手抱拳，作揖请求”各省来的同志们“帮帮忙”，“求求在座各位了”。

毛泽东发出号令

上山下乡运动的基础在一天一天地扩大夯实。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在1968年底发出那段著名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就不成那么大的声势和规模。一位著名学者在一次讨论会上讲过一句话：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要搞清楚上山下乡运动，就必须搞清楚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1968年7月末的一天深夜，毛泽东紧急召见著名的北京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其直接原因，是清华大学的武斗已经持续了100天，而7月27日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却受到了学生们的阻拦和驱赶。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

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如果有人继续反对解放军,跟解放军打仗,毁坏交通工具,杀人放火,那便是犯罪,要坚决消灭之!”毛泽东对红卫兵已经失望了:他们太狂妄了,太不听话了。毛泽东在一年之前就希望他们“复课闹革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希望整个局势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他们就是不听,闹派性,搞武斗,到处制造事端。持续百日之久的清华大学武斗,死亡12人,损失数百万元。现在他才看清楚:贯彻执行他的思想和主张的忠实可靠力量,不是红卫兵而是工农兵。“7·27”是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8·18”是红卫兵的节日,1968年的“8·18”,《人民日报》为“纪念毛主席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发表了一篇《坚定地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社论。社论说:“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不需要轻视工农的知识分子”。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长篇文章,里面公布了一条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阶级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中还写到:“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这里有一个重重的强调:工人阶级才是领导一切的。到8月底,首都的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

后这一办法普及到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校,红卫兵被全面地置于工人、解放军的领导和管理之下,往日的辉煌黯然无光。由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认为:“这就标志着狂热的红卫兵运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由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认为,姚文元8月26日的文章“实际上宣告了运动的红卫兵阶段的突然终结”。

1955年12月毛泽东发话:“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全国合作社,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语录里边的知识青年以教育者的身份出现,农村需要他们,是因为农村需要科学和文化。

1968年12月毛泽东又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在这段讲话里,知识青年以被教育者的身份出现,他们需要农村和农民,因为他们需要接受再教育。

13年之间,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位置颠了个个儿。它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目的和意义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第二章 挺 进

第一支队伍

1967年10月9日。北京。天安门前金水桥畔。

国庆节刚刚过完，节日的气氛尚未消散。马恩列斯的大幅画像依然注视着长安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孙中山的画像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睿智的目光与城楼上毛泽东慈祥的目光遥遥相对。

这一天平平常常，这一天又很不平常，一清早天安门广场就聚了许多人，还打着横幅，这情景使得过往行人心生疑窦：今天又有什么重要活动？

这不是官方的活动，这是民间自发的活动。这个活动在当时显得平淡无奇，而在后来却被说得意义非凡。事情很简单：有10个北京中学生要到农村去，到内蒙古的牧区去，去与贫下中牧相结合。这一天是他们出发的日子，这一天是亲朋好友们送行的日子。

10个青年人，穿戴整齐，英姿勃勃地走来了，他们在首都中学红代会负责人、25中高三学生曲折的带领下走到金水桥前，面向领袖画像整齐地站好，举起右手庄严地宣誓：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

10个青年在人们的簇拥下，踏上长途公共汽车，出发了，北上，向着辽阔无垠的大草原。很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里广播了他们的消息，紧接着《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这件事一下子就在北京传开了，在全国传开了，在一大批正处于苦闷彷徨寻找出路的中学红卫兵的心中，引起了剧烈的震荡。

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支有组织有影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队伍，他们是一场轰轰烈烈规模空前的大运动的先声，有人甚至说，正是他们才引来了那场轰轰烈烈规模空前的大运动。

曲折是25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由他参加发起成立的首都红卫兵团，后来成为北京市最大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曲折善于独立思考，遇事有自己的见解，他成了首都中学红代会政治部的负责人，主管宣传喉舌《兵团战报》。但是，三月份成立的中学红代会，四月份就分裂为“四三”与“四四”两派，整日争吵不休。曲折对此深感厌倦，产生了上山下乡的念头。

曲折的这个想法并非一时萌生，他是个关心时事政治，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邢燕子董加耕侯隽不止一次地燃起过他心头的火炬。1963年他初中毕业时，就想放弃升学下乡务农，为此他找过作家赵树理。赵树理对他说，咱们国家虽然解决了石油的问题，但“两弹”上天的问题没有解决，“粮棉过关”没有解决，你们青年人应该为国家的振兴多学些文化知识。这样，曲折考入重点高中继续求学。1966年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又一次产生了放弃高考上山下乡的念头，而恰在此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无疑深受60年代初期青年学生树立的那些榜样人物的影响。那时候为了发展农业（或许还有精简城市人口的需要），新闻机构曾大力宣传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城市青年学生中的先进人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赵耘等一批‘身居茅屋，心怀世界’的青年楷模，对不

甘平庸的中学生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在此期间,曾去狼牙山进行过社会调查的女八中学生郭兆英,多次和我谈起广大农村缺乏知识的窘况,谈起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大大影响了我的思想。后来她和我一同走向草原,成了我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妻子。这样,自然而然地,在我而对‘与工农相结合’方式的选择时,上山下乡就成了合乎情理的首选目标了。”

10月14日,经过五天的跋涉,十个北京青年到达了目的地——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白音宝力格大队。豪爽的牧民烧好奶茶煮好扒肉,热情地欢迎“北京来的客人”。蒙古包里挤满了人,有的是从几十里以外骑马赶来的,他们送来了炒米、奶豆腐和炸果子。

曲折在内蒙古草原整整生活了16年,一直到1983年才回到北京。他为自己的儿子起名叫光明——“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曲折他们的举动,对于当时无所事事又寻不到出路的中学生,具有一种启示:要革命吗?要表现你的虔诚吗?那么就走上山下乡的道路吧!因此曲折他们一开这个头,忽啦啦就有一大批人陆陆续续跟着下去了。一个月之后,去内蒙古插队的第二批中学生出发了。这一批有400人,分乘20辆汽车,整整一个车队。11月的内蒙古已经开始下雪,大片的雪花在无边的原野上漫天飘洒,那气势,那场面,真叫恢宏壮观,不论向哪里张望,都是一片白茫茫、灰蒙蒙。城里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感觉到天地之大,世界之大。他们在汽车上吟诵起那首古老的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他们去的也是锡林郭勒盟,一路到西乌珠穆沁旗,一路到东乌珠穆沁旗。当时,东乌珠穆沁旗的48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3万多人口。

之后,黑龙江国营农场也来招人了,学生们陆续走了。这些都是往北方去的。转过年来,到了1968年,就有往南走的了。他们走的更远,云南省的西双版纳,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地方。

“北京五十五”

我费了几番周折才打听到伍穗平的电话,又在电话中联系过多次才约定了见面的时间。他很忙,现在是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董事长,而28年前,他是第一批去云南的“北京五十五”之一,而且是发起者与组织者之一。

我推开南长街上一扇虚掩着的朱漆大门,眼前是一个精致的小四合院,一个清洁而幽静的地方。一个开始发福的中年男子闻声出来:“你找谁?”“伍穗平。”“我就是。”语言简洁利索,人显得很干练。我随他走进一间宽绰的办公室,我们落座,喝茶,开谈。

“当时我们为什么去云南?很简单,第一,老闲着没事干,打派仗又打腻了,我们开始考虑出路问题;第二,云南靠近越南,是前线,去云南也是想打仗,参加抗美援朝。”

“北京五十五”的最早发起者,是东城区25中、65中等学校的一批红卫兵,高中生为主,其中有一些是老高三。尽管他们在红卫兵组织甚至在东城区红代会中都担任了一定的职务,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高中都毕业了,大学又不招生了,总得要工作吧,总得要走向社会吧,应该及早打算,选一个理想的地方。

李镇江在大串连的时候去过云南,还长途跋涉到过西双版纳。那里的热带雨林,傣家竹楼,叫不上名字的鲜花和水果,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真是一块奇异的土地,真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当地人告诉他们,国家缺橡胶,过去橡胶只有海南可以种,现在西双版纳正在试种,帝修反卡我们脖子,进口橡胶很困难,我们一定要种出“争气胶”!李镇江他们怀着一种浪漫的色彩提出来:去云南!更多的人响应:去云南!到西双版纳去,建设我们国家的第二个天然橡胶基地!

伍穗平找来地图,用手在上边画:“我主张去河口,西双版纳跟缅甸、老挝接壤,河口跟越南接壤,又有铁路跟河内相通,要参加抗

美援越，非去河口不可！”“对对，去河口，我们去河口！”那些自认为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神圣使命的红卫兵，谁不想尝尝亲手打美国鬼子的滋味！去河口的意见又占了上风。

西双版纳也好，河口也好，反正云南是去定了。一个方案迅速地酝酿、成形、成熟。他们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成员有王树理、苏北海、伍穗平、何龙江等人。伍穗平说：“我们这批人相对成熟些。”

1967年10月，当曲折他们向北出发的时候，伍穗平、何龙江和张劲辉也向南进发了，他们身上带着东城区红代会的介绍信和大家伙凑的钱。这是一支三人先遣小组，任务是与云南方面商谈下乡的事并能取得他们的同意。

火车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在武汉还要转一次车，整整坐了一个星期的硬板儿，腿都坐麻了。刚刚走出昆明火车站，就听到了枪声。这是他们头一次听到真正的枪声，“这是越南战场上的枪声！”伍穗平脑子里很快闪过一个念头，他很激动。但是他错了，这枪声来自昆明市区，两派之间武斗正酣。

当时，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还没有成立，最高权力机构是军管会。军管会边疆组的负责人叫桑传宝，是一位级别很高的军人，他热情接待了首都来的小客人，仔细看了他们的介绍信，笑了：“我很佩服你们的勇气，我也很愿意帮助你们，可是，事情并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你们要到边疆安家落户，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哪个上级？”“反正，我们省军管会决定不了，你们北京市革委会也决定不了。”“那，就要找党中央国务院了？”桑传宝笑而不答。

三个人去时兴冲冲，回来心忡忡，找谁去批准呢？要是没有一个大人物批准，这件事就要泡汤了。

有人提出：我们去找周总理，周总理一定会理解我们，帮助我们的。“对，找总理！”“可是我们怎么能见到总理呢？”“总理很忙，不可能有时间听我们详细的口头汇报，我们写一个材料，找个机会递上去，如果总理批示了，问题就解决了。”他们马上坐下来，斟酌、措词，充分陈述理由，写好了一个报告。

11月下旬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东城区红代会接到一个通知,要他们派代表,11月27日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布置复课闹革命问题。

中央领导里边会不会有周总理?但愿会有周总理!

张劲辉、林力和张春荣几个人赶到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会已经开始了。他们进了南门,走进会议室,一眼就看到了主席台上的周总理。周总理坐在主席台的中央,正在专心听一个红卫兵的发言。几个人高兴得要跳,紧接着又沮丧得要哭:他们走得太急了,写好的报告没有带来,这可如何是好?赶紧再写一份!好在他们已经写过一份,读过多遍,许多话语和段落都记熟了,所以写起来并不费力。三个人坐在后排,也不理会台上在讲些什么,只管小声地嘀嘀咕咕,有人回忆,有人口述,有人笔录,为了让周总理能看得清,他们特意把字写得大一些。

“我们是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地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向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信的末尾落款是“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匆匆写就,几个人又轻声读了一遍。在总理休息的时候,他们递上了报告:“总理,我们是东城区的红卫兵,我们要求到云南去参加边疆建设,请您能支持我们的行动。”

总理接过报告,很快地浏览了一下,说:“你们也是来参加会的

吧,刚才已经讲了,马上就要复课了,你们应该积极复课。”

“总理,我们都是毕业生,要是不搞文化大革命,我们都已经毕业了。”

“那好,你们的报告和想法我再详细看看。”总理把他们的报告拿走了。

开完会,走出人民大会堂,不远处电报大楼的钟正好鸣响,“呀,都一点了!”初冬的夜风充满了寒意,三个孩子不禁打了个寒噤,但他们的心里装着一个热乎乎的希望:总理会支持我们的。

第二天上午,不,应该说是当天上午,东城区红代会的电话机响了,一直守在旁边等消息的王树理、苏北海、何龙江争抢着拿起话筒。电话是市革委会打来的,要他们马上到市革委会的接待办公室去一趟。

一个中年女同志微笑着接待了他们,然后拿出一张细长的纸,那张纸正是张劲辉他们前一天夜里在人民大会堂写就的报告。报告的上方是周总理的笔迹:“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 周恩来”。旁边还有李富春副总理的批示:“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

按照李富春同志的指示,北京市革委会立即联系,云南省很快来了人,带来了意见:第一,欢迎北京青年去云南参加边疆建设;第二,为了安全,不宜去红河州的河口,建议去西双版纳;第三,人员最好不要多,50人左右为宜。

但此时消息已经传开,要去的人越来越多。五人领导小组开始从志愿者中进行挑选,挑选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表现,而不是家庭出身。人员一个一个地选定,名单上最后有了55个名字,他们来自十几所学校,以东城区的为多,以六六届和六七届的高中毕业生为多。1968年2月8日,55名北京知青登上了征程。

昆明市内,武斗依旧,枪声依旧,两派依然箭拔弩张,但他们对来自首都的一队知青都表现出极大的友好。55个人打着一面红旗在街上走,红旗上写着“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战斗队”。这红旗标明

了他们的身份,也成了他们的保护伞。他们在昆明休整了两天,洗澡、洗衣服、写信,两天后换乘汽车开拔。云南军管会考虑到武斗的形势,特意派了一个班护送。

汽车驶过元江的时候,伍穗平在车上大声宣布,这条江经过河口一直流到河内,进入越南境内就叫红河了。55双好奇的眼睛一齐射向车外,射向桥下的江水。汽车渐渐驶近西双版纳,驶近热带雨林,奇异的花,奇异的树,引得车内响起一阵阵欢呼和惊叹。七天火车,五天汽车,当他们2月21日到达位于景洪县大勐龙的东风农场时,离家已经整整两个星期。可是汽车继续往前开,一直开到一个山坳里,这里是东风农场疆锋分场五队,一年以后这里改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六营五连。55个人就在这里落脚了。

南京的燕子飞到了鄂托克

无论是曲折们还是伍穗平何龙江们,在谈到当时要下乡的动机时都使用了同一个词:厌倦。他们对无休止的派仗感到厌倦,对无意义的争吵感到厌倦,他们对当时的自身处境不满意。有一个学生在一篇日记中写出了这种自己对自己“不满意”的心情:“我冷静地思考了一下这些天的生活,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词儿来:虚度!刚想到这个词儿我吓了一跳,再仔细一想我的确是在虚度。什么叫虚度?虚度就是碌碌无为。保尔说,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们现在整天在干什么?我们在学知识吗?我们在创造财富吗?工人每天生产出产品,农民每天打出粮食,解放军在保卫着祖国边防,他们不声不响地埋头工作,我们却趾高气扬地侈谈革命,究竟是我们在于革命,还是工农兵在于革命?我们对社会究竟做了些什么贡献?”

红卫兵要摆脱虚度,从厌倦中走出来,要再创一个壮丽的“辉煌”,所以他们选择了上山下乡。

1968年的夏天,南京市南师附中、九中和二女中的一些学生,

也发起了一场去内蒙古插队的浪潮。先是南师附中的几个学生,给国务院和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写信,要求到内蒙古插队,他们选定的目标是科尔沁,因为第一,文学作品中常看到科尔沁草原这个地名,第二,从地图上看,科尔沁离边境线很近,是反修前线。他们通过亲属的关系,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九中的同学动手稍微晚一些,他们围着一张地图看来看去选择地点,最后选中了沙漠地区的苏尼特、阿拉善、鄂托克旗和乌审旗,并给这些地方的革委会写了决心书。8月23日,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们把这份决心书转交给了许世友,第二天,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就受许世友的委托,接见了南师附中、九中和二女中的同学,对他们要求去内蒙古的行动表示赞同。

8月27日,正在焦急等待之中的九中同学终于接到了内蒙古鄂托克旗革委会的电报,电文中说:“我们高兴地接到你校林联勤、吴大同、黎亚明等12名红卫兵小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自愿来我旗安家落户的信,表示热烈欢迎并坚决支持,对抱有与你们同样思想的应届毕业生愿来我旗牧区安家落户,也表示热烈欢迎。……望你们办好一切手续,提前来电通知我们。”几天之后,他们又接到乌审旗革委会内容相同的电报。南京市革委会认为,去内蒙古的知青不宜分散在几个地方,还是安排在一个盟比较好,便于照顾也便于管理,他们就同这两个旗进行了频繁的磋商联系,初步决定安置500名南京知青。但是这个消息迅速在南京市各个中学里传开,要求报名的人非常踊跃,有的同学甚至写下血书,这样,安置人数又增加了一倍,达到1000人。

据当时在鄂托克旗革委会工作的海男说,当时鄂托克旗的态度非常积极,他们想接收全部南京知青,但这件事被全国劳动模范、乌审旗乌审召公社的女带头人宝日勒岱知道了,她提出这批知青不能全部给鄂托克旗,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商定,鄂托克旗接收800人,乌审旗接收200人。1968年10月21日,1000名知青乘坐的火车驶离南京火车站。

海男说：当时鄂托克旗有 25 个公社和农牧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公路大部分是自然路和二级土路，班车是些敞篷卡车，即便交通条件好的公社，也得隔日才发一辆班车，有的公社因沙大，汽车根本开不进去，只能骑马或步行。鉴于牧区公社生活条件相对比农区公社强一些，因此决定 800 名南京知青全部放在 13 个牧区公社。”

这里的牧区和锡林郭勒的牧区可没法比，没有那么大的高原，也没有那么好的草原，这里的草不是芨芨草，而是沙蒿。

1968 年 12 月 21 日，一个漆黑 寒冷而又热闹喧腾的冬夜

风声越来越紧，政治空气中有一种令人躁动不安又激动兴奋的东西在悄悄地流淌。1968 年 12 月 21 日晚，一个漆黑寒冷的冬夜，一个热闹喧腾的冬夜。新华社第二天播发的一则报道说：

“从昨夜到今天，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

“在震撼夜空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各地军民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画像和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色宝书，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在欢腾的海洋里，人们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

当然，反响最强烈的是青年人，是中学生，因为毛主席的这条指示主要是针对他们而发。

也是在那个严寒的夜晚，成都市 19 中的红卫兵高举红旗敲锣打鼓，举着“坚决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决心书，一边奔跑，一边高呼口号，朝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涌去。由于行动快，态度坚

决，他们得到一个光荣的任务——全校 1000 多人到川滇两省交界处贫穷落后的渡口市农村去插队。杭州市的游行一直持续到午夜，市重点校杭州二中的红卫兵向市革委会表示：不留城市，全部下乡！

两年前，衡量“革命”的标志是破四旧，大串连，揭发批斗走资派。两年后，当红卫兵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上山下乡又成为衡量“革命”的最新标准。革命的热情又一次迅速地在追求“革命”的红卫兵心头燃起，谁都惟恐落在后面。学校里再次贴满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申请书甚至血书，报名的办公室里挤满了人。“炸了营了”，“乱了套了”，有人用这两个词来形容当时的情景。更多的人形容说，真跟要上前线打仗一样，都争着抢着要走。

1951 年 1 月 3 日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了上海一位电车工人寄给毛主席的一张照片和一封信，照片上是三个可爱的同胎女婴，电车工人在信中满含感激之情，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三个女儿的关怀抚养。17 年后三姐妹一起中学毕业，一起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她们的名字叫咸慕真、咸慕和、咸慕群。

中国第一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的撰写者杜鸿林，家里是哥儿仨，哥儿仨在一篇联合撰写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哥儿仨当过红卫兵，接受过‘红太阳’的检阅，‘横扫一切’号令一下，我们即刻冲锋陷阵；‘接受再教育’号召一下，我们哥儿仨脚跟脚奔赴广阔天地。大哥去了宁夏，老二去了北大荒，老三去了晋东南。一家七口，分散在全国五个省市生活。老大一去 14 年，老二一去 7 年，老三一去 15 年，我们的青春年华几乎全消磨在贺兰山下、太行山上、完达山中。我们身体尝到的苦楚，我们亲眼见到亲自听到的他人的苦楚，完全不是知青文学所能全部反映出来的。”

三姐妹、三兄弟，是千千万万下乡青年的代表，这样的例子，这样的故事，在那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运动中实在太多太多了。

上山下乡，有插队，有国营农场，有建设兵团，有本省的，有外

省的,还有市郊的。除了京津沪等几大城市跨省安置外,其他基本上都在省内安置。压力较大的浙江、四川两省分别与黑龙江、云南联系,杭州宁波温州青年去了黑龙江,成都重庆青年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原杭州市知青办副主任任茂堂说,1968年底“最高指示”一发表,浙江省就同黑龙江省联系,黑龙江省经过研究,同意接收一部分浙江青年,第一批是1969年3月出发,到黑龙江省合江地区的同江、富锦、依兰等县插队,走了3000多人,整整三个列车;以后,黑龙江兵团也同意接收一部分,大兴安岭也要人,去黑龙江的人就多了起来。杭州市还有一批学生自愿去了宁夏六盘山区的固原县,那是一个缺水的贫困地区。

在一切去处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字眼是“兵团”,青年们都认为“兵团”是“兵”,铁了心要去当兵。家长也感到兵团有解放军管理,过集体生活,每个月有固定工资,送孩子去兵团心里比较放心。那个时代的青年人,都不甘平庸,渴望崇高,不甘宁静,渴望激昂壮烈、建功立业,不甘做一个普通平常的工人农民,要去承担起解放全人类的重任伟业。

1968年到1976年,上海市的中学毕业生有253万,下乡101.7万,占40%,其中1969年到1971年这三年下乡61.1万人。1969年到1973年这五年,杭州市下乡青年约12万人。

不让下的硬要下

本书开头讲到的那个温融雄,读者们大概还都在惦记着他的命运。他成功了,他甚至比大队人马还提前7个多小时抵达昆明。因为知青坐的专列是临时加车,常常要停下来给运行计划内的火车让路。当吴鹤翔他们来到下榻的昆明工学院时,温融雄引人注目地站在欢迎的人群中,他高高地挥起臂膀,高声呼叫着战友们的名字。这支队伍是最高指示发表以后来到昆明的第一批知识青年,温融雄又是这批青年中最先到达的第一人,他坚决要求上山下乡的

戏剧性举动,引起了赶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极大兴趣,记者饶有兴趣地详细询问了温融雄的上山下乡经过,并把他作为典型人物写进新闻报道之中。有了最高指示,有了新闻舆论,温融雄的行为得到了支持和鼓励,他破例成为上海首批到云南下乡的第1001人。半年之后,他出席了东风农场和思茅地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成为那一批知青中的第一个先进典型。

温融雄并非是那批上海下乡青年中的惟一例外,就在他们乘坐的那列车上,还有比他隐蔽得更深更巧妙的“漏网之鱼”。当年的上海知青、现在昆明大学任党委副书记的卜安奇回忆说,徐汇区的张小妹,在同学们的帮助和掩护下,白天躲在厕所里,晚上混在同伴中,居然躲过了老师的眼睛,跟同学们一起平安无事地抵达昆明。三个月后她才补办好户口关系,成为一名真正的云南国营农场职工。26年过后,她依然留在云南,在省里某机关做负责人。

“文革”以前下乡的沈宝英回北京去接知青,走的时候,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分不清哪是批准了应该走的人,哪是没批准非要走的人。不让走的非要走,挤在车厢里硬是不下车,沈宝英一遍遍地动员:“没办好手续的同学请下车!”但是没有人下车。她的喉咙干了,嗓子哑了,可是毫无成果毫无办法。一车人都拉走了,都拉到了北大荒。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学生是一群虔诚狂热的信徒,“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谁也挡不住。

刘凯已经两天没回家了,自打他跟妈妈吵翻了离家出走之后,他妈就再没见过他的影子。他妈开始还赌气:我看你在外边能挺几天,有本事你就永远别再回来,可是刘凯真的不回来,他妈就着急了。她先是把刘凯的弟弟派出去找,找了一天没有结果,紧接着她就跟厂里请了假,亲自出马了。

她先从刘凯平素最要好的那几个同学家找起,那几个同学都在家里整理物品,打点行装,做出发前的准备,他们都说好几天没

看到刘凯了,还问刘凯到底走不走了。刘凯妈妈气得说:人都找不到了,还往哪儿走!都是你们撵撮的!我们家都走了一口子了,他爸爸已经当插队下部去了,干嘛非得让我们再走一口子。

同学家找完了,就找亲戚朋友家,她跟他们诉说着内心的焦急、忧虑:“这孩子可真不让人省心,开头闹着要跟几个同学去内蒙古,我不让他去,我说内蒙古那地方都是少数民族,吃牛羊肉,你是海河边上长大的,你吃得惯吗?你没看《苏武牧羊》吗?就是苏武牧羊去的地方,冰天雪地,看不见人家,整天守着一群羊,在早那是发配犯人去的地方,干嘛非要上那地方去。他说这是毛主席号召的,同学们都去。我说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也没说非得去内蒙古呀,你回咱老家,上山东你舅舅家去,也有个照应。他就不干,跟我吵哇闹哇,闹完了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到谁家去了。要是真在谁家藏着倒也好,我就怕他万一出了什么事,让人给害了……”

刘凯哪儿去了呢?他躲到一个同学的舅舅家去了,那个同学叫王晓宁,他的舅舅舅母都是走资派,被关着办学习班,写检查,不让回家,家里只有两个孩子,住一大套房子,很宽敞,刘凯就住到他家去了。王晓宁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小,不会做饭,刘凯就每天帮着买菜,做饭,三个人处得很好,但刘凯心里毕竟不踏实。王晓宁每天来给他通一次消息:“你妈妈今天又上我家去了。”“你妈今天上你二姨家去了!”“你妈已经让人打电报把你爸也找回来了!”“你妈今天找刘老师去了!”“你妈找派出所报案去了,说你失踪了,可能让人给害了,这下事情闹大了,再不你干脆回去吧。”

“我要是回去还能出得来吗?一回去就哪儿也别想去了!我妈那脾气你还不知道?”

“那你也不能老让你妈这么着急呀,再不,你给你妈写封信,报个平安。”

“行,我这就写,一会儿你帮我邮了。”

第二天刘凯妈妈就收到了这封信。她拿着这封信又呜呜地哭起来了。正好刘凯爸爸刚进家门,妈妈拿着这封信跟他诉委屈:“你

回来了,你管管你这儿子吧,我是没办法了,非要上内蒙古,内蒙古那地方吃的都是牛羊肉,一股腥膻味,他在家一点羊肉不吃,还爱生冻疮,在天津还年年生冻疮呢,内蒙古那地方那么冷,他能受得了么?”

爸爸把信拿过来读了一遍:

“妈、爸:我现在挺好的,这里住的比咱家还宽敞,吃的也挺好的,饿不着冻不着,你们放心吧。去内蒙古的事我决心已定,走之前我就不回家了,到了内蒙古我一定给你们写信,望二老保重身体,不要为我担心。儿 刘凯。”

爸爸读完倒笑了:“孩子啥事也没有,你也别着急别牵挂了,他非要走,就让他走吧,下去锻炼锻炼,吃点苦也好。你看,我下去插队,饭也吃得香了,觉也睡得好了。”妈妈的火气又上来了:“你没着那个急,没受那个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这两条腿都快跑断了!这么着,你回来了,刘凯的事我一点不管了,说咋办,你就咋办吧!”

后来爸爸说通了王晓宁,跟刘凯见了一面,问清了都要带些啥东西,回到家里一样一样地收拾齐了,装包,打行李。他妈嘴里抱怨着,手上忙活着,一会儿要给带上这,一会儿要给带上那,他爸爸说,这又不是去安家过日子,罗罗嗦嗦带那些东西干啥?他妈说,你咋知道不是安家过日子,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都难说。这一点他妈倒比他爸看得长远,他爸以为儿子跟他一样,下去干个一年半载就回来了,他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一直到了出发那天,妈妈才在火车站上看到刘凯。见到儿子她心里一点气也没有了,一个劲地嘱咐,一个劲地抹眼泪,刘凯虽然嘴硬,但心里酸溜溜的,觉得对不住妈妈。

其实刘凯对上山下乡没有那么多想法,什么改造世界观啦接受再教育啦,他都没想过,他只知道同学们都走我也走,毛主席号召的谁也拦不住。

曾经在 1966 年 8 月 18 日那天登上天安门城楼,为毛主席佩

戴红卫兵袖章的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没有随大队人马上山下乡,而是跟一个要好的女伴一起,自行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这时她已改了一个名字叫宋岩。可是那时阿巴嘎旗的知青办有文件:凡是没有经过组织,盲目流入的零散知青,一律不予接收安置,各社队如果私自收留安置,旗里不拨给安置费。公社不接收,宋岩却坚决要留下,她和她的同伴暂住在一个同学的蒙古包里,一住就是几个月。许多同学出面帮她到公社说情,后来额尔登乌拉大队的牧民们又挤在一间土屋里,整整为这件事争论了一个晚上,说她在学校里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还是学生党员,这么好的青年不留下来太可惜。最后采用举手表决的草原民主方式作出决定,宋岩才以合法的新牧民身份留了下来。

她能吃苦,乐于助人,工作能力又强,所以跟牧民跟同学们都相处得很好,受到大家的喜欢和爱戴。

1968年,在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北京还有一些学生自发地零星地去了西藏,其中有一支队伍是101中、13中和33中的十几个同学组成的。战若英说:“我们之所以选择西藏,是那里的贫穷、落后、愚昧以及那里极其艰苦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吸引着我们去锤炼自己的意志,召唤着我们去奉献美好的青春,我们要在西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准备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当时没有去西藏的任务。但这件事还是被中学的工宣队知道了。一天下午,工宣队把战若英等人找了去,动员他们放弃去西藏的想法。墙上正好挂着一张中国地图,战若英走到地图前,指着那一片褐色的区域动情地说:“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最贫穷最落后最需要人去建设的地方,我们就是冲着这里的艰苦去的,我们要把自己的青春、知识和力量贡献给西藏,贡献给西藏的130万翻身农奴。”双方一直僵持到半夜,谁也说服不了谁,学生们耍了个花招,虚晃一枪,口头同意,方才得以脱身回家。

准备工作更加保密,并且决定尽早启程,以防泄密,以防有变,以防节外生枝。他们在初冬的一个夜晚悄悄登上351次快车,先到了西宁,又换乘汽车,走青藏公路,经过十几天的颠簸,经历了种种高山反应,终于站在了雄伟壮观的布达拉宫前。刚进藏时,他们被安排在拉萨市第二招待所,食堂里每天吃的是糌粑,只有星期六才供应米饭馒头和水煮萝卜。他们吃不惯糌粑,常常饿肚子。商店的货架子上几乎都是空的,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从衣服鞋袜到牙膏卫生纸,都要自己大包小包从内地带来。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当听说医院的血库里没有血了急需献血的时候,战若英和她的同学孙小梅还毫不犹豫地献出了450毫升鲜血。

战若英在西藏整整生活工作了12年,把她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那片雄浑粗犷的高原。

六口之家走了四口

包雷对北大荒早就有一种向往之心,不是想去工作,只是想去看,在她想象中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她考上高中那年,爸爸参加了一个工作组,到黑龙江的大庆,去总结抓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爸爸是上海总工会的秀才,那次去的人几乎全是秀才。据说那次任务是薄一波交办的。当时大庆刚出油,地理位置还保密,爸爸寄回家的信封上,写的地址都是安达。爸爸去了很长时间,回来后,讲了许多大庆的事情,讲了好多黑龙江的景色:辽阔的黑土地,肥沃的黑土地,人烟稀少狼群出没的黑土地,到了冬天则是茫茫白雪覆盖着的黑土地。对于在人口稠密的繁华上海长大的包雷来说,那种景色太有诱惑力了,她在脑子里想象着勾画着那片黑土地,她真想亲眼一睹那片神秘的黑土地。

但是四年以后包雷真的下决心要去黑龙江的时候,她可早没了那种浪漫的情思。爸爸成了走资派,被关押挨批斗,爸爸省吃俭用多年购置下的古字画线装书被查没一空,那是爸爸最心爱之物

啊！一家七口人挤住在一间 20 多平方米的屋子里，每月生活费只有 65 元！在学校里，这个过去深得老师和校长欣赏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成了修正主义的黑苗子，黑五类子女。太阳怎么一下子就没有了？天空怎么一下子就暗淡下来了？包雷感到压抑，她再也笑不出来了。她是长女，妈妈把 65 元钱交给她，让她安排一家人的伙食，她每天不必再去做那些费神的数理化习题，腾出脑子来，精心算计怎么用那 65 元钱让一家人吃饱肚子，而且能尽量吃得好一点。她买最便宜的菜，一毛钱一堆的包圆儿菜。

就在停课的日子里，她们几个在学校里受人歧视的同学，一起到上海郊区的一个公社去劳动。那里没有冷脸和白眼，没有造反派和大批判，只有河汊、菜地和稻田，她们可以高声说话，开心地大笑，她们光着脚丫，把裤腿挽得高高的，在地里走，在水里走，学会了种菜、摇橹和划船，真是开心，她们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包雷体会到农业劳动的乐趣，她想起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她有些乐不思沪了，她真想就留在这个地方，留在这个谁也不认识她，谁也不知道她是走资派女儿的地方干农活，她觉得那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后来学校复课了，后来黑龙江农场来招人了，来的人在学校里做了一个报告，那报告一下子勾起包雷对黑土地的向往，勾起她心底的夙愿，她要去黑龙江，一定要去。要求去黑龙江的人很多，只能优先安排六六届毕业生，优先安排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女。形势对包雷很不利，因为第一，她不是六六届而是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学校动员六七届去崇明岛的农场；第二，她的父亲正挨批斗，她不是红五类。她的好友岳华来找她商量，岳华比她还不利，是六八届的高中毕业生，分配还没分到她们头上，但岳华有个有利条件，她是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

两个人一块去区革委会招待所，一块找黑龙江来接知青的同志，软磨硬泡地交涉了好久都没有结果。她们的倔强脾气上来了：要是不同意我们去黑龙江，今天晚上我们就不回家！说完了，两个

人就走到招待所的大门口坐下来。

她们心里也没有底,她们不知道究竟能不能走得成。

岳华讲起话来很快,叽叽喳喳的像小鸟,包雷则显得沉稳持重,这不仅仅因为她大一岁,更因为她已经操持起全家的生计安排,生活的重负使她变得沉稳早熟。两个人在一起,大部分时间是岳华讲话。包雷偶尔插上一句,但她能把话讲到点子上。岳华的脑子转得飞快,不时想出一个又一个主意,包雷则对这些主意的可行性做出判断。两个人说着,聊着,时光就在这说话间从她们身边悄悄地溜走。夜色越来越浓,月光越来越亮,招待所大楼里的灯光一盏又一盏地熄灭了。此时已是九月初秋,子夜时分天凉如水,岳华的母亲不放心,出来寻找女儿了。

老人已经60多岁,是街道上的积极分子。她虽然在感情上舍不得女儿走,但是在理智上她还是支持女儿走,因为这是革命行动,否则她也不好去说服动员人家。老人家很通情达理,她来陪伴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女儿,这是一种无言的支持。母亲的加入,大大增加了她们的实力和她们的说服力。

夜半更深的时候,招待所的大门开了,一位男同志走了出来:“唉呀,真是拿你们没办法了,看来你们真是铁了心,我们领导研究了半天,同意接收你们了!”

两个姑娘一跃而起,心里顿时盛满了狂喜。

“老人家同意吗?”

“不同意还能来陪我们?”

“这是两张表,你们赶紧拿回去填一下,该盖章的地方要盖好章。三天之内办好手续,迁出户口和粮油关系,记住,就三天,到时候手续办不完,可就是你们自己的责任了!”

岳华一把夺过那两张表:“没问题!”

回家的路上,她们兴奋地商量着怎么去办手续,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哪一道关节可能会有麻烦,还要找哪个人去疏通一下,这几天里还要准备些什么行装物品等等。岳华的妈妈一句话也没有讲,

女儿没批准的时候她去帮她们说话，女儿真地要走了她忽然感到有种酸酸的失落，她心里很乱，还要考虑这三天里给女儿带些什么。唉，这就是当妈妈的心啊！岳华突然放开嗓子唱了一句：“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包雷打了她一下：“都几点了，你要把人都吵醒啊！”对了，几点钟了？岳华妈妈看了一眼手表：已经是凌晨一点十分了。

尹湘一直没睡，她不时地看一眼手表，为了不惊动老人和孩子，她关了电灯，在黑暗中静静地躺着，静静地想着。大女儿包雷还没回来，晚饭也没有回来吃，招呼也没有打，都半夜了，她跑到哪里去了？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随时都可能发生，一些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在瞬息间发生了，大祸从天而降。尹湘的心里没有底，她尽量往好处想，自己安慰着自己：雷雷这几天一直张罗着要去黑龙江农场，是不是又为这事找人活动去了？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门被轻轻地推开了，脚步很轻，蹑手蹑脚，但妈妈还是听出来了，是雷雷回来了，她扭亮电灯，看到的是一张容光焕发的脸。“妈妈，我被批准去黑龙江了，三天之后就要出发！”

尽管尹湘有这种思想准备，但这消息还是来得太快太突然了：“三天就要走，这么急？准备东西都来不及。”

“我跟岳华两个人是特批的，别人手续都办完了，我们是后补上去的。”女儿很兴奋，一点离家远行前的悲伤也没有。

说心里话尹湘不愿意雷雷走。丈夫还在关着，每天挨批斗，婆婆的肝癌已经到了晚期，下边还有三个孩子，她一个人要照顾老又要照顾小，亏了有雷雷这么个帮手。雷雷不仅成了她管家上的得力助手，在精神上也是她一个小小的依靠。尹湘对别人不好讲的事情，可以跟她讲一讲，商量商量，她这一走——。这些话尹湘都没讲出来，她只是轻轻问了一句：“学校不是让你们去崇明农场吗？”

“妈妈，我想走得离家远一点，我想到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

方去,那样我才能完全摆脱掉阴影!”

尹湘明白女儿说的“阴影”是什么,她理解女儿,她自己又何尝不想逃避开那个死死罩在她头上的阴影,可是她不能,她对这个家庭负有责任和义务,那就让女儿走吧,只要她高兴,别拖着她一起在家里受罪了,为了女儿,再重的担子我一个人担起来,尹湘决定了。但是她要对女儿说几句话:“你自己选定的路自己去走,妈妈不会拦你,但是你一定要考虑好。上了路就要走到底,不能回头!”说完,母亲去给女儿热剩饭。

奶奶其实也一直没睡着,肝癌的疼痛折磨得她无法入睡,对孙女儿的惦记牵扯得她无法入睡。母女俩的谈话她都听到了。这时她支撑着从床上坐了起来:“雷雷,过来,到奶奶这儿来坐一会儿。你要走了?”

奶奶这句平常的话语,把雷雷满脑子的兴奋和惊喜一下子全打跑了,对老人的依恋和怜悯一下子涌上她的心,涌进她的眼眶。她是奶奶从小带大的,她知道奶奶病情的严重程度,她知道奶奶每天被疾病折磨得那种痛苦的样子,她知道奶奶已经有了腹水,已经不久于人世。她忽然感到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一直到28年后她讲起那一幕情景时,仍然是唏嘘不止,不能自己。

奶奶摸索着从床头的小柜子里拿出一个陶瓷罐,那是一只盛盐的罐子,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上窄下宽,像半个腰鼓,表面上涂着一层釉,很亮。罐口有一个碗形的小盖,碗盖倒扣着,严丝合缝。奶奶用两只青筋暴露的老手摩挲着那个陶罐:“这是盛盐的,能盛五斤盐,你把它带上。盐可是好东西,到哪里也离不了的,再苦的日子,有了盐,腌点咸菜就饭吃,日子就能好过些。你把它带上。”奶奶一定也意识到了这是永别,她流着眼泪说完这几句话,她把一生的体会都凝聚在这几句话里。后来雷雷在收拾行装的时候,奶奶亲手用线衣线裤把那盐罐包得严严实实,亲手放进她的木箱里。

奶奶果然在包雷离家半年后去世了。当时包雷正在深山老林里架电话线,她请不下假来,也拿不出回家的路费。读完妈妈的信,

她捧着奶奶送她的那只盐罐，跑出帐篷，跑到一棵大树下，朝着家乡的方向，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

三天飞快地过去了。包雷在这三天里办好了所有要办的手续。妈妈帮助她收拾好了行装，她的行装很简单，被子、蚊帐、茶缸都是四年前她参加八一体操队时部队发给的，基本上没买什么新东西。离家的前一天晚上，班里的同学来看她，来了二十多个人，把一间屋子挤得满满的。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件礼物，大部分是一个硬皮的笔记本，上面写着勉励的话、告别的话，在当时，一个硬皮笔记本要一块多钱，对于中学生来说已经是一件很珍贵的礼物了。妈妈留他们在家里吃饭，家里实在做不出像样的饭菜，妈妈煮了一大锅面条，给每人盛了一碗，没有那么多凳子，大家就站着吃，一边说话一边吃，这顿面条就成了包雷离家前的告别饭。

9月15日是包雷出发的日子，那是一个阴雨天，雨下得很急很大，密集的雨点豆大的雨点劈里叭啦打在马路上，溅起一片白色的雨雾。妈妈去送她，弟弟妹妹也要去送她，只有奶奶出不了门，硬撑着身子下了地，硬撑着身子把孙女儿送到大门口，看着她一步一回头地消失在瓢泼大雨之中。虽然打着伞，他们的衣服还是全都淋湿了，雨水从头发上流下来，顺着面颊流下来，分不清哪是雨水哪是泪水，包雷只记得那雨水是咸咸的。火车站台上却热闹非凡，锣鼓喧天，人声杂乱。包雷很快就被赶来送行的同学们包围了，她顾不上跟妈妈说话，妈妈也没有办法跟她说话。火车开了，一个个熟悉的身影看不见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就从那一刻开始了……

包雷走后不久，包雷的妹妹包雨也走了，包雨的弟弟包丰也走了。包雨去江西省峡口县插队，包丰去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林格尔插队。三个孩子，天南地北各一方。

不久，爸爸终于“解放”了，爸爸是在“火线”上解放的，解放了就得下乡，不是当插队干部，而是当“带队干部”，带着知识青年一道下乡。上海市下去了上万名带队干部，最高的行政级别是九级，全部去了黑龙江。包雷爸爸去的是呼玛县荣边公社，那个公社就在

黑龙江边上，有八九个带队干部，一百多个插队青年。他跟着知青去修公路，住的是帐篷，帐篷扎在荒草甸子上，四周围看不见人家也看不见炊烟，极目所望尽是半人高的荒草。荒草里有很多蛇，早上起来穿雨靴，脚刚伸进去，蛇就噌地一下窜出来。

修公路要炸石头，有一次遇到了哑炮，导火索点着了，炮就是不响。两个上海知青自报奋勇去排哑炮，炮却轰地一声响了，两个孩子当时就被炸死了。他们被葬在黑龙江畔，墓碑上的字是包雷爸爸写的，大家都知道他是秀才，写得一手好字。他在写墓碑的时候，想到三个下乡的孩子，他在心里默默祷祝自己的三个孩子平安。

就在包雷爸爸写墓碑的时候，包雷的奶奶进入了弥留之际。孙子孙女和儿子一个一个相继离家而去，深深地刺激了老人，她的病情发展很快。老人在昏迷恍惚之中，嘴里常常呼唤着儿子和孙子孙女的名字。她最后的愿望是能在临死前再看他们一眼，但她这个最平常的愿望却无法实现。老人怀着深深的思念和遗憾撒手人寰。尹湘刚刚料理完婆婆的后事，她自己久病卧床的父亲也突然逝去。尹湘的日子一点也不比丈夫和儿女们好过，她一个人承受着接踵而来的打击，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她给分散在天南地北的四个家庭成员写信，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办各种事情，购买和邮寄各种物品，她要完成四个人交办的任务，她这里是四个人的大本营、后勤部、指挥中心和联络中心。多少次她累得要倒下，但她在心里告诉自己说我不能倒下，有我在就有这个家在，有这个家在他们几个人心里就会好过些。家——这是天南地北四个人心里的一座航标、一个灯塔。

不想下的也得下

1968年12月22日，是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上的一个分区点、分界线，上山下乡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和方式：在那之前只是安置毕业生的一条重要途径，在那之后成为全体毕业生非

走不可的必由之路；在那之前是号召式的，在那之后是命令式的；在那之前基本上是自愿的，在那之后更多是强制的；在那之前是部分的，在那之后是全体的，是“一片红”。“一片红”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68年9月的“全国山河一片红”，而现在是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一片红，一个不漏。

浙江萧山的陈洪兴，本来已经分配去工厂，12月23日上午9点多钟班主任老师来通知他：工厂的名额一律取消，毕业生全部去农村插队。他的命运在两天之内就变了一个样。杭州市在1968年12月之前的政策是30%的毕业生留城，70%下乡，最高指示一出，改为百分之百全部下乡！上海杨浦区法院副院长刘忠定回忆说，上海市六六、六七、六八届毕业生都有一部分留城的、参军的，到了我们六九届，就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路，校革委会说，因为毛主席已经有了指示。那时去的地方有黑龙江、云南、江西和安徽。大家都觉得黑龙江太冷，云南太远，比较之下还是去江西和安徽插队最好，一是离家近，二是气候条件跟上海差不多，三是有大米吃。江西和安徽一下子成了好地方，要求去的人很多，所以首先要照顾独生子女，我是班干部，要带头，所以报名去了云南。刘忠定说，当时如果不下乡，就有人24小时上门做动员工作，三班倒，直到家里同意下乡，直到从派出所迁出户口才肯罢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后来出现的一切弊端，一切后遗症，都在这个“一片红”上。

1969年成为建国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一共有267.38万人。

上山下乡成为一件政治任务，学生所在单位、家长所在单位和家庭所在的街道，几个方面协同作战多管齐下，编织成一张密密实实的网，就像大除四害那年月里捕捉麻雀的网，谁也休想漏过去。重点是做家长的工作，家长要承受各个方面的压力，每日每时的压力——上班时来自单位，下班后来自居委会。

1968年张治林只有16岁，身高一米四，体重54斤。妈妈壮起胆子去找学校的工宣队，说女儿又矮又小又黑又瘦，能不能晚一两

年再下乡，工宣队师傅回答：“革命不分年龄大小长得高矮胖瘦，当年参加红军的放牛娃也是又小又瘦，如今不是都成了老革命？”

就这样，上山下乡的大红喜报贴在了张治林家门上。她看着那张喜报心里想：这比起三年前红卫兵贴在我家门上的“抄家通告”简直是一个飞跃了，因为现在别人强制我去革命了，而那时是不准革命的。于是她带着一床旧蚊帐布改成的“新被盖”、一件妈妈穿过的烂毛线衣、一张灯草席和一个印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茶缸下去了。

但是几年之后当她在广阔天地里吃尽种种苦头的时候才恍然大悟：“抄家通告”失去的仅仅是“金银珠宝细软”，而那张大红喜报要她付出的却是她的整个青春。她说，我宁愿再来一百次抄家，也不愿要那张喜报。

两个心酸的故事

从哈尔滨去佳木斯，走公路，要经过依兰县。依兰县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松花江自西而至，牡丹江从南而来，两江在此相遇相融，合二而一，继续东行。依兰县的历史很久远，传说中曾经是宋代时期金国的都城，名曰五国城，被金国掳走的宋代徽钦二帝，就关押在五国城的一口枯井里，坐井观天。

六十年代末，依兰县接收了两批杭州市的下乡青年，每一批有千八百人。他们自西子湖畔钱塘江边而来，在松花江畔金国古都品尝着生活和劳动的苦辣酸辛。

我们的好友力群，就是这两批青年之一，她给我们讲过这样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下乡的那一年。

杭州市清泰街道有一个女青年，叫冯月文，她的父亲是个开私人诊所的医生，“文革”中遭到批斗。冯月文是个独女，既无兄长，又无姊妹，而且患有很重的肾炎，但街道上不肯放过她，每天来人到

家里动员,在她家里办学习班,一遍又一遍地学语录。父母开始还能保护她,后来他们连自己都无法保护,整天被拉去斗争批判,哪里还顾得上可怜的女儿。不下乡既成了父母的罪状——破坏革命运动,也成了女儿的罪状——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19岁的冯月文悄悄地报了名,悄悄地整点行装,她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衰迈的双亲,她不愿在他们那血迹斑斑的心灵上再划一道口子。

父母毕竟是父母,他们最了解女儿,最敏感地注视着女儿,他们心里已经明白了女儿的意愿和举动。母亲最后一次硬着头皮,壮着胆子,去找市里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她申辩着:我们不是舍不得女儿走,她实在是病啊,她的肾炎很严重!她拿着医院的诊断给他们看,可是没有人看,没有人理会她。可怜的老人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静静地哭了一场,她哭得好痛快,在家里她从不曾这么酣畅淋漓地痛哭。她知道,一切都已不可挽回,她不知道,女儿此去几时能回。

冯月文坐上了火车,一列专为知青增开的火车向着途远的东北方出发了。她在火车上就犯了病,病得很急,很凶。幸亏她带着药,父亲给她带了满满一大书包药,幸亏火车上配了一名医护人员,于是给她输液。葡萄糖药瓶从行李架上悬挂下来,随着火车的震动而摇晃,冯月文看着洁净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落下,就像一滴一滴的眼泪。她心中忐忑,充满了不安:这才刚刚启程,劳动还没有开始,今后不知还会怎么样,我受得了么?我吃得消么?她的眼泪也一滴一滴落下来。这眼泪打动了同行的伙伴,他们去找送他们的工宣队:“冯月文这个样子,怎么能参加劳动,她不适合下乡,她没有办法劳动,应该把她送回杭州,把她留在杭州!”工宣队应允了。黑龙江省本来就有三不收的政策:身患重病者不收,父母审查未结案者不收,高度近视不收。工宣队答应到目的地后,冯月文将随他们一道返杭。

这列火车的终点是佳木斯,下了火车转乘汽车,是解放牌大卡车,知青们或坐或蹲,拥挤在一起。汽车驶出佳木斯市区,便转上一

条黄沙铺就的公路，疾驶的汽车卷起了公路上的沙尘，飘洒在知青们头上身上脸上，此时正是秋末冬初，放眼看去，四周草木枯黄，一片苍凉景象，青年们开始议论，开始不满：怎么是这种地方，跟原来讲的不一样嘛，还要把我们拉到哪里去？车厢里开始有了小小的骚动。

汽车不理睬这小小的骚动，继续驰骋前行，暮色时分，在一个公社停下了。这个公社有个挺怪的名字：道台桥（道台是清朝的官吏）。低矮的土坯房，房顶苫的草已经发黑，下了车要找厕所，转来转去找不到，经人指点，原来是用炕席围起来的一小块地方，粪坑上搭着几根木头，坑里的粪便已经溢满，这些城里来的孩子吓得捂着鼻子跑出来，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怕人的厕所。

骚动变成了抗议，变成了反抗，愤怒的知青把工宣队围起来：“这里的情况跟原来讲的不一样，这种地方我们不要待，我们不要待！我们要回杭州，回杭州！不把我们带回去，你们也别想走！”工宣队噤嘴着：“我们也没来过，我们也不知道，情况都是听他们讲的……”

冯月文经过一路的颠簸，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她疲惫极了，找了个地方坐下来，静静地看着那激愤的一幕，看着事态的发展。她只想着一件事情：我要回杭州，我要回家，工宣队已经答应过了，他们答应带我回去，我要跟他们走。

工宣队被这群知青吓住了，如惊弓之鸟，他们知道，急了眼的知青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他们悄悄地一合计，早走为上。趁着夜半更深，趁着劳累的知青正在酣睡，他们偷偷摸摸地出了道台桥，赶到了依兰县，次日一早，就登上开往佳木斯的汽车，一溜烟地回杭州去了。

工宣队走了，知青们气得一顿骂，骂完了还得认命，分到大队、生产队，下地干活去。工宣队走了，甩下了冯月文，公社可不管病号不病号，既然来了，既然交给我们了，那就都得往下分，都得干活，谁也不能例外。冯月文跟着两个女友，住进了一户老乡家。第二天，

她浑身浮肿，起不来炕，连下地去厕所的力气都没有。生产队没有大夫，没法输液，只能吃带来的口服药。她躺了两天，社员们开始议论了：你瞅她，白白胖胖的，哪像有病的样？就是娇气，怕苦，不想干活！这些社员们不懂得：那哪里是什么胖，那是全身浮肿，是肾炎病情加重的症状。

冯月文躺了一个星期，不想吃也不想喝，到后来，进入一种半昏迷的状态。女友们心慌了，找到队长，要求送她去县里的医院。队里的马车还要干活呢，腾不出空来，再等两天吧！又过了两天，知青们在马车上铺了一床被子，冯月文已经不能行走，被人背上了马车。马车拉着白白胖胖的冯月文，向县城进发。刚刚下过一场雪，雪不大，被冬日的车轮碾化，于是黑上路上有了泥浆。两个女友一边一个，守护着冯月文。冯月文已经神志不清，迷迷糊糊地进入了弥留之际，她在昏迷之中感觉到车身的晃动，感觉到原野上呼啸的风声，感觉到射透了她眼睑的冬日，这几种感觉都是她未曾体验过的，她感到新奇，她就在昏昏沉沉迷迷蒙蒙之中，带着这几种新奇的感觉沉入了永久的寂寥之中。

几天之后，道台桥多了一座土丘，土丘前放着一个花圈，那是分散在道台桥公社几个生产队的知青们扎制的。花圈上的白纸条在寒风中瑟瑟抖动，哗哗作响，坟前的一伙知青谁也不作声，他们中有好几个人根本不认得冯月文，即便认得她的，过去也没有多少深交，因为冯月文是一个沉默寡言十分内向的人，但他们都是“知青”，是一个车皮从杭州拉来的知青，单凭这一条就足够了，他们没有想到，刚刚一个月过去，他们中间就少了一个人，他们没有想到，面对的是如此严峻冷酷的现实。冯月文走了，他们想到了自己，他们自己又会怎样？前面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谁也不知道，谁也答不出，只有一种凶多吉少的不祥之兆。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一年之后。

第二年的寒冬到了，干了一年，万一新拿到了47元钱，这是他

拿到的第一次分红,这是他除了口粮之外一年劳动的全部所得。

除了兴修水利、积肥,冬天的东北农村没有什么活计,社员们大部分时间守在热炕上,一边用裁好的废报纸卷烟叶抽,一边东一句西一句有一搭无一搭地唠家常。这叫“猫冬”。对于知青,冬天是探家的季节,他们开始准备回家了。

万一新也在算计谋划:这47元钱,刚好够他回杭州的路费,可要是把这些钱全当了路费,家里的双亲怎么办?明年的日子怎么办?他是独子,不能在家侍奉老人倒也罢了,总不能空着两手进家门吧?明年的零花钱也要从这里挤出一点,年迈的父母已经没有能力在经济上来贴补他,这些,他心里很清楚。

于是他打定一个主意:逃票!

他把47元钱用一个手帕仔细地包好,仔细地藏在脚上穿的棉乌拉鞋里,便跟着同伴小宋一道上路了。

那个年月,知青坐火车逃票是很普遍的事情,原因很简单:路遥远,收入少,又想家。火车上查票的,也常把知青做为重点查验对象。小万跟小宋,两家住的很近,从小就在一起玩耍,在一个学校里读书,又一道下乡,是很要好的朋友。小宋家境好一些,买了车票,两人用这一张票,顺利地 from 佳木斯到了哈尔滨,又顺利地登上哈尔滨开往上海的火车。小万是个老实孩子,从来没干过违法的事情,头一次无票乘车,心里自然紧张,眼睛不时地往车厢两头张望,一有风吹草动,就坐立不安,慌得不行,像只胆小的兔子,提防着随时可能袭来的危险。他的神经就这样紧紧地绷着,从白天绷到黑夜,从哈尔滨绷到长春,火车过了四平、铁岭,火车渐渐逼近了沈阳。此时已是夜半时分,车厢里,坐着的站着的,或已昏昏入睡,或是昏昏欲睡,小万紧张了一天,也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

正在此时,车厢里有了小小的骚动,一帮子人从前面的车厢走过来,慌里慌张往后面的车厢走,一边走一边通风报信:查票了,查票的来了!

小万一下子睡意全无,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躲到厕所去,可是

车厢两头的厕所已全部锁死,看来这是一次计划周密的“清剿”行动。他推醒了正在昏睡的小宋,告诉他:查票的来了,我往后边去,实在不行就从火车上跳下去,你帮我把东西拿下车,在沈阳火车站候车室里等我,反正这里离沈阳已经不远了。小宋刚从昏睡中醒来,懵懵懂懂地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等他头脑反应过来,小万已消失在车厢的尽头。

查票的过来了。查票的过去了。小宋向窗外望去,窗外正下着大雪,远处有一间茅屋,茅屋里露出一一点微弱的灯火,除此而外,什么也看不见,是一片漆黑的世界。他为自己的朋友担起心来:这样大的风雪,这样深的黑夜,这样荒凉寒冷的地方,他能安全地跳下去吗?他能顺利地走到沈阳去吗?

40分钟之后,沈阳站到了,小宋带着他自己的行李,还有万一新的行李,在候车室里焦急地等候。一天过去了,万一新没有来,两天过去了,万一新没有来,三天过去了,万一新还是没有来。万一新啊,你在哪里,你是已经登上了南下的火车,还是出了危险和意外?小宋没法再等下去了,再等下去他的车票也要作废,他的身上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他带着一肚子的焦急和疑虑,登上回杭州的火车。

刚刚迈进家门,母亲又惊又喜地叫起来:“你还活着呀,你可回来啦,你没有死呀!”说着就抱着儿子哭起来。小宋着急地问:“万一新呢?他回来了吗?”母亲哭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才断断续续地告诉他:万一新死在半路上了,沈阳铁路局已经打来电报,他的父亲已经赶去了。

万一新的尸体是在铁路边发现的,他的后脑上有一个洞,像是被榔头击打的洞,这个洞要了他的命。然而他的死亡过程死亡原因,都不得而知。尸检的时候,从他的棉乌拉鞋里找到了47元钱。

一个是病女,一个是独子,依照1973年以后调整的知青政策,他们本来是可以留城的。但是在1969年不行,1970年也不行,结果,冯月文死于去县医院的途中,万一新死于回杭州的途中。

第三章 磨 炼

知青是什么？知青就是兵团战士、农场职工、生产队的社员，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他们是从学生脱胎、从城里而来的兵团战士、农场职工和生产队社员。从学生到知青，是一个苦难的历程，几乎每一步都滴淌着汗水和血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人在苦熬着，度日如年；有人在苦练着，以坚强的信念作为支撑；也有人苦中寻乐，他们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在杨武兵站的一场误会

成千上万的中学生，从踏上出发的火车或汽车那一刻起，一段旧的生活就彻底结束了，而一段未知的全新生活已经开始，他们的身份变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而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心理上都缺乏足够的准备，身上依然保留着一些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对新生活的严峻性缺乏足够的估计。

陈洪范下乡那年正好 20 岁，如今已年近半百。他对将近 30 年前发生的那些往事始终记忆犹新，甚至一些日期和数字都能脱口而出，丝毫不差。

“我们是六九年3月2号离开上海的,那一批走了1029人,到云南思茅地区澜沧县插队,坐了三天火车,3月5号晚上10点多钟到昆明。出了站,把我们全都拉到昆明一中,就住教室,教室里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我们就睡在地板上,好在每个人都带了毯子。6号7号放假两天,8号早晨汽车来了,不是城里那种公共汽车,而是带帆布篷的大卡车,就是这种卡车也不够,我们得分成三批走。我是最后一批,10号离开昆明。

“从昆明到澜沧,路上要走五天。第一天我们的汽车走了200公里,到杨武,那里有个兵站,我们就在兵站吃饭、休息。吃完饭,有人把碗乱扔,院子里到处是碗,到处是剩饭,搞得很脏很乱,很不像样子,联想到在昆明的时候有的知青在大街上抢东西,我们几个学校的头头就聚在一起开了个会,感到这个样子破坏了自己的形象,怎么去接受再教育?当时我们还是挺革命的,挺注重自己形象的。我们商量,先在兵站停留两天,办学习班,整顿好了再下去。

“第二天早晨,我们把这个想法跟送我们的工宣队师傅讲了,他们不同意,说那怎么行,要整顿也得到下边去整顿,不能在这里中途停下来。送我们的汽车是昆明运输公司的,有十几辆,开车的司机也不同意,说他们的工作是有计划的,赶回昆明去还有其他任务,不能在这里等我们。这样,我们就跟上海的工宣队和昆明的司机发生了分歧,双方谁也不肯让步,一下子僵在那里。兵站是不管我们的事情的,他们只管接待我们住一夜,吃一顿饭,其他事情跟他们没有关系。工宣队对我们施加压力,各个击破,其他几个学校的头头都顶不住了,他们来找我,说我们还是走吧,到了澜沧县再说。我说要走你们走,我不走,既然这个话是我讲出来的,就不能再收回来。结果,到快吃午饭的时候,其他学校的知青都上了汽车,汽车开走了,只有我们学校的十几个人留在兵站上。

“兵站的解放军看我们不走,很反感,认为我们是捣乱分子。他们说你们住在这里不行,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我说我们不会向你们提要求,添麻烦。我们找了一间空房子,就坐在里面,没有人理睬我

们,没有人给我们做饭吃,我们只能吃自己从上海带来的食品。有的同学开始担心了,后悔了。他们心里没有底,我心里也没有底,但是我想,部队跟昆明有专线联系,他们肯定会把我们的事情报告上去。

“兵站没有多少人,大约就是一个排,每天的事情就是做做饭,给过往的军车加加油,他们看我们老老实实地在屋子里坐着,很好奇,就来跟我们聊天,问我们为什么不走。我们七嘴八舌地把事情讲了一遍,他们说,噢,原来是误会了,你们的想法也有道理,好了,既然是这么个情况,那就吃饭吧,看你们怪可怜的。解放军本来就热情好客,给我们端来了白米饭,两个炒菜里都有肉。有个女同学是回族,不肯吃,他们又拿小锅单独炒了一盘鸡蛋。那顿饭我们吃得香极了。”

到了第三天下午,昆明果然打来了电话,要找上海知青。

陈洪范去接:“喂,你是谁?”

“我是上海静安区革委会的。你们有多少知青在那边,叫什么名字,目前情况怎么样?”

原来这件事已经惊动了上海,说是有十几个知青不见了,云南到处是山,到处是大森林,要是走失了,那可不是一件小事情!上海方面果断决定,派出静安区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还有上海中学红代会的一个负责人,火速赶到昆明。他们得知十几个人平安无恙,才舒了一口气。但接电话的陈洪范心里反倒不踏实了,自从大队人马走后,他心里一直在嘀咕:我们的做法究竟对不对?会不会受到批评和处分?主意是我出的,决定是我做的,我会不会被打成反革命?他对着手里的话筒,极力解释他的想法,申述他的理由,他急切地问了一个几天来一直萦绕在心的问题:我们的行动是不是革命行动?电话那一头传来明确答复:我们完全理解你们,你们不要有其他想法,尽快赶到思茅去,我们在思茅会面。

第二天早晨,来了一辆汽车,也是带帆布篷的卡车,陈洪范他们跟杨武兵站的战士们依依不舍地告别,又在路上颠簸了两天,颠

进了西双版纳，颠到了思茅，上海来的两个人，已经在地区革委会等候他们了。一见面，静安区革委会副主任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你们的想法有一定道理，上山下乡，就说明你们已经走上了革命道路。但是，今后还是要增强组织纪律观念，认真接受再教育。”副主任问陈洪范还有什么要求，陈洪范提出：第一，我们这几天没有很好休息，路上跑累了，在思茅休息两天再走；第二，我们不能再坐卡车了，颠得受不了，用一辆客车送我们。这两个要求都得到了肯定的答复。那天晚上，陈洪范他们在思茅的财贸学校里，睡了离家以来最安稳最甜美的一觉。

“从思茅到澜沧，还有两天的路程，第一天住在景洪，第二天日暮时分赶到了澜沧。先到的知青，全都在县里等待我们，不见我们到来，他们不肯到公社去，因为他们听到种种传言，说我们失踪了，说我们被关起来了，据说邻国的电台都广播了。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学校的，但是这件事情却让我们亲近起来。有人问：你们挨打了？我们莫名其妙，说没有呀。他们说那衣服上帽子上怎么有许多墨汁？原来我们有一个同学，从家里带了一瓶墨汁，放在旅行包里，旅行包放在汽车的货架上，中途墨汁洒了出来，我们都在打瞌睡，谁也没注意，结果出了笑话。”

那次事件给陈洪范他们一个教训：这里不是上海的学校，这里已经是社会，社会上的情况要比上海的学校里边复杂得多，光凭一股热情一股闯劲是绝对不行的，红卫兵那一套做法在这里吃不开。

全体知青在澜沧县办了几天学习班，学习如何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然后分配到各个公社和大队。陈洪范又是最后一批走的，日期是3月25号，距离从上海出发的日子，已经过了23天。

和苏联一江之隔

这是我们的一位好友下乡后给家里写的第一封信，记述了下乡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也记述了对新生活的最初感受、第一

印象,透露出昂扬的格调。

爸爸、妈妈、小刚、小强:火车7月4日上午10:38分徐徐离开北京,奔向富饶美丽的三江平原,我校只有三个女生哭了,其他同学情绪很好,一路上很快活。火车速度很快,向前飞奔,车窗两旁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一排排整齐的树木似闪电般掠过,景色总是这样。第二天早上,整个车厢开始集体请示,然后天天读,天天读不大好,大概都塌不下心来。下午三至四点学习一小时,火车在哈尔滨停车约半个小时,兵团首长上车来看我们,我和首长握了手。很多学生在站台上欢迎我们,手里拿着一个用厚纸板做的“忠”字,给我们演了节目。第三天早上三点多钟到达佳木斯,市民和工人、学生夹道欢迎我们,并喊口号“向北京支边青年学习!”我们喊“毛主席万岁!”在这儿开了欢迎大会,开完会我们就上船了(东方红10号)。原定六点开船,因江面雾大,推迟到九点半才开船。双珍贵珍等三人在哈尔滨下车到市里去玩,结果误了火车,她们后来乘晚上九点多钟的火车去佳木斯。小英和小越两人直接跟车到了佳木斯,坐船要检查两次船票,第一关两人混过来了,但第二关上船时,五个解放军还有服务员把着船口,收一张票进一个人,他们没有票,无奈只好不去了,船开动,小英挥泪告别。

“东方红10号”驶在松花江江心。松花江水很浑,有些像长江水一样,七号早上三四点钟驶进黑龙江,这时天已经亮了,东北亮天很早。船的一边是中国大陆,一边是苏联土地,两边都长着很高的野草和树丛。船有时离苏联只有几十米远,房屋、人、电线、小狗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岸边有瞭望哨,我们没有。在旧的平房中,站着一幢干净的楼房,这可能就是苏修军官和他们家属的住宅吧。我们

还看见有一片房子都是空的,可能苏修把居民赶到离边界很远的地方去住或把他们集中起来住了吧。转过后来后,到了乌苏里江,此江的水比松花江的水清多了,我们站在船的最高处,风景非常好,但我形容不出来。

县城到了,老远就听到锣鼓声,下了船,还是夹道欢迎,我们走成单行,三人一横排,边唱歌边呼口号。这儿的人都很热情,对我们都很关心,来的当天晚上我们就看了一场电影《列宁在十月》,第二天看了两次宣传队演的节目,开了欢迎大会,现在我们正在办学习班,约七天,大约17号我们就开始往各连队分了,我们全排(我校男女生)写了决心书,要求到最艰苦的连队去。这儿的同志因多是从部队上来的,因此我看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三八作风比较好,很谦虚,也较民主,革命委员会很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自我批评精神也很强,待人热情忠厚诚恳,我一定很好地向他们学习。

可能再过一两个月,秋收完毕,去天津或上海再接来一批知识青年,那我们就成了“老”的了。可能明年还要去北京接人。这儿油很多,菜总是浮一层油,一月每人一斤,豆腐很多,因自己生产大豆。我们就和苏联隔一条江,真不大相信,以江心为界,游泳、划小船都要注意,过了界他们就找我们碴儿了。我们发布票了,一人33尺,比北京多一倍,近两倍,用到今年年底。你们需要什么布来信,寄些钱来,我买了布再寄回去。33尺我没法用。

最后,希望我们在世界革命心脏北京和反修前哨共同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关心政治,在政治舞台上做一名优秀的战士。另外,以后是否能给我不断地寄些《参考消息》来,这儿除每天早上听半小时广播,什么也看不到,报纸过四天才能看到。 志群 1968年7月14日

“我要回上海!”

当年凡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六师待过的知青,没有人不知道福利屯这个地方,没有人不记得福利屯这个地方。

福利屯很小,是一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小镇;福利屯又很大,每天来往进出的人口有上万人,是一个很大的客运中转站,从哈尔滨、佳木斯、双鸭山方向开来的火车从这里驶过,通往宝清、富锦、同江、抚远、饶河诸县和兵团三师、六师各个团部的长途汽车从这里发出。福利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热闹起来了,每天在这里上车下车中转换车的旅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知识青年,他们给这座小镇这个小站带来了生气,也带来了生意,饭馆多起来了,旅店多起来了,新的客运线路也一年年地多起来了。

1968年深秋的一天,一列从上海开来的专列,满满地载来了1000多名“上海阿拉”。他们大都穿着草绿的“仿军装”,肩上背着手里拎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包,按照各自的学校和城区,在广场上站好了队伍。那么多人,一下子就把站前小广场塞满了。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一些人显得有些疲惫,但是站在每支队伍前面打红旗的人,却都那么精神焕发。

各农场的人来了,各农场的车也来了,大都是解放牌卡车,也有零星的长途客车。这些车装上人,装上行李,把广场上的青年人一块一块地切开,一块一块地拉走,拉往友谊农场、五九七农场、双鸭山农场、万宝农场……广场上渐渐空了,只剩下约400人的一支队伍。

两男一女三个人急匆匆近乎小跑着来到他们跟前。“对不起呀,我们去联系住的地方,让你们在这里久等了,同学们,欢迎你们到我们农场去参加开发建设。”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热情地对他们说。“我们场离福利屯比较远,在边境上,那里是反修斗争的前哨,所以能分到我们场的同学,都是经过严格的政审,都是各方面

没有问题的,是很光荣的!”

这短短的几句话,把青年人的热情和激情鼓动起来了。那个举大旗的青年带头呼起口号来:“打倒帝修反,扎根边疆干革命!”“永远忠于毛主席,反修到底不回头!”在那个年代,人们创作这类又响亮又合辙的标语口号的能力是很强的,几乎谁都能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农场的同志也受了感染,受了感动:“我们农场条件比较艰苦,位置也比较远,离这里还有800多里路,是几个农场里头最远的一个,坐汽车要走一天,而且还有一段是山路。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让同学们能休息一下,今晚我们就住在福利屯,明天一早再出发,住的地方,可能条件差一些,大家将就一下吧。男同学一会儿跟我走,我姓孔,同学们就管我叫老孔好了。这位女同志姓汪,叫汪红,女同学跟她走,她跟你们一样,也是知识青年,从北京来的,比你们早来了两个月。”

一群青年人这时才注意地打量起汪红来:她也是一身“仿军装”,但颜色不如上海的好看,上海知青的衣服是草绿色,而汪红的颜色偏黄。她梳着短发,右侧一绺头发用橡皮筋扎起来,这是当时女青年里边最简单最省事最常见的发式,肩上也背一个黄书包,书包盖上用红丝线绣着“永远忠于毛主席”。他们一下子对这个朴实的姑娘有了一种亲近感,因为他们的身份相同,他们一下子就围住了汪红,急不可待地向她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农场到底是啥样子?”“你见过孢子吗?那里真的是‘棒打孢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呀?”“农场冷吗?会不会冻掉鼻子?”“人家才来两个月,还没过冬天,怎么知道?”“农场吃什么?阿拉可是喜欢吃米饭!”“到北大荒是来吃艰苦的,又不是让你来吃大米的,岗都(傻瓜)!”

人群开始蠕动,开始行走,老孔冲着人群又大声地喊了一句:“还有一件事情,各学校带队的负责人,吃完了晚饭到我这里来一下,都带上花名册,因为我们那里是边境地区,路上经过边防检查

站要检查人数!”

400多知青分散开,住在几个旅馆里,安顿好了,吃完晚饭,天就黑了。男知青们住的是大通铺,一铺大炕,从这头到那头能睡五六十人。女知青受到照顾,住的是号称“三人间”的小房间。其实这种“三人间”,不过就是在—铺大炕上,用三合板一段一段地间隔开,三合板和炕面都用牛皮纸糊过,牛皮纸上又刷了黄色的桐油,在昏黄的灯光下,“三人间”是黄澄澄的。三合板离炕面之间有二三寸的空隙,人手可以从下面伸过来。汪红把大家安顿好了,跟同屋的两个女生正说话,就有一只手从那三合板下悄悄伸过来。一个姑娘吓得大叫起来,隔壁却传来一片哈哈的笑声,原来是几个同学在恶作剧。“吓死我了,这是啥旅店哪!”

这边惊魂未定,那边屋子里又叫了起来:“妈呀!这是啥东西?”“虱子!”“虱子?”“太齜齜了,太齜齜了!”汪红连忙跑过去,只见三个上海姑娘都挤在炕沿边上,炕里是摊开的铺盖,被子褥子都是黑乎乎的,被头更是一片油黑,靠近缝线处,有几个白灰色圆鼓鼓的小虫子正在蠕动。她们看见汪红进来,一把拉住她的手:“我们不要住这里,这里太齜齜了!”

不住这里住哪里呢?方圆几里的小镇上,只有这么几家旅店,基本上都是这种水平。汪红安慰了她们一会儿,又去找服务员交涉。服务员毫无办法,因为她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主,最后找到了旅店的负责人,他很不情愿地从库房里找出两匹白布来,给每个铺位加了一条“白床单”,也就只能如此了。女青年们把褥子扫了又扫,看了又看,直到确认没有“小白虫”了,才铺上那条刚刚扯好的“白床单”。至于那床黑被子,她们再也不敢碰它,恨不得把它扔出去,“太可怕了!”

汪红正在忙着帮女孩子们铺床单,听见外面有人在喊她,喊得很急,是上海女孩子的声音。“又出了什么事?”她赶紧走出来。

“大进中学的袁文文肚子疼得厉害,躺在那里直打滚!”

汪红随着那个女青年进了一个“三人间”,一位上海姑娘“唉哟

唉哟”地捂着肚子在炕上叫唤，白净细嫩的脸上渗出了汗珠，几缕头发湿漉漉地粘在额头上。

“她怎么了？”汪红问同室的一个姑娘。

“她晚饭都没有吃，一直说肚子疼，有人给她找了两片药吃下去，可是不见好，越疼越凶了！”

“你快想想办法吧，她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呢！”一个怯生生的声音说。汪红从没经历过这种事情，她不过比她们早下乡两个月，年岁都差不多，她一时也没了主意。“得上医院吧？”有人说。这句话提醒了汪红：“对，赶紧上医院！找几个男同学来，找身体好、有力气的，背她去！”

好在镇里惟一的一家医院离旅店不太远，几分钟便到了。值班的是个戴眼镜的男医生，四十多岁，姓李，他让袁文文躺在诊台上，又是听又是按肚子，袁文文又高声叫喊起来，叫得几个青年人好紧张。汪红一个劲地试探着问医生：“她是什么病，不要紧吧？”大夫也不说话，检查完了坐在桌前，在诊断书上写道：急性阑尾炎，需立刻手术。

袁文文听到“手术”两个字，又嚎啕大哭起来：“我不要手术，我不要手术，我要回家，我要回上海！”

老孔也赶来了，他走得太急，呼呼地喘着粗气问医生：“能不能不做手术，给她打打针，消消炎，保守治疗？”

“她的阑尾已经化脓了，不但要做手术，而且必须立刻做手术，手术要是不及时，就有可能穿孔，那可是生命危险！”

老孔、汪红和几个上海青年都劝袁文文动手术，可袁文文反来复去就是那一句话：“我不要手术，我要回上海！”老孔说：“你非要回上海，也得等病好以后再说，现在是治病要紧。大夫不是说了，你不做手术，有生命危险呢！”

大家都七嘴八舌苦口婆心地劝，又七手八脚连背带搀，把她送进一间病房。护士指着一张空床说：“让她住那儿！”

床很脏，墙上有一块块的血迹，袁文文又哭喊起来，还用手指

着床铺,指着墙,用上海话哭诉着,汪红听不大懂她究竟讲的是什么,就问旁边的一个上海知青,那知青告诉她,袁文文说这里有虱子、臭虫,这墙上块一块的都是臭虫血,这么脏的医院能治好病吗?她说她死也要死在上海。

“阿拉也是上海人!”一直沉默不语的李医生突然激动地冒出一句上海话。大家都一愣,袁文文的哭声立刻止住了。原来袁文文还怀疑这里的医生水平差,把她的诊断搞错了,把手术做坏了,虽然她讲的是上海话,但李医生全都听懂了。李医生本来是上海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分配到这里工作已经11年了。他临床经验丰富,福利屯的人做手术,都点着名要找李医生。

一屋子人都沉默着,一屋子人都在看着李医生。他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走到袁文文的床边:“我是一个大夫,我要对你的病情负责任,你的情况很紧急,如果不及时把化脓的阑尾切除掉,就会造成肠穿孔,还可能引起腹膜炎。现在做手术,是一个小手术,要是等到穿孔了再做手术,可就是个大手术了,麻烦要多得多了。”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换了一种诙谐的口气对袁文文说:“你还不相信我这个上海老乡吗?”

袁文文低着头不做声。李医生把手术签字单递给她,她看了一遍,又犹豫了一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老孔在单位负责人一栏里签了自己的名字。

李医生对身边的护士说:“通知手术室,马上做准备!”一会儿,袁文文就被推走了。

大家都焦急地守候在手术室的门口,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手术室的门开了,李医生手里拿着一个托盘走出来,等在门外的人呼地一下朝他拥上去。他摘下口罩,端起手里的托盘给大家看:“好险,再迟半个小时肯定就要穿孔了!”

忙完了医院里的事情,已经10点多了,老孔安排了两个女同学留下照看袁文文,要其他同学赶快回去好好休息,明天一早还要赶路。汪红走到旅店门口,昏黄的路灯下站着三个人,看样子,他们

已经在那里站了很久，看到汪红，就急匆匆地迎了上来。

“你是汪红吧？我们有事情要跟你谈。”首先开口的是个上海女同学。

“行，咱们到屋里去谈吧。”

“不，我们就在这里谈好了，他们两个男生，到我们女生房里也不方便。”

“好，你们说吧。”

一个男同学开口了：“我先向你介绍一下吧，我们三个都是上海松江中学的，他们俩是兄妹俩，他叫周胜利，是我同班同学，她叫周和平，比我们矮一届，是六七届高中生。我们现在遇到个麻烦事，想请你帮忙，你也是知识青年，一定能理解我们的心情。”

“那当然。”汪红回答得十分爽快。

“这次下乡，本来他们兄妹两个都报了名的，但是他们的父母都是干部，被打倒了，成了‘走资派’，所以政审谁也不合格。后来两个人找到学校的工宣队讲了好半天，工宣队最后同意说兄妹俩只能来一个，哥哥就把这个名额让给了妹妹，但是哥哥又不放心妹妹，所以也跟着我们大队人马悄悄地混过来了。本来他们想就这么一直混过去，到了农场，生米煮成熟饭，死活留下就是了，可是今天才知道，还要过检查站，还有解放军站岗检查，所以我们只能求你了，请你帮助给说说情，让周胜利也一道去农场吧。”

“求求你了，帮帮我哥哥吧。”周和平的声音里已经带着哭腔。

“袁文文不是住医院了吗？她不是想要回上海吗？就让周胜利来顶替她好了。”

“这倒是个办法。”汪红说。“不过，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得去请示老孔，你们等一下，我去找他！”汪红很理解周家兄妹的心情，她很想帮助他们，她在老孔面前极力帮他们说情，但是老孔说，这个名单是黑龙江省招工办和上海市安置办共同定好的，咱们没权改动它，别说咱们俩，就是咱们农场也没那个权力，咱俩的权力，就是把名单上的人平平安安地接回去，别的，啥也管不了。老孔的解释

无懈可击，汪红说不出话来了，她只能告诉周家兄妹：爱莫能助，实在没有办法。周家兄妹不死心，又去找了老孔，还是不成，看来，他们只能在福利屯分手了。

第二天一早，八辆大客车在车站前的空场上一字排开，上海知青们按照自己所在的学校和名单上了车，汪红一辆车一辆车地清点着人数，在3号车门口，她看到了正在告别的周家兄妹。两人都是眼泪汪汪，难舍难分。汪红对周和平说：“上车吧，一会儿就要开车了。”她又转向周胜利：“希望明年能到我们农场来，我陪周和平一块到福利屯来接你！”

马达响起来，汽车启动了，开走了，车后扬起一股尘土，尘土遮挡了周和平的视线，她伏在座椅上，又呜呜地哭起来。在这一刻，她那坚定的决心产生了一些动摇，她很想跟哥哥一道回上海去，她甚至有些羡慕哥哥能回上海去。

当天下午，周胜利也离开福利屯，坐火车返回上海。

一周之后，袁文文刀口愈合，在同伴的陪同下，赶往农场。

女孩子的腿泡弯了

“五一”刚过，棉裤还没脱呢，就得下水田整地了，把撂了一冬天的稻田里放进水去，用水把僵硬的土地泡软，然后用人工整平，这叫“水整地”。整地是最苦的，大约要整近一个月，等到六月初开始插秧的时候，水就温乎多了。

刚解冻的松花江水冰凉冰凉，还带着冰碴呢，通过水渠流进稻田，潘德勤带着她那个排的女生就下地了。她们的装束很滑稽：光着脚，棉裤腿用剪子豁开，系在腰上，她们就这样走进冰凉冰凉的水田里，靠两只脚和一把镢把地整平。水浅的地方到脚脖子，深的地方到腿肚子，刚进去的时候还觉得凉，一会儿就不觉得凉了，两只脚两条腿全冻麻了，没有知觉了。

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五点半，一群女孩子要在冰凉冰凉的水

田里泡一天,午饭在地里吃,谁也不上岸,谁都硬挺着,潘德勤想起了指导员在动员大会上讲的那两句文绉绉的词儿:“北国的五月虽已是春回大地,然而久冻的土层仍充满了寒意。”

上了岸可就知道疼了,嗖嗖的西北风一吹,泡了大半天的腿全裂开一个一个的小口子,满腿都是。水把肉皮泡胀了,风把肉皮吹下了,一张一缩就裂口子了。

晚上回到宿舍里,第一件事就是烫脚,洗脸盆里盛上一盆热水,两只脚往里一放,满屋子都是叫声:“妈呀!”“唉哟!”“疼死我了!”“唉呀妈呀!”一个个刚裂开的口子,热水一烫能不疼吗,可是必须要烫,不能不烫,为的是把寒气烫出来,不然要得病,烫完了再抹上蛤蚧油,一盒蛤蚧油用不了两天,抹得满腿都是,第二天照样下水田。

每个人的炕头上都贴着一张小红纸,每张小红纸上是一条豪言壮语:“举红旗迈阔步奔赴农村,顶蓝天踏荒原壮志凌云”,“为人民吃大苦青春似火,为革命挑重担冶炼红心”……

秧插上了,苗长高了,吐穗了,变黄了,水稻丰收了,该收割了,可是女孩子的腿变弯了,有的朝里弯,O形,有的朝外弯,X形,关节变形了。有个女孩子上厕所,蹲下就起不来了,都是些十六七岁的孩子,身体还没长成呢,哪受得了这种罪。今天潘德勤回想起那段日子,还能感到一股冷嗖嗖的凉气从腿上漫起。

难割的麦子

有一些知青中的“先进分子”,以一种坚强的毅力支撑着自己。

麦子黄了,麦子熟了,麦子长得有齐胸高,沉甸甸的麦穗耷拉着脑袋,罕见的大丰收,1956年建场时来的老铁道兵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麦子,他们也不会想到,从来没见过这么难割的麦子。

那是1969年的7月,郭庆晨下乡遇到的第一个麦收,那时他

在连里当排长。

兵团收麦都是机械收割为主，要让康拜因那庞大的家伙上阵，得先给它打出跑道来。郭庆晨领着他那个排十几个小伙子，一人拿着一把镰刀下了麦地。北大荒的麦地真大呀，弯下腰去你就割吧，割到吃晌午饭的时候还是望不到边。成熟的麦子秸秆很脆，镰刀磨得快快的，右手一挥，齐刷刷倒地一片，这种活干起来真痛快，低下头去是黄澄澄的麦，直起身来是蓝湛湛的天。

跑道刚打完，天就开始下雨，紧一阵慢一阵，等了两天，一点放晴的意思也没有，有句老话说“麦熟一晌，龙口夺粮”，麦收是最紧张的季节，麦收季节最怕下雨。连长一算计，500 垧麦子刚割了不到十分之一，等不得了，就召开全连动员大会，说康拜因下不去地，就打人民战争，一人发一把镰刀，明天除了伙房做饭的，全都下地。

在雨中割麦，郭庆晨可再也找不到那种洒脱利落的感觉了。麦子淋了雨，秸秆发艮，地上全是泥，挪不动步。青年们一边割一边骂老天爷。那雨慢慢悠悠不住地下，足足一个礼拜没见过晴天，1956 年建场时来的老铁道兵说没见过这么大的雨，1968 年来的小青年说我们一来就赶上了。

麦地饱和了，地上就有了积存的雨水，积水一点一点涨高，漫过了脚脖子，漫过了腿肚子，一直漫到膝盖了。麦地泡成了稀泥，一脚踩下去，拔腿都困难。水靴没法穿了，只能穿系鞋带的球鞋，郭庆晨家里正好寄来一双新球鞋，是当时最有名的“双钱”牌，他下乡时还带了一双“双钱”牌，两双球鞋倒换着穿。整整一个麦收，天天穿着湿鞋在水里泡，天天两只脚泡得煞白，肉皮抽缩。等麦子收完了，两双“双钱”球鞋全让水泡糟烂了。

雨中割麦，喝水也难，吃饭也难。送水的牛车只能把水送到地头，再找人往地里边送，麦地已经成了沼泽地，送进去也走不远，顶多走上三五十米，所以越割得快越走得远越喝不上水。郭庆晨是打头的，他找了个水壶，每天装一壶水背在身上。吃饭也是难事，知青们就盼着那一声吆喝：“吃饭喽——”可饭送来了，又谁都懒得往地

头走。

等到收工的时候你往地里头看吧，头巾、衣服、草帽、水壶、镰刀，到处都是，那是干活的人干累了干热了，顺手放下的，谁都懒得再蹬着稀泥回去拿了——宁可不要了也不愿回去拿了，两条腿都快累瘫了。

那一年的麦收从七月一直割到九月，割了42天，将近一个半月，创下了纪录。割下来的麦子也拉不回去，就在地里放着，一直等到上了冻再去脱谷。脱谷的人哪一次都带回一批战利品：头巾、衣服、草帽、水壶、镰刀……都是割麦时丢下的。等到脱粒的时候，麦穗上已经没有什么“粒”可脱了，麦粒早都掉得差不多了。

郭庆晨回忆起那场麦收说，那种干法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但当时的口号是“麦子就是政治”，“抢回麦子就是最大的政治”。最后全团麦收总结的时候还讲了一条很重要的成绩：锻炼了全团职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麦收忙完了忙秋收，割大豆，郭庆晨累得发高烧，烧到三十九度五，炊事班给他做了两大碗鸡蛋面条，他挣扎着坐起来吃，吃完了说：“再来两个馒头吧！”炊事员全乐了：“你是真病还是假病？”他自己也乐了。

第二年麦收的时候，郭庆晨就调到了团部宣传股，同伴说：这下你好了，不用耍镰刀把了。他笑笑说：耍笔杆子比耍镰刀把还累呢。他办《麦收战报》，白天跟着团领导的车下去了解情况，晚上回来写稿子、排版、印刷，一条龙作业，第二天早上再带着刚刚印好的《战报》下连队去。每天出一期，够紧张的。整个麦收期间，郭庆晨12点钟之前没有睡过觉，有时要到凌晨两三点钟，一点也不比割麦子轻松。郭庆晨说，要说苦、累，那两个麦收是我一生经历中最厉害的，有了那两次经历，以后多累的活多苦的差事都不在话下。有一次师里要汇报材料，郭庆晨一个人三天三夜赶出了六万字的材料。六万字，按正常速度，就是抄也得抄几天啊！

下乡的经历锻炼了郭庆晨坚强的毅力，“有这碗酒垫底，什么

样的酒都能对付！”后来他不论到了哪个岗位上哪个单位里，都是一把硬手一把好手，他怀念那段吃苦的经历，感激那段吃苦的经历。

卢小飞说她糊里糊涂地就当上了大队青年突击队的副队长，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让她来当这个副队长，或许是她争强好胜能干活？或许是她性格开朗敢说话？反正队里定下就是她了。

卢小飞的确能干，她自称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而这“热情洋溢”恰恰就是当干部的基本条件之一。老乡看知青，第一个标准就是能不能干活，卢小飞偏偏就是能干活！陕北女人不干的活，她干！老乡说她干不了的活，她硬干！春天积肥她专拣大筐，装得跟男人一样多，男人都说她不行，她把牙一咬，硬是挺下来了，到今天肩膀上还有厚厚的趺子。耕地扶犁是男人们的活，小飞硬是要干，一副犁杖有几十斤重，拉犁的牛又欺生，她两只手紧紧抱着犁杖走一天，到晚上胳膊累得抬不起来。她担着105斤玉米走过五里路，她背过108斤一口袋的绿豆，下一道坡再上一道坡，她背着一捆高高的庄稼，倒栽葱从山上滚下去，两只手上扎了36根刺。这些事情至今她一件一件记得很清楚。

最苦的活是掏大粪。那年冬天，七个女生六个都回家了，就剩下小飞一个。冬天没别的活，小飞自告奋勇要和男社员一起去掏粪。陕北的女人从来不干这活，冬天都是在窑洞里做些缝缝补补的家务，但小飞要开这个先例。一天的定额是三担粪，天不亮就得起来，担着一副又沉又笨的木桶，直奔那一个个秫秸秆围起来的厕所，跟抢宝贝似的。起得早才掏得到，起晚了，三担粪上哪儿找去。粪桶装满了，要挑上山，堆在一起，掺上泥土，搅拌均匀，这叫“蘸粪”。当小飞掏完了三担粪，挑着空桶从山上走下来，太阳才刚刚完整地露出一个圆圆的红脸。小飞的裤脚上沾着粪，粪桶里散发出大粪的臭味，但她心里却很得意，很自豪。肚子饿坏了，拿起馒头就吃，满不在乎，这时候的馒头真好吃，特别软，特别甜。

小飞又掏又蘸,跟着男社员一起整整干了一个月,她干得一点也不比他们少,但是到月底记工分,男社员一天记10分,小飞只给记6分。后来队干部也觉得过意不去,就开会研究小飞的工分问题,小飞也是个“长”,自然也参加会议,但对自己的事情她不好发言。就这么一件事,几个人抠来抠去,最后终于有了一个统一意见:一天给小飞加0.3个分,那年一个工合七毛五分钱,0.3个分是两分钱,为了小飞这两分钱,几个队干部整整研究了半个多钟头。小飞又生气又好笑。

我们坐在《人民日报》五号楼前的花坛上,听卢小飞讲述她二十多年前的劳动经历和思想历程。“那时候特好胜,也可以说比较‘左’吧,我非常看重艰苦劳动对自己的磨炼,认为越是苦越是累越能锻炼自己,但有的时候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自己折磨自己。当时我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怎么办》,书里的革命者拉赫美托夫那种严格的斯巴达式的生活,给我的影响很深,还有孟子讲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我当时觉得越能吃苦越光荣,这是由衷的。”

上什么山唱什么歌

北方的土地是辽阔无边的,北方的风是粗砺的,北方的格调是粗犷豪爽的。那些吃稻米长大的江南知青,到了北方改吃白面和五谷杂粮,几年之后,一些身材苗条瘦弱的女孩子长得胖胖的壮壮的,有人说是整天干活饭量大了吃胖的,有人说是北方的白面馒头养人,把她们给“发”起来了。

刘金铭的适应能力强,从上海到农场,从江南到塞北,她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和情绪,很快就学会了各种农活,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肉体上,她都没感到有过多么难以忍受的痛苦。

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吃了三天三夜的饼干面包,真想好好吃顿饭。这是到连队的头一顿饭,饭一端上来,大家都乐了:蛋炒饭!满满地盛上一大碗,一吃,不对哟,硬硬的不像是鸡蛋,再一问才知

道,那一粒粒黄的是玉米糝(sǎn)。许多人把筷子撂下,回宿舍里吃上海家乡的食品去了,但刘金铭还是把满满一碗饭都吃光了。从那顿饭开始,不管吃什么,粗粮也好,面食也好,白菜土豆粉条三大样也好,她都拿着那个足足可以盛两斤水的大号茶缸,满满地盛一缸了,下面是饭上面是菜,菜盖饭,坐在那里慢慢地把一缸子饭菜吃光。饭桌上冻着冰碴,嘴里哈出的气是白的,她照样吃得很香。一道来的女友看着她那副吃相,既好笑,又羡慕。刘金铭从来不从上海带零食回来,所以她始终食欲很好,饭量很大,原来在上海生下的胃病,在北大荒倒治好了,一直到返城10年后,她担任了上海延安制药厂的厂长,每天中午在食堂吃饭依然是三两饭两个菜,许多男同志都吃不过她。“我的肚皮在北大荒撑大了!”她一边用手比画着一边大声笑着说,“我刚下去的时候体重只有90斤,过了两年就长到140斤,整整长了50斤!”

刘金铭在农场呆了10个年头,不仅没有得关节炎腰肌劳损那些个知青常见病,而且原来的毛病也都治好了。“主要是我会干活,会使巧劲。干活的姿势很重要,姿势不对,干起来又慢又累。”刘金铭说她比较会干活,男孩子一般也干不过她,割地,不管割谷子,割大豆,一天6根垄,1200米一根,6根垄就是7200米,15里路,她割得蛮快。“我最拿手的是在场院上扛麻袋,两个‘搭肩’的把麻袋抬起来,我就这样一钻,把麻袋扛起来,肩膀的位置一定要找好,腰一定要挺起来,走三级跳板走上去,心里觉得很自豪,那些男孩子都羡慕。他们跟我比赛,较着劲干,场院上的劳动气氛一下子就起来了,大家说说笑笑,越干越有劲头,一点不觉得累,反而挺开心的。”刘金铭开心地笑着忆当年,我们从她的笑声里能够想见她当年的威风形象。

刘金铭当班长时,她带的那个班是四好班;后来当排长,她那个排是四好排;她当了指导员,她那个连队是四好连队。她一直是在生产第一线干,“后勤一天也没下过。”直到后来当上了团里的副政委,她也常常下连队,有时候没有车就一个人走着下连队,要走

几十里路，一个人在荒野上走路，心里也挺害怕。下去了就干活，从春天一直干到秋天，她觉得在地里干活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她不愿意坐办公室。

她说：“人哪，就得到了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要是不下乡，张霖不会打鱼，也打不了那么多鱼。

张霖记得 1972 年那年鱼特别多，他们打鱼点 8 个人，四个老职工常常回家，他们一走就剩下四个青年人，一个北京的，一个上海的，一个温州的，一个鹤岗的。那年鱼可吃够了，两个大鱼篓泡在江水里，每个篓里有七八十条鱼，天天吃顿顿吃，也没油，就是用江水煮，加点盐，再放上辣椒，吃到后来见着鱼就恶心。

他打过最大的一条鱼有 600 多斤，是条大鲤鱼，鱼子在锅里炒成一块一块的，拿出来当饼子吃。现在可吃不着了，现在鲤鱼子金贵了，加工完了出口，800 美元一公斤。

那年开春，5 月份，正是打鲤鱼的季节。一天晚上，老职工王世荣跟张霖说：走，跟我去打两网！两个人划条船就出去了，一条船两副桨，张霖打前桨，他们去的是 4 号滩，专出鲤鱼的地方。下了网，蹚了 200 多米，江面上“叭”地一下子打起来一个水柱，好家伙，有 3 米多高，紧接着“叭叭叭”一连又是几个水柱，鱼尾巴也露出来了。是条大鲤鱼，那家伙比人都有劲！张霖有些害怕。王世荣说：“赶紧拉网！”他拉不动啊，那么大的家伙，有好几百斤！张霖帮他一块拉，那网死沉死沉的，跟坠了个大铅砣子似的，还直扑棱。好几次张霖差点让它给扑棱到江里去。网一点一点拽上来了，鱼头露出来了，乖乖，有缸口那么大，血红的眼睛瞪着，瞪得张霖好害怕，王世荣抄起一把砍钩，“叭”地照准鱼身砍了上去，鲤鱼痛得一抽搐，船身随着猛地一歪，差点翻过去。张霖吓得赶紧把船找平，但船里已涌进不少江水。等三把砍钩都砍上去，鲤鱼没劲了，折腾不动了，慢慢地老实了。这时张霖才发现，他们的船已经被鲤鱼拖出了六七里地，都见不到小岛了，得赶紧往回划！

天全黑了,拖着那么个大家伙,又是顶水,又跟鱼折腾半天了,真费力气呀!两个人使足了劲,一点一点往上顶,终于见到小岛了,终于把船靠近岸边了。回到打鱼点上,已经是后半夜两点了,几个人正为他们着急呢。把那条鳊鱼拖上来,量了量,4米多长,称了称,600多斤。

榆树通上有个鱼亮子,鱼亮子就是一块低洼地,江水上涨的时候水和鱼一起漫进来,赶在退水之前插上钎子下上网,江水退完了亮子里就光剩下鱼,这种捕鱼办法最省事,可谓低投入高产出。也是5月份,打完鳊鱼不久,江水还冰凉呢,张霖去挡亮子。挡亮子也是个苦差事,不是苦在插钎子上,是苦在扎猛子上。下水之前,先点好两堆火,然后脱得光光的,用酒搓身子,全身上下搓一遍,搓得血液奔涌,全身发热,趁着热乎劲一个猛子扎下去,江水一下子就凉透了心,赶紧把钎子一个一个插上,赶紧划水上岸,上了岸赶紧烤火,这时手脚冻得都不大好使唤了。烤了前胸烤后背,一定要烤透了,把凉气全都烤出来,要不然就落下病。这个时候蚊子也糊上来了,钉着咬,一边烤火一边打蚊子,劈里叭啦地打。张霖说,挡亮子那活一般人干不了,今天想起来还觉得透心发凉。

退了水再去,两个连在一块的水泡子,有200多平方米,一米多深的水里黑压压扑棱棱的全是鱼,密密麻麻地一条挤着一条!光大鲤鱼就收了4000多条,最大的47斤,还有鲫鱼子呢,鲶鱼呢,鳌花呢,鳊花呢,怀头呢,最大的一条怀头有400多斤,从它肚子里掏出12条鲤鱼来,那鲤鱼都有一尺多长!那一次打了6吨鱼,一万二千斤!

在大兴安岭打山火

大兴安岭年年都要着几场山火,大兴安岭的人年年都要扑几次山火。山火多发在秋末或是初春,那时,树叶落了,树枝枯了,柔嫩的枝条失去了水分,咋巴一下就能折断,有个火苗子就能点燃。

起火的原因，一是人为，最常见的是做饭或吸烟不慎起火；二是火车跑动中，车轮与钢轨摩擦生发的火星引燃路旁的野草；三是雷电所致，大兴安岭是有名的雷电区，雷电击伤击毙人畜的事件哪年都得有几起。有一次，一帮青年人在山间作业，忽然大雨突至，青年人挤进一顶帐篷避雨，最后钻进帐篷的人就站在门口。“咔嚓”一声巨响，站在门口的小伙子只觉得左腿一阵麻木就失去了知觉，原来闪电击中他的臀部，穿过左腿入地，结果一条左腿废掉了。

年年起火，年年打火，大兴安岭有个常年设置的重要机构——护林防火指挥部。指挥部有密布的网络，有通讯联络设备，有丰富的打火经验。一旦火起，监测点立即用报话机报告火情，大队人马即刻浩浩荡荡出动，动辄就是上千人。有时能坐一段火车或是汽车，但绝大部分要靠两条腿走路，原因很简单：林子里没有路，更跑不了车。直升飞机也盘旋而起，监视火情，投运物资，那阵式十分宏伟壮观，真正是一场人民战争。由于组织工作做得好，又有丰富的经验，所以在打火中虽然免不了有零星伤亡，但大的事故很少发生。

在深山老林中打火，比在荒草甸子上打火要苦得多。常义在大兴安岭呆了二年多，打过三次火，其中最苦的一次，是1970年4月末那场火。那天晚上九点多钟，小伙子们干了一天活，洗了脸洗了脚躺下要睡了，突然接到打火的通知。各单位的基干民兵立即紧急集合（打火多是以基干民兵组织为单位），站好队，简单说了一下情况，每人发了一个工具袋，里面有锯子、斧头、水壶、压缩饼干。锯子斧头是打防火道用的，水壶饼干是给养。一千多人的大军出发了。先坐了三个小时火车，到了大杨树，下了车就步行进山，顺着公路，一气走了七八十里地，到了一个叫“一里”的地方，那里有个打火物资供应站，有个仓库，库房里常年储备着各种打火用的物品，有工具，也有干粮，干粮是大饼、馒头，都干巴巴的，不知道放了多少日子。打火大军在那里进行休整，正儿八经地吃了一顿饭，吃的是玉米面粥、干馒头和咸菜，吃得那个香。在整整一个星期里，那是吃得

最好的一顿饭。

吃完饭,就进林子了。在大山里打火与荒原上打火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不知道火在哪里,常义他们看不到火,也看不到烟,只有满眼的森林和大山。向导手里拿着报话机,按报话机里的指示了解着大火的位置和火势的走向。走着走着,就看到了着火的痕迹:立着的树是黑的,躺着的树也是黑的,地上盖着一层草木灰,空气中飘散着一股焦糊气味。大队人马就跟着向导,懵懵懂懂地踩着草木灰往前走,去追踪大火,寻找大火。走哇走哇,不停地走,走了整整两个白天,又走了整整两个黑夜,再走整整一个白天,接着又是一个黑夜,一千多人的队伍在树林子里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不让休息,不能睡觉。常义困呀,困得睁不开眼睛,迈不稳步子,谁不困呀,20岁上下,正是能吃能睡的年龄,昼夜兼程行军,人困马乏,可是谁也不敢停下来,在这深山老林里掉了队可是最危险的事情。领导也怕有人掉队,前面传来命令:每个人抓紧前边人的背包带,一个抓一个,谁也别撒手。于是一个一个都死死抓住前边的背包带,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脚底下有石头,有朽木,有塔头墩子,还有沼泽,沼泽里的水,有的地方齐膝,有的地方没腰,一脚踩空掉下去,裤子就全湿透了。大兴安岭纬度高,地势也高,虽然是四月底了,还都穿着棉裤,湿透了的棉裤穿在腿上有啥滋味?冰凉,死沉。一千多人长长的队伍,就这么跌跌撞撞,磕磕绊绊,迷迷糊糊地往前走,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头,什么地方才是头。有发牢骚的,有气得骂娘的,但是没有停下来不走的。三天三夜过后,常义他们这一千多人终于赶到了火头的前边。这时一个命令从前头传过来:原地休息待命!就盼着这句话呢,盼了三天三夜了,小伙子们,壮汉子们,把工具包往地上一扔,把大皮袄往草地上一铺,倒头就睡,倒头就着。

这羊皮袄可真是个好东西,知青到了大兴安岭,发的头一件东西就是大羊皮袄,每人一件,都是光板皮子,没有衬里也没有罩面,冲里的一面是一寸多长的羊毛,光板冲外,日子一久,光板就黑了,脏了,也没人刷没人洗,反正图的是个暖和。别瞧样子不好看,却是

离不了身的东西，一年里除了最热的几个月，从秋到春都离不了身，打火队员有一条纪律：什么时候也不能扔了羊皮袄！

刚睡了不到俩钟头，前边有人高喊：火来了！火来了！快起来！赶紧起来！不起来就烧死了！正睡得香呢，谁愿意动弹？谁也不愿意起来。有人迷迷糊糊地说：烧吧，烧死也不起来！翻了个身接着睡。民兵连长排长都急了：非把他们都踢起来不可，使劲踢！人都起来了，都懒洋洋的，动作慢慢腾腾。每人拿出斧子，砍了一根大桦树枝子，把上头的小枝杈都打掉。这根桦树枝就是打火的工具，每人拿在手里，瞪着眼睛，盯着前方的山。

当时的地理形势是：两山之间有一块地势低洼的草地，草地上打了防火带。常义他们在这边的山上，火将要从对面山上过来，等大火烧到了防火带，就全体出动把火打灭。常义心里好紧张，他不知道这场火究竟有多猛，有多大，会不会烧死人，能不能打得灭。他心里正在嘀咕，忽然看到对面山上出现了一股烟，在阳光的照耀下，那烟不是乌黑的，而是淡蓝的，在树林上方轻轻地抖动，飘荡，忽忽悠悠地冲着他们这边飘荡过来，看不出凶狠歹毒之心，却似有轻盈美丽之态。常义被它迷住了：难道这就是那场可怕的大火吗？正在这时，风向陡地一变，北风变成了东风，飘悠而来的火猛地掉转了方向，扭过头向西飞驰而去，速度极快，就是最快的骏马也追不上它，倏忽之间，林子刷地变成了一片黑色，真是闪电一般。常义看傻了，惊呆了！

打火指挥气得一跺脚：“又没等上，再追！”这一追，又是整整两天。

水壶里的水早喝光了，遇到小河或是小溪，就再灌上一壶，遇不上就只能喝草甸子马蹄坑里的水，水里有许多红色的线状虫子，据说那是孑孓，蚊子的幼虫，也顾不上是什么了，拿茶缸舀一缸子，用手绢儿一盖，咕嘟一大口喝下去，再嚼一口压缩饼干。

有一天，整整走了一天见不到水，不少人水壶早就空了，只能忍着，常义省着喝，水壶里还剩一点儿。走在他后边的小王，渴得实

在受不了，晃了晃常义背着的水壶，感觉到水的晃动。他知道水的珍贵，他也知道连自己都舍不得喝的水轻易不会让给别人喝，他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常义：我渴得不行，让我喝口水行吗？常义转过身，挺豪爽地把水壶递给他：喝吧！小王喝了一口又迟疑着说：再喝一口行吗？喝吧！还是豪爽的回答。这珍贵的两口水，让小王感动，让小王难忘。事过半年之后，小王还跟常义念叨起这件事：常义呀，你那两口水救了我了，你这人太好了，我没想到你还能让我喝第二口！

出来日子多了，带的饼干也吃完了，有一天，断顿了，没吃的了，偏偏又赶上了“五一”节，指挥部决定空投食品。飞机来了，一麻袋一麻袋地向下投面包、猪头肉。青年人看到袋子投下来，都一窝蜂地跑过去抢，有人都一天没吃东西了。猪头肉的袋子重，一着地叭地就摔裂了，猪头肉有油，沾上了草木灰怎么擦也擦不干净。四五天没闻过肉香了，沾了草木灰也要吃。面包就猪头肉，吃完了，哪个人的嘴巴子都是一片黑。

白天太阳一出来，热得恨不能光膀子，皮袄根本穿不住，晚上山风一吹，穿上皮袄还冷得发抖。“五一”那天晚上，找了一片草地宿营，可是谁也睡不着，不是不困，而是太冷，大伙就点起一堆一堆的篝火，脚冲着篝火躺一圈儿。怕跑了火，还得有人轮流值班看着火。常义守在火堆旁，头顶上是漆黑的夜空，四周围是黑黝黝的森林，草地上一堆堆篝火那么明亮耀眼，除了燃烧的树枝噼噼叭叭，什么声响都没有。山林里的风，到了晚上就小了，弱了，它们跑了一天也累了，也要歇会儿了。常义头一次看到这么奇异好看的景象，感受到一种神秘的气氛，那种景象那种感受，以后他再也不曾经历过。

到了第五天晚上，他们终于追上了那场该死的大火。那是在一个山凹里，山凹里是一片草地，还有塔头墩、沼泽，沼泽里的水有没腰深。火是随着风走的，白天风大，火就飞快地跑，夜间风息了，火就悄悄地呆在山凹里养精蓄锐。指挥部赶紧抓住这个时机，调兵遣

将,把一千多人马分布在周围的山上,将火团团围住。部署妥当,发出号令,各路大军就从四面八方方向中间打火。满山都听得到口号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共产党员跟我上!”“共青团员跟我上!”他们抡起桦树枝条,狠命地扑打。受了五天的苦和累,根子全在这场火上呢!憋了五天的一肚子气,全发泄在这场火上了!人多气盛,包围圈一点点地缩小,火势一点点地减弱,黎明时分,这场燃烧了一个星期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

高兴劲自然是没的说,任务完成了,苦日子熬到了头,明朝就可以打道回府,班师回朝。山林里的火打灭了,心里的火苗子窜起来了,大家议论起几天能赶到家,回去之后怎么洗,怎么吃,怎么睡,睡他个三天三夜,吃他个盘空碗光。山林里几天来头一次听到了笑声,笑声此起彼伏,可是没多久,这笑声就变成了“唉哟”。刚才打火出了一身汗,贴身的衣服全湿透了,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让山风一吹,来了个透心凉,凉得牙齿打颤,几个人抱成一堆还是没用,只盼着赶快天明,出了太阳把衣服晒干就好了。

哪成想这一天就没见太阳。太阳没出来雨却下起来了,开始是小雨,慢慢成了大雨,雨点越下越大越下越急,青年人一个个只能用羊皮袄蒙着脑袋在树根底下蹲着。吃也没的吃了,睡又没法子睡,又冷又饿又困。想赶紧往回走,但是指挥部不同意,说怕有未熄的余火,人走之后死灰复燃,打火成果前功尽弃。指挥部为了安定军心,每人发了一个大饼,那饼邦邦硬,不知道究竟放了多少日子了,不要说嚼不动,啃都啃不动,至多能在上面啃出一个浅浅的牙印来,这饼怎么吃呀?没法吃!有几个人不听命令,硬是走了,结果后来受了处分。绝大部分知青真是服从指挥,就在雨中一直待了6个小时,一直待到中午12点,指挥部说雨已经下了6个小时了,估计余火全部浇灭了,好了,完成任务了,可以往回走了。雨还在下,皮袄棉裤浸透了水,增加了十几斤分量,本来就饿得没力气,这下更迈不开步了。常义今天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那时候也真有毅力,硬是咬着牙、顶着雨走了90里山路,夜里10点走到了“一里”。

到了“一里”，雨也停了。

“一里”有储备仓库，仓库里有馒头，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开始分馒头，馒头干得都裂了，有白面的，也有黑面的，分到黑面馒头的不乐意，非要吃白面的，就动手去抢，结果打起来。实际上，并不是非要吃那白面馒头，而是心里窝着火，憋着气，要找个出气的地方，找个碴把它发泄出来。大锯片子都抢上去了，把脑袋都砍伤了。

他们回到加格达奇的时候，样子狼狈极了，大皮袄上全都是泥，棉裤上也全都是泥，脸是黑的，手是黑的，脚是黑的，整个一群黑鬼。从车站到宿舍，一路上都有人围着看，跟看怪物似的。今天几号呀？4号？噢！算了算，整整出去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像一场梦。

回到单位，第一件事是吃饭。人人都跟饿鬼似的，狼吞虎咽了一顿。第二件事是烧热水洗澡。常义脱光了衣服一看，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除了大腿根往上、腰往下这一段，其余地方全跟鱼鳞一样，一圈一圈一块一块全是黑的，成了“鱼精”了！洗了一遍又一遍，一盆一盆端出去的全都是黑水，有人把棉裤也洗了，一盆一盆的全是泥汤。

那种罪，真不是人遭的！

没有一点修饰，没有丝毫遮掩，中国农村荒凉、贫穷、艰苦、险恶的一面，彻底无遗地展现在青年人的面前，一点儿诗情画意也没有，一点儿浪漫情调也没有，这场景就像一根残酷的木棒，一棒子就把姑娘和小伙子们打蒙了。这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像一阵狂风一场暴雨，把许多人心里边热情的火一下子就扑灭了。上海作家赵丽宏经常想起20多年前在一座海岛上插队时的情景和心情：“那时，总是一个人站在堤岸上看日落，看太阳辉煌而黯淡，最后被海水吞没，于是夜幕迅疾降临，黑暗不动声色地笼罩一切……当时的感觉，自己仿佛是海边一棵无依无靠的芦苇，是寒夜中一只流离失所的孤雁，孤独，怅惘，根本看不见何处是光明的前途。”他用文学

的语言和修辞的手法,概括了广大知青刚刚面对荒野时的真实心境。

第四章 求学之梦

大学之门砰然关闭

1966年5月,浓浓的春意溢满了北京城。树上的叶子完全绿了,浅淡的绿变为深重的绿,疏朗的绿变为浓密的绿,绿荫遮挡住强烈的阳光,老人和孩子们在绿荫中下棋品茶聊天嬉戏。天气太热了,热得人心烦意乱食欲不佳。夏天快步地逼近了,升学考试也快步地逼近了。

26中位于北京崇文区,它的前身是有名的汇文中学,老牌子的重点校,但初三和高三的同学心里依然惴惴不安,因为这毕竟是一生中的一个“坎儿”,决定前途的重要时刻。

就在大考临近的日子里,就在这个天气燥热的五月,中央戏剧学院两位老师走进了26中。他们是来招生的,文艺院校需要有文艺特长的学生,文艺院校的招生总是提前进行。他们提出要求,学校按照他们的要求推荐学生,被推荐的学生一个一个来了,谈话,提问,朗读课文,做几个简单的形体动作。两个老师不动声色,用鹰一样尖利的眼睛辨别着,挑选着,他们的视点渐渐集中在一个学生身上。这个学生的确与众不同:当过学生会主席,组织过学校的文

艺汇演,自己也登过台亮过相,他的学习成绩出众,文科理科都相当不错,尤其文章写得好,获得过全市少年儿童征文大赛一等奖,连续几年他都是学校优良奖章的获得者。

这个学生的名字叫肖复兴。

但是肖复兴压根儿没有想过去读戏剧学院,他心中的目标是北京大学,像他这样名牌中学里的尖子学生,完全具备向全国文科最高学府冲刺的实力。戏剧学院,就是演戏呗,这跟他的想法他的目标他的追求差得太远了。

可是戏剧学院的老师就是相中了他,就是看好了他,就是不肯放过他。他们几次找他谈心做工作,他们告诉他,戏剧学院培养的并非全都是演员,从今年开始他们就要培养一批既有表演能力又有写作能力,能编能导又能演的新型学生,而肖复兴正是这种新型学生的苗子。两位老师情意真诚,话语恳切,还领他去戏剧学院参观。肖复兴是个很重情义的人,他被他们感动了,打动了。他参加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招生考试,顺利地通过了初试,又顺利通过了复试。就这样,在全国高考开始之前,在那个燥热的五月里,肖复兴的前途就被决定了。他不再感觉到天气的燥热,精神上和体力上一下子都放松了,他只要安心等待九月一号的开学典礼了。26中是一所男校,小伙子们有的向他祝贺,有的为他惋惜,也有人投过来妒忌的目光。肖复兴在轻松欣喜之中又感到若有所失:他失去了有可能念北大的机会。

也是在那个五月里,上海一所著名女校的尖子学生,升学的前途也被决定了。

小雷不是毕业班学生,她正在读高二,但是,因为她太出众了,所以机遇过早地降临了。数学比赛,她得过第一,作文比赛,她也得过第一。她思想好,是共青团员,她还有一项特长——从13岁起就是一级体操运动员,曾经作为海军体操代表队的成员参加过国内的一些比赛。德、智、体,三者俱优,全面发展。

就在1966年的春天,她参加了一次奇怪的考试。考试在校长办公室里进行。但校长不在,只有一个陌生的中年人监考。参加考试的人很少,而试题的范围却很广,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什么都有,大部分都是教科书以外的东西。那监考人只说这是一次摸底考试,别的什么也没说,考完了,他把全部试卷装进一只信封,当着大家的面用浆糊封好口,就带走了。小雷一直觉得那监考人很神秘,那次考试很蹊跷。

到了五月份,学校开始收下一学期的书本费了,班主任老师告诉小雷:你不要交费了,让你妈妈明天到学校里来一趟。妈妈来了,妈妈得到一个让她意想不到喜出望外的消息:小雷考上了留法预科生,下个学期去北京,先补习一年法语,然后出国!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让小雷几乎不敢相信,这时她才明白那次考试的目的。

原来,上海市根据国家的计划安排,要从高二年级同学里选拔20名优秀生出国留学,10名男生,10名女生,小雷有幸考取了,凭她的实力考取了。

闽西南是一片山地,属于武夷山脉的南段,永定县虽然不像长汀、龙岩、上杭那样出名,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曾经因《世界大串连》那部长篇报告文学而出名的张月生,就是永定一中的学生。

张月生是县里出了名的学生,考高中的时候,他的成绩是全县第一,爱惜人才的校长一下子就看好了他,给他定下的奋斗目标是清华。

校长不仅有目标,而且有措施,他给张月生做出规定:只准读数理化方面的书,不准涉猎文艺类图书,不准看小说看文学作品,不论外国的中国的古典的当代的一律不准看。图书馆接到了这个通知,图书馆严格执行这个通知。为了实现那个艰巨的目标,张月生必须做出牺牲。

他是山村里长大的,山村里的孩子都能吃苦,他立下志愿发愤

苦读,果然出类拔萃,如鹤立鸡群。1965年全国落实毛主席关于教育改革的指示,永定一中规定,教师有权推荐尖子学生免考,结果张月生的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外语政治,所有的科目全部免考,期末复习是学生们最紧张的时候,张月生反而是最轻松悠闲的时候,他真想找几本小说来读,可是谁也不借给他,无奈,只好解题、读外语。1966年5月,学校提出来,让高中二年级的张月生提前参加高考,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踌躇满志充满自信,投入了高考前的总复习。

全国一片读书声,这一片读书声在1966年的6月戛然而止。

1966年6月6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五天之后,北京女一中的高中毕业生给毛主席写信,表达了“彻底砸烂一切旧教育制度的决心”。接着,北京男四中的毕业生也贴出倡议,提出今后的大学应该“大量从工农兵中吸取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革命者入学”。对于那些满怀信心就要跨入大学校门的优等生,这是两个可怕的消息,优等生们一边温书,一边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时局,再紧再忙,每天早晨6点30分他们也要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噩耗终于降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彻底改革高考制度,“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很快人们就明白,推迟的决不仅仅是半年,大学招生遥遥无期。

肖复兴、小雷和张月生们,在“热烈拥护党中央英明决定”的同时,内心里也感到了一种失落,一种悲哀,甚至是一种破灭。辉煌的、厚重的、诱人的大学之门在他们面前缓缓关上,紧紧关死,不留一条缝隙,只有“砰”的一声沉重巨响,他们美好的幻想就在这“砰”的一声中破灭了,已经展现在他们面前的那条洒满阳光盛开鲜花之路被这扇大门堵死了。“文化大革命”改变了“老三届”的前途,越是出色越是优秀的学生,对这一点的感受就越是明显。他们没有其他路选择,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上山下乡。

大学之门悄然打开

谁也没有想到大学还能恢复招生,大学恢复招生是在四年以后。

1970年的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两所最著名大学的一个报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大学部分恢复招生,这在极“左”思潮猖獗的当时,不啻是一件事关路线的大事,如果没有上层决策人物的首肯,两所大学不可能敢于触及这样一个敏感问题,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它很可能会招来祸害。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央的考虑和决策,借助于两校之口来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这实在是国家的需要,“支援世界革命”的需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

“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肯定要明显区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下的旧大学”,这首先表现在招生对象、招生办法上。

什么样的人可以上大学?《报告》所附的《报告(试点)具体意见》规定,招生条件是“政治思想好,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此外“还要招收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他们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招生办法,则是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10月15日,国务院正式通知各地,招生试点开始进行。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一共招收了工农兵学员41870人。1971年,继续实行试点招生办法,招收了工农兵学员42420人。两年加起来,不过八万四五千。这两年的招生由于是试点性质,只在小范围内悄悄地进行,既未大面积地展开,也未大加渲染地声张,更不为广大知识青年所熟知。在兵团,在农场,在一些生产队,零零星星地有人走了,知青们用羡慕的眼光目送他们,用羡慕的语气谈论他们。留下的人,谁都盼望自己能有这样的机遇,谁也不敢奢望这幸运的机

会有朝一日可能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因为那名额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几乎是百里挑一呀!

大面积大规模的招生,从1972年开始,那一年全国招收了133553名工农兵大学生,大大超过了前两年的总和。那一年大学招生工作从“试点”转为“铺开”,那时知识青年终于意识到“上大学”并非远不可及高不可攀,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幸运的一员”。

八 仙 过 海

上学的心愿是相同的,但不同的人怀有不同的目的。

对于一部分在校期间就好学上进成绩优异的知青来说,大学重新招生的消息重新燃起了他们心中的理想之火,重新给他们提供了求学深造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依然遥远而渺茫。每天简单繁重的劳动,周围淳朴厚道的农民,无法满足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无法进行一种深层次的精神交流。他们想充实头脑却苦于无书可读,他们渴望提高自身却找不到博学的师长,精神的发展受到了物质的限制,于是他们有了一种窒闷感,于是他们渴望改变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上大学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出路最佳选择。

对于大多数知青而言,上大学除了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它更是一条冠冕堂皇的返城途径。不用煞费苦心地编出各种自欺欺人的理由,也不用顾虑别人指责自己不安心不扎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光明正大地、光荣体面地回城去。

但是上大学也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毕竟想上的人多,录取的人少,所以尽管人人想上,但也都在心里边掂量着自己的实力、自己的把握。

在农村,真正有希望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劳动表现好、群众威信高的,他们可以通过正路被推荐选拔上大学,农民衡量人的标准是肯吃苦能干活,老实巴交,这样的知青一般都能比较早地获得上学机会;还有一种是有关系有熟人有权势的,他们可以通过歪路走

后门上大学。走后门也有两种走法,一种是从城里走起,大学招生单位带着名单下来,与知青所在地的领导交涉或是交易,把人带回去;另一种是从农村走起,把具有决定权的人买通,一路绿灯推荐上去,这后一种在农村插队青年中尤为明显。有时在一些社队,生杀大权就掌握于一人之手,“我说是谁就是谁”,用不着群众推荐、民主选送,甚至连那个形式也不走。在那些地方,“后门”比正门灵验,“会来事儿的”比“能干活儿”的灵验,所以,每当一有招生的消息传来,下乡知青们就像听到了运动场上的发令枪一样,立即各怀着心腹事分头行动忙碌起来,各有各的“目标”,各有各的门路,各有各的高招。

“插队知青上大学,全凭队长一句话”,这是一些地方的流行说法,也是一些插队知青的切身体会。队长的择生标准,常常取决于个人的好恶,而不同的队长又有着不同的好恶。公正清廉的队长,会挑选那些真正出色的知青;图谋私利的队长,会借此机会谋求物质上甚至是肉体感官上的享受。但一般说来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会死死留住那些知青中的优秀分子,这是插队青年与兵团青年在上学问题上的不同之处。这是因为,第一,插队知青担任农村社队干部的本来就寥寥无几;第二,农民们压根儿就不相信插队知青真的能够扎根久留,也不愿意这些人扎下根来跟他们争工分抢口粮吃。农民知道,这些城里学生早晚得走,只不过是走什么时间,以什么形式走的问题。

刘敏回忆说那是她生平第一次去送礼,去为了实现一个个人的愿望、一个完全公正合理的愿望而向当权者献媚、乞求。

她是在天黑以后走进大队长家的,她特意选了这么个时候,因为她不愿意被人看见,她觉得这是件丢人的事情。要不是看见村里的插队青年一个个都快走光了,要不是她住的那间土房里只剩她一个人,晚上睡觉直害怕,要不是同伴们一再地窜掇她开导她,她怎么也不会干这种事。她走进大队长家的时候,一家人正坐在炕上吃晚饭,除了大队长抬了一下眼皮,从塞满食物的嘴里挤出“来了”

两个字以外,其他的人看都没看她一眼,仿佛进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他们家里的一条狗或一只猫。刘敏感到一种卑微和屈辱,她更加胆怯,嗫嚅着说完了那句她默念了一路的话,把家里寄来的那包沉甸甸的东西往炕头一放,就逃跑似地退出来了,她依稀听到大队长的嘴里又咕哝出几个字:“我知道了。”他知道吗,那包东西花去刘敏父亲一个半月的工资!他知道吗,刘敏的母亲此时正病在床上,她是个家庭妇女,不享受公费医疗。

几乎在每一个有插队知青的农村,几乎每到招生招工的名额一下来,就成了队长书记们家里的喜日子。但并非花了钱送了礼的就一定能有效果,这种时候,就要看礼物的厚薄、队长的好恶、本人的表现等等因素了。

那一年,刘敏被推荐上了地区师范学校。

珍珍如今在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直属研究所里工作,她是所里的业务尖子,她的职称是研究员,相当于教授。

珍珍至今感谢母亲当年到处找人走后门,使她能在1972年就上了大学,而且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她说,那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它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创造了一个条件,使我能在一个适合我发展的环境里充分施展我自己,充分显示我自己,我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和这个环境给我提供的条件,我对当时学校里搞的各种运动不感兴趣,拼命地吮吸,就像一块干透了的海绵,一块干得裂了缝的土地,说实在的,当时真是快干透了,在黄河边上的盐碱地里干了三年活,几乎什么都忘了。我到处借书,常常去找老师问问题。开始我是班里的党小组长,后来党员都对我有看法,说我“白专”,有忽视政治的倾向,改选选掉了我的党小组长职务。我倒更高兴,无官一身轻,可以多看书,反正我是党员,政治上有了保护伞。当然,工农兵学员学的那点东西是远不够用的。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年招考研究生我就去考了,我就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我又出国进修了两年。应该说,我的运气是不错的,跟我的同龄人相

比,特别是跟我最要好的朋友秀芹相比,我是幸运的。我常常想起秀芹,上中学的时候,她各方面都比我强,在学习方面比我强得多。如果她也有个“后门”,如果她也有我这样好的机遇,她今天肯定要比我强。

秀芹家里六个孩子,她是老大,母亲又没有工作,8口人全靠父亲的六十几块钱过日子。但说来也怪,那么重的家庭负担,那么差的家庭环境,她却有很好的悟性,理解能力极强,她又具有她那种家庭孩子的一个共同优点:用功。所以她的学习成绩不光在班里总是稳居榜首,在学年里也是出类拔萃的。她参加过市里的数学比赛,得了二等奖,她还是市级的三好学生。

她跟珍珍是同一批下乡的,她能吃苦,懂得关心人,常常帮助照顾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珍珍。锄地割麦子,她的垌老是挨着珍珍的垌,割一段就回过头来接珍珍一段。珍珍把她当成最可亲的人,最可信赖的大姐姐。珍珍上学之后,一再写信催促秀芹想办法上大学,也帮她想了一些办法,可是秀芹家里一点劲都使不上,普普通通的工人,老实巴交的工人,拮据的经济条件,连过日子都紧紧巴巴,只能靠秀芹自己去努力。按表现,她绝对可以上大学,绝对有被推荐的资格,即使只有一个推荐名额也应该是她的,可是想上学的人太多了,不光知青想走,队干部公社干部县里干部也想把他们的孩子送走。县里一个劳动科长的女儿,在村里一共待了不到一个月,也占了村里的名额上大学走了。这种本事这种能力秀芹怎么会有呢。她只能“认命”,只能像一根浮在水面上的小草叶,任凭生活的河流冲着她走,冲到哪里就是哪里了。1975年她得了肝炎,从此彻底失去了进大学读书的机会。

珍珍和秀芹,两个要好的姑娘,两个优秀的姑娘,两个命运迥异的姑娘,因为她们出生在不同的家庭里,珍珍通过“后门”得到了她本该得到的东西,而秀芹却永远无法得到本该属于她的东西,她的道路在冷冰冰的“后门”面前戛然而止。

另一个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下乡,后来通过“后门”上了大

学的姑娘这样说：“走后门当然不对，我也不愿意走后门，这也是被逼出来的。我从小学习就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肯定顺理成章的上大学。我在兵团四年，不能说表现不好，可按当时的标准，我的表现不能算最突出，又不如某些人会 and 领导搞关系，更没有往领导家里送过礼。取消了文化考试，全凭推荐，我不去争，也决轮不上真正埋头苦干的人。上学以后，班里一些同学由衷地说：‘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我上大学的今天。’我可从来不说这种话，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上大学也不用走后门。可是话又说回来，比我有才干，应该上大学的人，多着呢，他们没有上，我却上了，当然是沾了权力的光，确实不公平。临走时，好友们给我送行，说了许多勉励的话，我却灰溜溜的，心里总是怀着几分歉疚。”

强者落马

就上大学的机会而言，插队知青要比兵团和农场知青多一些，因为兵团和国营农场知识青年集中，数量多，一个有几千名乃至上万名知青的团（场），一年也就是有几十人百多人的指标，比例在十分之一；而农村插队知青，点多面广布局分散，一个公社几十个人，一年也能分到几个十几个名额，比例就高达十分之一甚至几分之一了。

半夜，电话铃声把石铁林吵醒了。他睡在连部里，值班，看电话，因为四个连职干部里头只有他一个是单身汉。电话是他在师部机关里当干事的一个“哥们儿”打来的，告诉他一个秘密消息：上海招生的人已经来了，师部已经把招生名额分配到各团了。朋友叮嘱他：机会难得，切莫错过，要及早下手！这个电话闹腾得石铁林既兴奋又紧张，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早晨，他带领全连出完了操，去找指导员，指导员一手拿着扁担一手拎着铁桶，正要去挑水，石铁林把一副铁桶接了过来，两人边走边说。指导员是1958年来农场的老转业兵，石铁林跟

他关系很好，所以毫不隐瞒地把这件事和盘托出，末了他十分诚恳地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上大学，最大的遗憾是上不了大学，指导员你要是真心对我好，就成全我这一回。指导员的话讲得也很真诚：“你小子是干大事情的人，真把你窝在这里，也实在是委屈了你，要为你想吧，该让你走，可是要为连队工作想，为长远建设想吧，又不能让你走，唉，我这心里头也是矛盾哪，不光连里的工作离不了你，我这心里头也离不了你呀！”

几天之后连里开了个领导班子会，研究推荐上大学的人选，几个连干部虽然都不愿意让石铁林走，但最终还是一致同意推荐石铁林。名单报到了团里，石铁林的工作重心也跟着名单转到团里，他请了一天假，上团部去了。

石铁林在知青干部中间也是个知名人物，所以跟团机关的人很熟，组织股、干部股、军务股，参谋长、主任，他挨着个地转开了。有人跟他打哈哈，有人劝他留下来，有人热心地帮他出主意。参谋长涨红着脸，声色俱厉地批评了他：“麦播这么紧张，你不坚守在岗位上，为了个人的事情跑到团里来，还好意思找首长，你这是失职！上大学，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组织上让你去，你就高高兴兴地走，组织上让你留下，你就高高兴兴地留在团里，这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石铁林从没见过他发过这么大的火。后来在全团春播总结大会上，团长还不指名地批评了“有一个连队的青年干部，在生产大忙的时候，跑到团里来找首长，闹着要上大学。这种做法，说明他根本不够一个上大学的标准，政治思想这第一条他就不够！”

石铁林的努力不能说没有成果，一个星期之后，团部通知他到卫生队参加身体检查，这时麻烦出现了。一位很年轻的大夫在他的心脏部位听了好一会儿，皱着眉头说：“你的心脏有点毛病，二级杂音。”“不会的，我身体好得很，从来没有得过病。”不管身体强壮的石铁林怎样解释，甚至近乎哀求，他还是莫名其妙地被淘汰出局。参加体检的四个连职干部里面，走了两个女生，一个上了华东师大，一个去了外语学院。石铁林恨透了那个体检大夫，但他也不能

不替自己的心脏担忧。一个月后他再次来到卫生队检查心脏，他特意找了一位副队长、“文革”前哈医大的毕业生，副队长反复听了好一会儿，结论是“心脏完全正常”。石铁林疑惑不解地提出了上次体检时的结论，副队长笑而不答。石铁林此时终于心领神会：责任原来不在那位大夫，他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想让你走你就走得了，不想让你走你休想走得成。”石铁林上大学的机会就这样名正言顺地被剥夺了。

这种情况在生产建设兵团绝非仅有，有人称之为“卡两头，放中间”，最差的走不了，最好的也走不了，放行的是那些中等偏上的知青。

为什么最优秀的走不了？因为领导要留住骨干，为兵团的长远建设考虑。

同是知青干部，为什么又有人能走得了？有这样一些知青干部，他们思想意识不错，干活肯吃苦出力，能以身作则，能团结同志，但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偏弱，担当连级干部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干得很吃力。团领导也觉为难：撤换吧，他们没有明显的错误；留任吧，他们缺少应有的能力。把他们送去上大学，就成了一个两全齐美、皆大欢喜的最佳方案。在上大学的知青干部中间，有一些就是这样被“选送”走的。

石铁林后来还是上了大学，那是在粉碎了“四人帮”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之后，他凭自己的实力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时间整整晚了五年半。

周晓红大胆唱了一声反调

周晓红的胆子可真是不小，她干了一件让全团都大为吃惊的举动。她发起召开了一个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是：上山下乡是不是知识青年惟一的革命路？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惟一的革命路了。毛主席在30年前就明

确讲过,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要引起认识上的混乱,就是别有用心,一些人愤愤地想。

周晓红当然懂得这些,她 1967 年底就来到黑龙江,先于那条著名最高指示发表一年之前,应该说,她在走上山下乡革命道路方面,认识早行动坚决,对最高指示的理解应该比别人更深一些才是,但恰恰相反,她对这条道路的“惟一性”产生了怀疑,在一片拥护和赞扬声中大胆唱出了一声反调。

她之所以敢于怀疑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是在传达了林彪叛党出逃的中央文件之后,她的思想好像一下子放开了,你想啊,连最最忠于毛主席的副统帅都是假的,那什么不能是假的,什么不能去怀疑?她下乡之后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难道这些城市里下来的青年人,就要在这黑土地上劳动一辈子吗?难道就让这些接受过中学教育的青年人把头脑里的知识一点一点淡忘掉,让思维一点一点迟钝萎缩吗?她对此想不通,她觉得青年人还应该另外的一条路。

就在这时传来了大学招生的消息。当时她在团报道组,一听到这件事脑子里飞快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应该上大学”!她长久思索的那个问题一下子就有了答案:对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来说,扎根农村是革命道路,上学深造也是革命道路,这两条路,哪一条都无法替代另外一条,因人而异,殊途同归。因为,国家不光需要普通劳动者、普通农民,也需要科学家、医生和各种专业人才。周晓红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名之曰“二元论”。她先是在报道组内公开了这一想法,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赞同,然后他们以团报道组的名义召开了这个讨论会。周晓红的用意,是要阐述和宣传自己的“二元论”,寻求更多的理解者与支持者。

他们找来开会的,都是有些名气有点头脑的知青,大部分是团部的,也有一些来自连队,通知到的几乎都来了,会议室里坐满了。当主持会议的周晓红在会上把自己的观点一亮出,立刻引来一片议论声:这个想法太大了,太突然了,太好了,太离谱了,太妙了,

太不像话了,太荒谬了,太可笑了……。就像一颗火星燃着了一锅油,火苗腾地窜起,辩论顿时展开,各种观点一下子就亮相了。请来的都是青年人里头的精华,都是有头脑善言辞的,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二元论的提法是反马列主义的,两条革命道路的提法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这是最尖锐的一条反驳意见。

有人说,周晓红,你这是一种背叛行为,背叛了毛主席对咱们的期望,背叛了你自己上山下乡的初衷。

马上有人站起来反驳: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最大的期望是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没有文化,不掌握科学知识,用什么去改变面貌?

“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我们首先要看这个问题究竟符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什么人鼓吹的下乡镀金的反动路线!”

“毛主席早就说过……”

“但是马克思早就讲过……”

总的说来,支持者少,反对者众,连最要好的朋友关力都着急地把周晓红拉到一边说,你怎么敢讲这些话,你这不是鼓动知青不扎根吗?那可不是小事,要是有人给你上纲上线,就成了政治问题了,你想过吗?

“当然想过,可是你想过吗,本来我们都是名牌中学的学生,应该升入名牌大学的,现在既然大学恢复招生了,我们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去争取,我们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责任,我们应该成为有用的人才,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不能再这么一天天地把青春消磨光了。”

那次引起了爆炸性反响的讨论会开过之后,团领导找周晓红谈过一次话,很严肃地批评了她。一些本来对她印象很不错的老同志也说:周晓红,你有思想有热情,本来是个很不错很有发展的青年,但是你干了一件错事一件蠢事,你把自己的形象破坏了,你让我们失望。周晓红却不后悔,她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始终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并且终于如愿以偿,1973年她进入上海化工学院学

习。但是讨论会的阴影还是影响了她的入党问题,对此周晓红觉得委屈:我在北大荒实实在在地干了六年,因为这一件事情就抹煞了我这六年的一贯表现,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事情的确有些奇怪:工农兵上大学被宣传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在一些地方(主要是一些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上大学却又被看做不安心农业生产、不扎根农村的表现,被看做一种害怕艰苦想“曲线返城”的错误思想倾向。石铁林那个团的参谋长和团长的观点带有普遍性:“上大学,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组织上让你走你就高高兴兴地走,组织上让你留下你就高高兴兴地留下,这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闹着要上大学,这种做法本身就说明他根本不够一个上大学的标准,政治思想这第一条他就不够!”从这后一句话里我们听出一股味道:越是想走就越不让你走!

一块石头伤了一大片人

1972年5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了一份《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报告中说,北京11所高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小学程度的占20%。某大学数学系的学生,竟闹出“ $1/2+1/2=1/4$ ”的笑话。如果这样的人也能上大学,那还叫什么大学?

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招生工作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1973年的招生工作因此增加了一项文化考试的内容。

这件事引起了江青一伙的不满和抵制。张春桥恶狠狠地攻击说:文化考查“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予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

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毛远新则帮腔说:“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四人帮”们在寻找时机,寻找武器,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块反击打人的石头,这就是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下乡知青张铁生。

6月底的一天,正是夏锄大忙的时候,张铁生扔下锄杆,急匆匆走进兴城县中学,参加大学招生的统一文化考查。他心里没有底。语文考试是一篇作文,题目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他得了38分,数学考试他及格了,得61分。最后一天考理化,这是他最没有把握的一科,尽管是开卷考试,可以翻书翻资料,但他一看试题还是蒙了,勉勉强强只答了三道小题,后来得知仅得了6分。

大势去矣!张铁生的心凉了。情急之中他想起了准备好的那封信,他把信拿出来,刷刷刷地匆匆誊抄在试卷的背面。

尊敬的领导: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说一说。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18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地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

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惟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在一次全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毛远新听说了这件事，他立刻调阅了张铁生的答卷，如获至宝，异常欣喜。在他的策划下，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信，并加了编者按语。毛远新在审看校样时，用红铅笔删掉了这封信里“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和“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之类的话语，他想把这个典型的境界体现得更加完美高尚一些。

三个星期之后，《人民日报》在8月10日的头版头条位置转载

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编者按中说，“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话虽不多，但是把问题提到了思想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不久，江青就在一次讲话中捧出了张铁生：“辽宁有个张铁生，了不起，他敢反潮流。今年考大学的时候，正是农忙，他是生产队长，没有工夫准备功课，考试时答不上卷，写了一封信，说有人不劳动，准备功课，我不能放弃工作去准备功课，我不能那么无耻。”她把张铁生吹捧为敢于“反潮流”的英雄。

在毛远新的直接干预下，张铁生在秋风刮起的时候，带着志得意满的微笑走进了辽宁省铁岭农学院，他终于如愿以偿。入学不久，在省委的直接授意下他入了党，当上了学院领导，在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又当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张铁生这块石头打出去了，一时间社会上掀起一股抨击文化考查的浊浪，大学招生中重视文化考查的作法被批判为“旧高考制度的复辟，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主张搞文化考查的那些同志成了攻击的主要对象，一些文化基础好文化课考得好的考生也受到牵连，一些坚持学习文化知识的青年受到了批评，他们想凭学识凭实力争得一个深造机会的愿望再一次破灭了。

万郁文家有十分可怕的社会关系，她的父母都跟一个在《毛泽东选集》开卷第一篇文章里就遭到批判的人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个人叫戴季陶，《毛泽东选集》注释中说他长期“都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忠实走狗”。

万郁文的母亲是戴季陶的侄女，万郁文的父亲是戴季陶的私人医生，这样的家庭出身，她除了下乡劳动没有其他出路。

插队期间，她十分寂寞和孤独，没有什么亲密的同伴，也没有什么人关心她，所以她很爱看书，从书里去寻找愉悦寻找慰藉。可是那年月书很难找到，除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

队里有一个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的右派,过去是城里中学的一个语文老师,语文老师有个女儿叫凤妹子,年岁跟万郁文相仿。她们两人都是“黑五类”子女,都有一种受人歧视的屈辱感,这相似的身份和相似的感觉使两人渐渐接近了,熟悉了,有了共同的话语,有了相通的心灵。一天在田里割麦子,休息的时候万郁文小心地试探着问凤妹子:“你爸原来是教语文的,你家里书一定很多。”

“好多书都烧掉了,现在没有什么书了。好像还有一本《唐诗三百首》。”

“真的?”万郁文惊喜了。

“啊,不不,我记错了,过去有一本的,搬家的时候都卖掉了。”

万郁文知道凤妹子在说谎,赶紧信誓旦旦地向她表示:看完就还,决不损坏,决不借人,绝对保密。凤妹子没有说话,因为这事她做不了主,书是爸爸的,借与不借要爸爸说了算。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凤妹子悄悄地来了,她从衣服底下拿出一本书:“我爸说,年轻人多学点知识好,但是他要你千万保密,让别人知道了,他要挨批判的。”

从那以后,万郁文不再害怕孤独的夜晚,每天都期盼着孤独的夜晚,她在孤独的夜晚里关好门,坐在土屋里,坐在油灯下,静静地读书,默默地抄书,这是她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最幸福的时刻。她读完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读完了《历代文学作品选》和《外国文学作品选》。她把她喜欢的诗文抄下来,大段大段地抄,甚至整本整本地抄,她在这个时刻忘记了世人的白眼,忘记了劳动的艰苦,忘记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心中充满了欢欣和愉悦。她从那时起,感到白天过得太慢而夜晚过得太快。

听到1973年大学招生要考试的消息,万郁文的心里立刻充满了阳光,她天真地以为时来运转了,又要凭分数靠本事吃饭了。她参加了考试,她对自己的考试成绩很有把握,对择优录取充满了信心,每天都焦急地盼望着录取通知书。

一天,她正在田里薅秧子,看到了刚刚从公社回来的会计。万

郁文向会计打听消息,会计说,公社里有一份录取通知书,好像是他们大队的。万郁文一分钟都不愿耽误,扔下秧子撒腿就往公社跑,她跑得太急太猛,一脚重重踩在秧耙的铁钉上,铁钉深深扎进她的脚掌,鲜血一下子就涌出来。但是万郁文忘记了疼痛,顾不得包扎,她以为福音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这不过是福音降临之前的最后一点灾祸。她一跛一瘸地找到公社,找到了分管文教的公社书记,书记认得她,很惋惜地告诉她:“你考试的成绩很好,本来第一批上大学的名单里边有你,可是,张铁生的事情出来之后,你就被刷下来了。这次招生还是以出身为主……”

万郁文突然感觉到脚底的剧痛,那么清晰,那么强烈,那剧痛沿着神经传导,一直疼到心房。她感到一阵眩晕,一下子就跌倒了。

从此万郁文绝了高考的念头。

幡 然 醒 悟

钟志民走出系会议室的时候,心情变得沉重而郁闷,入学一个月来那种新鲜、兴奋、欣喜的感觉一点也找不到了。他的好心情全让今天传达的那份文件搞坏了。

那份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走后门”现象的通知》,1972年5月1日发出。他印象最深的是那几句话:“对检查出违反招生规定的问题,应及时向当地有关党、政、军领导机关反映。各级领导机关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和纠正。今后,如再有干部滥用职权、违反招生规定‘走后门’者,除对有关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外,也要把学生退回。”系总支书记念到这里的时候,钟志民如芒在背,浑身的不自在,向来优越的钟志民,突然感到一种自卑。

1969年1月,江西瑞金县的征兵工作已经进入尾声的时候,正在沙洲坝公社大布村插队的钟志民,找到了县人武部。

“我要参军。我爸爸也是军人。他叫钟学林,在福州军区政治

部工作。”

人武部的同志开始态度生硬，听到他爸爸的名字，语调一下缓和下来：“你怎么现在才来，太晚了嘛，这样吧，先填一张表放在这里，我们再想想办法看。”

县人武部把一名体检已经合格的青年农民挤掉，腾出来的名额给了钟志民。这样，在沙洲坝只呆了三个月、挣了四五十个工分的钟志民如愿以偿，他收拾好行李匆匆走掉的时候，不少社员还没有认清他的面孔。他在部队里表现很好，两年以后入了党，当上了班长，受到领导的器重。当大学恢复招生的消息传来时，钟志民再次求助于他的父亲，走进了南京大学的校门。

他喜悦的心中充满了阳光，阳光下却有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离开部队之前一些干部战士对他“走后门”的议论和讥讽。他为上大学而欣喜，又隐隐地为上大学而羞愧，他甚至不好意思给战友们写封信去。这种内心深处的矛盾在一年半的大学生活里始终困扰着他，后来在开门办学期间，他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人民群众对“走后门”的强烈不满，这个有觉悟的小伙子萌生了退学回部队的念头。

1973年趁暑假回家的机会，他回了一趟江西老家。他的老家在瑞金，离沙洲坝不远的叶坪公社，那里还住着他的几个堂兄。

位于赣闽边界武夷山下的瑞金，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1931年至1934年曾经是中央苏区所在地，毛主席领导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就设在这里。钟志民的爷爷当年是村里的苏维埃主席，为了掩护红军，被白匪军杀害了。奶奶把三个儿子都送出去参加了红军，幸存下来的只有钟志民的父亲，他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参军那年只有14岁，后来跟随红军长征到了陕北。钟志民的大伯父在战斗中负伤后在家养伤，被地主还乡团活活砸死在床上，二伯父在长征途中过草地时牺牲。这些家史，钟志民听父亲讲过多次，而这一次，他从堂兄和村子里其他老人的口中，又听到了更丰富的细节，他一边听，一边想像着他的爷爷、奶奶、伯父，想像着14岁时

的父亲是个什么样子。他神思飞扬,心情激荡,一股庄严而神圣的情感在心胸中涌动。村前有一条大河,名叫绵水,钟志民常常一个人坐在绵水边上,望着静静流淌的河水静静地沉思:我在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家族里出生长大,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上有我们钟氏家族的鲜血,我不能愧对先人,不能给钟家抹黑!瑞金之行,使钟志民受到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他知道,一个革命者的后代,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暑假过完了,钟志民在这个暑假里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嬗变。当他再次走进南京大学的校门时,心里是从来没有过的坦然。9月28日,他正式向南京大学党委递交了退学申请报告,申请“把我退回部队去。”校党委经过研究,给他的答复是:问题发生在197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下达以前,不在退学范围,可以不退;同学、教师对你反映较好,没有退学必要;学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对国家也是个损失。

事情暂时搁置下来。11月,钟志民做为工作队的成员,到苏北阜宁县宣传党的“十大”会议精神,他从群众给县委提出的尖锐意见中,再一次深切感受到人民群众对“走后门”那种深恶痛绝的愤慨,同时“十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提出要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回到学校以后,钟志民再次明确地向校党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仅要退,而且要退到底,退回部队,退回农村!

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在《一份退学申请报告》的标题下,发表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1月27日又刊登了一则消息……钟志民的父母积极支持儿子退学的革命行动。消息说:“钟学林、黎明立即给南京大学党委发了一封电报,表示完全支持钟志民的退学报告,并且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2月26日,办好了一切退学、退伍手续的钟志民,又回到了曾经生活过三个月已经阔别五年多的沙洲坝公社大布大队百花园村。他埋下头,弯下腰,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炼自己的筋骨和意志,第二年就被选为生产队副队长和党小组长,还被选为县里的劳动模范。第三年,县

委调他到团县委工作,他表示: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但不离开农村,不拿工资。他成了一个不脱产的团县委副书记。

七十年代初期突出表现在参军上大学问题上的这股“走后门”之风,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走后门”之风猖獗是在“文革”之中,一批“暴发户”手里有了权,发迹之快,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惊讶,于是充分利用执掌的那部分权力大捞一把。这是典型的暴发户心态,他们的素质决定了他们的心态。这是“文革”中“走后门”之风兴起和盛行的主要原因。当年有一副颇为流行的对联:“老子有能儿返城,老子无能儿务农——比爹”,它充分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对这股风气的愤慨与无奈。“走后门”,败坏了党的形象,败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刺伤了老百姓的心。

换一个角度看,“走后门”也是怨而无奈的知青家长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种反抗:通过正当途径无可奈何的,就通过非正当途径去获取。也有少数获得了“解放”被重新安排工作的老干部,参与和介入其中。“走后门”真正形成大气候,是在1972年,这一年是全国大规模大范围招生的头一年,也是一大批老干部得以“解放”复出的一年。1973年6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第八期简报中说:“山西反映,国家计委一副主任子女,‘走后门’参军回北京,不通过下面就把户口转走。”“云南反映,省委在讨论处理‘走后门’时,对‘走后门要退回’的提法,两次删去……”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说:“(黑龙江建设兵团)独立二团1969年接收北京军队子女240名,1970年走掉204名,其中104名任何手续都不要。”

《人民日报》登出钟志民的报道之后,全国出现了一股退学退役之风。从2月6日到2月21日,半个月之内,在各省报纸上公开登出退学申请报告的就有十五六个人。

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

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此通知一出,反“走后门”的问题一下子就不再提了。因为毛主席讲话了。

第五章 扎根和拔根

老工人的“绝招”

在整个上山下乡期间,返城的问题自始至终苦苦缠绕着几乎每一个知青,从下乡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终有一天离开乡下为止,他们千方百计地要解决它,实现它。而对于上山下乡的倡导者和各级领导者来说,最大的问题则是如何使知青们安心留在农村,亦即扎根问题。扎根与返城,这是一柄双刃剑,这是站在两个不同立场上,对同一个问题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在上山下乡期间,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我在黑龙江一个农场的招待所里,听上海知青李春涛完整地讲述了它。

有个蹬平板三轮车的老工人,家里只有一个独生儿子,独生子也下了乡。眼看着单位里、街道上的一些知青,与儿子同时下乡的一些同学,陆陆续续回城了,老两口心里真着急,可是又毫无办法。老工人知道知青办是管办理返城手续的地方,没事的时候就蹬着三轮车老在知青办大门口转悠,有一次,一个家长指着刚刚走出来的一个中年男人说,看见了吗,那就是知青办主任,管事的,办返城,只要他一句话,全有了。

老工人眼睛一亮,他心里有了目标,他跟猫似的盯上了这个目标。其实主任才是猫,儿子的命运掌握在主任的手里。老工人琢磨开了:怎么能想法跟他说上话呢?主任每天进出大院,身边都有人,常常围着好几个人,主任常常带着一脸不耐烦的样子跟他们讲话,别说跟主任说上话了,就是想靠近他也难。老工人琢磨了好久,终于想出一个主意。

一天,主任下了班刚走出大院,一辆平板三轮车从门前疾驶而过,他躲闪不及,被车撞了一下,倒在马路上。蹬三轮的就是那个老工人,他赶紧跳下车,问撞了什么地方摔得疼不疼,说我得赶紧拉您上医院。主任本来一股火,一看老工人这么着急这么实在,火气消了一半,说没啥大事,不用上医院。老工人说那不行,是我撞了您,我得对您负责,要不然我这心里也不踏实。他连搀带拽,把主任扶上了三轮车,直奔医院。

老工人这一下撞得相当有水平,既撞倒了人,又没撞到要害处,既有伤痛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伤病,到了医院拍了片子检查完了,大夫说不用着急,休息几天就好了。老工人付了所有的药费检查费,又把主任送回了家。

老工人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可认识了主任的家,他可有了个去主任家的理由。从打那天开始,每天下了班他都登门看望,也不买什么贵重的物品,只表示出诚心诚意的关切与焦急。知青办主任也是个实在豪爽的人,他跟老工人越唠越相投,一来二去的两人成了知心好友。老工人沉得住气,对儿子的事只字不提。直到有一天,主任告诉他一个喜讯:“我儿子要结婚了,请你来喝喜酒,一定要来!”老工人听了这话,缄默不语,面有凄楚之色。主任好生奇怪:“孩子结婚是喜庆的事呀,老哥,你怎么不高兴啦?”

老工人长叹一声:“唉!看到你儿子,想起了我儿子。”

主任忙问:“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还没听你说过你儿子的事呢,你儿子做什么工作呢?”

“别提了,就这么一个儿子,下乡六七年了,也回不来,混得没

个人样儿，跟你儿子没法比！家里就我们老两口儿，难哪！”

“嗨，这事儿你咋不早说，按政策，你儿子也应该回城，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这事儿你能帮上忙？”

“这种事儿正归我管！”

“嗨，你咋不早说，我找了多少人打听，都没辙！”

“这事儿得怪你，你咋不早说！”

过了没多久，老工人的儿子按困退返城了。

它很可能是人们杜撰出来的一个故事。李春涛说他曾经问过某市知青办的人，那人说这个故事纯粹是“瞎扯淡”。但是有那么多人津津乐道地讲述它，传播它，从七十年代一直讲到九十年代，就因为它反映了群众中一种普遍而强烈的情绪：对“走后门”的愤愤不满之情，对于返城的急切之情。

爸爸，我不同意你这拔根教育

辽宁出过一批知识青年典型，其中在全国颇有名气引起轰动的也有四五个。他们中间有男有女，有埋头苦干的，也有反潮流的，埋头苦干的终究也变成了反潮流的，最后都身不由己，或深或浅地涉足于政治斗争之中，成为“四人帮”反党夺权的工具、走卒、帮凶。他们曾经辉煌过，耀眼过，他们最终都暗淡了，被人民所遗忘，被历史所湮没。

就在张铁生头角崭露，在全国大红大紫的时候，辽宁省又有一个革命知青典型紧随他之后破土而生。

《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一个月之后，1973年的8月20日，当时尚属辽宁省管辖的赤峰市煤矿系统有一个干部，给他插队的儿子悄悄地写了一封信，向他道报了一个消息。

“春泽：当前有一事和你谈一下，你要有个准备，不过现在还不

需和别人讲,即上级有指示,在煤矿工作的职工子女用人时优先采用。现在矿上准备要补充人员,这次有可能将你抽回来(这次要男的,不要女的)。”

这位父亲深知他的儿子是一个“革命性”极强的青年,因此在信的末尾特意叮嘱他:

“如果决定了,通知你时,要无条件地执行。如果公社等部门征求你的意见时,也得听盟煤炭局和我的意见,对这个问题不准有其他的想法,必须回来。(机会难得呀!)爸爸”

这时,他的儿子,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插队青年、刚刚入党两个多月的柴春泽不在队里,他在赤峰市,参加昭乌达盟团委组织的学习吴献忠有线广播大会。柴春泽在会上发了言,发言中提出了“扎根农村60年”的口号。会议开完,本来可以顺便回家看看,但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觉得自己刚刚表完决心,在行动上也要做出个样子来,于是急匆匆地赶回玉田皋。

回到青年点,一位同学很神秘地把他拉到一旁,交给他一封信。同学的神秘表情,引起他的诧异,拿过信一看,没什么好奇怪的,信封上的字体很熟悉,是父亲写的。他想把信撕开,翻过信封来却发现封口的地方盖了一个父亲的印章。这事的确有点蹊跷,过去父亲寄信从来没有这样“神秘”过,他一下子联想起同学那“神秘”的表情。更让柴春泽生疑的,是信封的封口处有些折皱,好像被人拆开过,又重新粘好的。他把信匆匆读完,立刻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父亲那溢于言表的喜悦没有激起他一点欢愉,反倒激起了他的反感,他想起自己刚刚在全盟广播大会上发出的誓言,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第一想法就是“此事不妥”。“我刚刚向全盟的知青,向盟团委的领导表示过要扎根农村,怎么能出尔反尔呢?怎么能掉过头来就反悔呢?”

柴春泽下乡之前是赤峰市第六中学红卫兵团的团长、市红代会的副主任,1971年底中学毕业时最先贴出上山下乡的决心书,下乡的时候他又放弃了去爸爸所在的赤峰县,尽管那里离家近,条

件好,他还是选择了条件艰苦的玉田皋,他的文章《上山下乡干革命》,登在了《昭乌达报》上。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人物,他是一个心强好胜有荣誉感的青年。

中午,云彩遮满了天空,一会儿,雨就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了。下雨天不用出工,是知识青年最喜欢的天气,他们吃完饭就躺在炕上,心满意足地呼呼大睡。柴春泽却着急写信。他想好了,这封信不仅是写给父亲的,而且他要向大队的全体知青宣读,因为他们可能有人知道这封信的内容了,他们可能已经在怀疑他的决心了,他一定要表白自己,一定要证明自己是言行一致的,是“真正的革命派”而不是“口头革命派”,所以,这封信一定要写得精彩、漂亮,既能说服父亲,又有理论的高度。柴春泽想起了在盟里大会上的发言稿,那稿子读过之后别人都说写得好,他把那份稿子找了出来,大段大段地抄了下来:

敬爱的爸爸:您好,近天工作一定很忙吧!8月20日来信已于8月31日上午收到。爸爸,看完您这封信后,我心情不平静程度简直无法形容。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特别是最近学习吴献忠同志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以来,我脑子里所想到的是如何为共产主义在农村广阔天地奋斗终生的问题。同是一个党领导,同是一个阳光照,同在农村干革命,同奔共产主义大目标,吴献忠做到的,我为什么没做到?做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感到问心有愧。因此,我最近发下誓言,向前看——共产主义金光闪。途无限,扎根农村争取奋斗60年!向前看——征途仍然有艰险。讲路线,建设农村不获胜利心不甘!向前看——世界风云在变幻。立大志,誓为全球红遍决裂旧观念。……我,作为贫下中农的后代,下乡到这里两年来,并没有为这里大变快变作出大的贡献,党和人民在我刚刚迈出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第一步的时候,就给

予了我很大的鞭策和信任,让我先后出席了旗、盟、省团代会,出席省知识青年批林整风讲用会,被选为旗团委委员、大队团总支副书记,最近又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怎么才能对得起党的培养、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难道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应扎根农村、建设农村,把我的一切献给敬爱的党,献给我国农村面貌的改变,献给人类的解放事业吗?……

咱们家出身是贫下中农,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的根本利益就是消灭私有制,决裂旧观念,而一切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只顾个人利益的思想,都是建筑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存在决定意识,正是如此,《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爸爸,我现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对我进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这拔根教育。

当天晚上,柴春泽就在全体团员大会上,宣读了父亲的来信和他的复信。事过19年之后,他说:“接到父亲的来信,作为儿子,何尝不知道这是对我的关怀,我又何尝不想回到那温暖的都市、温暖的家中去呢?但是不行,同学们都在看着我。我下乡那天就曾代表知青在千人大会上发言表决心,之后又曾返城20天以现身说法动员其他知青下乡,我半路当了逃兵,别说没资格当一名党员,简直没资格做人。我只能豁出去了,在农村扎根就扎根吧。”

关于“扎根”的讨论就这样在玉田皋的青年点开展起来,团员带头,三十几名团员纷纷给父母写信,表示要“决裂旧观念,当铁心务农的扎根派”。

不久,昭乌达盟召开知青工作会议,盟领导又安排柴春泽到会宣读了他的信。新华社记者获知了这一情况,把它写入内参中,内参摆在了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的案头。

张铁生的走红主要靠了毛远新的鼓噪，柴春泽的崛起也是毛远新起了关键性作用。发现张铁生的喜悦还没有从这位省委书记的心头消褪尽净，柴春泽的信又使他兴奋不已。无论文字水平还是理论水平，这封信都比张铁生那封要高出一筹，一读完他就对秘书连声称赞说“柴春泽的信写得好！”辽宁可真是人才迭出，他又有文章好做，又有功劳好摆了。他吩咐秘书：马上把省委宣传部和《辽宁日报》的负责人找来！

1973年12月20日，《辽宁日报》在《小将的挑战》标题下面，发表了《柴春泽同志给他父亲的信》，不仅加了编者按语，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一篇生动的路线课教材》。紧接着，一个由《辽宁日报》记者、《昭乌达报》记者和昭乌达团盟委组成的写作班子一头扎入玉田皋，采写长篇通讯《柴春泽的信是怎样写出来的》。长篇通讯刚刚完稿，柴春泽的信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一天是1974年1月5日，距《辽宁日报》发表《小将的挑战》仅有半个月时间。第二天，1月6日，长篇通讯《柴春泽的信是怎样写出来的》发表在《辽宁日报》上。

这里有一点改动，《辽宁日报》刊载柴春泽复信的标题是《小将的挑战》，《人民日报》转载时则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青年》为题。柴春泽在他的信里把“一切重工轻农、重城轻乡”说成是“建筑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只顾个人利益的思想”，紧接着就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那段关于“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著名论述，显然，《人民日报》注意到并强化了柴春泽的这一思想，编者按中把“扎根农村、建设农村”说成是“与轻视农村、轻视农业劳动的旧思想、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样就把“扎根”同“决裂”联系起来，把“扎根”上升到“决裂”的高度。

真的要扎根？

1974年2月19日，佳木斯火车站前聚集了一千多人，喊着口号迎接自动申请退伍返回兵团的郑小丰。郑小丰是1968年到黑龙江兵团的北京知青。1971年2月，在非征兵期间，他通过父亲的关系，到黑龙江省军区警卫营二连当战士。1974年1月29日，他给连党支部写了一份退伍申请报告，这份报告加了编者按发表在沈阳军区政治部主办的《前进报》上。调查附记中说，黑龙江省军区党委于2月2日作出决定，批准郑小丰同志的退伍申请，并号召省军区全体干部战士学习郑小丰同志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革命精神。郑小丰在那份退伍申请报告中写道：

“我是下乡以后通过‘走后门’来部队当兵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只走了一段，也可以说刚刚开始就停下来了。这并不是说下乡以后就不可以当兵，而是怎样入伍，为什么入伍？通过正当手续，为保卫祖国当兵，这是光荣的事，可是我不是这样，通过‘走后门’入伍，入伍后为了返回城市，离开农村，这样当兵不是为革命，而是为自己，这样的思想基础是当不好兵的。所以，我提出申请，请批准我退伍，回到农村去，把没有走完的路接着走下去！”

郑小丰勇敢地袒露说，他是想通过入伍来达到返城的目的，而他退伍重返兵团，正是要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在那个年代里，对于下乡知青来说，扎根不扎根，成了革命坚决不坚决、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彻底不彻底的最重要的标志。

一批扎根的典型出现了。这些典型大都是听毛主席的话、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乡之后一贯表现较好、思想稳定的知识青年，他们出于内心的真诚，带着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坚定地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扎根知青以女性为多。

1973年3月5日，是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10周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这一天推出了一个“雷锋精神鼓舞我

扎根边疆”的典型冯继芳。冯继芳是1963年到农场下乡的哈尔滨青年,1964年她就被树为黑龙江省下乡知识青年标兵,1965年又入了党。这期间,她父亲病故了,根据劳保条例,冯继芳可以回城接班就业,母亲精神不好时常犯病,更盼她赶紧回来。冯继芳想到雷锋甘做革命螺丝钉,党把他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的精神,说服了母亲返回了农场。她学习雷锋,干一行爱一行,她养的鸡多生蛋,她养的奶牛多产奶。1967年有人鼓动她闹回城,她坚守在生产岗位上,常常一干就是一个通宵。1970年大学招生的消息来了,其中有一条标准是劳动锻炼三年以上,冯继芳是极少数具备这条标准的人之一,但她认为“上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留农村也是革命的需要,我们只能让党来挑选自己,决不能自己去挑选革命工作”。后来,她又动员她的弟弟妹妹下乡,来到生产建设兵团。冯继芳的最大特点是“服从”和“安心”,是“党叫干啥就努力干好啥”,从来不好高骛远,从来没有非分之想,在知识青年中间,能做到这一点的,实在为数寥寥。

1969年,配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育,曲雅娟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号典型”;1973年,配合扎根教育,冯继芳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头号标兵”。知青标兵的转移,反映出对知青思想教育重点的转移,“扎根”教育成了头等重要的教育。

在对下乡知青的教育和管理上,兵团和农场抓得比较紧而插队青年松散得多,多数农村根本不相信知青能扎根,也不愿意知青在他们那里扎根。当年北京知青下乡的时候就流传过一句话:“要吃馒头上东北,要想自由上陕北”,意思是说东北的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虽然生活条件比较好,但管理也严格,陕北农村尽管生活条件差,但是松散自由。在“扎根”教育上也是这样,北京插队知青方兢说:陕北从来不搞扎根教育。

在知青上山下乡之初,兵团农场严格禁止青年谈恋爱,甚至把男女青年之间的谈情说爱当成有伤风化的道德品质问题而大加批判,但是从1972年开始,不仅对谈恋爱的口子渐渐放开,而且鼓励

青年人在兵团农场安家立业,因为安了家就安了心,扎了根。而对青年人来说,在农村安家则意味着自己把返城的大门关死,是“铁板钉钉,走不了啦”,所以,在农村安家需要勇气。

各地的下乡知青,从1972年开始,都有一些人陆陆续续结婚了,有知青跟知青,也有知青跟复转军人,跟农工,跟农民,跟牧民,他们中以高中学生为多,这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六六届的高三毕业生,到了1972年至少也有二十五六岁了,他们很实际地面对生活,很实际地考虑问题,他们不惧怕农村的艰苦,乐观而充满信心地开始新的生活。

后来,扎根的宣传逐渐升级,除了宣传“招工不走、大学不上”的典型,又开始宣传读完大学回农村、参军复员回农村的扎根典型。

1973年秋天,最早一批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主办的《兵团战士报》上陆续介绍了王世英大学毕业回连当农工、天津师范学院毕业生陆伯如大学毕业回到45团18连当农工、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生鲁明回到48团卫生队工作,以及双鸭山市师范学校毕业生张仁杰回到6团工作等事迹,此外还有哈尔滨青年王穗退伍后重返边疆干革命的事迹。

王穗是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1团31连下乡的,1970年调回哈尔滨,1971年参军入伍。按规定,她从城市入伍,复员以后可以回城市安排工作,但是她听到复员的消息后,立即向党支部表示了重返边疆务农的态度,随后又写了决心书。父母要她回城当工人,可是她认为“务工务农不仅是一个职业选择问题,现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差别,有志气有抱负的革命青年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缩小三大差别多吃苦,多贡献力量。”王穗还给她的父母做工作说:“你们都是从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里过来的人,抗美援朝时,你们把我放在鸭绿江这边,积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一心想的是打败美帝解放朝鲜,保家卫国。现在你们还应该保持那股劲。我们新一代也要把老

一辈的这种革命精神继承下来发扬下去,要像雄鹰一样迎着风浪展翅高飞,不能像雏鸡一样偎依在翅膀下。”王穗终于说服了父母,他们支持她回兵团去,还送给她毛主席著作和劳动工具。

一些先进知识青年自愿留在农村留在边疆参加农业生产建设,这是一种有志行为,他们的决心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赞扬。

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有12名知识青年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他们中除了老知青代表邢燕子外,基本上都是“文革”期间下乡的知青代表:朱克家、薛喜梅、程有志、柴春泽、戈卫、高崇辉、肉孜古丽、曾昭林、张登龙、林超强、刘裕恕。一批名气很大的人物聚在了一起。9月15日,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针对我国农业基础薄弱的现状,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这些话深深地鼓舞了到会的知青: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这么重要,中央对农业这么重视,我们就该一辈子献身农业。12个人聚在一起商量,邢燕子说,咱们应该联名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表示我们的决心!好哇,写吧!大家选中了朱克家和柴春泽两个人执笔,他们在这封信中表示:要在两三年内“把自己所在的社队建设成为大寨式的先进单位。”

邓小平看到这封信很高兴,他指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毛泽东也看到了这封信,他批示道:“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这封信经过报社编辑的加工修改,10月28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上同时发表。那次大会闭幕以后,12个人就怀着一股豪情一种志向,分赴自己的岗位,使足力气要大干。

但是在“四人帮”把持下的舆论宣传,把扎根教育推向了极致,要求所有的知识青年都一辈子扎根农村,这就未免太不近情理也太不现实了。大学恢复招生,可是上大学被看做“不扎根”;城里工厂需要工人,可是招工进城被看做“不扎根”;家里有困难,困退返

城更被看做“不扎根”。总之,坚定的“革命派”就是不能上大学,不能进工厂,不管家里发生什么情况都绝不返城。按照这种理论,大学没法办了,工厂没法办了,城里的商业服务行业没法办了,全国青年只能从事农耕这个惟一的行业。这种搞法,不仅知识青年不答应,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不答应。

典型的苦衷

还有一种知青,硬被树为“扎根”典型,一旦成为扎根的典型,那么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必须扎根,只能认命了。

王冬梅至今还记得李素文给她们九个同学写的那封信,那封善意的信决定了她一生中第一次重要的选择。

她是七四届初中毕业生,1974年,正是吴献忠、张铁生、柴春泽大红大紫的时候,她们那一届学生充分接受了三大典型的影响和教育,血管里奔涌着躁动的热情。她们想到北大荒去,因为那里艰苦,又是生产建设兵团,但是分配方案中没有去北大荒的任务,几个女孩子一核计就给李素文写了一封信。

一天,《辽宁青年》的一个记者专程来到旅大,找到了56中学,找到了王冬梅,他带来了李素文写给她们的回信。记者告诉王冬梅:去北大荒是跨省下乡,辽宁没有跨省下乡的任务,手续不好办。辽宁也有艰苦的地方,比如昭乌达盟就非常落后,非常艰苦,辽阔的大草原地广人稀,非常需要青年人去开发建设。昭乌达盟草原是1969年从内蒙古自治区划给辽宁省的,这片土地当时占辽宁省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而人口只占全省的十分之一,省里的意图,就是要利用知识青年的力量去开发建设这块地方。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地一番议论商量,做出了决定:好吧,就去昭乌达盟。

1974年的上山下乡动员,已经不像1970年那么好做,上山下乡的弊端日益暴露,上山下乡的热情日益衰减,为了煽起青年人心中的火,需要“典型引路”。为了这种“需要”,王冬梅她们就成了典

型。在“文革”中，典型实际上是一种工具，是用来宣传，用来煽动，用来造舆论的。6月20日，《旅大日报》登出了一篇通讯，通讯的题目借用了王冬梅的一句壮语：《先辈开路不怕死，我们走路何惧难》。通讯记述了“应届毕业生王冬梅等九名小将立志昭乌达盟插队落户的事迹”。后来，《辽宁日报》也发表了长篇通讯《小鹰展翅——旅大市56中应届毕业生王冬梅等九名同学选择革命道路纪实》。6月9日，旅大市委召开大会，并作出决定，号召全体中学生和下乡知青向王冬梅等九名同学学习。王冬梅在大会上讲话说：“不恋旅大风光美，愿去草原战风沙”。这句话成了他们那批青年人的口号。又过了两个月，8月9日，王冬梅为首的119名旅大青年向昭乌达盟草原进发。在王冬梅等九名女同学事迹的带动下，先后有3000名青年到昭盟下乡。

下乡第二年王冬梅就入了党，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她成了1974年辽宁省的知青典型。但典型带给她的是什么呢？典型面临着更多的机会，但典型必须扎根，要扎根就必须放弃这些机会，否则就不再是典型。王冬梅在十年之后回忆起当年的心情时这样描述过：

“我想上大学，想得发疯，但我心甘情愿不去；我不想扎根农村，我害怕嫁给牧民，但我心甘情愿留下，并且准备在这荒芜、落后、愚昧、贫穷、边远的地方呆一辈子。谁也没强迫我，我自己愿意，我堵死了自己上大学的路，还以为自己是个悲壮的勇士。”她反问道：“我是那个时代的宠儿、骄子，但这些难道不是那个时代对我的伤害，对我灵魂的深深伤害吗？”

这是一个典型内心里的真实活动，做这样的典型，难道不是一种痛苦？！但遭受痛苦的不仅仅是她本人，还连带着她的家庭。

王冬梅的父亲叫王兴安，是沈阳军区的一个副团长，1976年夏天，部队开始进行干部转业工作，这项工作向来有难度，部队首长也要抓典型，这个典型抓到了王兴安的身上，谁叫他是典型的父亲呢。他们用女儿做榜样来教育父亲，动员父亲带头转业，并且步

女儿的后尘,带领全家去昭盟。“你女儿是全省青年学习的榜样,当父亲的,不能给女儿脸上抹黑呀,不能落在女儿的后面呀!”“小将挑战了,老将还能打退堂鼓吗?”这些话讲得句句都在理上,王兴安无辞以答,找不到任何辩驳的理由,他只能服从,于是他也成了典型,不仅是送女下乡的典型,而且是举家北迁易地落户的典型。王兴安的名字也出现在报纸上,《前进报》、《旅大日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

在1976年8月2日的《光明日报》上,登出一篇王兴安的署名文章《父母要支持子女扎根》。王兴安从大女儿讲起:“我们全家人都为她走毛主席指引的这条光辉道路而高兴而自豪。”接着讲到二女儿:“玉梅也表示毕业后到昭盟去扎根农村干革命。”最后讲到他自己:“五月间,我就向师、团党委写了申请。现在,我们全家已经作好了准备,只要党一声令下,我们就马上出发去昭盟,为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个月以后,王兴安举家迁往赤峰,直到1980年才重新回到大连。王冬梅认为这件事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为此“后悔万分”。

典型的堕落

知识青年的志气和热情是很可贵的,但青年人有自身的弱点,热情有余而经验不足,对社会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如果再有虚荣心,追逐名利,那就很容易被利用,走向自己的反面。跟着好人走正路,跟着坏人走歪路,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青年典型的一条深刻教训。

其实,辽宁省第一个在全国出名的知青典型,既非张铁生也不是柴春泽,而是一个女性名叫吴献忠。1973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通讯《青春献给新农村——记下乡知识青年吴献忠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先进事迹》,那时,张、柴二人还

都是无名之辈。

抚顺市下乡知青吴献忠最突出的事迹,就是下乡之前不留城,下乡之后不进城,招工不走,上大学不去,她是一个扎根农村铁心务农的典型。

1968年秋天吴献忠初中毕业之后,抚顺市第六中学准备让她作为“学生骨干”留城,但她第一个报名到黑山县太和公社耿屯大队插队。下乡之后她干活不怕累,给农民扎针灸治病,很快受到农民的拥护,第二年就入了党,当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又过了一年,城里招工的机会来了,她向党支部表示:不参加招工评选,留在农村干革命。大学招生的机会也来了,先是省内大学来招生,村里、大队、公社一致推荐她,她却要求留在农村。接着,清华大学这样令多少知青朝思暮想的第一流名牌学府向她招手,公社党委和县有关部门商量,决定要把她送到毛主席身边去上大学,她仍然不为所动,“甘愿在基层当一辈子农民”。再后来,上级要调她到公社担任团委书记,当国家正式干部,她坚决要求不拿工资拿工分。吴献忠真是铁心务农,铁了心要在黑山县太和公社耿屯大队扎根。机遇对于吴献忠实在是太慷慨了,接二连三地赐予她,她却视而不见赐而不受,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吴献忠完全是心甘情愿的,就像她的名字,她要在所有的方面奉献出自己的忠诚——对党、对领袖。她的奉献得到了党和领袖的肯定,得到了政治上的报偿。1973年8月24日是吴献忠政治生涯的顶峰,她坐在了人民大会堂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华灯齐放,一圈圈明亮的白炽灯紧紧簇拥着中心那颗红色五角星,吴献忠的眼睛紧紧盯着主席台,她看到了自己心中的圣像。在1249名代表中间,吴献忠和朱克家代表着“文革”中下乡的800万知识青年,一女一男,一北一南,人数虽少,却有着极广泛的代表性。此时,张铁生刚刚有了点名气,而柴春泽的父亲正在给儿子写那封隐秘的信。

“十大”归来,辽宁全省掀起了学习吴献忠的高潮,声势之大,

组织工作之细实属罕见。许多单位培训了吴献忠先进事迹报告员，成立了红小兵、红卫兵宣传小分队，吴献忠的先进事迹在辽宁几乎家喻户晓。

一个知识青年的地位达到这份儿上，绝对不是好事情，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吴献忠已经成为毛远新手里的一个木偶，他手里紧紧攥着操纵木偶的吊线，她却对此浑然不觉。吴献忠这个扎根典型，慢慢变成了“四人帮”的政治工具。

1974年1月，毛远新亲自决定让团省委召开学习吴献忠座谈会，吴献忠既激动又有些不安。座谈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她怀着一种崇敬和感激的心情听毛远新讲话，把他的话尽可能完整地记在笔记本上。“现在是新旧交替的时期，要老老实实在下面当几年党支部书记，你当三年党支部书记就有发言权了。”毛远新话里有话：几年之后就要到上面了，就要委以重任了。

不必等到几年之后，毛远新很快就对吴献忠有了安排，座谈会开过不久，吴献忠接到通知，到工农干部学习班深造，而且担任副组长。这个学习班，是毛远新为了培养扶植自己的势力办的，他很懂得这样一点：干事情非得有“自己人”不行，他选择的培养对象，都是那种涉世不深，缺乏经验，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文化大革命”无比拥护的人。

从这时开始，吴献忠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毛远新为她设好的圈子里，越来越深地卷入政治斗争之中，她的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耿屯大队和太和公社，思虑的不再单单是个人怎么斗私批修吃苦出力气，她放眼锦州市、辽宁省乃至全国，开始思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样的重大问题。这个学习班真是没有白上，吴献忠的鼻子灵了，眼睛亮了，她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反面。

知识青年的命运如此，知识青年提出的一些口号的命运也是如此。在1975年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扎根”的意义是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实现农业现代化；到了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扎根”又被“四人帮”利用，成了“批邓”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人帮”把“扎根”这个口号接过去，把邓小平说成是反对扎根鼓吹拔根的复辟势力代表，煽动广大知识青年起来批邓。这样，1976年在知青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场“扎根”与“拔根”的大辩论。

据曾在国务院知青办工作过多年的顾洪章同志介绍，这场大辩论的开展，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这就是毛泽东的一段批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做过三次重要指示，第一次是1968年底的那段“动员令”，第二次是1973年写给李庆霖的复信，这两段指示早已家喻户晓，而第三次指示却鲜为人知。

顾洪章同志向我们提供的资料说，1976年1月19日，陕西省咸阳市北社公社杨家寨大队回乡青年周荣光和复员军人王元成，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信中说：“招工为什么只能从城市来的人里招，农民就应该是‘世袭’的么？为什么城市学生就应当当工人，农村学生就该当农民？甚至有一些知识青年，名字下乡了，人还在城市，只因够了两年时间，不经贫下中农推荐，也就当了工人。这样做能够纯洁工人阶级队伍吗？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吗？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吗？”这封信，请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桂贤转呈。

吴桂贤在调中央工作之前，是陕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全国劳动模范，大概正是出于这种“同乡”的考虑，周荣光王元成才把信写给了她。吴桂贤感到他们在信中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于是又做了一些调查，2月1日，她写了一封信，连同周荣光、王元成的信一起转送毛主席。吴桂贤在信中说：“咸阳地区1968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已经在七〇、七一、七二年三次招工中基本走完。去年招工，下乡两年的知识青年又大都返城。一些青年农场被拆散。这实际是鼓励倒退，‘劳动镀金’，早下早上来，这种规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不是维护，而是拆台。”

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做了如下的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

与上两次指示不同的是，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讲得很含糊，他只是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要“专题研究”，“给以解决”，但是他对信中的观点未置可否，也没有讲出他自己的倾向性意见。毛泽东的批示作出不到五十天，就出了“天安门广场事件”，“批邓”骤然升级升温，知青问题自然被暂时地冷落一旁。这样，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并未大范围地、大张旗鼓地在全国宣传，它的贯彻落实主要是在上层进行，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为“开一次会”“作准备”。筹备之中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初步定在1976年11月召开，虽然后来由于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等全国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而一再推迟，但是在整个七十年代全国仅有的两次知青工作会议，都是在毛泽东的批示与促动下召开的，毛泽东并没有忘记知青，他还在关注和关心着知青。

“四人帮”是最善于利用毛泽东的某项指示而加以影射大搞政治运动的，他们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引机，煽起了一场“扎根”与“拔根”的大辩论，并给邓小平戴上一顶“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的帽子，把广大知青硬拖入“批邓”之中。在“文革”的最后一年，“扎根”问题被提到了阶级斗争甚至是反复辟的高度，毛远新控制之下的辽宁省在这场批判中仍然走在了前面，1973年那一次的风云人物是张铁生，这一次打头阵的是柴春泽。

湖北省武汉市，有个女孩子叫张静，张静1975年下乡插队，但下去之后发现现实的农村与她原来想象中的农村相距甚远，因此产生了动摇。张静在苦闷之中想起了“勇于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柴春泽，于是写信向远在辽宁的柴春泽求教。她在信中向柴春泽提出了六个问题：1. 怎样把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2. 怎样对待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怎么学法？3. 怎样磨炼自己，刻苦改造世界观？4. 怎样树立扎根思想？5. 怎样把自己培养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6. 什么是农村的阶级斗争？

柴春泽的确爱钻研理论，并努力用当时流行的理论来分析一切解释一切。从1976年3月到5月，柴春泽一共给张静写了七封

信,在这七封信里,他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扎根问题拼命上纲,把知青上山下乡与“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相联系,攻击邓小平和“党内资产阶级”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魁祸首,号召广大知青“学会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同资产阶级对着干”,“还要斗十年、几个十年,一直斗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这些信在煽动知青“批邓”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

当时,辽宁团省委为了配合“批邓”,正准备在知青中开展一场“扎根与拔根”的“大辩论”,毛远新的亲信看到柴春泽的信十分高兴,两次批示,让把这些信印发下去组织学习。5月4日,《辽宁日报》首先刊出张静的两封信和柴春泽的前三封回信,不久,《湖北日报》发表了柴春泽的七封信。

1976年的夏天是炎热的,气候在升温,“批邓”在升温,“扎根”的调子也在升温。6月中旬,辽宁省召开了一次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座谈会,这实际上是一次鼓动知青参与“批邓”的动员会。会上,辽宁省委负责人煽动知青“把眼睛盯住中央”,“警惕纳吉重新上台”,“头上的角要磨得尖尖的,刺要长得硬硬的,要敢于放炮,给上面的领导放炮”。在这种挑唆下,以吴献忠、柴春泽、张铁生为首的19名知青代表,联合写了一封给全省人民的公开信,信的标题是《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这封信6月12日写出,7月13日在《辽宁日报》发表,第二天又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转载。

关于扎根拔根的辩论在升级,煽动知青“批邓”也在升级。7月17日,国务院知青办把柴春泽的七封信印发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7月29日,《光明日报》正式发起了“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关于怎样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讨论”,《编者的话》中说邓小平是“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第一期讨论的内容是柴春泽致张静七封信的摘要。

扎根问题,在“文革”中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它本来是知识青年对理想和前途的思考,是对生活道路的一种选择,是一部分先

进青年为改变农村面貌和改造世界观而做出牺牲的一种表示；接着，在极“左”思潮的宣传下，扎根成了知识青年革命与不革命的最高标准，要求知青把它由选择之一变为惟一的选择，由动员扎根几乎变为了强迫扎根；最后，“四人帮”来插手了，他们把扎根与返城的矛盾上升为扎根与拔根的矛盾，又把拔根与扎根说成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最初由一批先进青年怀着理想和热情高声呼喊出来的这个口号，至此被纳入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整体部署。扎根的口号里塞入了他们的黑货，扎根调门喊得最高的激进青年则或轻或重或浅或深地上了贼船陷人泥潭，成了他们利用的工具。

柴春泽有两个最著名的口号，从这两个口号中可以看出他上贼船的轨迹。1973年他的口号是“扎根农村60年”，1976年他的口号是“一反潮流几千年”，前者是个人决心的表示，后者是参与政治斗争的呼喊。他们成了一股被人利用的政治力量，这就导致了他们的堕落。

前面讲到过的那个大连青年王冬梅，也参加了1976年6月份那次全省知青座谈会，成为那封《致全省人民公开信》的19名作者之一。当时能荣膺其中，是一种荣誉，但半年之后就成了罪状，刚满20岁的王冬梅受到审查和批判，这种审查从1977年持续到1979年，审查一结束，她就考入了大学。1993年，她以总分数全年级第一的成绩毕业，当了一名记者。

第六章 要把孩子们安置好

陌生的农村

下乡一个月之后,包宇才懂得了她们四个知青处境的艰难。烧柴要自己砍,吃菜要自己种,每天要跟社员一样出工,干一样重的农活。平时手里没有钱,连看病的钱也要家里寄来。她们比社员优越的只有一点——插队头一年的口粮是国家供应。

四个人里包宇年岁最大,三个人选她当集体户的班长。江西农村真是苦,一年要种两季水稻。最累的是八月份的“双抢”,早晨两三点钟就得下地,在水田里一泡就是一天。偏偏包宇腿上生了一个很大的疮,她不肯休息,照样下地。为了不落后,她夜里就起来去拔秧,秧苗拔回来,别人还在酣睡,她却开始下水田插秧了。

包宇的秧插得又快又匀,谁见了都说好,插秧这活最累腰,一天下下来,腰疼得直不起来,可是收工回来还得烧饭,还得侍弄菜地,否则就没有菜吃。但她们还是常常没有菜吃,因为实在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侍弄菜地。没有菜吃就挖野菜,甚至往白水里加点盐加点油,当汤下饭。实在想吃菜了,就端着一碗饭,到农民家里去要点菜吃,村里的农民对她们还是蛮好的,都同情这些“城里来的

娃娃”。

包字要强,再累的活计,再苦的日子,她都顶下来了,她的出勤率是知青里边最多的。干到年底一算账,一个劳动日的分值只有5分钱,整个知青集体户是超支户,一分钱拿不到,反而倒欠生产队的钱。

到1973年夏天为止,汹涌的上山下乡浪潮已经裹挟进880万知识青年,其中“文革”期间下乡的有758万;除去参军招工上大学的,当时在乡的还有595万人,其中插队400万人,兵团和农场的195万。这些人中间,5.9万人入了党,83万人入了团,24万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这是作为主流成绩反映上来的。作为问题反映上来的主要是两个30%:全国有30%以上的知青生活不能自给,要靠家里资助,个别严重的地区达到60%—70%;全国有30%的知青点没给知青盖房。

知青的口粮头一年都是由国家拨给,不要生产队操心,所以第一要紧的是住房。房子可不是说盖就能盖起来的,不要说正儿八经的砖房、土坯房和土窑洞了,就是简易的马架子、地窖子、茅草屋,也得备料、施工干上几天,还得看天气,冬天不能施工,雨天不能施工。所以有些知青长期借住社员的房子,有的住仓库、寺庙甚至放棺材的祠堂,住在马棚里的,夜里醒来能听到老马咔哧咔哧咀嚼草料的声音。他们来得太急了,太仓促了,农村还没有做好准备呢,物质的准备和精神的准备都没做好。

知青有的才十五六岁,还是些孩子,天性好动,免不了淘气,甚至有恶作剧。肚子饿了,偷点队里的红薯、嫩玉米吃,嘴巴馋了,有人去偷老乡家里养的鸡,有时相互之间闹点矛盾还会动手打上一架。唉,真是添乱,真是麻烦,平安无事的村子里一下起了多少风波!四川的插队知青有种流行的打扮:上身海魂衫,下身绿军裤,农民一看到这种打扮的小伙子就心生戒意,多了几分警惕,赶紧关好自家的门,赶紧点点自家的鸡。他们实在有些害怕。农民跟知青之

间有了芥蒂。

最让农民不高兴的是知青来了抢了他们的工分，占了他们的利益。地还是那么多地，粮还是那么多粮，尤其在人多地少的南方农村，本来锅里的粥就紧紧巴巴的并不富裕，现在一下子又来了一帮分粥吃的“和尚”，农民能没有意见？农民心里头能高兴？他们就想法子把知青的工分压得低一些，干同样的活，农民拿10分，男知青只拿8分，女知青仅拿6分，这是常有的事，知青能没有意见？知青心里头能高兴？

知识青年有文化，爱海阔天空地高谈阔论，讲起话来嘴无遮拦，有股子狂傲劲，让一些农村农场的干部听了不舒服，特别是对那些敢给领导提意见的人。“得找个机会整整他们”，那些心胸狭隘的干部在内心里暗暗地说，“这地方过去还没有人敢跟我这么说话呢！”

城里的姑娘也比农村的姑娘妩媚动人得多，她们的皮肤是白嫩的，她们的衣服穿得很得体，她们有的是家里的独女或娇女，身上有种娇滴滴的味道，她们在城市文明的熏陶下长大，走路说话微笑，都有着与农村姑娘截然不同的风度和气质。有些村干部团干部农场干部连队干部悄悄地起了歹心。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是接受再教育，贫下中农可没那个想法。谁去教育？怎么教育？村里头一天到晚种地干活，谁有闲心去研究那个？队干部想：嗨，就是安排他们干活呗，跟社员一样，下地，上场院，割稻，插秧，别的啥也不要说，就是个普通劳动力，啥叫再教育？这就是再教育！

睡在一口棺材下面

1968年8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一列火车缓缓驶人大石寨车站，慢吞吞地停下来。昏昏沉沉正在打瞌睡的张羽农被人推了一把：“快点，下车了！”他费劲地睁开发涩的眼睛，才发觉车厢里的人

已经走了一半了。他赶紧跳了起来,从行李架上取下背包和挎包,慌慌张张地朝车门走去。

外面正在下小雨,细细的雨丝落在他的脸上,凉凉的,很舒服,把他的睡意驱走了,脑子一下清醒了。他听到尖厉的哨声和集合的喊声。借着火车站那儿盏电灯透出的昏暗光亮,300多个背着背包的小伙子和姑娘拥挤着,推搡着,在队伍中寻找着自己的同伴和自己的位置。

“唉呀,你别推我呀!”“我的背包呢?谁看见我背包了?”“刘礼红——”“三排在哪?谁是三排的?”……

一阵长长的骚乱之后,队伍终于站好了。“都把手电筒拿出来,别说话,一个跟着一个,出发!”这是指挥员发出的命令。

天特别黑,没有星月,也看不见灯光,不知这是啥地方,不知要去啥地方。路特别滑,尽管张羽农十分小心,他还是在一个拐弯的地方摔倒了,裤子上背包上都沾了许多泥,两只手上粘糊糊的,手电筒的玻璃片也摔碎了。上火车时的那股兴奋劲一下子跑了大半,不知是让雨浇的还是摔跤摔的,他的心绪一下子变得很坏。他在心里骂着这条泥路,这场小雨,这连灯也没有的环境。前边后边已经有人骂出声了:“我操他妈,这是什么鬼地方,早知道这样子老子就不来了!”

“哎哟——”随着一声叫喊,又有人摔倒了。张羽农想象着摔倒同学那泥糊糊的衣服、粘糊糊的双手,心里产生了一种感官上的厌恶,他只盼着快点到达目的地,到了宿舍里好好洗洗身上的泥,踏实安稳地睡上一觉。

长长的队伍,长长的一溜手电,在长长的泥泞小路上行走,谁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还要走多远。

队伍终于停下了,男女生分开,张羽农他们这拨男生被带进一间大库房。

好大的库房哟,足有三四个篮球场那么大!里面空空荡荡的,啥也没有,只挂着几盏马灯,地上有几支蜡烛,忽闪忽闪的,散发出

昏黄微弱的光。“把我们领到这地方来干啥？”张羽农心里正犯疑惑，听到一个硬邦邦的声音：“地上是铺，赶紧找地方，解行李，赶紧睡觉，其他事情明天再说！”

这时张羽农才看清楚，地上铺着两溜木板，这边一溜，那边一溜，他蹲下去用手摸了摸，木板潮乎乎的，还带着毛碴，看来是刚刚用大锯破好的，还散发着一股杨木的清香。木板有薄有厚，有宽有窄，高高低低的，木板跟木板之间有棱，有缝。天哪，这里就是宿舍？这里就是床铺？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张羽农心里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他那个舒舒服服睡一觉的希望破灭了，出发前他心里那些个兴奋、激动、光荣、自豪的感觉一下子全没影儿了，荡然无存了。看见别人都在抢地方占位置解行李，他也赶紧找了个位置把行李放下来。幸好他的背包外面包了一层油布，没有淋湿，可是绳子全湿了，发涩，结又打得紧，屋里光线又暗，看也看不清，解又解不开，他气急败坏，有一阵甚至想用刀子把绳子割断，但他还是把这个念头打消了：在今后的日子里，这根绳子不知还有多少用处呢！

鞋都湿透了，脚湿漉漉的，没法洗，他找出毛巾干擦，擦得很仔细，每个脚趾头、每个趾头缝里都擦了，擦完脚，铺开行李，他呆呆地坐着，看着，一屋子人都在忙碌，解行李，铺行李，脱衣服，动作快的已经钻进被窝里去了。到处都有人在咒骂，各种恶毒的字眼都用上了，在这种时候，咒骂是他们惟一的发泄方式。女孩子还有另外一种发泄方式，从库房外传来了她们的哭声，嗓子很尖，声音很响，屋里的男生有了新的咒骂对象：“哭丧哪？三更半夜的，哭个屁！”

有人在出出进进，有人在地上走动，有人拿着手电筒满屋里找失落的東西，摇曳的烛光在墙壁上投下他们巨大的影子，黑乎乎的影子随着烛光的跳动而不停地摇动。张羽农想起他小时读过的童话，他觉得那晃动的影子很像一个个狂笑乱舞的魔鬼，而这座巨大的库房就像一个空旷的山洞，他心头袭上一阵恐惧。

一切都跟他想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失望深深地压在心头，他后悔了，可是后悔也晚了。

那一夜，张羽农竟然睡得很实、很香。

跟四川姑娘魏泽比起来，张羽农的住处应该说要好得多了。

魏泽一个人来到大巴山区的一个山村插队，到了队里天就快黑了，队长把她领到生产队的保管室里，里面很干净，刚刚收拾过的，摆着一张新桌子，一张新木床，床上铺了厚厚的稻草。墙角还有新砌的炉灶，新买的铁锅。魏泽对这个新家很满意，很喜欢，可是到了晚上她才发现，这个新住处太可怕了！

她先是听到头顶的房梁上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是老鼠跑动的声音。她不禁有些害怕，赶紧点上煤油灯，又拿出手电筒朝房梁上照，这一照不要紧，原来房梁上还横放着一个木箱，再细一看，呀，原来是一口棺材！唉呀吓死人了！棺材是放死人的，里面有没有死人！魏泽一下想起从前听过的那些尸体呀鬼魂呀的故事。她想哭，又不敢哭，她想另找个睡觉的地方，可是初来乍到，谁也不认识，去找谁呢？没有办法，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山村，在这漆黑孤独的夜晚，她只能住在这里，只能睡在一个有口大棺材的屋子里，睡在那口大棺材的下面。躺在床上，一睁眼睛就能看到那口大棺材，真倒霉！

煤油灯亮了一夜，魏泽靠着那点光亮来给自己壮胆。好容易捱到鸡叫了，天亮了，鬼魂不会出现了。魏泽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队长：“队长，那屋里的梁上有口棺材，吓死人了。你帮我解决一下吧，要么换个地方住，要么把棺材抬走！”队长想了一会儿，说，现在队里没有别的空房，换地方恐怕不行，这口棺材是公社王书记的老丈母娘的，一直放在这里，我也不敢得罪王书记。两个办法一个也不行。魏泽只得硬着头皮住下去。她每天晚上都点着煤油灯睡，即使有油灯的光亮她仍然无法睡实，朦胧中保持着警觉，一有风吹草动立刻睁开眼睛。每月供应的煤油，几天就用光了。她没有了油灯壮胆，只能在黑暗中入睡，劳动了一天，实在太困了，稀里糊涂地也就沉沉睡去。魏泽说：“这口黑漆漆的大棺材成了我在农村的陪伴，它躺在上面，我睡在下面，一直到我调离农村。”

安置费不翼而飞

李大光去内蒙古巴彦诺尔盟杭锦后旗红旗公社插队，那个地方风沙大，不打粮，一亩地撒上60斤麦种，最多收回来二三十斤，社员收入本来就低，所以都不欢迎知青。大队分不下去，就让生产队抓阄，抓着几个算几个。没抓着的都高兴坏了，李大光那个队抓了八个，队长让社员数落得一年都没抬起头来。

在川西平原插队的成都女知青张治玲，个头长得小，生产队里给她评定的工分标准是每天三个工分。那一年每个劳动日值（10分）是0.17元，三个工分仅合5分1厘，这是她一天10个多小时的劳动报酬。她下乡七年，最多的一年挣了1200多个工分，可是由于分值低，那一年她反要倒补队里17元钱。在人多地少的四川省，农村的劳动力本来就过剩，农民的收入本来就不高，知青来了，挣工分的人多了，工分值自然就更低了，无形中影响了农民的收入，侵犯了农民的利益。所以，这种地方的农民自然不欢迎知青来下乡。

成钳对北大荒的印象是一个字：冷。气候是冷的，人情是冷的，村里的氛围是冷的，队干部的语气和表情从来都是冷的。他们这帮小青年在一块多次议论过：队长会不会笑？

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到了11月，已经是滴水成冰了。社员们家家户户都生起火墙，烧起热炕，严严实实的屋子里，有一种融融的暖意。但是成钳他们那间宿舍，既无烟囱，又无炉盖板，没有办法烧火，只能干冻着。土炕开始是凉的，后来是冰凉，再后来是冰冷，没法睡人，小伙子们就在冰凉的炕上搭一些木板，睡木板。早晨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墙上的霜，一指厚的霜，晶莹洁白的霜，茸茸的，像小动物的绒毛，在杭州从来没见过。好看的霜花激发不起一点儿浪漫的情调，他们全都蜷缩在被窝里不想出来。

烟囱哪去了？炉子上的盖板哪去了？都让主人拆走了。主人哪去了？主人是特嫌分子，全家都迁往内地去了。边境形势紧张，怕他们里通外国搞破坏。

本来成钳他们有国家拨的安置费，本来队里说好了要用安置费给他们盖房子，可是地基刚打好就停工了，至今还在那里撂着，队里把他们安排到老乡家去住。住老乡家的房要付房钱，住了半年，队里说知青的安置费花光了，没钱了老乡就不让住了。正好，有两户内迁户刚刚迁走，知青就搬进去了。内迁的老乡把能带走的東西全都带走了，只剩下两间空荡荡的土房和两铺光秃秃的土炕，连炕席都没有。

七月八月好对付，九月十月能将就，到了十一月日子就难捱了。知青去找队长要烟囱，要炉盖板，要煤，队长说烟囱没有，炉盖板没有，给你们拉一车煤吧！第二天队里就拉来一马车煤，那煤乌秃秃的，一点儿光泽也没有，成钳他们试着在炕洞里烧，不管劈柴烧得有多旺，煤一压上去火就灭，原来煤里边尽是石头，原来这是一堆放了好几年没人要的煤，煤里那点可怜的有机质，早就在风吹日晒中流失光了。知青们气得直骂，骂也没有用，没人管他们，只能自己救自己。“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他们唱着《国际歌》开始行动了。

成钳说，那个时候知青偷东西，都是逼出来的，因为谁也不管，手里又没钱。要分红得等到年底。

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到边境地区来慰问演出，成钳的好友小周那时正在学小提琴，苦于无师可求，他就绕到俱乐部的后台，趴着窗户，看歌舞团的小提琴手如何调音，怎样练琴。后台很热闹，演员们正在化装，屋子里面热气腾腾，炉子上坐着一把铁壶，壶里的水烧开了，鼓得壶盖一窜一窜地跳，白色的蒸汽从壶嘴里呼呼地冒出来，窗户上挂满了细细的水珠。小周隔着水珠寻找小提琴手，成钳却一眼就盯上了炉子上的那十几节烟囱，他心里猛地掠过一阵狂喜。

演出结束了，观众散场了，知青们却不肯走，七八个人围着俱乐部的看门老头，七嘴八舌地发议论。有人模仿相声演员的样子和语调，一帮人就一阵又一阵地哄堂大笑，在这笑声的掩护下，成钳正领着另一拨子人，紧张地在后台拆烟囱。

炉火还没有熄，烟囱还热得烫手，但是顾不得了，等不及了，他们用毛巾和手套垫着，使足力气往下拔。窗外有人接应，拆下一节运走一节，一节节烟囱全部运回宿舍去了。他们心里好不得意，结果最后一节没拿稳，掉到舞台上，“咚”地一声，在空旷的剧场里响起了清晰响亮的回声。这响声引起看门人的注意，他说：“什么声音，我得去看看！”知青们却拉着他不让走，正纠缠间，传来了成钳的喊声：“平安无事喽——”这是事先预定的暗号，示意事情成功，于是知青们也高声喊着：“平安无事喽——”一哄而散，把莫名其妙的看门人，留在了俱乐部的大门口。

烟囱有了，烟囱安好了，可炉盖板没有，没有炉盖板的炉子怎么用？有人侦察之后又想出了一个主意：邮电所的炉子在外屋，炉盖板是新的，偷他们的！

一天，邮电所里来了五个知青，五个人都来买邮票，每人买两张。他们慢腾腾地掏钱，慢腾腾地付款。屋子里边买邮票，屋子外边偷炉盖板。北方的炉子是砖砌的，红砖砌成四四方方的炉壁，上边放一块四四方方的炉盖板，炉盖板的中间是炉圈，大的套着小的，一环套着一环。红红的炉火把炉盖板烧得火热，但是小周不在乎，他找来一根铁条，用力一撬，就把炉盖板撬了起来，几个人拿着棍子一挑，一套炉盖板就挑走了。

俱乐部来告状，邮局来告状，状子告到公社的刘副书记那里，被告都是知青。刘副书记是江苏人，五十年代末转业来到东北，他理解这些孩子们的难处，但处在他的地位，又不好为孩子们辩解，只得把事情压下了之。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偷上了瘾的知青，竟然偷到了他的头上。

一天夜晚，他在公社里值班，一个人坐在灯下看书。看着看着

起了困意，正要铺开行李睡觉，忽然听见院子里边有响动，他拿了手电出来，煤堆旁边有一群黑乎乎的人影，打开手电一看，原来是知青，一人手里一把铁锹，正往一个大木槽子里边装煤，他恼了，高声喊到：“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偷到公社来了，哪个是头，出来讲话！”

挺身而出的是成钳。他认得刘副书记，刘副书记也认得他。“刘副书记，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都要冻死了！”

“你们队长说，给你们拉了一车煤！”

“那种煤根本没有办法烧，里边尽是石头，你去看看好了，要是能烧的话，我们不会跑到这里来的，我们真是没有办法了！”

刘副书记的语气缓和下来了：“你们队里怎么搞的，安置费全都给了他们，房子也不盖，煤又不肯买，他们把钱都用到哪里去了！”

“队长说安置费早都用光了，我们也不晓得他是怎么用的，我们也不晓得到底有多少钱。”

刘副书记心里明白：知青的安置费被队里挪用了。

挪用知青安置费的现象，在农村是很普遍的，只是程度不同。挪用的原因大体上有这么几个：一是队里实在太穷，缺钱；二是农村干部从一开始就不相信知青们能长久地住下来，能在这里扎根，“要是真把这些钱都用在他们身上，那不白瞎了！”第三，许多地方的农村本来就不欢迎知青，而知青的一些恶作剧和偷窃行为，更加深了农民的反感和不满，“有钱也不往他们身上花！”

可能是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到北方插队的南方知青，与当地农民的关系大都比较冷漠，成钳说，他们跟农民基本上没有交流，除了在一块儿干活很少来往，没有事，他们从不到社员家里去，社员也不到他们屋里来，走在路上见到了，彼此连个招呼也不打，农民的脸上老是那一副漠然的神态。

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成钳是在村里过的，知青大部分都走了，只剩下他跟小周两个人。知青点的炊事员是个鹤岗知青，他走

的头一天,用最后一点玉米面蒸了几个窝窝头,用最后一点油作了一锅汤。他对成钳说:“粮食一点也没有了,油也没有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那一年的秋天霜来得早,早霜把未长成的庄稼都打死了,是个灾年,分口粮的时候队长告诉知青:“你们的口粮等过了春节再分!”过冬的菜也是队里分的,社员家里都有菜窖,把分到的白菜土豆萝卜放进菜窖里,要吃一冬。知青口粮分不到,菜也分不到,“反正你们也没窖!”队长说。

炊断粮!这可是件大事!成钳跟小周整整饿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中午实在挺不住了,两个人上队长家里去了。队长家里正在吃饭,炕上摆着小饭桌,玉米面饼子冒着热气,散发着香甜的气息,真诱人!两个人拿起饼子就吃,这比知青做的饼子好吃多了。

“队长,我们断粮了,你要再不给解决,我们就天天上你家里来吃饭,总不能让我们饿死吧,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队长没办法,下午就从仓库里给他们称了100斤玉米。整粒的玉米没法吃,成钳跟小周扛到公社的粮食加工厂,磨成了玉米面。

那个春节,他们俩天天吃玉米面,顿顿吃玉米面,玉米面饼子,玉米面窝头,玉米面糊糊。什么菜也没有,只能喝盐水汤。过完了春节才给知青结账分口粮,成钳从年初到年尾整整干了一年,分了32元钱,是知青里边分钱最多的一个,大多数人都是倒欠队里的钱。

“领袖像事件”

对知青来说,体肤之苦还好忍受,最难耐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松花江流过了哈尔滨就进入了中下游,江面渐渐展宽,水量渐渐变大。松花江中下游最大的城市是佳木斯,与佳木斯隔江相对有个莲江口农场。莲江口农场过去是个劳改农场,在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中,劳改犯迁走了,农场用于安置滚滚面来的知识青年。

李铁是个很帅的小伙子，国字脸，白净的皮肤，浓黑的瞳仁，浓黑的头发，他有一条好嗓子，又有很高的音乐天赋，音乐课上学唱新歌，老师刚刚教过两遍，他就能完整流畅地唱下来，旋律之准乐感之好声音之嘹亮，令老师惊叹。学校里哪次文艺汇演也少不了他，他因此而有了名气，有了傲气，“这小子挺狂”，人们嘴上这样议论，心里还是喜欢他。他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母亲是报社的老编辑，他是家里的独子，母亲的宠儿。

李铁聪明，又爱耍点小聪明，学习不大努力，每次考试老在80多分。他没吃过苦，也没发过愁，整天哼哼呀呀地唱，得意地炫耀他那条好嗓子。

1966年的夏天李铁第一次尝到了屈辱的滋味。他的父亲成为走资派被打倒，他的母亲也受到批判，他的地位几天之内一落千丈，成了黑五类、狗崽子。他一下子蔫了，像是遭了寒霜的花儿，再也没有了那股得意的“狂劲儿”，再也听不见他那高而嘹亮的嗓音。他觉得抬不起头来。他们那个大院里抬不起头的孩子有好几家，几个孩子尽量少露面，不出门，离“大革命”“大批判”躲得远一点。

上山下乡的高潮来了，李铁像是甩包袱一样很快地离开了他那个家庭，来到了莲江口农场。这里是一个新组成的集体，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是狗崽子，尽管劳动很累，但是他的精神压力小一些，心情要好一些。

李铁的性格大大改变了，他不爱多说话，对什么都不抢不争，大家对他的印象是两个字：老实。又老实，又长了一副招人喜欢的模样，自然得到大伙的喜爱。那时每天早晨上工要排队，还要举着一个毛主席画像，举毛主席像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李铁，画像粘贴在一块木板上，木板有一个长长的木柄，李铁每天上工下工，就举着这个木柄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下乡不到两个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那时正是隆冬，每天在场院上脱稻谷，李铁到了场院上，随手把毛主席像往稻草垛上一插，就去干活。

冬天的原野是空旷的,空旷的原野上风是很大的,稻草垛又很松,不知道什么时候,插在稻草垛上的毛主席像倒了。这本来是一件平常普通的事情,倒了,再扶起来重新插好就是了。就是这件当时谁也没注意的事,几乎毁掉了李铁。

那时每天晚上都有总结会,总结会主要不是总结工作,而是总结思想,斗私批修。李铁他们排里有个男生,来自一所工读中学——学校不好,他家是富农成份——出身不好。或许正是由于这两个劣势,他才更加急于表现自己。在总结会上,他把毛主席像这件事情讲了,他说:李铁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不尊重,他不是把毛主席像好好地插在那,而是把毛主席像往那一扔就走了,这是什么问题?这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态度问题!他严肃而又气愤地说。

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这可是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呀!有人十分气愤地喊起来:李铁,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李铁,你用心何在?李铁,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屋里的气氛在急剧地升级。李铁哪见过这阵势,他吓坏了,他无力地辩解着:“我没——”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有人又提供了关键的情报:“他爸是走资派!”这一下,问题的性质可就严重了。“打倒——”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

各个排的总结会,要逐级向上汇报,于是这件事汇报到分场。分场听汇报的是一个原劳改农场的干部,他立刻查了李铁的档案,又派人搞了他的外调,证实了他的的确是走资派的孩子。问题定性了:反革命!发泄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满!反对毛主席!那年月正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年月,愁的是没有活靶子,喜的是终于找到了一个活靶子。管劳改犯的干部把管劳改犯的那套办法又拿出来了:马上把他看起来,隔离反省!全分场开大会批判他,连里排里每天批判。每次批判会上他先要自报家门: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李铁,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白天劳动让他干最苦最累的活,晚上批判会让他90度大哈腰,早晨他要先起来给食堂挑好做饭的水,给知青们挑来洗脸水,帅气的小伙子迅速地憔悴下去。

李铁的妈妈听到了消息，急匆匆地赶到农场来看他，一见面她几乎不敢相信，这张肮脏憔悴的脸就是那张白净俊秀的脸吗？这木讷无语的人就是他那活泼好动的儿子吗？她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是反革命，她相信儿子的良好素质，可是她的辩解是无力的，无效的，无结果的。她要陪儿子住几天。早晨，天还黑黑的，儿子就被看守人员叫起来，她也跟着穿衣起来，儿子去挑水，她就坐在炕沿上发呆。善良的母亲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爱子，她的脸也跟着憔悴下去。

女生排排长潘琴看着李铁妈妈愁云满面的神色，看着她单薄瘦弱的身影，看着她每天默默无语地跟在李铁旁边去下地去挑水，在食堂里排着队给儿子买饭端菜，心里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她真想去帮帮她，真想对她说一句安慰话，可是她该说些什么？她又能帮上什么忙呢？她仅仅是一个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啊。

十六七岁的孩子，还未成年，如何能受得了这么大的压力？李铁的精神终于崩溃了，他得了精神病，要到外地的精神病院去治疗，来农场接他的，还是他的妈妈。潘琴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清瘦的母亲一手提着沉重的行李，一手领着痴呆的儿子，一步一步地走远了，消失在原野上，消失在寒风里。潘琴站在修整水渠的工地上，一直看了很久很久。

几年之后，潘琴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农场。暑假里她回家度假，一个明媚的夏日，她在江边公园里漫步，忽然遇见了李铁。小伙子的脸色很好，白里透红，又恢复了英俊，那对瞳仁还是乌黑乌黑的，但瞳仁里似乎少了些什么。究竟少了什么？潘琴苦苦地想，噢，是灵气，少了灵气，几年前，那双黑黑的眸子里飞动着多少聪颖的灵气呀！潘琴问他：李铁，你的病好了吗？好了。你现在干啥呢？没工作，在家呆着呢。你妈妈好吗？挺好的，就是头发都白了。他神情那么平静，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抱怨，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什么也没失去过，“但是，他失去了多么重要的东西呀，那失去的永远也寻不回来了。”潘琴在心里默默地想。她为李铁的平静而高兴，她又

为李铁的平静而悲哀。云彩在天上慢慢地飘，柳树枝在头顶轻轻地摇，公园里的一切都那么美好，潘琴的心却被一段往事的回忆啮咬着。

社会是复杂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而知识青年们是比较单纯的，他们缺少处理各种矛盾的经验，也缺少自我保护的警惕性。“老三届”们的确如他们自己所说是“生不逢时”，刚刚独立地走上社会的时候，偏偏赶上的是一个遍布着陷阱的社会。他们懵懵懂懂地闯进这个社会，父母亲友师长都不在身边，无人帮助无人指点，就很容易或是由于太幼稚或是由于太冲动而做出一些错事、蠢事来。

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女知青班，刚发了工资，一个女生的钱就找不见了。她急得在宿舍里一边找一边嚷，同班的几个女生都赶紧表态：“我没拿！”“我没看见！”只有天津知青小杜没有吭声。她平时就不爱讲话，对别人的事情也不大关心，“管你们丢钱不丢钱，跟我没关系。”她常常是这样一种处世态度。很自然的。她就成了惟一可疑的对象。

班长找她谈心，排长也找她谈心，她们不好直截了当地把话挑明，不好一口咬定是小杜偷的钱，只能拐弯抹角扑朔迷离闪烁其词。小杜不是傻子，她当然听明白了，她也不做更多的解释，就是一句话：我没拿，反正我没拿。不管班长排长讲多少话，她只有这一句话。指导员听说了这件事，有些恼火，让她们“加大火力”，全班开会动员她把钱拿出来，不拿出来第二天就开全连大会。小杜只是哭，不讲话。会开完了，大家都躺下睡觉了，她还是坐在炕沿上哭，哭得宿舍里的人心烦，睡不着觉，有人就气恼地喊了一句：“想哭上外边哭去！”小杜一欠身蹦到地上，抬脚就出去了，一夜没有回来。

第二天班长赶紧向排长报告，排长向指导员报告，指导员让全连人去找，营区里找遍了，营区后边的小山上也找遍了，又派人到团部去找，都毫无结果。指导员有警惕性，当时正是冬天，江河都已封冻，“她会不会叛国投敌，跑到老毛子那头去了？”指导员赶紧向

团里报告了这个可疑的情况。

连队有两口井，一口在马号，是喂牲口的；一口在食堂，是做饭用的。开春以后，天气渐渐暖和了，大伙觉得食堂那口井里打出来的水有股臭味，臭味一天比一天冲，又过了几天打出来的水里还发现了黑色的毛发。副连长说，这井日子久了，该淘一淘了，就派人下去淘井。下去的人一脚踩到个软绵绵的东西，用手一摸是个人，吓得大声叫起来。上边的人听到叫喊，赶紧摇动辘轳把他拉了上来。小杜终于找到了。小杜在井里沉睡了一冬天。连里的人喝了一冬天泡着小杜尸体的井水。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处理不当，就出了一条人命。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1973年8月，北大荒上响起了两声枪声。应声倒地的是两个现役军人，一个叫黄砚田，一个叫李耀东，一个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6团的团长，一个是16团的参谋长，一个49岁，一个48岁，一个是四三年入伍四四年入党，一个是四三年入党四四年入伍，都是有着30年党龄军龄的老八路。他们的罪名是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与此同时，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104号文件，把黄、李案件通报全国县团级以上党政军部门。通报的措词十分严厉，指出当前摧残迫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激烈斗争的反映”，要求各级党委“全面地严格检查这类案件，依法惩办以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知识青年和强奸女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坚决杀掉其中罪大恶极、民愤极大者，并大张旗鼓地宣判，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104号文件发布之后，各地都公判处理了一批迫害下乡知青的案件，杀了一批罪大恶极者。由于当时正在风口浪头上，所以有个别案件在事实上和量刑上不甚准确，有偏严偏重的倾向（如黄砚田李耀东一案1983年复查后撤消了原判决）。

1973年5月底,新华社云南分社的两名记者,到滇南的一支部队里去了解批林整风的情况。采访很顺利,也很平淡,但是在返回昆明的时候,他们却见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

在途经生产建设兵团4师18团团部所在地的金平县时,汽车出了点故障,抛锚修理,记者在等候修车的时间里,看到有几个年轻人被看管着劳动,记者好奇地向人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知青,是“5.13”反革命暴动事件的参加者。

知青成了劳改犯,而且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这显然很不正常,非常反常,作为新华社的记者,敏感性与正义感俱备,他们对18团的知青问题作了一些调查,调查就从“5.13”反革命暴动事件开始。

5月11号夜晚,18团1营18连发生了一起企图对女知青强行施暴的事件,女知青发觉后大声呼救,住在旁边的男知青赶来,将流氓一顿痛打。5月13日,流氓纠集了一群人,在18连大打出手,扬言要“踏平18连”。有的男知青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女知青受到了侮辱和调戏,更多的知青躲进宿舍不敢出来。正当知青节节败退之时,一个个头不高的“小四川”忽然从厨房里杀将出来,他手拿一根木棒,冲着歹徒们一阵猛抡,一下子就扫倒了一片。小伙子姓黄,平时就急公好义,专爱打抱不平,其他知青见状,趁势挥舞着锄头扁担一拥而上,战局顿然改观,知青大获全胜。这时连队指导员出面了,他火冒三丈,拔出手枪对空鸣响,然后厉声命令把打架闹事的知青统统都抓起来。18连是武装连队,连里也有武器,小黄这个愣小伙子眼疾手快,一把抢过来一支冲锋枪,哗啦一声顶上了子弹,一些气愤的知青也把老式步枪端了起来。刀出鞘箭上弦,形势顿然紧张。

双方都拿着枪,双方的枪膛里都顶着子弹,只要有人用食指轻轻扣动扳机,就可能有人饮弹倒下。情况十分危急,气氛十分紧张,有的女知青吓呆了,有人马上去打电话。情况马上报告到团部,一名副团长马上带领警卫连赶来。持枪的知青被包围了,知青手里的

枪被缴械了,50名知青被当场抓获,连夜审讯,最后拘留了小黄等15人。这次事件被定性为“5.13”反革命暴动案,首犯小黄被正式逮捕,其余十人先在各连队巡回批斗,然后管制劳动两年。

这是18团迫害知青最典型最严重的一起事件,但不是惟一的一起。在18团,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相当多,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全团31个单位中有23个单位都发生过。捆绑吊打有各种花样,各种名称,比如:猴子捞月,老牛扳桩,吊半边猪,背扁担,跪砖碴,跪劈柴加踩杠子等等。

两名记者写出的《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反映》,登在新华社7月4日的《国内动态》第241号上,送到了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7月5日叶剑英批示:“事态严重,请电告昆明军区派人查报。”7月6日周恩来批示:“先念、登奎、德生、国锋、洪文、东兴同志: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只要18团被控事件属实,应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这个团部负责人停职交待,并开群众大会宣布此事。……省委、军区要负责保护这些受摧残的知识青年。”7月6日李先念批示:“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军区难道说一点也不知道吗?”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出了联合调查组赴云南边疆进行调查,8月,调查报告作为中央文件通报全党。

迫害知青的问题一点一点揭露出来,问题越揭越多。

独立一营有个营长叫贾小山,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入伍,打仗很勇敢,多次立功受奖,还在敌人的炮火底下抢救过好几次战友,但也因为调戏妇女犯过大错。独立营下面管着十几个连队、两千多个知青,43岁的贾小山在这里简直是个土皇帝,被他捆绑吊打过的男知青有七十多人,其中有的致残,被他强奸的女知青有二十几个。直到1973年,一名上海女知青两次投河自杀,贾小山的事情才暴露出来。

一师二团六营的张国亮,原来是沈阳军区“雷锋团”的一个排长,他们部队到中老边境执行战备任务,张国亮作为骨干留在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由排长擢升为指导员。他很能干,开荒、筑坝、各种大会战,比谁都干得猛干得欢,他曾经跳下激流救人,也会和风细雨地做思想工作,为此获得过上级嘉奖,还荣立过一次三等功。张国亮是许多知青心目中“真正的解放军”、“优秀的部队干部”。但是这个“英雄”渐渐生出了邪念,1971年,张国亮借谈心为名,强奸了第一个女知青。他当了三年指导员,强奸了几十个女知青,其中有的多次堕胎。

李先念看了张国亮的材料后,十分气愤地说他“和日本鬼子差不多”!

恶有恶报。1973年11月28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景洪召开宣判大会,判处迫害知识青年的罪犯贾小山、张国亮等四人死刑。昆明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指示:一定要将罪犯押回原单位公判,以平民愤。

李庆霖告状

各种各样的知青问题越来越多,通过知青反映到公社、县里和地区,反映到团部、师部和兵团司令部;通过知青家长反映到市里和省里的知青办。可是那几年还正在轰轰烈烈的高潮中,知青办也好,司令部也好,主要精力还在忙于动员下乡,忙于接收和安置,他们对这些陆陆续续反映上来的问题,有一些是没有引起重视,有一些是抽不出人力来调查,更重要的是没有条文遵循,没有力量解决。谁也不敢多讲问题,只能讲形势大好,只能讲广阔天地炼红心,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于是,大多数的信访都石沉海底没有回音,知青和知青家长们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

有一个人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因为他直犯龙颜告了御状,他越过了县地市省诸级机关,一下子就把信写给了毛主席。恐怕连他

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封信能寄达毛主席的案头之上。

福建省莆田县因盛产荔枝而闻名,人称“荔城”,城郊公社下林村有个小学教师李庆霖。李庆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到莆田县山区插队,年年口粮不够吃,队里从来不分红,没有钱买菜,没有钱看病,连个固定的住房也没有。小儿子眼瞅着也到了下乡的年岁。李庆霖在情急之中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1972年12月20日他瞒着家人,花了两个多小时,执笔上书毛泽东: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底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200来斤,外加300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200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100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的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年轻力壮,更是会吃饭的。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

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口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云,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将要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李庆霖在这封信的末尾说:“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话。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这封信是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一份十分珍贵的材料,它的珍贵不仅仅在于真实地袒露了一些插队知青的困难处境,更在于它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千千万万知青困难而又无奈的处境。

毛泽东读完了这封信十分震惊,在此之前他还从没听到过这方面的消息。自从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患了一次严重的肺炎开始,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971年“9.13”事件极大地刺激了他,紧接着一场严重的肺心病袭来,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已经难以外出视察,他只能久居深宫,依靠听汇报看材料来了解下情。报上来的,都是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他的号召踊跃上山下乡的先进事迹和各地如何做好上山下乡工作的经验介绍,李庆霖的信使他第一次知道了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怎么能这样对待下乡的孩子们!他也是父亲,他也有过两个儿子,他完全能理解李庆霖的心情。他又把那封信拿起来,目光停留在末尾的几句话上:“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是呀,一个县城里的小学教师,无职无权,有什么办法呢?毛泽东被一个平民百姓的命运打动了,他生出恻隐之心。他把烟头在烟灰缸里重重地一捻,拿起一支笔来亲自给李庆霖写回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写毕,他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找来,要他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把信和钱通过邮局寄出。此时距李庆霖写信的日子,已经过了4个月,这封信为什么经过如此漫长的日子才到达毛泽东的手中,我们无法考查,但它终于能到达毛泽东的手上,实在值得庆幸,不光是李庆霖一个人的庆幸,也是广大下乡知识青年的庆幸。毛泽东的信,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在1973年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一些久拖不决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一批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知青的待遇和境况有所改善。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是,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了全国统一的知青政策。

姗姗出台的知青政策

毛泽东亲自给一个小学教师写信的举动,表示出他对知青工作的不满意,此外他还感到,一些消息被封锁了,一些真实的情况难以到达他的耳边,这比知青工作的失误更让他难以容忍。毛泽东过去就曾经用写信这种方式来表示过内心的不满,比如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书信。所以这一次,政治局和国务院都有些紧张,他们努力从信的字里行间去揣测毛泽东的用意和心情。

4月27日,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后的第三天夜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专门研究知青工作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央开始重视解决知青问题的一个信号,是制定和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开端。会议的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从晚上9点一直开到次日凌晨1点多。

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他先念了毛主席的信,接着十分动情地说: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寄去300元钱,这说明我们对知青工作没有抓好。主席要考虑的事情那么多,我们不能再让他为知青的事情操心了!会上决定,尽快召开一次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五·一”过后,国务院组织了13个调查组,进行上山下乡工作调查,5月31日,中央工作会议印发了调查组提出的《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周总理要求各地同志把这个文件带回去讨论。6月,中共中央把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和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作为中发(1973)21号文件下发全党。在这一系列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由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6月22日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华国锋亲自主持会议,28个省市自治区、11个大军区和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广州、云南五个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参加。这是一次相当重要的会议,它对知青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统筹解决的办法,对一些政策性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会议开了一个半月,之所以开得那么长,一

一个重要原因是,越开揭露出来的问题越多越严重,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预想。先是7月初新华社反映云南兵团4师18团捆绑打骂青年问题的那份内参,接着,国务院知青办的一份简报专门反映了建设兵团的问题,涉及的兵团有内蒙古、新疆、黑龙江、江苏、广州,涉及到的问题有管理粗暴、奸污知青、毒打知青、工伤事故等等,死亡人数有1300多人!中央领导对一些现役军人奸污知青的问题十分气愤,李先念、李德生讲话都提出,对于问题严重、罪大恶极的要杀头,否则不能平民愤。

那次大会的主要成果,是一个报告和两个草案。《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经毛主席阅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报告的两个附件是:《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前者是一个政策性文件,后者是一个未来七年的规划。

《报告》提出了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六条意见,其中包括: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切实解决知识青年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国家对生活困难的插队青年要给以必要的补助,安置经费要适当增加;对有缺点错误的知青要耐心说服教育,绝对不能采取简单粗暴态度;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今后领导干部“走后门”的,不但要把他们的子女退回去,并且要给予纪律处分;对于以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知识青年和强奸女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恶依法惩办,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举行公判,坚决杀掉。

报告中点名表扬的优秀知青有,云南勐腊山寨的上海知青朱克家、河北涿鹿县的插队知青程有志、陕西延川县的北京知青孙立哲、知青烈士金训华等。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中规定,有特殊情况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可以留城,大体有五种情况: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知青不动员下乡;家有特殊困难的知青可以不

动员下乡,这主要指父母年老多病或死亡,弟妹年幼生活不能自理而又无人照顾的;独生子女或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的,不动员下乡;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下乡;父母双亡年满17周岁的孤儿原则上不动员下乡。归侨学生下乡主要安排到华侨农场。下乡青年的年龄延长到17周岁。这些政策网开一面,为留城开了活口。《草案》对下乡知青的实际生活困难也提出了解决意见,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由原来平均每人230—250元提高到近500元,其中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和到集体所有制场队的,南方各省每人480元,北方各省每人500元,到内蒙古新疆等地牧区的每人700元,到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每人400元。到高寒地区的每人另加40元冬装补助费,到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边远地区插队的补助两次探亲路费。在口粮方面,规定插队知青头一年按各地标准由国家统销供应。参加集体分配后既要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又要给予必要的照顾。正常出勤,应不低于当地单身整劳力的实际吃粮水平。所在社队口粮水平过低的,由国家统销给予补助。此外对医疗、住房等具体问题也作了规定,如规定给每个知青建房8—10平方米。

这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知青政策进行了调整,部分地纠正了知青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知青的生活困难。

史卫民、何岚所著的《知青备忘录》中说,1973年那次知青工作会议,“实际上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高峰转向低落的重要标志”。其理由有二:第一,在知青的安置方式上,“已不再强调过去那种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分散安置办法,而是希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相对集中,便于管理并有利于解决生活问题;同时,也不再强求向边疆贫困地区大量输送知识青年,因为有许多不好解决的实际困难,而是挖掘城镇郊区社队的潜力,尽可能在远近郊区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第二,在插队知识青年的前途上,一些地方“已经认识到有下必有上,造成良性循环,于是在安置新的中学毕业生时,大多已经考虑到城市的回收问题,有的城市(如北京市)已开始采用一届顶一届的办法,如1974年的毕业生下乡后,即安

排 1972 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批招工,知识青年下乡锻炼的时间为二至三年。这样做的结果,使得 1973 年后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农村的时间远比在此之前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农村的时间短。”实际上,从 1974 年以后,北京的中学毕业生就都安排到郊区的几个县里插队,基本上没有去外省下乡的了。

第七章 魂系荒原

如果说,在知青上山下乡动员阶段最常用的一段毛主席语录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那么知青下乡之后使用频率最高的一段语录,要数“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了。这条语录最早见诸报端,是1969年8月1日,在两报一刊纪念建军节的社论《人民军队所向无敌》里面。

“红卫兵”们在数日之内甚至一夜之间变为“知识青年”之后,最先感受到的便是艰苦,生活的艰苦,环境的艰苦,劳动的艰苦,以及由于远离家人和文化生活的贫乏所引发的感情之苦等等,他们用以战胜艰苦的武器,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八个字真正成了知识青年的口号,成了天天都要诵读的座右铭——在学习会上,在批判会上,在油灯下写进每天的日记里,写进遥寄远方亲人的书信里。

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段语录相联系的还有一段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愚公移山》中的一段话,写于1945年。虽然两段语录相隔24年,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下定决心”与“两不怕”相比较,在语态上有着更强的力量和气势,更口语化,更便于诵读,更容易激发起诵读者的信心、勇气

和劲头,它既可以看做是“两不怕”内容的具体化,也是实现“两不怕”目标的凭恃和途径。

他们过早地消失了

关于艰苦的程度以及知识青年们怎样不怕艰苦,适应艰苦,我们在前面的篇章中已有很多的叙述。现在要谈及的,不是“一不怕苦”,而是“二不怕死”。让我们来看一看,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们,一大群二十岁左右的孩子们,是如何面对着死亡这个人生中最险恶的课题、最严峻的考验,他们是怎样怀着理想主义的自豪感去蔑视死亡,甚至为了表现出自己的英雄气概而扑向死亡,尽管这种死亡有时并没有实际的价值。这里的“价值”,主要是从物质的角度、经济的角度而言,也就是说,死亡并没有能够避免物质损失,减少经济损失,反而大大加重了物质和经济上的损失——年轻生命的损失。有的时候,不是一条两条,而是几条十几条,甚至几十条年轻的生命。

这种以保护和救助或属国家或属集体的物质财富(如森林、草原、羊群、房舍、电柱等等)为目的的举动,虽然常常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救护者在救护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理想主义色彩,都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肯定和赞扬。他们的事迹登在报纸上,印在小册子里,成了对知青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最好素材,于是,就有更多的青年人在胸膛中升腾起激情,学着他们的样子,加入救护者的队伍,有更多的知青救护者,胸中怀着庄严神圣的感觉,无畏而又常常是无谓地倒下去,倒在山火的烈焰里,倒在洪水的波涛里,倒在各种各样的事故里,倒在祖国壮丽的大地江河里,他们过早地从知识青年的队伍中消失了,永久地消失了。

这批逝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分子、英才精华,浑身上下展示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生前就有着牢固的思想基础和出色的表现,他们在一刹那间的义举都决非偶然,这些人

后来被称作烈士,树为英雄,有的成了全国闻名的青年典范。他们中间的第一人,是上海知青金训华。

金训华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的六八届高中毕业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1969年3月,他参加上海市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组织的知识青年学习访问队,去了一趟黑龙江。他第一次看到了那么蓝的天空,那么广阔的黑土地,黑土地与蓝天在遥远的极目处拥抱在一起,他这时才感觉到,楼房连着楼房弄堂连着弄堂的大上海,是多么的使人压抑,还是在大平原上更舒畅更痛快!

一回到上海,金训华就开始张罗上山下乡,他发起成立了赴黑龙江插队落户联络站,组织了几十名同学。他做通了妈妈的工作,还带走了16岁的妹妹金士英。5月25日,他们乘坐火车从上海启程,向着黑龙江进发,金训华带着三十几名青年,来到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逊克县靠着黑龙江,不通火车,位置偏远——金训华给自己选了一个艰苦的地方。

金训华5月下乡,8月牺牲,在双河大队只生活了77天,两个半月的时间。这两个半月里,他几乎每天都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地检查自己,剖析自己。他坚持写日记,在日记中严格地审视自己,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

他在7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感到肚子痛,本来不想出工,但想到当前生产这么紧,人手这么少,我一个人不出工不要紧,影响不好。通过劳动,肚子也不那么痛了。这说明对我们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来说,劳动也能解除一部分疾病。我们可以在改造思想的同时,改掉身上的一些弱病。我决心在刻苦地改造思想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体质。”

他在8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一人捆一垅麦子,下午看来还是‘拿个子’比较轻松,但是一垅干下来,又觉得还不如捆麦舒服。这说明头脑里不用毛主席思想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必然去占领,就会拈轻怕重,逃避思想改造,我要坚持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不断前进。”

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训华总是把自己的任何一个微小的弱点,提到原则的高度,然后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狠狠地斥责和批判。这是那个时代先进青年所共有的特点,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先进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和条件。“每做一件事,就想想是否符合人民需要;每说一句话,就想想是否符合毛主席思想;每走一步路,就看看是否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金训华在7月26日写下的这些话,是他做人的最高准则。

双河大队的位置,在逊河和沾河的汇合点上,“双河”就是因此而得名。8月15日,一场暴雨,江河横溢,农田被淹没,大树被冲倒,双河两岸一片汪洋。

介绍金训华事迹的长篇通讯《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中这样写道:

下午四时许,金训华正带着民兵修坝防洪,生产队长老姜忽然跑来对民兵连长老贾说:“堆在河沿上的一百五十根电柱被水泡上了,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

“保护电柱要紧,这任务交给我!”金训华还没等姜队长说完,就向民兵连长请求战斗任务了。连长让他带领五名民兵前去抢救。

刚跑到河边,见有两根电柱已被一股急流卷走。此时河水正以每秒钟七八米的流速向下倾泻,电柱像箭一样向下冲去。小金万分焦急,一边跑,一边甩掉身上的衣服,大喊一声:“跟我下,马上捞!”小金首先跳进大河。

“追不上了,快回来!”生产队长知道小金正犯着胃病,怕他支持不住,发生意外,小金坚定地回答:“不要紧,走!”

小金在急流中与洪水展开搏斗。一个巨浪把他打入旋涡,他从水里拱出来,向电柱猛冲。又一个巨浪把他打入旋涡,他从水里拱出来,继续向电柱猛冲。第三个巨浪

又一次把他打入旋涡，他还是顽强地把头拱出来，继续向电杆猛冲。

三次冲击，小金露出水面一次比一次低，离河岸一次比一次远，但他却一次比一次更高地攀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思想高峰。

冲上去，冲上去，抓住电杆就是胜利！小金离电杆只有一米远了，这时，又一股漫甸子上的洪水冲进大河，呼啸着向他盖去……

金训华生前是民兵排长，最爱穿军装，经双河大队贫下中农要求，解放军有关部门批准，金训华穿上一套绿军装入殓。经大队党支部讨论，县核心小组批准，追认金训华为中共党员，逊克县革委会作出了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金训华学习的决定。

1969年10月27日，《黑龙江日报》和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12月3日，新华社播发了《金训华同志日记摘抄》和《红旗》评论员文章《革命青年的榜样》。《红旗》是党中央的机关刊物，“革命青年的榜样”这是党报党刊自“文革”兴起以来，给予一个青年人的最高评价，由此奠定了金训华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席之地。1970年1月21日，全国发行了一张“革命青年的榜样”的邮票，这张邮票依据一张宣传画设计而成，画面上，激流之中的金训华一面奋力划水，一面大声呼喊，表现出一种英雄气概。在中国邮票史上，为一个知青出一张邮票，是独一无二的。

树立金训华，意义有两条，第一是他走上山下乡的道路，第二是他不怕死。金训华是第一个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高指示具体化了的知识青年典型。

“两不怕”精神

就在新华社播发《金训华日记摘抄》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后的第三天，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佳木斯市召开。那次会议规模隆重而盛大，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地处三江平原腹地的佳木斯，忽拉拉一下子涌来了那么多穿黄棉袄的人，南腔北调，口音各异。大会的正式代表有上千人，集中了兵团六个师和直属单位的精华，此外还有一批用生花妙笔为先进代表写典型材料的“秀才”们。全兵团的先进人物济济一堂，全兵团的“秀才”也济济一堂。那真正是一次群英盛会。盛会在兵团机关俱乐部举行，那个俱乐部在佳木斯市的各剧场中堪称一流，楼上楼下全部坐满，大灯小灯一齐开放。主席台上坐着一批资历和级别都令人起敬的兵团领导、省革委会省军区的领导，他们之中有好几名将军、老红军。

那也是一次知识青年的聚会，在代表中，知识青年占了近一半，在大会发言中，知识青年占了近三分之一，而各代表团的通讯报道员们则几乎全部是知识青年。他们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知识青年中的精华。知识青年为那次大会增添了生气，也为寒冬之中的佳木斯增添了生气，他们毕竟是在城市里长大的，现在又重新进入了一座城市，尽管佳木斯不大，在经过了一段艰苦生活之后，知青们更加感觉到城市的温馨，城市的可亲。他们抓紧中午休息时间去逛街，逛商店，逛书店，寻购那些久已想买而在连队和团里一直买不到的物品和书籍，到照相馆里去拍一张照片，更有少数幸运者，在大会上还巧遇校友甚至朋友，真让他们惊喜不已。吃饭的时候最能体现出知青们的战斗力，操场一般大的餐厅里摆满了大圆桌，肚子里长时间缺少油水而又正是能吃饭年龄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平时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能见到一顿荤腥，而今顿顿有

肉,心里暗暗高兴,虽然因为要顾及代表的身分而故意装得文明有礼不慌不忙,但悄悄地都紧盯着自己爱吃的菜,加快着节奏,转眼间就把一桌饭菜吃个精光。十天会议开完,人人脸上有了光彩,肚子里的物质食粮恐怕比脑子里的精神食粮更让他们留连难忘。

那次大会的基调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哈尔滨知识青年、一师七团五营的副营长曲雅娟,被安排在整个大会的第一个典型发言。曲雅娟就是个不怕苦不怕死的典型。

1969年3月18日晚上,曲雅娟和战友们一起锄草。锄草机隆隆地响着,皮带轮飞快地转着,曲雅娟的任务,是往机器里续草。正干着,突然机器停住了,原来是被草团堵住了,曲雅娟伸出右手,一把一把地从机器里往外掏草团。当掏最后一把草团时,机器突然转动起来,曲雅娟的右手和草团一下子被机器卷了进去。旁边的战友看见了赶紧过来帮她往外拽胳膊,胳膊拽出来了,但整个右手从手腕处起全被绞掉了,好几根血管抽出来挺老长,血直往外冒,疼得曲雅娟汗珠往下淌。

她很快被送到了团部卫生所,卫生所的大夫给她包扎,包扎先要清理创面,要用剪刀剪去伤口上的烂肉,用镊子一块一块摘出绞碎的骨头碴子,真疼啊,刀子剜心似地疼,曲雅娟忍住了。团里领导来看她,她急切切提出的问题是:“首长,我还能当兵团战士吗?”

后来她被送到哈尔滨去治疗,大夫经过检查,决定给她做齐骨手术,就是把断手处的骨头切去一块,拉齐了。手术前大夫告诉她,这次手术是局部麻醉,拉骨头的时候要疼。曲雅娟说:“不要紧,拉吧!”拉骨头果然疼,一下一下,比断手的时候还难受,疼得心里直哆嗦。手术做完以后,整个右胳膊都肿起来了,一到晚上疼得更厉害,连躺都躺不下。曲雅娟靠什么战胜痛苦呢?她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默诵毛泽东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她用精神的力量来战胜肉体的疼痛,从始到终,没掉一滴眼泪,没喊一声疼。手术后第三天,她就用左手握起拖把,在病房里擦地板,用左手给同室的病友们送水、端饭、倒便盆甚至刷痰盂。

不久,中国共产党“九大”开幕了,曲雅娟又用左手拿起笔来,写出了祝贺“九大”召开的文章。

她出院了,出院后,她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只表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她回到了连队,回到了战友们中间,一同天天读,一同参加训练,她用左手拿着铁锹,用前胸抵住锹把,挖土,撮砂子,到处找活干。

曲雅娟的先进事迹不是在断手的一刹那间,而是在断手之后表现出来的坚强毅力,她以常人所少见的毅力,忍受了常人所难忍的苦痛,这对于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来说,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在大会上发言的典型一共有 31 个,若按行为类型划分,最多的当数扑火,扑火的典型有三个。

印尼归国华侨李凯堂,在团里参加粮食工作会议时,团部医院仓库失火,他在救火中为了保护其他同志,一人独撑住一堵快要倒塌的墙,最后他被那堵墙压在底下,腰部严重血肿,腰椎骨折,下肢瘫痪。

二师 16 团一连的王广发,在参加扑救一场山火中,发现两个青年不见了,他返身冲入烈火,寻找营救那两个青年,身上的棉袄棉裤都烧着了,脸和手都烧起了大泡,他想把衣服撕掉,但两只手已经不听使唤,他就把两只袖子用脚踩住往下拽,衣服拽下来了,手上烧的泡和焦糊的皮也被袖口拽了下来。他说:“当时我很清楚,继续前进肯定会被烧伤,甚至有生命危险,退出去,只要冲过几米的火带就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想,抢救阶级兄弟,就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毛泽东思想。看着阶级兄弟不救,活着也轻如鸿毛。”他最后终于找到了两个战友,原来他们俩早已冲到火带的另一边打火,没被烧伤。

与四师 35 团九连安凤清等七名知青扑救的那场火相比,李凯堂和王广发所经历的火灾实在要小得多。可以说,1969 年 3 月 31 日发生在 35 团九连的那场荒火,是黑龙江兵团第一场最有名的大火,参加扑火的北京知青安凤清,做为七英雄的代表,被安排在第

二天大会的第一个发言,她发言的题目是一句毫无特色的套话:《胸怀朝阳无所惧,兵团战士永向前》,不知是出于哪个“秀才”之手抑或哪个领导之口。其实那次大会的所有典型经验,全都经过了“秀才”和领导的精心加工,从团到师,从师到兵团,一级一级地加工,加工就是拔高、吹路子,就是挖掘出每一件具体事情背后的革命精神,挖掘出讲用者高尚的动机,哪一个典型也逃脱不掉,否则他就无法成为典型。

1969年底的中苏关系十分紧张,“林副主席一号命令”已经传达到全军,给人以“战争危险迫在眉睫”之感。隶属于沈阳军区又地处中苏边境线上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责任重大,兵团的主要领导深深懂得这一点。大会的开幕词是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所致,大会的总结报告则由兵团第一副政委程克廉来做,他们都强调了准备打仗,强调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强调了这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准备打仗,就必须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这是实现思想革命化的最高标准。

这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就在整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响亮地叫起来了,成了每一个兵团战士、每一个知识青年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目标。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不管天灾也好人祸也好,面对着危险和死亡的时候一定要冲上去,冲上去的就是英雄,即使死了也光荣;不敢冲的就是逃兵,即使活着也是孬种。于是,一些幼稚而又冲动的年轻人,在缺乏科学救灾常识、缺少自我保护能力的情况下,干出了一桩桩貌似惊天动地,实则意义不大的事情。

火 中 凤 凰

在兵团首届积代会的典型中,还没有一个献身的烈士,但是在那次积代会后不久,很快就出现了,其中十分著名的一个,是四师的天津知青孙连华,他曾经作为知识青年的优秀代表,去北京参加

了国庆 20 周年观礼。

1970 年春末,刚刚入党不久的孙连华去扑打一场草甸子里燃起的野火。他挥舞着柳毛子枝条打,用整个身子向火海中滚压着打,脱下上衣蘸湿了打。野火被扑灭了,这时打火的人们才发现他们已经深入到大草甸子 20 多里路了。草甸子就是沼泽地带,上面是一人多高的荒草,草下是一米来深的冰水,水中是多年繁衍缠绕在一起的烂草根。有的地方,水深无底,人一旦陷进去,被草根缠住,就绝难生还。孙连华他们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战斗,已经极度疲劳极度饥饿,现在又面临着—场充满了危险的考验——如何走出这茫茫的荒草甸子。孙连华有意走在队伍的末尾,做“收容”工作,帮助遇险的战友脱离危险。天黑了,兵团战士们蹬着泥水,踩着烂草,艰难地行进,孙连华穿着单薄的衣服,走在齐腰深的泥水里,他发觉身边的老王有些支持不住了,就搀扶着老王往前走,前面有一个战友要倒下去了,孙连华又拼命向前一把扶住了他,同老王一道搀扶着他向前走,一直走到凌晨一点钟,这时,他已经整整奋战了十个小时。突然,孙连华陷进了更深的泥水里,他再也没有力气拔出自己的双腿了,他挺直地立在那里,全身的力气已经耗尽了。

一个优秀的知识青年离我们而去,在他正值青春年华的时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决定给他追记一等功,并成立了孙连华事迹调查组。1970 年 6 月 25 日,《天津日报》刊载了长篇通讯《笑把青春献给党》。

同是天津知青,同样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劳动过的杜鸿林,在他的《风潮荡落》一书中写到:“据熟知孙连华等几位知青牺牲详情同志介绍,牺牲是可以避免的,那场荒火不用扑救也可能会自灭,当时人们就是那样一种精神状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其中也有某些领导瞎指挥的因素。事实上,在北大荒,每到秋天和春天总要放火烧荒,好开拓荒地,只要这种荒火不连上山林,一般不必去管它,会自己熄灭的。……孙连华所在的兴凯湖地区,年年也放火烧荒,为什么这次却兴师动众地去扑灭荒火呢?包括孙连华

在内的数位知青的生命是否可以免于牺牲呢？”

1970年11月初，在兵团首届积代会开过一年之后，扑火英雄安风清他们那个团又着了一场大火，这一次不在九连，而是一连方向。

火仍然是荒火，初冬季节，荒原上干枯的野草很容易燃着，一着就是一大片，火焰最高处达到十几米，遮天蔽日。35团地处中苏国境线上，一连又与苏联接壤，于是这次扑火就有了政治意义：决不能让荒火烧过国界，这事关系着祖国的尊严。不愧是培育出“七英雄”的团，每个兵团战士都懂得“火光就是命令”，都知道“明知火烧人，偏向火海冲”。有组织的，有自发的，有坐车的，有步行的，步行的拦住汽车爬上了汽车，救火的队伍就这样发展着扩大着，高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许多人都赤手空拳，拿什么去扑火，怎样扑火，他们不知道，也不去想，只有豪情在胸中激荡。

35团三连的北京知青宋世琦，在北大荒待了11年，11年里让他最难忘怀的，就是1970年11月7日的那场火，当时，团军务股要三连组织60人的扑火队伍，但是到了火场边清点人数时，竟去了87个。在扑火中牺牲的明海涛副参谋长身先士卒，领着团机关的队伍率先进了草甸子，其后是工业二连，三连在最后，他们拨开齐腰高的荒草，向大火奔去。

那场火好大！在暮色中，烈火把天空映红，几十米内照得通明。三连的高连长有经验，他下令点火，先烧出一块防火道来，以保证救火者的安全。几十平方米的火道刚刚烧出，风向突变，大火从三面向三连的人员猛扑过来，高连长大呼：“撤进火道！”87个人刚刚集中到狭窄的火道内，烈火浓烟热浪就席卷而来，四周变成一片火海。这时高连长又喊：“快蹲下，脱下棉衣蒙住头！”几分钟后大火如野马般向西扑去。三连的知青一个没少，可是团机关和工业二连，却有14个知青在大火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宋世琦回忆说,大火过后,他借着火光看见不远处的焦土上躺着四五个人,都是白花花的。跑过去一看,他们的头发和衣服已被烧光,仰面朝天,双臂痉挛在胸前,已经没有一点声息。眼前的惨景使他惊呆了!

那场火继续烧了三天,三天之后荒草烧光了,大火也就自动熄灭了。或许还是杜鸿林的话有道理。

被荒火吞噬的 14 个青年,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大的 22 岁,小的 17 岁。惟一的男青年叫傅强,他家里生活条件不好,小小年纪就懂得生活的艰辛,省吃俭用,隔几个月就给家里寄一次钱。

死者之中的潘文宣,是著名工笔画家潘挈兹先生的女儿,当时潘先生遭受批判,潘文宣也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潘先生一直保存着当年女儿的一封书信,写信的时间是 1970 年 5 月 30 日。

“要不到东北来,永远也见不到这么高远的蓝天,和蓝天下这么辽阔的田野。要是爸爸能到这为贫下中农的劳动和生活写生,那一定能画出让工农兵喜欢的最美的画来。爸爸近年的情况怎样?身体好吗?爸爸的错误是严重的。要是解放前爸爸不学画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工笔画就好了。希望爸爸能在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认真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早日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咱们家从爷爷那一辈就出身不好,但出身虽然无法选择,今后的生活道路还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望爸爸妈妈空闲时常常给我写信,多说些家里的事,写得具体点,各种无关紧要的事都别忘了写。和爸爸妈妈离开这么远,可真是想念你们啊。”

潘文宣故意把农村的生活说得美丽而浪漫,但诗意的语言掩饰不住内心深处的思念与伤感。信中没有一个悲凉的字眼,却透露着那么深重的悲凉。潘文宣是潘先生的爱女,可以想见,爱女的死对身处磨难之中的父亲,该是何等沉重的一击!

在那场大火烧过整整 20 年之后,1990 年 11 月,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上,展出了 14

位知青的遗像,展出了潘挈兹先生为女儿所作的一幅画,那幅画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烈火中的凤凰》。画上的潘文宣,依然清纯,美丽,在她的四周,是燃烧着的火焰。

那次展览的解说词中还有这样一句:据不完全统计,仅一师,七年之中有100余名知青埋在了北大荒。全兵团有六个师。

雨中凋零的花朵

在祖国的青山沃野之间一共埋葬了多少年轻的尸骨,无人能够说得准,说得清。在他们中间,带着一种壮丽的情怀、喊着两不怕的口号、毫无惧色地冲向死亡而被授以“英雄”或“烈士”称号者,实在为数寥寥,更多的人,或死于一场突发性事故,或死于一场可怕的疾病,或死于大自然降临的灾祸,甚至死于自己的战友之手。

张庆华在《北大荒的回忆》中说:黑土地到底掩埋了多少知青的生命,也许永远无法精确到个位数,但据权威方面的保守估计,至少有五六百人长眠于北大荒。张庆华还说,到黑龙江下乡的十几万名北京知青中,第一个捐躯北疆的,不是英勇壮烈的汉子,而是娇小柔弱的姑娘,她叫梁明,是位驻外商务参赞的女儿,才16岁。

梁明一下乡就赶上麦收,就赶上下雨,康拜因下不了地,每个兵团战士手里一把镰刀“龙口夺粮”。梁明是家里的独女,父母的掌上明珠,她像一朵娇嫩的花儿,一下子走出几千里地,一下子参加这样繁重的劳动,怎么受得了,怎么吃得消?她很快就病倒了,高烧不退腹泻不止。但她是个要强的姑娘,即使两条腿软得像一滩泥,还是摇摇晃晃地拿着镰刀下地去。她终于昏倒在地头上。

先是连队的卫生员找来土霉素,无效;继而送到团部医院抢救,为时已晚。梁明死于急性中毒性痢疾。至于病因,有人说是喝了不洁净的生水,有人说是因为没有厕所淋雨着了凉,也有人说是交叉感染所致。

16岁的女孩子还未成年,娇小的梁明刚刚离家就倒下了,她

用她美丽的生命对上山下乡运动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尽管这声音很单薄很微弱。它发生在1969年的盛夏,其时上山下乡正值高潮,大批知青狂涌而来。

梁明的父亲,那位就要启程赴任的商务参赞,听到女儿病重的消息心急如火,尽管昼夜兼程,可他还是来晚了,赶到农场,看到的只是一座新坟。8月,天气正热,农场又没有冷藏降温保存尸体的设施,只能匆匆入殓了。团里领导闻讯赶来了,小心翼翼地询问参赞有什么要求。参赞闭上了眼睛,他不敢睁开,害怕一睁眼,泪水就会流出来,就这样过了许久许久,他轻轻地,缓缓地,提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要求,一个谁也想不到的要求:“给女孩子们盖一所防风防雨的厕所吧。”

1970年10月,一个台风暴雨之夜,在海南岛屯昌县大峪谷里,一个新建的宣传队驻地被呼啸的山洪漫过,汹涌的洪水吞噬了20名女知青,她们都是宣传队员,鲜花一样的容颜。

两个月后,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上,兵团某师一个钢铁厂用炸药爆破冻土,因炸药雷管混装引起爆炸,炸死兵团战士五人。

又过了三个月,云南德宏州,靠近中缅边界的盈江县,兵团三师13团的一个连队。干了一天活,大家都睡了,在万籁俱寂的漆黑夜晚,只有一间茅草屋里露出点点微弱的灯光,一名上海知青在偷偷地读一本外国小说,美国作家德莱塞写的《珍妮姑娘》,世界名著,但在当时绝对是禁书,一看名字就是禁书!这书是从一位北京女知青手中借来的,他只能在夜深人静之时,借着一个小玻璃瓶做的简易煤油灯悄悄地偷读。读书的人也许是太累了,太困了,深夜12点,他不小心碰翻了油灯。

他们住的都是竹墙竹床草顶的茅屋,火腾地一下就燃着了屋顶的干茅草,并顺着屋顶向隔壁房间蔓延,一溜五间茅草屋全着了。大火过后,住在相邻一间屋里的10名成都女知青全部遇难,她们刚刚来了一个星期。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7团宣传队,排演了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这在文化生活极其单调的“文革”时期，在许多人还不知道芭蕾舞为何物的内蒙古，不啻是一件轰动性的大事。宣传队开始了巡回演出；先是在团里的各连队演，接着到黄河南北的各个团去演。

从20团演出回来过黄河的时候，由于是逆流而上行走困难，几个船工跳入水中，用缆绳拉着船走。宣传队里有10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不忍心在船上坐着，也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加入了拉纤的行列。河水越来越深，船工们收起缆绳回到船上，而10个小伙子却穿着长衣长裤，朝河对岸游过去，越游越远。这时突然有人喊：“快数数人头，好像少了两个！”大家的目光立刻一起射向那一个个时起时落的小脑袋，一二三四……不好，是少了两个。“救人啊，快救人哪！”河面上响起了急切凄凉的喊声。

原来，由于穿着衣裤游泳，又是逆流而上，吹笙的贾生渐渐感到体力不支，发出了求救的呼喊，扮演洪常青的苏士龙返身去救他但是呛了水，两人一起被漩涡卷走了。黄河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吞噬了两个多才多艺英俊年少的小伙子！

知识青年的死，绝大多数是可以避免的，应该避免的。应该避免的却未能避免，这里面有领导者组织抢险和安全教育方面的责任，也有知识青年自身的原因。他们仍然带有当年红卫兵身上那种缺乏理性的冲动和盲目的热情。几年前，在破四旧中，这种带着“革命”桂冠的热情搅乱了整个国家的秩序和千万个家庭的安宁，而今天，这种曾经伤害了许许多多善良人的“热情”要来伤害知识青年自己了。

听听当年在知青中最流行的一些豪言壮语吧：“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敢冲的是英雄好汉，不敢冲的是懦夫蠢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的时候，这些单纯的青年人简直不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是一怕不苦二怕不死，这些幼稚的孩子们在一些政治口号的煽动下，不惜拿着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一

顶“英雄”的桂冠。

悲壮的一幕

如果把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比作一场威武雄壮的大戏，那么这出大戏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最悲壮感人的一幕，发生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在西乌珠穆沁的大草原上。就在这块富庶美丽的草甸草原上，24年前的一场荒火，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他一个电话打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师长办公室，严厉询问师长是否亲临火场指挥。

那场大火铺天盖地般席卷草原之后，宝日格斯台就出现了一座烈士陵园。69名知识青年静静地、永久地躺在蓝天白云之下，绿草环抱之间。无边的牧草黄了又绿，绿了又黄，24个春秋就在这黄与绿的更替之中悄悄地流走，而他们，就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安睡，一声不响，一动不动，睡得那么沉稳香甜。草原上的风儿在他们耳边哼唱，白云在寂寞的苍穹游荡，不远处，羊群在嚼咽着鲜嫩的青草，它们全都那么轻，那么轻，惟恐惊动了这些熟睡的孩子们。他们依然年轻，最小的17岁，最大的24岁，一如24年前，而他们当年的伙伴，如今都已额现皱纹，鬓染白发，娶妻生子，日渐老态，他们的孩子也都有20岁上下，真是时光如水，岁月悠悠。

24年过去，返城的知青们没有把留在草原上的伙伴忘记，他们或是专程或是顺路，从首都北京赶来，从“青色的城”呼和浩特赶来，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赶来，通往山坡墓地的那条草原公路上，可以看到他们匆匆行走的身影，尤其是夏季，那时，水草正肥，大地一片浓绿，天空一片碧蓝。在知青的聚会上，在报纸上，在书刊里，时常有人提到他们讲起他们，一篇篇回忆文字写得深情而又深沉，那些沉甸甸地压在作者心头的往事，又沉甸甸地压在了读者的心上，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那场大火，了解了那次灾情……

1972年5月5日中午，西乌珠穆沁草原上刮起了热风，大风

裹挟着燥热，吹得人心绪烦乱，热风中渐渐透露出一股烟味，那烟味越来越浓，像一个不祥的信号，借着六七级西北风，瞬间便传遍了草原。

原来，二连的一个知青在蒙古包里给打石头的战友们做饭，饭做好后，他把刚刚烧完的热灰倒在了蒙古包外的灰坑里。热灰的余烬燃着了野草，还没有返青转绿的枯草正是易燃的时候，淡淡的火苗借助着风威张狂起来，转瞬间变成一场铺天盖地的熊熊大火，肆虐着、呼啸着、滚卷着，撒欢儿一般向着东南方的四连猛扑过去。大火龙的后面，留下了一大片焦黑的草木灰。

东南方十几公里处就是四连，这是一个组建不到一年半的新连队，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知青，主要来自呼和浩特、集宁、唐山等城市。四连周围的山上山下铺着厚厚一层陈草，金黄色的陈草极易燃烧，因此四连的处境十分危险。

四连的兵团战士们都集合在操场上，听连长慷慨激昂地作动员。“火光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年轻的战士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火，也从来没有救过火，谁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但是每个人都神情严肃，心情激动，准备着接受“党和人民的考验”。

一二三排各留一个班保护连队，机运排在连队后面开防火道，其他人兵分两路，一路直接上后山迎着火头扑打，另一路坐拖拉机向北绕到山后，再向沟里插，与上山打火的人会合。迎着火头打火是犯忌的，当地的农牧民打火都是在火头后边和两边打。当这个错误决定做出的时候，就已经预示着灾难性的后果。

无论就职务而言，还是从扑火的表现来看，69个知青中最优秀的一个都是副指导员杜恒昌，他是69人中惟一的北京知青，惟一的军队干部子弟。他是著名的北京男四中的高三年级学生，在中学里就加入了党组织，这说明他有很好的思想基础，政治上成熟，这与家庭的影响教育有关。杜恒昌本来可以跟弟弟一起去部队参军，但是他要到更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1967年11月，紧随曲

折他们之后,杜恒昌作为第二批赴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来到了辽阔的锡林郭勒大草原。

在插队知青中,杜恒昌第一个把行李搬进了贫下中牧的蒙古包,第一个穿起了自己制做的蒙古袍,并且学会了蒙古语。草原上没有电,却有四季不断的大风,杜恒昌懂得一些机械和发电知识,他要研制一台风力发电机。为了挤出一笔试制费,三个多月里,他只吃盐和炒米,省下钱来搞研究,终于制做了一台木制的风力发电机。别人不敢骑的烈性马,他去骑,从马上掉下来,被马踢伤了右手腕,落下残疾。领导照顾他,不让他干重活,他不同意,绑上沙袋,每天伸屈练腕力,割苇子的时候,他就用这只残手创造了全连的最高纪录,而在探家的时候,残手还端不稳脸盆。他参加了团里的巡回讲用报告组,却不讲自己的成绩,只讲怎么向别人学习。组织上推荐他上大学,他说:“草原边疆就是最好的大学,贫下中牧就是最好的老师,我要在这里上一辈子大学。”他们连队是个新建连队,小麦亩产只有三十几斤,就在牺牲之前,杜恒昌还在煞费苦心琢磨怎么夺高产。

杜恒昌表现得异常成熟、出众、老练,他有明确的目标,又具备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学识、毅力和踏踏实实吃苦耐劳的精神。杜恒昌自然而然地受到知青们的拥护,得到领导的器重,组建兵团的时候,他被任命为连队的副指导员,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选这样的青年选谁呢?

在四连知青的眼里,杜恒昌既是领导,又是老大哥,他们都称呼他“老杜”,这称呼中包含着爱戴、信任和敬意。

杜恒昌是出类拔萃的。他比金训华大四岁,他跟金训华有许多共同的优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他比金训华下乡的时间更长,经历的事情更多,如果仔细地搜集整理撰写,他肯定是一个比金训华更全面更丰满的知青典型。

杜恒昌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他头脑清楚、富于理智,即便在铺天盖地的大火面前,仍然表现出清醒和理智。他把打火用的麻袋

和扫帚装上大车之后,猛然想起团里发下来的那份《关于防火救火工作的通知》,那份通知发下来好长时间了,但因为全连在全力以赴地抢播小麦,一直没有传达。他知道,连里的知青们几乎没有一点打火的常识,一定得把那份通知念一念,把注意事项讲一讲,让他们知道该怎样去打火,怎样保护自己。可是,当他从连部的报纸堆里翻找出那份通知时,全连战士已经在连长的率领下奔向火场去了。

大火就像是一场大海上的龙卷风,呼啸着,翻卷着,在狂风的助威下肆虐横行,烈焰形成的高温使人根本不敢近前,大火周围几米之内都是缺氧地带,即使能够近前也会窒息而亡。

杜恒昌向山沟飞奔而去,他来内蒙古已经四年多,他打过火,也懂得该怎样打火。他一边冲着知青声嘶力竭地高声呼喊着“逆风往高处跑”,一边用衣服包着头冲进山沟的火海之中。这时,打火的青年们已经被烈火和浓烟团团包围,他们此时已经没有了打火的信心,只有求生的念头,但是他们又不知道该向哪里跑,出路何在,生路何在?在高温少氧的环境里,许多人已经喘不上气,迈不动步,有人已经倒下去了……

杜恒昌冲进火海之中,寻找着战友们的身影,一个,两个……他找到了十几个,他大声呼喊着他们的名字,带着这十几个人冲出了火海,把他们领到安全地带,一转身又冲进了火海。第二次,他又领出了七八个知青,这时,他身上穿的衣服和包在头上的衣服都烧烂了,脸上烧起了大泡,他太累了,真想喘口气,歇一歇,可是一眼看见火里有一个挣扎着的身影,他又不顾一切地冲进了火海。这一次他没有出得来,一股冲天而起的烈焰很快吞没了他的身影。被他救出来的那些知青见到这情景也急了,一边高声哭喊着“杜指导员”,一边疯了似地冲进火海。火头更高,火势更猛,这一次,他们谁也没能再出来。

就在杜恒昌策马向火海驰奔的时候,18岁的蒙古族女孩力丁也在拖着患病的身子向着火海奔跑。她本来可以休病假,本来可以

不参加救火,但是这个漂亮而又好胜的姑娘一听到连长的动员声,就毫不迟疑地站进救火的队伍里。

从幼儿园起一直到中学时代始终与她相伴的金环,用充满感情的笔调留下了力丁美丽的形象,金环为这一节文字拟的标题是《力丁,我没有留住的美丽姑娘》:

“力丁漂亮,同伴们都说她是‘安琪儿’。1969年,她报考军区文工团,1970年报考外地文艺团体,都因父母在‘牛棚’挨斗而断送了前程。力丁写了血书,才被批准参加兵团。她的名字和她一样简单、纯洁,她虔诚地相信到生产建设兵团是她最辉煌的前途。她要付出比别人多一倍、两倍的汗水去接受再教育,因为她带着一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桂冠’。力丁为了能早日入团,和自己的好朋友查日斯、杨鸿原商量好,在连队不过多接触,以免被认为是‘狗崽子’串通一气。为了入团,她累得吐血都不肯上卫生队。

“着火的前一天是青年节,连队放假一天,她要到团部和一年多没见过面的同学相会,当然也包括我。她心里充满了喜悦。她哼着歌欢快地走着。5月的草原和力丁一样充满了青春活力,起伏的草浪忽明忽暗,嫩绿黛青,层次分明。忽然,她发现前边道上有一个蠕动的黑点。她疾步跑过去,见是一个沾满血污的小马驹,粗心的马倌不知到哪儿喝酒去了,母马产后寻水不知去向,小马驹抽搐着湿乎乎的身体,几次欲站又重重地摔在地上,力丁用手绢给小马驹擦干血污,抱着它向马倌的蒙古包走去。

“力丁赶到团部时,我们已买好聚餐的一切,单等这位姗姗来迟的公主。她两眼肿肿地站在我们面前,大家愣住了。原来她刚才触景生情,想起被关押着的爸爸妈妈。父母和女儿天各一方,她成了荒原上孤独的马驹。我看她好没情绪,便把她硬拽到我们三连去学骑马。下午,她执意要走,怎么也留不住,我只好骑马送她到团部,她又步行近20里回到四连,当晚就病了。5月6日我从遇难者名单上发现她的名字时,我好后悔,当初,要是硬留住她……”

力丁以生命为代价,得到了共青团员的称号。她是一个视荣誉

如生命、视荣誉重于生命的理想主义者，宁可美丽地冲向死亡，也不愿平庸地活在人世。而来自集宁的张建军，就没有那么多考虑，这个正在关禁闭的小伙子，没有那么多革命激情，不怀一点功利主义色彩，就迈着大步冲进火海，他是69个烈士中惟一没被追认为团员的人。“因为他犯有前科，还因为他从未写过入团申请书”。但是他的弟弟妹妹却因了烈士哥哥而安排了工作，他的父亲母亲也拿到了维持最低生活的抚恤金。做为六个孩子中的老大，他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我是一个大男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养家”的誓言。这个健壮的小伙子是从禁闭室中跑出来的，关禁闭的理由很简单，他没有请假就偷偷跑到另外一个连队去看妹妹，于是领导让他写检查。他不会写检查，只想睡大觉，于是安然而卧，他在酣睡中被救火的喊声惊醒，这个因为无组织无纪律而被关了禁闭的小伙子再一次违反了纪律，这一次他没有受到批评，却得到了他一生中最高的荣誉。

这场大火从5月5日中午11点20分燃起，一直到第二天下午3点熄灭，一直烧了27个半小时。这场大火吞噬了150平方公里草原，留下了150平方公里黑色的焦土，这个面积超过了三个大西洋上的百慕大群岛或是两个欧洲的圣马力诺共和国。这场大火吞噬了69名活蹦乱跳的年轻生命，留下了69具难以辨认的焦尸，这个数字超过了历年来草原火灾死亡人数的总和！整个宝日格斯台一下子沉默了，不知道是被这可怕的事情吓呆了，还是被巨大的悲伤压垮了，总之它缄默无语，被一种压抑可怕的气氛笼罩着。

团部的现役军人们全都集中到会议室里开会，但是没有人发言，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发言，该如何评判这场大火。这次扑火是壮举，还是事故？该歌颂，还是该追究责任？他们脑子里不停地转动着一个妇女的形象，那是一个蒙古族女牧民，她因为自己的孩子玩火烧死了牧场的牛羊，就被判了七年徒刑，那一次烧死的只是牛羊，而这次烧死的是人，是69个人啊！团长政委的眉头拧成了疙瘩，心里压上了石头。团里连夜写好关于起火扑火的情况汇报，上

报兵团司令部。一些连队接到了通知：赶制棺材。他们连夜破木头，锯板子，钉钉子，没有油漆，就在白木板上涂一层黑黑的墨汁。

一些听到了消息的家长急于知道子女的情况，询问子女安危的电报像雪片一样打到宝日格斯台：“是否被烧？”“健康否？”“电告近况”。有的家长打了电报不见回音，就接着再打，一连打了好几封，他们心里着急呀！

兵团和自治区的领导立即闻风而动。起火的当天，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在召开党委常委会，突然接到五师打来的紧急电报，兵团政委倪子文立刻带着群工部长、卫生部长赶往火灾现场。第二天，自治区党委书记尤太忠也坐飞机视察灾情。

大火过后，对这场火的评价，对扑火行为的评价，成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它既决定着死者的评价和待遇，也决定着生者的前途和命运。5月15日，在灾区待了整整十天的倪子文政委回到了呼和浩特，他在兵团常委办公会议上，传达了自治区党委书记尤太忠的指示。尤太忠肯定这次灭火是保护国家财产的英勇行为，牺牲者一律按烈士待遇，就地集体安葬，并修建烈士陵园，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这就给这场扑火行动定了调子，给死者以安慰，给生者以开脱。尤太忠的这段指示，至今还写在烈士陵园陈列室的墙上。

死亡的69名知青，主要来自呼和浩特、集宁和唐山三个城市。呼和浩特的死者家长涌向兵团机关大院，力丁的哥哥说起他漂亮的妹妹时哭了，他说，草原失火根本就不该往火里冲。舒宝立的父亲说，我就这么一个男孩，他妈也去世了，我依靠谁去？有的家长刚一听到噩耗就昏厥过去，这消息太突然，太沉重，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一棒子就把人打晕了。有些出事后很快就赶来的家长，要求最后见孩子一面，兵团硬是没有让他们见，那些孩子都被烧黑了，烧焦了，有的烧得就像一段焦炭，根本无法辨清谁是谁。这样的尸首怎么能让家长看？

兵团常委办公会开完后，向死难者的家属讲了三条：牺牲者是

毛主席的好战士；一律算作烈士；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要帮助烈属解决困难。对死难者还追记了一二三等功，其中杜恒昌等四人记了一等功。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个没写过入团申请书的知青，不是团员的全部追认了团员，12名团员被追认为党员。

6月12日，《内蒙古日报》登出长篇通讯《壮志凌云》，69名死难者的英雄事迹第一次见诸报端，这篇报道扫去了43团领导眉间的乌云。紧接着，兵团党委的机关报《兵团战友》报也以整版篇幅歌颂了扑火者的英雄壮举。6月16日，烈士陵园落成的日子，隆重的追悼会正式召开。

远在贵州花溪空军五七干校的杜恒昌的父母杜士芳、张玉英，突然接到从呼和浩特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您的儿子扑火牺牲，请于16日以前来连队参加追悼会。他们一下子惊呆了，儿子春节是回家过的，走了才几个月，怎么就没有了，牺牲了！张玉英不是杜恒昌的亲生母亲，但是母子之间感情非常好。老两口商量了一下，决定两人都去，他们坐飞机从贵州到了北京，然后转乘火车到赤峰，赶到43团时，已经是15号的晚上。

追悼会上，六十几位知青的家长哭成一团，家长哭，发言的人也哭，哭得追悼会几乎开不下去。代表家长发言的是毅强的父亲，他把毅强的妹妹也带来了，让她到哥哥的连队接哥哥的班，“继承烈士的遗志，屯垦戍边，埋葬帝修反”。

追悼会开过之后，紧接着是一连串的会：授枪大会、报告会、表决心大会、表彰会，连长慷慨激昂地讲述英雄扑火的壮烈事迹，全兵团掀起了一个学英雄的热潮。没有人再敢对“69个知青死得值不值”这个最敏感、最容易引出一场麻烦的问题提出疑问，69个知青被肯定了，其他一切问题便都解决了。

烈士陵园里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的前面是两间烈士事迹陈列室，碑的后面是69座坟墓，排列得整整齐齐。墓很小，呈方锥形，只有一米见方，墓碑是一块石板，上面写着烈士的名字。24年过去，时光在墓碑间悄悄流淌，风雨在墓

碑上留下痕迹,而今,墓上的水泥已经一块块地剥落,露出了里面的红砖,墓碑上的名字已经失去了鲜红的颜色,变成淡淡的粉白,只有少数几座墓碑上的名字用红色油漆重新描写过。年久失修的烈士事迹陈列室,门上挂着锈锁,只有挂在室内墙上的一张张照片,还是那么英俊年轻。墓地四周全是青草,据说大火过后的第二年,草长得格外好,绿得发黑。当年杜恒昌他们开垦出的上万亩耕地,如今已经全部退耕还牧,他要提高小麦产量的遗愿永远也无法实现。一切复归于沉寂,一切复归于自然,一切复归于一片象征着生命的绿色,无论是当年的兵团,当年的四连,还是当年的杜恒昌、力丁他们那一群生机勃勃的好青年。

据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情况统计:1969年至1975年,知识青年死亡人数为225人(不包括二师)。

写完内蒙古的大火,不由得想起小兴安岭下的另一场大火。那场大火发生在1976年3月,正是春播时节,尾山农场六连的知青正在晒场上搅拌麦种。中午,距六连三里多地的小郎山着火了,山火向六连扑来。连部当即下令,马上停止工作,上山打火。青年们就扛着铁锹、拿着扫帚向小郎山奔去。在打火中,有七名女知青不幸丧生,她们来自上海和哈尔滨,在打火中表现得很英勇,有人在倒下云的时候,手里仍然紧握着扫帚。

事情发生之后,连队领导写了一份事故报告交了上去,整天忧心忡忡,等着上级的处分决定下来,但是却迟迟不见动静。

原来,当时主管新闻舆论的姚文元看到了一份反映尾山农场火灾事故的材料,他在这份材料上批了十个字:“伟大的战士,可贵的精神”。这十个字不得了,等于肯定了打火者的英雄壮举。敏感的海上报纸一马当先,首先登出了姚文元的题词,并配发了歌颂七英雄的长篇通讯,于是“尾山七英雄”马上成了知青的榜样,先进的典型。1976年8月,中共黑龙江省委授予七英雄“英雄战士”称号,尾山农场也忙着重修坟墓。墓修好了,“四人帮”也下台了,尾山山

麓的墓地前，只留下一块无字的石碑。

今天，在大批知识青年早已通过各种途径陆续返城之后的今天，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上，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在西双版纳和海南岛的热带亚热带森林中，在一些边远的穷乡僻壤，安葬着我们的伙伴，我们的战友，他们在上山下乡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静静地、永久地安睡在异土他乡。他们因上山下乡而逝，因英雄气概而逝，因环境恶劣而逝，因有勇无谋而逝，因年幼无知而逝。不管具体的死因是什么，他们都是英年早逝，我们都想把他们称为“英魂”。

第八章 典型们

蔡立坚百感交集

在太原下了火车,安排好住处,我就斜穿过几乎整个太原市,从城区的西南角赶到东北角的省委党校,找到了蔡立坚。虽然我们初次见面,但她却像是对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一样亲切,十分麻利地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说:“走,到家里坐去!”

在山西插队的知识青年中间,下乡最早的是蔡立坚,名气最大的也是蔡立坚,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下乡的知识青年里边,蔡立坚是第一个在《人民日报》上露面的个人典型。

蔡立坚原名蔡玉琴,是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的高中生,班级里的团支部书记,学校里的学雷锋标兵。她的下乡插队决心,萌生于大串联之中。

1966年12月1日,蔡立坚和一些同学组成的长征队从北京出发,开始了步行串联,途中,这支19人的队伍产生了分歧,多数人直取遵义,而蔡立坚等四个人直奔延安。他们从河北的井陉经娘子关进入山西,在巍巍太行山的峰峦叠嶂之中艰难地跋涉。蔡立坚从一出场,就是一个主意很正的姑娘,一个信念坚定的理想主义

者。

12月28日对蔡立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那天他们整整走了一天也没走出大山。天越来越黑，路越来越难走，陈年的落叶在脚下发出沙沙的响声，胡荆、刺梅的枝条把脸抽打得好疼，灌木林中有时会扑棱棱惊起一群野鸡，或是飞快地蹿出一只野兔，让本来心里就不踏实的年轻人好一阵紧张。没有灯光，没有人家，只有夜空中几颗寒冷的星星在眨眼睛。饥饿、寒冷和恐惧挤压着四颗年轻的心。

忽然，从前面山腰上传来一阵狗叫，循声望去，隐约可见几点光亮，那个小得可怜的村子叫杜家山，只有五户人家17口人，属榆次县黄采公社，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又穷又闭塞。听说来了北京的红卫兵，一会儿全村的十几口人全都跑来了，老的老，小的小，见不到一个壮汉。

火苗子在灶坑里边跳着，水和小米在铁锅里面煮着，大娘和小姑娘忙活着做饭，几个老汉向他们诉说着村里的情况：杜家山穷得养不住人，男人往外跑，女人往外嫁，如今村里就剩下这老的老小的小，四个半劳动力最年轻的也47岁了。老人动了感情，淌着泪水，用青筋暴露的老手冲窑洞里一挥扫说：“这不是，全村的人都在这里了，眼见得这村子就要绝户了！”蔡立坚听了这话，心里猛地一震。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蔡立坚他们就动身了，走得匆忙顾不上跟乡亲们打声招呼。出了村，还是爬山，当太阳露头的时候，他们爬上了大罗山顶，蔡立坚坐在一块石头上回头望去，正好可以俯视杜家山。在一片霞光之中，一位老人正挑着一担水，步履蹒跚地爬一道坡，看着他那吃力的样子，蔡立坚的心猛地收紧了：杜家山需要人哪！她冒出一个念头：别人不愿意去，我偏要去！从那一刻起，杜家山占据了她的心，牵扯着她的心，牵扯得她犹豫不定，举步艰难。

她心情矛盾着往前走，走过了汾河水，走入了文水县，走到了

云周西村。这里是刘胡兰烈士的家乡，有烈士的墓碑，有毛主席的题词，一股壮烈的豪情从蔡立坚心头升起。在离开杜家山 280 里的孝汾公路上，她站住了，一脸严肃地对三个战友说：“我要回杜家山去！”

从这一刻起，她走上了一条荆棘丛生、曲折漫长的艰辛之路。

杜家山的乡亲们又惊又喜半信半疑地迎接蔡立坚，第一个见到她的大爷问：“妞儿，你怎么一个人又弯回来了，莫不是丢下了什么东西？”蔡立坚说：“大爷，我是来落户的，不走了！”老人摇着头说：“这咋可能，别玩笑！”乡亲们虽然怀疑她能否留下，却实在希望她能真地留下，他们很快就腾出一孔窑洞，送来了土豆小米白面、水缸面盆碗筷。第二天，二大爷到外村去买了一个算盘几个本本，说：“你要是真不走了，就给咱当个会计、记工员，咱这山上没个识字的。”蔡立坚心里一热，当天晚上就列出了全村劳动力记分的表格。

蔡立坚好强，自己挑水打柴，自己学做饭。她挑了一担水还要走四五十度的陡坡，她砍了两捆柴却挑不回来，她实实在在地尝到农村生活的苦了，她也实实在在地尝到了杜家山人对她的一片诚心。一个多月之后公社来说，你要是真心想来，就把户口迁来。在一个大雪漫天的日子，蔡立坚回北京去办户口。乡亲们都依依不舍地来送她，有的用木锨清雪开路，有的送来了红豆、烙饼、煮鸡蛋，嘴上没说，但谁的心里都在想：这姑娘肯定回不来了！

这姑娘真是差点回不来了。她的半身不遂的母亲，已经在床上瘫痪了半年多，看到离家两个多月的女儿，眼泪不断线地往下掉，好半天才说：“人家长征都没事，就你，一征把人也征没了。”

开通的父亲支持女儿，他帮蔡立坚做通了母亲的工作。办手续又耽误了一些日子，1968年3月，北京市安置办批准了蔡立坚去杜家山插队的要求，学校召开了两千多人的大会为她送行。刚满20岁的蔡立坚，终于又回到了杜家山。她远远地就看到了那棵老松树，那弯红土窑，听到了熟悉的狗叫声，再走近些，她看到了站在

窑畔上的乡亲们，乡亲们正在向她望呢。蔡立坚的泪花在眼眶里打转转，她奔跑起来，她在心里呼喊：乡亲们，我回来了，我带着户口回来了！

在这段时间里，杜家山又少了一口人，惟一的后生到外村当倒插门女婿去了，走了一个后生，来了一个姑娘。三个多月之后，7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了由山西晋中报社记者撰写的通讯《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同时还配发了评论文章《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

蔡立坚来杜家山时只是一只孤雁，孤雁带来了群雁，不久，她的母校同学刘淑琴等人来了，太原、榆次的青年来了，山西大学政治系学员王和平、周山湖也来了。在离杜家山不远的杏林塔大队插队的朱维红，在日记中写到她第一次见到蔡立坚时的印象：“蔡立坚就是跟报上介绍的那样，大热的天儿还腰扎老贫农二大爷送的布腰带，赤脚穿着双山鞋，衣服上汗迹斑斑，头发蓬乱，胡乱用根什么东西扎住，她的脸膛赤红，手糙得像锉刀，猛一握手，又硬又有劲儿，我想跟她多聊几句，可她怕耽误干活儿，老半天腰都不抬一下，杜家山人干活真不惜力，天老黑了还没有收工的意思。蔡立坚睡在二大娘家里，一进村就去替大娘挑水，忙得不歇气，我仍然找不到和她攀谈的机会。杜家山这个集体显得团结而有朝气，大伙儿抢着干活，开会抢着发言。”这篇日记是1968年9月1日写的。到1968年底发表那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时，杜家山已经有了18个知青，最大的24岁，最小的14岁，超过了杜家山的原有人数。最高指示发表的那天晚上，他们聚集在土窑洞里，一遍遍地朗诵自己的诗：“十八颗种子四海采，十八颗种子山上栽，十八朵葵花党灌溉，十八朵葵花向阳开。”杜家山人丁兴旺，红火起来了。

这些青年人几乎承担了全部农活，从开荒、播种、锄地、追肥，直到收割、打场、入库。他们从圪针窝里开出100多亩荒地，还用自己的安置费给队里买了两头驴、40只羊。为了练铁肩膀，他们每天下工后肩不离担地争着挑水；比抡大锤，学欧阳海能一气抡打

180 下,下了工还要来个抡锤比赛。割谷子的时候,手指肚被谷子叶磨破了皮,露出鲜嫩的肉,毛刺一碰钻心疼,刘淑琴说,光是糊裂口的胶布,用了也有好几丈。知青们办起了养鸡场、小学校、医疗站、科学实验小组,还成立了文艺宣传队。知青担任了队长、书记、会计、出纳、保管员,几乎执掌了杜家山的一切大权。他们搞种子优化,给庄稼施化肥,粮食产量当年就翻了番。一帮子争强好胜的青年人,把杜家山闹得红红火火,热气腾腾。

1969年9月末,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蔡立坚脱下补丁摞补丁的破衣服,穿上同学汪俊英的新制服褂子,带着从当年开荒地上种出来的一尺多长的谷穗、脚板子大的土豆,光荣地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她和郭凤莲、申纪兰等人住进了中南海,住在警卫战士居住的一排平房里边,虽然这里不如京西宾馆宽敞阔气,但与毛主席近在咫尺,这是多大的幸福和荣誉!

9月30日晚上,蔡立坚拿着红色的请柬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盛大国庆招待会。10月1日上午,她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主席,晚上,又在观礼台上看了焰火。那一次,她在北京一共住了半个月,参观,座谈,每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还受到周总理的接见。那年进京参加国庆观礼的知青代表一共有314人,其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有30人。

蔡立坚出名了,她的头上也有了官衔:县革委常委、县委常委、团地委副书记、团省委常委、省革委委员……但是她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上级两次要推荐她去北京上大学,她都拒绝了,她表示:不改变杜家山的面貌,决不离开杜家山。县里要给她转成国家正式干部,定行政级别拿固定工资,她又拒绝了,说:“杜家山的老农挣多少,我就挣多少。”每次去县里开会,散了会县里总要用车送她。蔡立坚不习惯坐小车,尤其不愿意一个人坐小车,所以总是悄悄地溜掉,跑90多里山路一个人走回来。有一次去县武装部开会,散了会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武装部的田部长要用吉普车送她,可是车来了,人找不到了,蔡立坚已经出了城了。刚走了二三十里路,天就

黑下来，路边是一人多高的庄稼地，静静的，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天上一钩弯月看着她。她没吃晚饭，肩上还背着一支刚领回的步枪，又累又饿，真想在这静静的大山上，在这散发着清香气味的庄稼地里睡一会儿。可是枕着田埂刚躺下，蚊子嗡嗡地叫着飞过来了，她只好继续赶路。走着走着，前面在修路，公路断了，蔡立坚转悠来转悠去，越走越不对劲，走了个把小时，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口。从一个院子里传出牲畜吃草打鼻的响声，这是到了牲口棚了。蔡立坚上前去叩门，半晌门开了，出来两个喂牲口的社员，他们看着蔡立坚疑惑地问：“杜家山的？咋跑到这里来了？这是庄子公社呀！”外间屋里拴着一溜牲口，里面的小屋有半截土炕，他们说：“你就在这小炕上歇吧！”两个男人说完就走了。蔡立坚饿坏了，想找点吃的，可是找来找去什么也没有。她小歇了一会儿就起身上路了，回到杜家山，天已大亮，社员们正要出工。

蔡立坚娓娓地述说着往事，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那是她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房门响了，走进来一个魁梧健壮的男人，他是蔡立坚的爱人王和平。“家里来客人了，从北京来的，你赶紧做饭吧，做点好菜！”蔡立坚给他派活。

王和平是慕蔡立坚之名，宁可不要大学文凭坚定地上了杜家山的；蔡立坚是被王和平那股子能吃苦能干活憨厚朴实的性格所吸引，因而萌生了爱慕之心的。王和平割庄稼，手上磨起过23个小泡；修大寨田没箩筐，他一个人进山割条子，三天磨破了两条裤子，割回来的条子编了32担箩头、10个大抬筐；盖房子，十四五斤一块的土坯，他一次能担18块；抡镢头开荒，别人一溜没刨完，他两溜都刨到了头；他跟周山湖两个人，鞋子上打过20多个补丁。杜家山的二大爷说：“这个人真能受，一个人顶七个，谁见了谁待见！”

蔡立坚从北京回来，就跟知青们商量怎么学大寨，改变杜家山的面貌。

学大寨，就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就要“大批促大干”。知青们动员农民交出自留地，把各家各户的自留地收归队里统一耕种，

实行评工记分法,可是社员们不同意,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挥舞着烟锅子冲知青大嚷:“还让不让老农活了!”知青要在山上修造“小平原”,可乡亲们说,有那个功夫不如去积肥砍圪针,修一亩“小平原”要几百个工,最多增产一二百斤粮食,要是把这些工用来砍圪针开荒,可以稳拿一两千斤粮食。蔡立坚他们搞不明白了:贫下中农怎么这么保守、自私、落后!他们不理睬老乡们的反对,起早贪黑,花了百十斤炸药,半个月时间,在山坡上造出了一块仅有一亩四分地的“小平原”,可上边来检查的人还是不满意,说他们是“小打小闹”,要他们在沟底修水库,在山上造大平原。

力气没少出,汗水没少流,大批判没少搞,可是到年底一算帐,粮食亩产不到200斤,人均口粮只有300多斤,每个劳动日分红值只有三毛八分钱,村子里还是破烂不堪,青年们吃的还是缺油少菜的伙食,顿顿窝窝头,住的还是夏天漏雨冬天漏风的房子,分红的那点钱只够买盐买醋。有一年冬天上级打来紧急电话,要杜家山的知青带头交售爱国粮,他们一合计,决定交售两千斤。可是第二年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知青的口粮不够吃,两千斤爱国粮又拉了回来,所不同的是,他们送去的是谷子,拉回来的是小米。青年人心里都憋着一肚子气,最着急的是蔡立坚,她是主心骨,她是领头雁,杜家山搞不好,理所当然她要负主要责任。可是,大寨也学了,“平原”也造了,“三自一包”也批了,浑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她搞不清楚问题究竟在哪里。

常常有人来找蔡立坚去作报告,谈经验,她外出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有时一走就是几天。蔡立坚心里感到不安,她不愿意脱离劳动,可是来人常常拿出盖着红印章的信函,死磨硬缠,蔡立坚又是个不愿意使人为难的人。一次她随来人出村的时候,背后传来一句“蔡大姐,有空来……”蔡立坚泪水夺眶而出,心里充满了委屈。她开始体尝到孤独的滋味,不能被亲密的同伴所理解,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为了补偿外出耽误的时间,每次回来她一放下背包就扛起家什,拼命地干,怀孕八个多月还扛着80多斤重的化肥袋子,从沟

底爬到山顶。蔡立坚常常有一种负疚感,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欠了同伴什么,她要拼命地多下,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这样,蔡立坚身不由己地处于三种矛盾之中:她与一些知青产生了矛盾,她感到知青不理解她;知青与杜家山的乡亲产生了矛盾,她感到乡亲们不理解她;杜家山与“上头”产生了矛盾,她感到“上头”不理解她。种种矛盾集于一身,蔡立坚成了一个焦点。实际上,蔡立坚所经历和感受到的,也是许多“先进”知青所经历和感受到的,因而她在整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间,具有一种典型性。

历尽磨难的蔡立坚,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却经受了更大的磨难。当时她生完第二个孩子不满一个月,就住进榆次县委大院里检查错误,罪名是“反对学大寨”。后来工作组又开入杜家山,说杜家山是假典型,蔡立坚是精神贵族,要在知青中肃清她的流毒。她从大队到地区的六项职务被全部撤掉,一撸到底。

杜家山的知青尽管对蔡立坚有意见,但他们是了解蔡立坚的。有知青站出来讲话了:过去杜家山是什么样子,现在杜家山又是什么样子?过去杜家山穷得没人愿意待,现在杜家山通了公路有了电灯,耕地多了,果树多了,粮食总产增加了五倍,人均产量超过了千斤。要是没有蔡立坚带头,杜家山就没有那么多知青,要是没有那么多年轻力壮的知青,杜家山就没有今天的变化。同伴们的理解,上级领导的误解,使蔡立坚又感动又委屈,终于有一天,她把自己关在一个老大娘家的厢房里,尽情地哭了很久。她说,退一万步讲,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是个农民,我本来就是想当农民才到杜家山来的。中国有八亿农民呢,可是没有我这样的反革命!

知识青年们都纷纷离开了杜家山,杜家山变得冷清了,蔡立坚坚决不走,她说不能反悔自己立下的誓言,不能反悔自己走过的路。她主动要求去做果树管理员,得到批准后,就背着孩子上山了。

当年知青亲手栽种的果树园,如今野草丛生,一片荒凉,有的地方野草把果树都没过了。蔡立坚把孩子放在大树下,自己扛着锄头,把一人高的野草刨倒,把石头清理掉,把土坷垃打碎,给每棵果

树建起丈把宽的圆树盘，几百棵果树都伺弄得干干净净，连根草苗子也看不到。她又担上两只大桶，装满了粪肥，爬着陡坡担上山去，把几百棵营养不良的果树全都喂了个饱。她背着药桶给果树打农药，又下山向技术员学剪枝，荒芜的果园又繁茂起来，有了生机。她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的纯洁清白。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杜家山乡亲们的温暖给了她极大的鼓励。大爷给她送来肉和蛋，让她不要坏了身子断了奶饿了孩子，巧莲嫂把她和孩子接到家里，天天给她做热汤面。

1979年6月21日，国务院知青办的同志和省地县知青办的同志上杜家山来了，他们来看望蔡立坚了。他们肯定了蔡立坚上山下乡的道路，称赞她能在这么艰苦的小山沟里干了这么多年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他们告诉她，问题总会查清楚的。七月，县委通知她到石圪塔公社担任副书记。八月，她接到国务院知青办的通知，到北京参加了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在会上发了言。8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记述蔡立坚的通讯《把青春献给山区建设事业》，蔡立坚上山下乡的举动重又得到了肯定。1980年，中共榆次县委发文，对蔡立坚和其他被错误审查的同志给予平反。1981年春天，中共晋中地委宣布彻底为蔡立坚平反，恢复名誉。

1982年春天，蔡立坚考入了山西省委党校优秀中青年干部培训班，1984年8月毕业后留校担任班主任工作。在党校这十几年里，她多次被评为学校和省直单位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工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当年蔡立坚是出色的，如今蔡立坚仍然出色，不论在上山下乡的高潮里，还是在高潮平息以后，不论在杜家山，还是在山西省委党校。

她有一儿一女，女儿的户口按政策已经转回北京。二十多年前，蔡立坚离开父母，孤身一人从北京来到山西落户，二十多年后，她的女儿又孤身一人从山西到了北京，闯荡京城，如今女儿在一家中外合资的大饭店里做事，工资收入、物质条件要比母亲当年好得

多,可是她感到寂寞和孤独,常常想家。母亲当年尽管物质条件极差,却跟她的同伴们一起过得开心快活。已经年近五十的母亲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那一段历史我过得很充实很快活,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宝贵的一段时光,有时想起来会笑,有时想起来会哭,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我都尝过了,我们那一代人经历的事情和生活体验,肯定要比下一代人丰富得多。

饭做好了,摆了满满一桌子,我们围着桌子坐下来。蔡立坚拣了一个最大的鸡腿放到我的碗里,嘴上又讲起了杜家山。王和平说:“你整天就离不开杜家山!”蔡立坚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晚上做梦梦见的也是杜家山,都这么多年了,就是想它,忘不了它,我对北京的感情也不如跟杜家山深,等退休了,我就搬回杜家山去住,回去种果树,办小学。”其实哪里等得到退休啊,王和平说,他们每年都要回几趟杜家山,前年给杜家山买了1000棵苹果树苗,去年找到水利局要了两万元,帮杜家山解决了吃水问题。

我问蔡立坚:“你怎么就那么想念杜家山?让你牵肠挂肚的是什么呢?是杜家山的山水,还是杜家山的人?”

她很认真地凝神想了一会儿,笑着转向我说:“都有吧?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只要我一走近杜家山,心就怦怦地跳,就兴奋得不行。我们当年住的房子,我们亲手盖的房子,有不少都拆了,二大娘家的一串窑都塌了,人去楼空,物在人非,曾经那么兴旺红火的地方,现在又冷清了,回想起来,就像作了一场梦。想起那段历史,真是叫人百感交集,啥也说不出!不管别人怎样评价,我们在国家十分困难的时候,为国家分忧解难,到最困难最艰苦最需要人的地方去,我们是高尚的,比现在那些搞腐败的人要高尚得多!有人说我们是狂热,我就想,你们也狂热狂热嘛!

“我在杜家山啥都经历过了,啥滋味都尝过了,达到顶峰的滋味,跌入谷底的滋味,摔得真疼啊!我什么苦都吃过了,什么委屈都受过了,有句话叫‘先死而后生’,我是曾经死过的人,现在我才有了扎实正常的生活。”

我在蔡立坚家的书架上发现了好几本纪念册，装潢精美漂亮，经过主人的允许，我一本一本地打开，原来都是她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写给她的留言。

“蔡老师，你以你的行动使我懂得了应该怎样作人，怎样作一个正直的人，诚实的人。”

“我是一个失去了母爱的人，但你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好妈妈，不管走到哪里，我心里会永远记着你。”

“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曾经对党失去信心，我从你身上找回了对党的信心，找到了当今社会上少有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好人一生平安。蔡老师，我祝愿您永远幸福！”

蔡立坚在一篇题为《难以忘怀的岁月》的文章里写到：“我的青春年华，是在那座至今仍然使我魂牵梦绕的杜家山上走过来的，那是一段苍凉悲壮难以忘怀的岁月，它记录了特殊年代里我们那代人苦苦追求探索的脚步，也真实地映衬了多灾多难的祖国艰难曲折的历程。”

苦难也是一种财富

启宏一个人坐在黄浦江边上，静静地看着江水发呆。他想起了二姐，想起了跟二姐一起逛外滩的日子，在他心里，那是一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可今天却是阴天。

启宏九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只有两个姐姐。大姐出嫁早，星期天他总是跟二姐一道过，姐弟俩有时在外滩坐一坐，看看江水和轮船，有时沿着狭长的南京路，一家店铺一家店铺地走过去，他们什么也不买，只是好奇地看，因为口袋里是空的，顶多有几毛钱，那是买公共汽车票的钱。二姐书读得很好，本来可以考大学，可是为了小弟弟的生计，她作出牺牲，初中毕业后考入一所中专，中专毕业后分到北京的一个医药研究所，从

此星期天就只剩下启宏一个人。二姐每月一拿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弟弟寄去 15 元钱，那是启宏一个月的生活费。

他在里弄食堂里吃饭，在学校里住宿，逢年过节，同学们都走光了，宿舍里只剩下他自己，心里空落落的。他一个人走到黄浦江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一个人出神地看黄浦江静静的流水。他老是想起二姐，心里涌上酸酸的滋味，家庭的变故，使他比他的同学们更早地体味到生活的艰难，比他们早熟，比他们懂事，他也因此受到同学们的信任，他们推选他当班长。

他的家庭状况也引起校方的关注和同情。1967 年春末，当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之时，启宏就得到了一个就业的机会，到一家轮船公司去当海员。

转过年来，当时还担任上海市革委会正副主任的张春桥、姚文元，认为给一部分中学生在城里分配工作的办法不妥，应该让他们都到农村去。这样，已经当了一年海员的启宏又来到庐山脚下，彭泽县界，那是晋代诗人陶渊明当过县令的地方。

一千五百年前，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他以轻松欣喜的心境吟诵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诗句，辞去彭泽县令，复归柴桑故里，采菊东篱下，种豆南山下，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怡然自得，悠闲自在；一千五百年后，启宏为了生计来到此地，被一场滚滚洪流裹挟到此地。他找了一本陶渊明的诗来读，读到“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这两句，不觉心动：陶渊明是厌倦了官场，倦而还家，启宏却是无家可归。上海是家吗？上海仅仅是他的出生地、就读地，他没有家的温暖，也就没有家的依恋，对他来说，哪儿都一样，真真是大丈夫四海为家了。

他从江西彭泽的农场，又转到江苏大丰的农场，紧接着，上山下乡浪潮汹涌而起，他又乘上北去的列车，一直坐到黑龙江的北安。在站台上开完了欢迎会，他们又换乘汽车，到了德都县，五大莲池农场，一个好听的名字，一个有着美丽火山湖的地方。第二年这个农场就改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

农场之初,启宏的运气相当不错。他下乡早,又是老高二的学生,到了连队就当文书,不久又被借调到场部保卫科,搞外调。他跟着一位老同志,一老带一小,关里关外跑了许多地方。第二年开春,启宏又到了龙镇。

龙镇在北安以北,是铁路线的尽头,从哈尔滨延伸来的铁路到此戛然而止,再往前走只能改乘汽车。紧靠铁路是龙镇的优势,所以兵团一师把一些直属单位设置于此,其中包括师后勤部的物资批发站,那里是启宏的新单位。

批发站当时只是空地一片,空地上只有一顶孤伶伶的帐篷,帐篷里只有启宏他们五个人,百米开外有一棵老树,夜里,一只老狼就蹲在那棵老树底下,冲着帐篷嗥叫,整整地嗥了一夜,帐篷里的五个人一夜无法安睡。

批发站很快建了起来。房子多了,人多了,笑声多了,狼嗥声没有了。启宏成了五金采购员,经常跑哈尔滨,采购进货。不久整党运动开始,他又成了专案组的成员,因为他能写材料,搞过外调,为人又忠厚可靠。他心情很好,跟领导和同志们的关系也处得很好,不论做什么事情,他都实实在在地做好它。

当师后勤部一个副政委带着一个工作组来到龙镇,小镇上的笑声就一天比一天少了,而风声却一天紧似一天,经常有人被突然关押,突然隔离审查,头天晚上两个人还在一起说笑话,第二天早晨一个人就成了另一个人的阶下囚、监管对象。人人紧张,人人自危,400多人的小镇,不长时间就关起来二十几个人,百分之四十五。

专案组给启宏派任务了,让他写一个材料,把他同组的一个人写成反革命。启宏去找那个人谈话,了解那个人的反革命罪行。他仔细地听,刷刷地记,完了,拿着厚厚一叠记录找到专案组说,这个人不是反革命,他不过是有点落后意识,这材料没法写。单纯正直的启宏以为他挽救了一个人,其实他非但救不了那个人,反而招来了殃及自身的灾祸。

1969年12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召开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在佳木斯召开,一师的代表要在龙镇集中,在龙镇上火车。龙镇热闹起来了,要欢迎,又要欢送,标语贴出来了,毛主席像挂起来了,招待所前搭起了彩门,彩门要贴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九个大字。

下午五点多钟,在龙镇那个地方天已经擦黑了。启宏从招待所门前路过,正看到两个女孩子往拱门上贴那九个大字。她们个头太小,站在凳子上不够高,便把两个凳子擦起来,擦起来的凳子摇摇晃晃不稳当,两个女孩谁也不敢上,她们心里好着急。急公好义的启宏爽然相助,他个子高,手臂长,站在凳子上,正好够到拱门。他先贴好一头一尾的“敬”和“疆”字,再贴好正中间的“席”字,在两个分区中点的地方,贴上“毛”和“寿”,最后剩下两个字,一个是“万”一个是“无”。字是隶书,天色又暗,小姑娘认不大清,启宏在上面要“万”,她们递上了“无”,轮到要“无”字时,她们又递上了“万”。九个字贴完,启宏两手几乎冻僵,浑身几乎冻透,他不及细看,从凳子上跳下来,冲两个姑娘喊了一声:“你们看看行不行?”然后迫不及待地一头跑回温暖的宿舍里去了。就这样,“万寿无疆”变成了“无寿万疆”。

次日清晨,批发站的教导员起得早,出来跑步锻炼,第一个发现了这桩错误。他赶紧叫人,立刻把那条标语改了过来。启宏在去食堂吃早饭的路上听到这消息,吓了一跳。在那个年代,因为一条语录一句口号而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并不少见,无意的可以说成有意,责任事故可以说成政治事件。他搞过外调,搞过专案,不止一次地听说过接触过这类事情,心里自然清楚它的严重性,所以早饭也没顾上吃,就跑去找教导员,说明情况,承认错误,要写检查。教导员是部队转业下来的,他根本没把这当成一回事,安慰了几句,就叫启宏赶紧去哈尔滨催一批货。

启宏当晚赴哈,三天后返回,回龙镇那天正值元旦,火车车厢里冷清空旷。他从列车的广播里听到了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题目

是《七十年代第一春》。

然而龙镇却没有一丝春意，他一回到站里，立刻意识到情况已经起了变化：专案组开会，不再找他参加。他预感到有一场灾祸即将临头，他也知道这时最危险的东西是写在白纸上的黑字，一条条罪证都会从那里面找出。他做了最坏的打算，把自己的日记和信件找出，就着走廊里烧火墙的炉子，把它们全部化为灰烬。他刚把这件事情做完，就有人来找他开会，会议主持人劈头一句就是：“启宏的问题性质十分严重，是对伟大领袖的态度问题、立场问题，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启宏未等那人把话说完，就开始大声争辩，接着发生一场激烈的争吵，这场争吵的后果，是他当天晚上就搬出了集体宿舍，住进了隔离审查室，24小时有人监管。

揭发批判开始了，罪行一件件被揭发出来，有十几条之多。诸如：他从哈尔滨买回一些哲学书籍，组织青年成立学哲学小组，这个小组实质上是“反动小团体”；有一次唱歌，他故意把“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唱成“党听我的话，我听枪的话”；还有一条涉及到他和两个姐姐的关系：“跟革命的大姐关系不好，跟反革命的二姐关系好”。大姐大启宏近二十岁，出嫁又早，他是跟着二姐一道长大，自然在情感上更亲近些，这有什么可奇怪呢？真是应了那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满院子贴的都是揭发启宏的大字报，轰轰烈烈，铺天盖地，“挖出地平线下的现行反革命！”口号喊得山响，原来关押的二十几个人全部放掉，集中力量对付他一个，他一个救了二十几个，值了。四个人拿着枪，一天24小时看着他，启宏成了龙镇的头号人物，没有不知道他的，没有不认识他的。他的名字还传到省里，成为当时正在开展的“深挖”运动中一个难得的典型案例——《一个知青是怎样变成现行反革命的？》全省通报。挖出这个头号敌人的人，自然也成了头号功臣。

他态度极其不好，不肯认错，不肯交待，顽固对抗，是一个“不肯投降”的阶级敌人。那好，给他一本毛选，翻到1260页，每天读那

篇《敦促杜聿明投降书》。那是毛泽东 1948 年在淮海战役中起草的一篇广播稿，劈头一句是：“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末尾一句是“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言辞通俗朴实，语气斩钉截铁。启宏一边在嘴里读，一边在心里苦笑：这是哪儿跟哪儿呀。一本 1400 多页的毛选合订本，只有那几页是黑黑的，每天被一双黑黑的手翻来翻去，要念十几遍甚至几十遍，他至今还能流利地背诵全文。“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这些句子白天晚上在他的脑子里嗡嗡响。

后来让他去劳动，劳动的时候脑子里响的也是这些句子。他拉着一辆没有马的马车，铁制的车辕把他的胳膊划出一道道长长的口子。每天早晨四点钟起来，一个人要装六吨煤，把一辆汽车和一个拖车装满。吃完了早饭，接着是掏厕所，当泥瓦工，什么活都干。吃完晚饭，还得给食堂挑水，招待所一个食堂，批发站一个食堂，供应站一个食堂，三个食堂九口大锅，都是最大号的，还有 14 口水缸，一挑一挑，全部装满，一直干到 11 点，干到万籁俱寂，四无人声。

启宏成了一个干活的机器，成了一个动物，一头牲口，他完全丧失了生活的兴趣。他被剃了阴阳头，几乎整整一年时间没换过衣服，没洗过澡，衬衫上的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结了厚厚一层盐碱，一碰直掉渣。

四五月份，天气渐渐转暖，启宏这个反面教员开始上课了，他被拉到各个单位去轮流批斗。他的两只手被反绑着，腿也捆上，像一头要挨宰的猪，扔到汽车上，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启宏在车上被颠来颠去，从一个团拉到一个团，从一个连队拉到一个连队。有一次，在工程连，批斗完了，几个小伙子拿条麻袋往他头上一套，噼里啪啦揍了他一顿。他从痛骂声里听出他们是北京青年，心里涌过一阵悲凉酸楚，麻木的脑袋里忽然涌出曹植那首七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来自上海，你们来自北京，为什么知

青要斗知青，知青还要动手打知青？

接下来，到他原来待过的连队批斗。那里有他的同学、朋友，有跟他一起来的知青，来的时候他是带队的，现在成了反革命。他在台上挨批，他们在台下喊口号打倒他。有几个要好的同学，就是不喊口号，不肯揭发，他们说启宏不是坏人，为这个他们受到了牵连，有的人甚至待不下去，只得调走了之。但是也有人站出来揭发，把他闲谈时的一些话语当作罪证，说他讲过“恩格斯的军事著作有点唯武器论”，甚至有人说他是“十恶不赦”！这些人大大刺伤了他的心：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也反目为仇，落井下石，太不可思议了，活着太没意思了，于是他想到了死。

一天深夜，他趁看守上厕所的工夫，悄悄跑了出去。批发站的院子里，有一个还没完工的大菜窖，他早就选好了那个地方。他在一根粗粗的横梁上，挂上一根绳子，绳子有一个圈套，于是成了绞索，他看着那个绞索，想起了一本书，《绞刑架下的报告》。伏契克在就义之前，把他要说的话全都写了下来，留传下来，昭然天下，可是我的冤屈对谁言讲，对谁诉说？如果我死了，又有谁能为我洗净污垢，申诉冤情？自己的情况与别人不一样，家里只有两个姐姐，二姐也成了“反革命”，指望她们决不可能。如果自己不能把自己的事情搞清楚，就不会有人来给我搞清楚。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死，我得活下去，终有一天我要让大家看看清楚，我启宏的心是红是黑，是忠是奸！

那一个夜晚，启宏对这件事情想开了：反正我豁出去了，什么都不在乎了，什么都无所顾忌了，我只等待机会，我只期待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虚伪和丑恶烧个干净！

启宏每天的劳动量太大，他的饭量也大得惊人，四十几斤粮票不够吃，32元工资也不够吃。不够吃怎么办？只能吃半饱，只能空着一部分肚子，没有人会给他钱和粮票。可是有人在暗中支援他，他去食堂买饭，给一元钱，找他二元或二元五角钱，给一斤粮票，找回三斤粮票，他并不认识那些炊事员，有时甚至看不清对方的脸，

至今他也不知道那些人的名字,只知道也是一帮知识青年。他们使他感到了人世间的真情,使他知道:还有人信任他关心他,在暗中悄悄地帮助他,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并不是一片漆黑。

整个1970年就这么过去了。1971年春天来到了,天气一天天地变暖了,厚厚的棉衣穿不住了。有一天,启宏正在院子里把陈旧的标语刷干净,忽然听到有人叫他:小启,你过来!好亲切的称呼,一年多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了,他惊异地转过身,看到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个穿军装的老头,原来是个现役军人,站在不远的地方,正看着他,眼睛里射出友善的目光。启宏迟疑了一下:是叫我吗?会不会搞错了?那个现役老头又叫了一句:小启,你过来!启宏停下手里的活,慢慢腾腾地走过去。“你还记得毛主席给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写的那段祝词吗?”启宏脑子里一下蹦出那段著名的语录:“记得。”“那你给我背背看。”“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好!你自己要对自己的问题有正确认识,你要相信党,相信问题总会搞清楚的。”真是怪事,怎么会让他背这段语录,这一年多总是让他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背“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友善?

后来启宏才知道,他是师后勤部新来的政委,姓赵。赵政委上任后听说了这个案子,就找了一些人了解情况,搞调查,接着,后勤部党委开了一天一夜的会,专门研究启宏的问题,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很激烈,展开辩论。赵政委说,这个青年走了几千里路到黑龙江来上山下乡,怎么能是一个反革命呢?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的嘛,根据他的一贯表现看,这个青年不是坏人,不是阶级敌人。会议最后形成一个意见: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几天之后,启宏被解除了看管,到装卸连监督劳动。派给他的是杂活儿,比过去轻多了:给宿舍烧火墙。当时连里干杂活的有两个人,烧火墙的是启宏,烧大水壶的是张德英,就是那员后来成为世界冠军的乒乓骁将。但张德英不是监督劳动,她是一名兵团战

士。又过了一年,启宏调到批发站当仓库保管员,管棉布。工作很简单:货来了码码好,票来了付付货。他把仓库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净整洁,工作上谁也挑不出他的毛病,一丁点儿也挑不出,真是没的说。但启宏从不多说一句话,他记住了“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他沉默谨慎,对人多了一种戒备之心。

再后来,整党开始了,赵政委带着工作队来到批发站,在整党的后期,发展新党员阶段,提出了启宏的入党问题。赵政委说,启宏不是现行反革命,他是受冤屈的,吃了许多苦,受了很多罪,但他工作一直干得很好,勤勤恳恳,没有怨言,这样的同志是真正的好同志。1973年7月1日,启宏入党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他回忆起那段往事说,想想很可笑,反革命的事情还没有个结论,就稀里糊涂地入党了,有人说是赵政委把我拉入党内的。

这个赵政委在启宏的一生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极“左”的大气候下改变了启宏的厄运。他真正懂得党的政策,有正义感,有同情心,更重要的是他握有权力。

1974年推荐上大学,一师批发站八个小单位,每个单位一票,启宏得了满票,文化考试,他又在师部考了第一。学校很好,是大连工学院,但他终于没有去成,原因不明。经过了那样一场大磨难,启宏对什么都想开了看开了,他乐天知命,心境平和地留下来,“久经沧海难为水”嘛!他聊以自慰的是,那么多人投他的票,他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后来他调到师后勤部商业处,管计划和统计。

1976年,启宏已经28岁,他同一个哈尔滨知青结了婚,准备就把根扎在农场了。但第二年恢复高考,400分的满分他考了392分,以如此高分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入校后,他才敢正式给学校,给原农场写了申诉材料。平反的时候,从他的档案里取出的黑材料有七八公分厚。

启宏后来的路很顺。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哈尔滨锅炉厂——全国同行中的排行老大,1990年全国首批一级企业的头一家。第二年他就评上了工程师,有了中级职称,1984年当锅炉

水系统的总负责人,1985年去美国,与美方联合设计以褐煤为燃料的60万千瓦锅炉。那几年,他在技术上提高相当快,一年一个大台阶,大跨步地往前走,往上走。领导器重他,同事也喜欢他,因为他从不张扬从不炫耀自己,从来不闹一点是非,只知道埋头实干。1987年,他开始参与工厂的生产管理,做生产处的处长,全厂的生产总指挥。1992年他又升任副厂长,掌管财务、企业管理和计算机。如今,启宏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哈尔滨动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启宏在谈到他这一段先苦后甜的经历时说,我虽然当了“反革命”,吃了很多苦,但遇到赵政委以后这一段还是比较顺利的。苦难也是一种财富,它使我懂得了为人处事要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再一个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过去我是大咧咧,以为这个世界一切都很美好,人们的心里都很简单,不晓得有些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坑害别人。挫折和磨难使启宏学会了如何为人处事,如何适应社会的复杂性,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这是他以后能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燕的“忧国忧民”意识

启宏是规规矩矩的老实人,尚且挨整,那些思想活跃敢想敢说的青年人,就更危险了。在各地区下乡青年中间,北京青年是最爱关心国家大事,最爱议论国家形势的,因为他们来自天子脚下,京畿之地,消息灵通,北京人又素来好评说朝政,北京的红卫兵又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

当启宏在东北的黑土地上被批判斗争的时候,西部的黄土地上,也发生了另外一桩性质相似的事情。

尽管司机一看到路轨上躺着个人就果断地拉下了制动闸,但巨大的惯力还是推着火车向前驰跑了一百米才缓缓停下。司机师

傅没等火车停稳就心急火燎地跳下车,顺着路轨往后找人,于是他就看到了那个姑娘。

她的头部和背部已经被火车撞伤,两只手却死死抓着一个书包不放,那书包鼓囊囊沉甸甸,里面装的都是书和本子。她不是横卧在铁轨上,要是那样她肯定轧死了,她是顺着卧在路轨中央,所以侥幸拣了条命。事后她说她想保留一个完整的尸首,不愿意身断三截。

司机马上找汽车,送医院,还好,伤得不很重,没有生命危险。翻了翻书包里的物品,才知道她是个知青,而且是北京的知青,看样子不过十八九岁,模样长得挺秀气。好好的一个姑娘,怎么要寻死呢?司机想不通,医生也想不通。

这个女知青是谁?她为什么要寻此短见?

她有个好听的姓,姓燕,我们就叫她小燕吧。小燕是北京市女八中的六七届初中毕业生,她有一个爱思索爱提问爱探求的头脑,问题就出在她这颗头脑上。如果她也跟农民一样,就是干活,挣工分,别的啥也不想,如果她也跟其他知青一样,随遇而安顺其自然,有气就发发牢骚,甭那么叫真儿,也许就不致于闹到这个地步。偏偏她就是好认真。

她插队的地方在山西雁北地区,雁北在雁门关以北,是山西最北边的一个地区;她插队的阳高县,又是雁北地区最偏北的一个县,再往北不到30里就是内蒙古了。她插队的那个村,冬天冷,夏天旱,一个整劳力干一天挣一毛七分钱,女知青只给记5.3分,还不到一毛钱。有的年景麦子播下去,到夏收种子都收不回来,全旱死了。

小燕进村的第一个感觉是一片黄:地是黄的,窑洞和土墙是黄的,到了黄昏的时候看不清哪是房子哪是土,找见一扇门,才知道是有人家了。她那个知青点一共10个知青,她是出工最多的一个,一年干下来,倒欠队里18块钱,自己养活不了自己,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只能写信找家里要。家里每月寄生活费来,开始每月寄10

元,后来寄五元。这跟她想象中的农村可截然不同啊,报纸上广播里每天宣传的农村可不是这个样子啊。

这里的农民也跟她想象的不一样。村干部不下地干活,整天在村子里转悠,吆三喝四的,农民家里穷得什么也没有,衣服穿得破破烂烂,村里的孩子老爱上知青屋里来转悠,他们一来知青屋里准丢东西,铅笔钢笔啦,香皂手帕啦,都是些小东西,小燕她们又好气又好笑,继而觉得孩子们很可怜,以后孩子再来就告诉他们:想要什么就跟阿姨说,别偷偷摸摸地拿。

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政治文化生活的贫困。村子里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更甭说看电影,也没有电,天一黑,村子里就一片漆黑,除了狗叫啥声响也没有,家家把门关起来睡觉了,他们睡得早起得也早,他们是真正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也不想去闻窗外事,一点也不“关心国家大事”。

村里有五个女知青,一个调走了,一个回家了,另两个住一处,小燕单住一处,孤伶伶的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伴也没有,真憋闷,真寂寞,真难以忍受。她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在油灯下,在日记本上,倾诉自己的孤独和苦闷。

这时,村里来了一个“坏分子”,叫王永,是阳高县城里的一个工人,两口子下放到村里来劳动改造,两口子说话都是北京口音,这是乡音哪!这乡音使小燕产生了一种乡情,她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儿说说话。这王永偏又是个爱说话的人,除了保留着北京的口音,他还保留着北京人爱关心国家大事爱议论国家大事的习惯,他坏事就坏在这张嘴,虽然戴上了“坏分子”帽子,还是改不了这爱说话的毛病。他把小燕当成他忠实的听众,天南地北地讲开了,他的思路开阔,讲中国的经济实力不行,所以中国的国际地位不高,讲中国不能光搞文化革命,还得搞好经济建设,中国要是不重视经济建设迟早要“势衰”。他有很多新鲜的见解,让小燕听着吃惊,一琢磨又觉得有理。她把自己的看法记在日记本子上,她也开始思考一些发生在村子以外,除了干活吃饭记工分以外的大问题、理论问

题。

五月底,县里开了一个知青表彰会,小燕也去了,会上一共去了几十个北京知青,有小燕一个学校的,也有一个班的,她真高兴,可看到亲人了,可有了说话的机会了,她把憋在心里的一肚子话尽情地跟她们倾吐。她发现她们也有类似的苦闷,类似的感受,大家在一起越讲越相投越说越激奋,有一个老高三的大姐姐说,我们自己开一次会吧。

那次会是背着会务组悄悄召开的,有几个知青预感到不祥之兆事先就躲避开了。那次会上真是议论风生,各抒己见,群情激奋,谈到农村的现状,谈到农民的现状,谈到知青的现状,愤愤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小燕说,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也去过北京郊区的农村,参加过麦收劳动,看到过京郊的农民,那里的农村跟这里的农村相距不过四五百里远,差别实在太大了,真叫人难以想象!究竟哪里的情況代表了真实的中国农村,是京郊的农村,还是阳高的农村?解放已经20年了,为什么农村还是这么落后,农民还是这么贫穷,跟报纸上广播里每天讲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啊!

还有人在发言中对知青的管理、知青的待遇,甚至上山下乡这种做法,都提出了尖锐的指责。主持会议的高三大姐姐说:革命事业接班人难道就是这样培养的吗?我认为,培养接班人的工作有偏差!一群年轻气盛的青年,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就聚在一个离北京不过几百里之遥的县城招待所里,议论着“朝政”,发表着不合时宜的见解。好在没有人揭发举报,但这件事情还是令县革委会的领导不满、不安。

那次会开过以后,小燕回到村里,照旧下地出工,照旧独自思考,又开始了孤伶伶的日子,她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了一下,把满脑子的问号归纳成了10个问题,写在笔记本上,其中包括知识青年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如何改变农村面貌的问题等等,甚至还有个人崇拜的问题。她在日记里写过这样的话:“糖纸上也印语录,丢在大街上,让人踩来踩去,这是热爱毛主席,还是亵渎毛主席呢?”她

重义陷入苦闷。她有时还去找王永，但她不愿把自己的想法讲给王永听，毕竟他是“坏分子”，她对他还保持着几分应有的警惕。那么满腹话儿向谁诉说呢？

她想起在北京读过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五十年前，毛主席通过书信的形式，同会员之间交流思想，甚至他的一些很重要的思想，都是在写给蔡和森的书信中提出来的。小燕怀着一种强烈的探求真理的欲望，开始给她的几个好朋友写信了，她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求索，就是想在这种探讨中找到真理，找到答案。因为她选择的通信对象都是一些关系要好，又有一定学识水平的人，所以她在信中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毫不注意词语的选择和措词的斟酌，家里每月邮来的五元钱，有很大一部分就花在信封信纸邮票上。可是一封封信寄出去，反响淡淡，回音寥寥，或许是他们无暇，或许是他们无意，或许是他们对这些重大问题也无法做出回答。事实上，在那个年代里，谁也无法做出准确的回答。

不久，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一打三反工作组进村了，队长是一个194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过去是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姓刘，他刚刚得到“解放”尚未安排工作，所以他想好好地在一打三反中表现一下自己，表现自己阶级斗争觉悟的提高，表现自己完全能够胜任一项重要的工作。他要好好地抓一抓阶级斗争。

第一个他要抓王永，因为王永是坏分子、阶级敌人，他要抓出阶级敌人的“新动向”。王永被带来，不老实交待，好，脖子上挂上大车轴，在火边烤他，看他老实不老实！村里还有一个所谓的“富农”，也被带来了，不老实交待问题，就吊起来打，看他讲不讲：

刘队长把小燕找了去，说你跟王永接触比较多，你要揭发他的问题，小燕说我们在一起就是瞎聊，没什么正事。队长不信，让村里的几个知青给她做工作，小燕拗不过，就找了几篇日记拿给刘队长看，刘队长看得很仔细，一边看，一边往本子上抄写。后来小燕就回家探亲去了。

在她回北京的这段时间里出了一件事：她的一个朋友，把她写

的信交给了领导,可能是那人从小燕的信中隐隐地感觉到一种危险的味道。这样,问题一下子就变得严重了,复杂了,上升到阶级斗争这个当时指导一切工作的“纲”和“线”上去了。那边的领导把信转到了小燕插队的阳高县革命委员会,县革委会又布置到正在她们村里搞一打三反运动的工作组。小燕回村以后,刘队长要看她的日记,小燕说私人日记是受宪法保护的,你无权看我的日记。刘队长说你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样很危险。小燕说,我们下乡快两年了,村子里什么变化也没有,我们起了什么作用?一点作用也看不到!我感觉到的只是一天天地被农民同化,这根本不是毛主席所讲的再教育,再教育不应该是这样子。刘队长讲不过小燕,就派人监视她,下地干活有人监视,下雨天在屋里看书写信也有人监视,有的时候监视她的人还背着枪,搞得谁也不敢跟她讲话,谁也不敢跟她来往,不知道她究竟出了啥问题。小燕自己也搞不懂究竟有啥问题,但她感到一种很大的压力,她感到孤立无援,感到自己力量的弱小。“我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她想找个讲理的地方。到哪里能找到讲理的地方?到县里?工作组就是县里派来的。看来只有回北京,如果北京市革委会也不能主持公道,我就只有去闯中南海了,我相信毛主席肯定会理解我的,肯定能为我说话。对,回北京,只有回北京才能把问题说清楚!她跟工作队说:我想回家!工作队倒没阻拦,或许他们觉得小燕在村里成了个负担。可是回北京没有路费呀,小燕去找队里的会计借钱,会计说账本上一共只有五毛多钱,不能借。“那就只好逃票啦!”小燕想。她还从来没坐过逃票的火车,可是眼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啦。

1970年9月1日,小燕今天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日子,天挺好,是个大晴天。她们村离五官屯有30多里路,五官屯有火车,一大早她就上路了,随身带的物品很简单,只有一个书包,书包里装了她的八本日记和一些照片。尽管她走得很急,但是当她赶到五官屯的时候还是晚了,早班火车已经开走了,只能等晚上的一班

车。小燕找了个地方坐下来，静静地捱时间。

她忽然泄气了，勇气和信心一下子全没有了：我没有车票能上得了车吗？即使上了火车查票的也会把我赶下来；即使我能回到北京，进得了中南海吗？中南海是毛主席党中央住的地方，肯定闯不进去，站岗的解放军再把我当坏人抓起来，我说得清吗？小燕这时完全变了一个角度，更实际地来考虑她的处境，她觉得找不到一个主持公道、能为她洗清罪名的地方，她对这个社会绝望了，对这个世界绝望了。她一下子想起一个最要好的同学，那个同学跟她一道插队同住一间窑洞，下乡不久就回北京去治病，治了很久也治不好，最后自杀了。听到自杀的消息，小燕难过了很久，她怎么也弄不明白那同学为什么要自杀，甚至不相信她会自杀，可是此时她一下子理解了她的同学：自杀，这是一条多么好的出路啊，离开这个丑恶的世界，摆脱掉人世间所有的烦恼，那是一种最好的办法，那是一种最好的去处！小燕定定地望着那两根在太阳底下的钢轨，钢轨发着耀眼的光，她站了起来，冲着那两根耀眼发亮的钢轨走去，这时，她听到了火车的鸣叫声……

小燕的伤治好了，出了医院她就进了看守所，审问开始了。其实那不是审问，那是批判，不允许她申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不允许她为自己辩解，只是把一顶顶大帽子扣到她的头上，一顶比一顶吓人。半年之后，召开了宣判大会，小燕因“书写反动信件，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党中央毛主席，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二年，到榆次日化厂劳动改造。

那个工厂是一个劳改单位，做毛巾围巾肥皂洗头膏之类，小燕在那里搞基建盖楼房拉沙子抹泥墙，活是累一点，但是生活不苦，宿舍条件食堂伙食都比插队的村里好得多，可以看报看电影，一个月还有六元津贴，小燕真是很喜欢这个地方。两年以后刑满释放，听到林彪“571”工程纪要中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成是“变相劳改”的时候，小燕一下子就想起了她那段劳改生活，“插队生活还不

如劳改生活呢！”她脑子里一下转出这个念头，可是她什么也没说，她不敢再那么没遮没拦随心所欲地讲话了。同她在一起劳改的，都是些政治犯，有基督教徒、一贯道首，还有大学教授、回乡知青，大多是有文化的人，彼此相安无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日子里，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下乡插队的小燕，服完了她的两年刑期。1972年10月刑满释放，她又回到了阳高县，又回到她插队的那个村。

村里的知青几乎都走光了，招工的招工，上学的上学，回城的回城，人去屋空，光阴依旧，小燕想起自己这二年的遭遇，不禁感慨万千，悲从中来。村里还是那么穷，工分还是那么低，跟从前不同的是村里有了电，有了电灯和电磨。最让她感动的是村里的农民不歧视她，还跑来看她，支书和队长说：上边来调查你，我们都说你在这里表现挺好，能干活，不怕吃苦。小燕听了这几句平常朴实的话哭了。

被没收的五本日记，释放的时候只还给她两本，晚上在孤灯之下，她翻看自己的两本日记，那里有她的豪言壮语，有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严厉批判，那里边充满了斗私批修的精神。“我有什么罪？我错在哪里？即使我有错误的想法，那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我呀。警察、监狱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对付阶级敌人的，难道我是阶级敌人吗？”小燕的思想依旧那么活跃，两年的服刑生活改不了她爱思索爱探寻的习惯。她越想越气，拿起笔来给周总理写信，要求复查她的案子，要求中央派人来调查，要求上前线去，参加抗美援朝战斗，她想，我要用我的行动来证实我的无私，我的清白，我的忠诚。她甚至还给周总理写了一封血书。

但是这些信件全都没有回音，不知道是周总理看到了无暇顾及，还是周总理根本就没看到，被中间某一个环节的什么人给卡住了。那就给省里写信，给北京市知青办写信，申诉自己的冤情，她甚至还去过太原，找过省高级人民法院，可是她得到的，要么是“好好

工作,相信党相信组织”之类的空话,要么干脆就毫无反响。

小燕不像启宏那么幸运,她没有遇到一个敢于仗义执言主持公道的领导,所以她孤立无援,冤案难翻,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混迹于农村青年之间。她的北京口音渐渐改变成当地口音,她身上的知青味道一天天地减少。

1976年1月,小燕因母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困退返城。

1980年9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责成阳高县法院为她平反,除了一纸平反证书,还有100多块钱的“经济损失补偿”,而小燕最想得到的那三本日记,却始终没能要回来。

如今,小燕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工作,谈起当年的那些事情她显得十分平静,没有激动甚至也没有一点怨忿。当时报纸上刚刚登出李鹏总理在延安地区接见下乡知青的一段讲话,小燕说,我觉得李鹏对知青运动的评价很完整,这么多年了,这么大的一场运动,国家是该有个公正全面的说法。她还说,知识青年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美德,这就是忧国忧民的意识。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二十几年前在雁北山区里思考着国家命运的那个年轻姑娘,就为了这“忧国忧民的意识”,她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但是小燕没有因为政治上受挫而颓丧消沉。回到北京以后,她从一个普通工人干起,一直在奋斗,在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直到现在还在参加中央党校的函授学习,学习外语,学习经济管理。她依然有信仰,有追求,依然在十分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默默地望着她,什么也没说,心里却渐渐升起一股敬意,我想起了一些比她顺当得多处境好得多的人,还时不时地要叹息,要抱怨几句,而她目前所做的仅仅是“接待工作”,是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

跟好人在一起

比起在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蔡立坚和小燕来,在安徽插队的

上海知青祝庆军处境要顺当得多,经历要简单得多。在上海某大学政治系的一间办公室里她回述插队往事的时候,始终用的是一种轻松的语调,脸上是一种轻松的表情,经常说着说着就笑起来,笑得很开心,农村生活没有在她的心上投下阴影,留给她的只是愉快美好的回忆。

祝庆军跟小燕一样,也是干部子女,“文革”前,父亲在上海市委党校工作,母亲是一个区的卫生局长,她自己,是一所市重点中学的三好生,六七届的初中毕业生。

1969年的春节,祝庆军家里没有一点节日的喜悦,却笼罩着压抑沉闷的气氛。爸爸妈妈还戴着“走资派”的帽子,还在挨批斗受审查,他们的问题能不能够解决,何时能够解决,看似遥遥无期;祝庆军和她的哥哥,又要上山下乡,去农村插队了,下去以后他们能不能回来,何时能够回来,亦未可知。饭桌旁,每个人都有—种前途无望的感觉,但谁都不肯讲出这种感觉,只是默默地吃饭。电灯发出幽幽的光,那饭菜好没滋味。

那是祝庆军过的最不开心的一个春节,却是祝庆军记忆最深的一个春节。春节—过她就跟哥哥去了安徽。

他们去的那个县在安徽的东部,虽然紧邻着富饶的江苏,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而他们所去的大通公社,被称作那个县的“西伯利亚”,其状况可想而知。他们来到生产队时,村子里人迹冷落,显得很空旷,原来许多人家都出去要饭了,一家—家的。队长说,年年这样,现在正是闹春荒的季节,去年分的粮食都吃光了。

队里有一百多口人,一千来亩地,地里光秃秃的,没有庄稼,城里长大的祝庆军第一次体味了“荒凉”。但是,与许多知青不同的是,面对贫穷与荒凉的祝庆军兄妹,心里生出的不仅是悲凉和伤感,还激发出—种使命感,“改变贫穷匹夫有责”!或许这是受了家庭的熏染,30年前,他们的父母就是怀着这样的使命感参加了革命。

祝庆军说起话来很快,叽叽喳喳的透着兴奋,她这样讲述当年

刚下乡时的心情：“我从一下去就没有接受再教育的感觉，那么落后的农村，那么贫穷的农民，我们不能接受那种教育，毕竟我们代表了知识的一面，文明的一面，我们的使命是改变农村！”

几个上海知青在祝庆军兄妹的鼓动下，开始勾画起改变农村的蓝图，每天晚上凑在油灯下，一脸严肃的神色，一本正经地思考，白天则在村里搞调查。那时正是农闲，没有多少活计。他们制定了一个规划，而那个规划能否实施，要看能否得到队长的支持。

生产队长是个既有农民的淳朴，又有灵活的头脑的人，他的女儿19岁，跟祝庆军一样大，所以他把祝庆军他们当孩子看待。他喜欢这些孩子，也心疼这些孩子：从大城市到乡下来，吃苦受罪，多不容易。空闲的时候他很愿意到他们这里来坐坐，聊聊，听他们讲一些城里的新鲜事儿、国内国外的重要事儿，祝庆军他们就借机献出谋划好的计策。

“队长，咱们村里不能老是这么穷啊，毛主席说穷则思变，咱们得改变面貌。”

“咋个改法？”

“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人的因素第一，所以先要把人找回来，马上春播了，没有人，地种不好，来年还是受穷。”

“找回来？回来吃啥？”

“我们知青有口粮啊，我们分一点出来，帮助最困难的农民。”插队知青，第一年的口粮是国家拨给的商品粮。

队长笑了笑，心里暗想，你们那点粮，管得了几个人，村里人吃粮可不像你们，个个都是大肚子汉，但嘴上没说什么。他感谢孩子们的好意，他怀疑孩子们的能力。

外出要饭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村子里人多了，热闹了，有了生气。知青进村，成了全村人最大的话题，知青的住处，成了村子里最热闹的地方。到了晚上，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没有电灯，公社的放映队一个月才来放一次电影，村民们，特别是年轻人，就相邀着

去看知青,听他们讲“城里人的事”,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房子里摆什么样的家具(厕所盖在房子里,不可思议!)马路上跑什么样的汽车……。在他们心目中,上海是一个神圣而又神秘的地方,那里的任何一点细微琐事,都让他们觉得有趣、新奇。他们从知青的介绍中了解着、想象着那高不可及的另一个社会,另一种生活方式。日子长了,慢慢熟了,祝庆军他们就教村民们学文化、认字、唱歌,唱“敬爱的毛主席”,唱毛主席语录歌,村里的年轻人来得更多更勤了。

春耕开始了,几个知青要搞科学种田的实验,他们去找队长要实验田。队长不相信他们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又不愿意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反正队里的地也多,就找了一块给他们种。种什么呢?队里的大田作物主要是种玉米,广种薄收,亩产只有二三百斤。知青也种玉米,他们翻看书本,依照科学,要种出高产的玉米。

队里的玉米种得很稀,知青要搞合理密植,密植必须要施化肥,而化肥是要县里批的。几个青年人胆子大,就跑到县里去批化肥。到了县里一问,巧了,县委的郭书记就是在他们村里劳动改造过的那个“走资派”。当初祝庆军刚到队里时,就听说有这样的人,她好奇地去看他。他正在给牲口铡草,冷冷地看了祝庆军一眼,冷冷地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上海来的知青。”

“我是走资派,你最好不要到我这里来。”

“我不怕,我爸爸妈妈也是走资派,但他们都是革命干部。我认为你也是革命干部。”

几句话一下子就融去了“走资派”心里和脸上的冰霜,他在这荒僻的乡村里遇见了一个理解他的人,他的话渐渐多了起来。祝庆军渐渐地了解了他的历史,知道他曾经是北平的大学生,还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祝庆军很喜欢跟他谈话,可惜不久他就被召回县里,“三结合”进了领导班子。

他们就径直去找郭书记。郭书记把一个姓陈的县长找来，听知青们七嘴八舌地讲理由：“玉米抽穗之前一定要上化肥，不然穗就抽不出来，我们的实验就要失败，如果我们失败了，那科学就被愚昧战胜了。”郭书记笑着对陈县长说：“你看，问题还挺严重。如果大家都能这样来关心农业，我们县的农业就一定能搞上去了。”

陈县长给他们批了化肥，还找了个拖拉机帮他们拉了回去。化肥及时施到地里，玉米丰收了，每亩比农民不施化肥的要多出好几百斤。社员们看到了合理密植的好处，懂得了科学种田的道理和威力，科学种田在队里一下子就推开了。

知青们尽其所能地帮助队里发展生产。队里要买水稻良种，没有钱，知青们就每人找家里要了50元，借给队里买稻种。上海市给下乡知青点支援一批农机具，祝庆军他们想尽办法给队里弄来一台拖拉机。拖拉机刚要来，就赶上麦收，队里用机械脱谷，很快就干完了。那年麦收赶上下大雨，邻近的几个生产队麦子都没收完，遭了灾。祝庆军还帮助队长出主意：那些年年外出讨饭的，粮食不要一下子全分给他们，一个月给他们一部分，省得他们吃粮不会安排算计，甚至把粮食拿去卖掉。

几年之后，当知青们离开这个队时，队里的面貌已经大大地改变了：粮食打得多了，没有人出去讨饭了，工分值高了，没有超支户了，这里面，自然少不了知青们的一份功劳。知青带给生产队的，不仅仅是几个劳动力，更主要的是他们带来了科学、文化、知识，带来了先进的农机具，按祝庆军的话说，他们用他们所代表的知识和文明，对农村的贫穷和愚昧有所改变，当然，这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和一定的范围内。

但是最让祝庆军难以忘怀的，不是他们当年如何改变了农村，而是农民给予他们的厚爱，那是一种最质朴圣洁的爱，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爱。

村里的农民非常淳朴、善良、宽厚，他们总是说：这些孩子可怜哪，这么一点大就离开父母。他们总是尽其可能地给知青以帮助。

知青自己起火做饭,菜要自己种,猪要自己养,一天劳动回来,精疲力竭,动也不想动,谁还有心思去伺弄那些猪呀菜呀的,所以知青的猪崽老也长不大。队里的饲养员大妈就把猪崽带走,跟队里的猪放在一起养,她还蛮有理由:猪崽给知青们养要养死的!猪崽渐渐长大了,知青们觉得老是队里给养不大好,就把猪赶回来,可猪每天还是要跑到队里去吃食。知青的猪吃了一队里的食,到了冬天长大了,养肥了,社员们又帮他们把猪杀掉,把肉腌起来,放到来年慢慢吃。

种菜也是这样,妇女队长给他们拿来菜秧,帮他们栽上,他们也不去管,反正经常有社员给他们送菜来,他们不愁没菜吃。农民这样讲:我们多浇一担水,知青就多一篮菜。

那个地方烧的都是草,有麦草、稻草,也有野草,晒干了,捆成一捆一捆的。队里分草的时候,每次总有许多散草,分到最后队长就问:散草怎么办?大家就说:给知青算了,他们不会割草。有人就帮着把散草运到知青的宿舍去。

干活的时候,队长把知青跟社员分在一起,末了嘱咐一句:知青不会干,你们教一教。于是,锄地的时候,锄在前面的社员总会回过头来接落在后面的知青一段,割麦的时候,挨着知青的农民总要多割几垄。

祝庆军说,农民从来不计较我们干多干少,干快干慢,对我们十分宽容。我们的工分,跟队里没出嫁的女孩子一样多,那些姑娘可比我们能干多了,她们比结了婚的妇女还能干,但是她们不计较。队长老是说:这些知青能下来劳动,就不容易了,不能要求他们干多干少。大娘们则是另一种心情:哎呀,这么白的脸,在太阳底下晒成这个样,作孽呀!

实际上,村里的农民是把知青当成“客”来看待的,而且是大城市里来的“贵客”,而且是客客气气地对待,“要不是上山下乡,哪个农民家里也请不来这样的贵客呀!”他们非常清楚他们自己跟知青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差距,他们懂得二者根本不是一家人。“你们总

要回城里去的,就算走不了,也得嫁人吧,嫁人你不会嫁给村里的农民吧,总得找个城里人吧,结了婚还不是得进城去?”村里的大娘们这样对祝庆军说。

队长更是个聪明人,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知青们能在这里“扎根”,但是他不动声色,长于心计,充分利用好上边给予知青的优惠政策。

政策规定,拨给每个插队知青一些盖房子的木料,不少村里拿了木料去,不给知青盖房子,挪作他用,但是这个队长拉来木料,全给知青盖了房子,他亲自规划设计,五六个知青,却盖了一大排房子,盖得很好很漂亮,足有八间。其实他盖的是队委会办公室,哪一间是队委会,哪一间是会计室,哪一间是开大会用的,他都算计得好好的。“知青总是要走的,知青走了就作队委会。”他在心里暗暗思忖。有一间打算作库房的房子,很大,他就让知青堆草放柴禾。房子的后边还挖了一条深沟,“这样安全。”他说。他考虑的既是知青的安全,也是将来队委会的安全。

明知知青要走,但是在内心里,农民真希望他们能长久地留下来。“给我们做干女儿吧!”许多大娘大妈看似玩笑实则试探地跟祝庆军说。“我们来接受再教育,还不就是你们的亲女儿!”祝庆军一边笑着说一边巧妙地把这个话题岔开了,她内心里有一个原则:决不在这里认干亲,她不愿意卷到一种说不清楚的关系里面去,尽管她知道农民决无恶意。

即使作不成干女儿,大娘大嫂们还是对她亲热得不行,给她买布做件大襟衣裳,给她纳底子做双鞋。大襟衣裳她实在不愿穿,但有时为了让她们高兴也穿一下;大娘们做的布鞋她却很爱穿,比城里买的舒服多了。作为回报,她每次回上海探亲,也给她们捎些东西回来,多是糖果、小食品、肥皂、洗衣粉之类。农民是实心实意待知青好,知青也实心实意帮队里办些事情,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处得相当好。

在外村插队的同学来看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吃,祝庆军就跑到

地里去摘嫩玉米，煮熟了招待他们。第二天祝庆军去找队长：“队长，我犯了个错误，我们摘队里的玉米吃了。”队长说，喜欢吃就多摘一些。晚上，他带来满满一篮子。祝庆军爱运动，村边有个池塘，很深，是个“锅底塘”，祝庆军夏天去那里边游泳，她游得很好，很开心，农民劝阻她，说那是个“鬼塘”，淹死过人，祝庆军不在乎，照样游。

后来，队里有了招工指标，哥哥先走了，去了滁县。第二次县里来招工，祝庆军又把机会让给一个女友，她说那个女友太老实，活动能力不强。祝庆军留在村里，成了知青标兵，入了党，当了干部：公社常委、县委委员。但她是不脱产的干部，她的关系仍然在大队，平时仍然在队里参加劳动。队长经常来找她商量工作，她也经常给队里出一些好主意。花生丰收了，年底，祝庆军分到了100斤花生。她去县里开会，县委书记问她：“小祝，你回上海带些什么呀？”“带花生！”“带多少花生？”“100斤！”书记笑了：“你算算看，要是每个知青都带100斤花生，我们县里的花生不是都让你们给带光了吗？”祝庆军也笑着说：“如果每个知青都像我一样帮着队里提高花生产量，你算算全县可以增产多少花生？”书记说：“你厉害！”

县委书记给了祝庆军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影响，祝庆军至今还牢牢记着书记当年告诫她的两条：一条是不要跟人，要跟组织，跟路线，另一条是女孩子不管到谁家里去，一定要两个人一道去。这么多年，她一直牢记不忘。1972年，祝庆军被推荐上了大学，安徽劳动大学的政治系，是由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合肥教育学院的政治系联合组成的，在宣城县附近的马谷山下。

祝庆军插队的那个地方原来是新四军的根据地，交通不方便，离集市又远，人的商品意识很淡薄，旁边几个富裕些的村子，知青受到的待遇反而不如她们好，“因为那些村子的农民，菜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掉，他们的脑子要灵活得多。可能是越穷的地方农民越朴实。”祝庆军这样解释说。

祝庆军们是幸运的，他们在那个贫穷的村子里得到那么多真

诚质朴的爱,大大冲淡了劳动的艰难和生活的苦涩,他们在村民们长辈般的荫庇佑护下,度过了一生中难忘的插队生活。尽管他们与村民之间是油和水的关系,但村民的善良和淳朴,还是深深地影响和教育了知青,在知青的内心深处打下了烙印。祝庆军的儿子这样评价他的妈妈:你最大的缺点是对人太好了,最大的优点也是对人太好了。祝庆军说:我这种品性是在插队的时候养成的。

黑土地上的“白毛女”

路荭爱美,二十岁左右的姑娘谁不爱美,谁不希望自己美?美是一种资本,一种炫耀,爱美是每个姑娘的天性,可是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偏偏不敢美,因为爱美是“资产阶级思想”,要做检讨受批判的。

可是爱美就像春天桃树上的花苞,压是压不住的,心灵手又巧的路荭,用十分隐蔽十分狡猾的手法,看似不经意却实则有心计地悄悄打扮着自己。

她今天在辫子上扎一根红头绳,就像年三十晚上的喜儿,明天她又在发卡上缠一圈红毛线。她想穿件花衣服却又不敢,就找块红布,剪成一朵小花,缝在衣服上一个显眼的地方。她说:衣服破了,补个补丁。谁也不好说什么。

路荭喜欢红色,在那个浑身上下灰黄蓝的年代,一点点红色的点缀是多么抢眼,离着老远,就能吸引来注视的目光。

路荭是团宣传队的主角,她嫌自己的眉毛太浅,每次演出化妆时,就用眉笔重重地多涂一会儿。戏演完了,她故意拖延着不洗脸不卸妆,或者是粗促地洗两把,让红脸蛋和黑眉毛的痕迹能多留几时。

第一次探家回上海,她突然发现自己的脸比上海姑娘的脸黑,她着急了:“妈妈,我的脸怎么这么黑呀?”

“你整天在外边跑,风吹太阳晒,自然就黑嘛!”

“那我怎么才能把脸变白了呀，就像大街上的那些上海姑娘？”她自己琢磨，配了一个方子：甘油加面粉，调成糊状涂在脸上。涂了一个星期，果然见效，她发现自己的脸比刚回来时白多了。妈妈说，那不是面粉的功效，那是因为你不在太阳底下跑了。

回到团里，路荭悄悄地把这个方子跟同伴们讲了，同伴们仿而效之，天天往脸上涂白面，结果路荭挨批评了。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上山下乡，路荭准能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舞蹈演员，她天资很高，有那份才气，有那份灵秀。上小学的时候她是少体校游泳班的小队员，蛙泳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标准。少年宫的老师看到她就叫起来：“你这么好的体型不学跳舞？你天生就是跳舞的材料！”她看中了路荭纤细的身材、柔软的腰肢和可爱的模样。小姑娘，谁不喜欢文艺，谁不喜欢跳舞，舞台比竞技场对她有更大的诱惑力。她离开了碧波荡漾的游泳池，走进了琴声优雅的练功房。

真让那个老师说中了，路荭天赋高，悟性强，身体条件又极好，她很快就在舞蹈队里脱颖而出。1965年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来招生，一眼就看中了她。路荭考取了，她喜滋滋地想象着自己穿上军装的模样，飞快地跑回家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妈妈。

可是，那时毛泽东已经在文艺界的整风报告上声色俱厉地做了那段著名的批示：“……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已经成立，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正悄悄地在上海某一座楼房里加紧炮制。就在路荭焦急地盼望去北京的日子里，她接到了入学延期的通知，从此她就失去了穿军装上军艺的机会，失去了做一名专业舞蹈演员的机会。

1968年9月5日，“百分之百可以留城”的路荭登车北上，到了北大荒的一个农场，作为鲁迅中学上山下乡的发起者之一，路荭的誓言是“壮志未酬不回家，三年之内不探家”。她每天晚上就着小油灯，在日记上狠狠地揭露自己，批判自己，什么“割大豆落在别人后边了”，“扬场时站在上风头了”等等，她拿着毛主席语录这把锋

利的手术刀,严肃而又严厉地剖析自己,毫不留情!

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了,北大荒的冬天是相当冷的,路荭从来没见过这么冷的天,没见过这么大的雪,她们的宿舍漏风,还漏雪,外面下大雪,屋子里下小雪,雪花落到被子上,落到脸上,凉丝丝的,路荭忽然想:我就要在这里过一辈子吗!我这一辈子都不能跳舞了吗!她害怕了,这是下乡以后她第一次感到害怕。

她估计错了。她在连队里只待了一年半,团里成立文艺宣传队,要排演革命样板戏,自然少不了像路荭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

他们那个宣传队里真是人才济济,有能唱的,有能吹能拉的,还有能跳的,比如路荭。宣传队排演的第一个戏是全场的《智取威虎山》,一炮打响,演遍全团,接着又排《红灯记》。大家越演心气儿越高,觉得老是演京剧不过瘾,正在这时芭蕾舞《白毛女》的电影上演了,嘿,咱们演《白毛女》吧!一群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青年,开始是半真半假地说笑话,说着说着就当真了。“路荭是学跳舞的,就让路荭演喜儿!”今天路荭讲起当年的事情还说:那个时候胆子真大,宣传队里没有一个人真正看过芭蕾舞。

于是成立了两个队,一个舞蹈队,一个乐队,乐队的队长是个拉大提琴的北京青年,叫王成永,他看着电影记乐谱,然后再分成总谱,他的主意特别多,大伙都戏谑地叫他是“阴谋家”。舞蹈队也是一遍一遍地看电影,看完了自己体会自己琢磨自己学着比划。从北京买了几双芭蕾舞鞋回来,穿上了练立足尖,练得脚趾出血,鞋都脱不下来,后来就改成踮着脚尖跳。路荭的悟性就是好,看了两遍电影就会跳了。

《白毛女》排出来了,《白毛女》上演了,这可是一件大事,先是在团里演,以后又去师里演,一个团一个团地演。当时整个黑龙江兵团只有两台《白毛女》,两台《白毛女》里头的喜儿都是上海青年。

路荭回忆说:夏天去连队演出,过一条河的时候,船翻了,大家都先去抢乐器。冬天去林场演出,半路上刮起了大烟炮,风雪漫天,找不到路,汽车开到沟里去了,沟里的雪有齐腰深,汽车陷进去就

出不来。荒郊野外，气温是零下30度，一会儿水箱里的水就上冻了，汽车灭火了。五六点钟天就黑了，有的女孩子想起过去听老职工说过，刮大烟炮经常死人，吓得哭起来了。带队的是团部的宣传股长，现役军人，他说咱们得走，在这里待着非冻死不可。一群年轻人上路了。好几个男队员坚持要抱着乐器走，说没有乐器就没有武器了，股长说别瞎扯了，这个时候最要紧的是保住人，人比乐器重要，毛主席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当时的情况真是很吓人，黑灯瞎火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大雪有没膝深，看不见路，谁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纯粹是瞎蒙瞎走。如果迷了路，找不到人家，在这荒郊野外非冻死不可，我们都想到了死，心情非常紧张，越是害怕，走得越急，连吓带累，全都出汗了，衣服都湿透了。走了一个多小时，看到灯光了，我们都叫了起来，高兴极了，这下有救了，那是一个连队的马棚，里边有一铺炕，我们男男女女20多人就挤在那铺炕上睡了一大觉，真是累坏了，也吓坏了。一直到今天路荭想起来，还觉得可怕。

路荭在黑土地上过了她的跳舞瘾，圆了她的跳舞梦。下乡之前和回城以后，她再也没有那么开心地跳过。

第九章 黑土地：辉煌的兵团史

开发建三江的有功之臣

1969年12月初，正在北京接收一批知识青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副师长王少伯突然接到一纸电文，要他“火速到兵团司令部报到”。

他是个军人，懂得“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立即找人买火车票，当晚启程，急匆匆赶回佳木斯，急匆匆走出火车站，急匆匆走进火车站对面的兵团司令部大楼。

这座建于六十年代初的三层建筑物，原来是东北农垦总局的办公大楼，1969年10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从哈尔滨迁移至此，从此就有了一大批身穿草绿军装的人出出入入。在二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一位将军面色严肃地向他宣读了一项命令：任命王少伯同志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师长。这不仅意味着升迁，更意味着一副重担，一副常人难以承担得起的重担。将军告诉他：六师的师长和别的师长都不一样，这是责任最重大的一个师长，这个人选是经过多次讨论才确定下来的，希望你不要辱使命。

走进这座大楼时他是心急火燎的，走出这座大楼时王少伯更

加心急火燎。他旋即走马上任,只带着司机、警卫员和一辆北京吉普。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六个师里,只有六师是在1850万亩沼泽荒原上开发组建的,其中平原沼泽占了93%!王少伯的任务就是开发这片沼泽荒原,把它变为良田,让这片死寂的荒原上充满欢声笑语。

建三江开发之初,真的是“野鸡飞到饭锅里”,等到客人进了屋再拿着枪出去打,保证不耽误开饭。天黑了不用瞄准也能打着狗子。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来拍《英雄儿女战荒原》的电视片时,还尝到了刚刚打到的熊掌。几年之后,这片荒原上就建起一个个连队、一幢幢砖房,有了鸡鸣犬吠,有了袅袅的炊烟,有了京津沪杭哈各种不同口音的说笑声。知识青年们给这块死寂的荒原带来了生气。

从1968年到1976年,这块土地上一共接纳吸收了44175名来自京津沪浙黑五省市的知识青年,他们是开发建设建三江最主要的一支力量,占到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没有大批知识青年的到来和参与,建三江这块肥沃而又难啃的黑土地,决不会开发得那么快那么好,决不会有今天美丽富饶的景象。八年间,建三江的耕地面积增长了250万亩,平均每个职工每年生产粮豆2444公斤,上交国家商品粮856公斤。这八年间有六年盈利两年亏损,盈亏相抵净盈利168.2万元。

进荒原,先要修筑从二龙山公社到抚远县235公里长的国防干线公路,七千人的筑路大军中90%是知青。开荒大军的主体也是知青,他们开着火红的东方红拖拉机,在辽阔的荒原上撒欢儿奔跑,一台车一个班次开荒上百亩,最高的一个大班次开荒140亩。浓江河畔有一块洼地,过去开荒的人们两进两出都没立住脚,27团以知青为主的开荒营,在那块洼地上一下子建起了12个连队。在年轻的六师,机务战线上的车长、驾驶员、修理工中有80%以上是知青,基建战线的各技术工种中60%以上是知青,而文教、卫生、财会系统和连队的“八大员”,则几乎全部由知青担任。

据《中国知青事典》中的数字,从1967年到1976年,十年间全国的生产建设兵团共接收知识青年120万人,仅占同期整个上山下乡人数的8.56%。但是这8.56%的声音和影响,作用和能量,无论是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之中,还是在知识青年返城之后,都远远超过了占上山下乡人数80%以上的插队知青。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生产建设兵团是准军事化建制,兵团知青过的是集体生活,他们总是以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群体形态来出现,来发言。一个连队有上百名知青,一个团有几千名知青,一个师一个兵团的知青就达到几万人几十万人,这样多的喉咙发出来的声音是威武雄壮强大有力的。插队知青就不同了,一个知青点,至多也不过一二十个人,一般的只有十个八个人,1100万插队知青这个庞大的数字,被分割成一个个极小的单位,像撒芝麻盐一样零零星星地点缀在广阔的农村天地里,淹没在八亿农民之中。插队知青是以个体的形态出现的。1975年全国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加在一起,总人口不到一千万,职工人数不到五百万,知识青年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约占职工总数的一半,而全国的插队知青仅占全国农村人口的八十分之一,约占农村劳动力的十几分之一。

兵团知青和插队知青的地位和作用也不一样。在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里,知识青年是主力、主体,不光会计、出纳、文书、统计、卫生员、保管员这些职务绝大部分由知识青年担任,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连队的连长指导员也是知识青年,在团部师部甚至兵团司令部机关里,都有知识青年占据重要的岗位,担任显赫的职务,级别最高的担任了兵团党委常委,因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他们得到信任,参与决策。而农村的主力、主体永远是农民,任何一个生产队发出的声音永远是农民的声音,势单力孤的知识青年很难以一支独立的力量来出现,来发言,即便放开喉咙大声呼喊,他们的声音也要被农民雄厚粗壮的声音所淹没,很难引起社会的注意。鉴于这一对比,有人把兵团的知青比喻为“成建制的正规部队”,而把插队知青比喻为“游击队”或是“散兵游勇”。

打仗为主,还是打粮为主?

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所独有的兼具军事与农垦双重性质的农垦组织,这种组织形式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达到了极致和高峰,又随着这个高潮的低落消失而衰退萎缩。今天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成立于1954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但是“兵团”这个词语仍然经常可以听到,主要是在四十至五十岁这个年龄段里。“我是内蒙古兵团的”,“我是云南兵团的”,“我是黑龙江兵团的”,“我是某师某团的”,“我跟某某某是一个连的”……在1990年底北京举办的《北大荒回顾展》、1991年春天成都举办的《青春无悔大型图片回顾展》和广州举办的《海南、广东兵团知青回顾展》上,在这些年来频频举行的各种知青联谊活动中,都有一些胡子拉碴的中年男子、一些想用防皱霜来努力消除面部皱纹的中年妇女,这样确认着自己当年的身份和所属团体,来寻找着今天他或她所应该属于的那个聚会群。他们就像战争年代“找到了组织”那样欣喜兴奋,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二十几年前的往事一下子就想起来,他们在这种无休止的回忆中变得年轻了,回忆比防皱霜有更好的疗效,它能医治心理上的衰老。“我是兵团的”,说这话的人大多至今还有一种自豪感。

当年能去兵团的人,确实都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甚至是优越感,下乡青年的首选目标就是兵团。第一,兵团是“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兵团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军区某某生产建设兵团”,解放军的声望在“文革”中达到了顶点,“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中学生奔着上兵团是为了“参军”,为了能穿上草绿色的衣裳,所以“铁了心要去当兵”。走的时候,真还发了一套黄色或是草绿色的衣裳。第二,兵团挣工资,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黑龙江是32元,云南是28元,内蒙古兵团则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的供给标准是29元,这跟那些挣工分、分口

粮，年底分不到几块钱的插队知青没法比。这对那些家境困难甚至过早担负起养家义务的青年，有更大的诱惑力。当然各省的情况不同，小兵团就要差一些，如浙江兵团开始每月只有12元工资，扣去10元钱的伙食费，发到每人手里的只有两元，直到浙江兵团撤消的1975年，才涨到了每人24元。第三，去兵团的人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只有那些家庭历史清白本人表现又好的才有资格，这样就使得去兵团成了一件荣耀的事，令人羡慕的事，一些不够条件的青年甚至为此写下血书。

从1968年开始到1970年10月为止，全国一共组建了黑龙江、内蒙古、兰州、云南、广州、安徽、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湖北共11个生产建设兵团，分别隶属于沈阳、北京、兰州、昆明、广州、南京、福州七大军区。其中最大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在原东北农垦总局和黑龙江省农垦厅所属的93个农(牧)场的基础上组建的。此外，1969年组建了江西农业建设师，1970年组建了西藏生产建设兵团和广西生产师。

湖北生产建设兵团组建的最晚，寿命也最短，1971年组建，第二年便经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批准撤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寿命最长，1968年组建，1976年宣布撤消，存在了九个年头。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广州兵团接收知青都在10万人以上，被称为四大兵团，赫赫有名。黑龙江兵团1970年底共有职工57万人，其中知青35万，占61%；内蒙古兵团1971年有职工10.1万人，其中知青7.55万，占75%；云南兵团1972年底有职工18.7万人，其中知青9万多，占一半。1971年广州兵团43万职工中，知青有11万，占25%。另据总参谋部1972年的统计，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共有职工292万人，其中知青近110万人，约占38%，三分之一强。

为什么要组建兵团？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处副处长王殿林认为，组建兵团当时是大势所趋，这个“势”是指国际形势，是国际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需要。原兵团宣传处韩处长则十分肯定地说，组建兵团就是为了准备打仗。1970年10月全国生产建设兵团

团会议领导小组打给中央的报告中就说：“全国 12 个生产建设兵团，除新疆外，都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号令下，以国营农场和农建师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讲到组建兵团这一决策的做出，就不能不回溯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1964 年 10 月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加快了反华步伐，在中苏边界增加军队部署，并且获得了在蒙古驻军的权利，在常设基地上部署的苏军部队有好几个师。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披露：“苏联把边界地区部队的数量从兵员不足的 15 个师增至 40 个师，后来更超过 50 个师，还让部队进入了更高级别的战备状态。苏联还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补足了边界地区各师的兵员，经常在水陆边界线上巡逻……”这样一种态势，不能不引起中国决策者的高度警觉，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一个接着一个地组建起来，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西、南的边境线上。除了与朝鲜接壤的吉林、辽宁两省以外，其他凡是与周边国家有陆地接壤的省和自治区，全都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或是独立农建师，而与苏联、蒙古接壤省区的生产建设兵团，都是力量相当强的。意味深长的是，新组建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地处抚远县境内，隔江相对就是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但是从 1969 年 3 月珍宝岛事件之后，由于诸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苏边界的局势并没有进一步恶化，战争的危險并没有进一步增长。而兵团首先是一个生产单位，决非单纯的军事组织，主要任务不是“戍边”而是“屯垦”，不是打仗而是打粮。兵团的领导者们是在吃了许多苦头之后才明白这一点的。内蒙古兵团说：“组建三年，花了三亿学费，现在才知道兵团是搞农业生产的。”

让我们看看在兵团组建之初，兵团的领导者们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1970 年 8 月 25 日至 10 月 5 日，全国 12 个生产建设兵团和西藏农建师的师以上干部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这是各路兵团劲旅的一次大会师，他们借此机会举行了全国

生产建设兵团会议，讨论了“兵团的革命和建设问题”。会议领导小组在会议结束的时候给中央打了报告，强调要“走政治建军的道路”，“要进一步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和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连队运动，加强连队建设”，“把兵团建设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讲到兵团的性质和任务时，报告说：“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的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平时以生产为主，劳武结合，亦兵亦农亦工；战时一面作战，一面坚持生产。”从这份报告中我们感觉到的是：兵团姓“兵”，要按当时解放军大搞“政治建军”的那一套办法，来加强兵团建设。

于是，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在兵团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而且成为兵团建设的主要内容。

无处不在的大批判

1971年“9.13”事件之前，兵团与解放军部队一样，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形式是开展四好连队运动。

四好连队的第一条是政治思想好，政治思想好就要开展革命大批判。大批判包括两个方面：既批判刘少奇，也批判自己，批头脑里的私心一闪念，这就叫斗私批修。下面是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斗私批修的几个小故事。

五连的知青去七连拉砂子，路上有很深的车辙，坑坑洼洼的不好走，有人想打退堂鼓，思想不统一，矛盾出来了。怎么办？班长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就在半路上办起了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语录。学完了，闹别扭的双方各自作自我批评，批完了，大家继续上路，圆满完成任务。

上海知青兄弟两人下乡到兵团，哥哥当农工，弟弟去养蜂。蜂子欺生蜇人，几天之后弟弟的胳膊被蜇肿了，肿得像藕节，还发高烧，烧到40度。哥哥看了心疼，去找指导员，要求给弟弟调换个工

作,弟弟知道了这件事,反而埋怨哥哥说:你这不是爱我,简直是害我,咱们下乡不是来享受,是来吃苦的。于是哥俩坐在一起学习老三篇,批判刘少奇的“活命哲学”。

一班和二班争当先进,有一天半夜紧急集合,执勤的战士是一班的,他先把一班的战士吹起来,再去吹二班,结果一班得了第一。一班长知道了这件事,马上组织全班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深挖锦标主义的危害。全班战士统一了认识,把“第一”的荣誉送给了二班,连长又把“开展革命大批判标兵”的荣誉奖给了一班。

那个时候经常开展路线分析,叫“一事一议一分线”,“遇事办不办,先把路线看,红线就执行,黑线就批判”。人的眼睛真是锐利明亮,不管你多小的事情,都能给你上升到原则的高度。在地里干活干累了,田间休息时大家坐在一起也要没事找事地来他一次“革命大批判”,靶子么到处都有,随手就能抓来一串,比如有人干活慢是怕苦怕累,有人割地不干净是“单纯军事观点”。

白天干了一天,批了一天,晚上还要集中学,集中批。那时突出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政治学习,“天天读”是“雷打不动”的,学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用毛主席著作批判自己头脑里的“私”。斗私批修先得要亮私,有时谁亮私越勇敢越彻底,亮出来的私越丑陋越可耻,谁就可能成为斗私批修的榜样和标兵,这叫“亮私不怕丑”;接着就要把亮出来的私心上纲上线,痛加批驳,这叫“斗私不怕疼”。

一个知青赶马车,他常常想:如果马毛了就好了,马毛了我一定要学习英雄刘英俊,勇拦惊马,干出点惊天动地的举动来。一次马真的毛了,知青勇敢地跳上马车猛勒缰绳,可是辕马野性发作,狂奔不已,车上的知青怎么也勒不住惊马。大车跑得飞快,颠簸得厉害,知青心里慌了,地下的车老板也急了,在后面高声大喊:“危险,快下来!”知青一松手,从车上摔了下来。晚上在斗私批修会上,他狠狠地批判了自己,说那一摔“把灵魂深处难以见人的‘活命哲

学’摔出来了”。

知青抽烟，打火机没油了，想到油库去灌一点，走到油库门口，想到汽油是战备物资，紧接着就联想起“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斗私批修会上他狠狠批判自己说：如果每个人都去灌汽油，万一有紧急情况，汽车没油了怎么办！

麦收的时候下雨，康拜因下不去地，知青整天挥舞小镰刀，进度慢浪费大又累人，大家都盼望着天晴了机械能早点下地。这也成了大批判的靶子，既批判怕苦怕累的“活命哲学”，又批把希望寄托在收割机上的“唯武器论”，一箭双雕。

亮私亮出来的积极分子

有些人，就是靠了“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疼”，当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黄虹下乡刚干了一个多月，就开始了她的讲用生涯。冬天兵团要积肥，领导分配她们几个女生去刨厕所，这个活不累，因为粪便屎尿都冻成了坨坨。干了一天，晚上照例是斗私批修。黄虹开始讲白天刨厕所的时候如何斗私批修：“粪渣溅到我的身上，溅到我的脸上，我感到挺恶心，我真想扔下镢不干了，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粪是臭的，可我的思想比大粪还臭，我感到自己的脸上火辣辣的……”黄虹口才好，讲起话来有声有色，很生动。正好指导员参加她们班的斗私批修会，指导员说：这个讲用讲得好，应该到全连大会上去讲。过了两天全连开斗私批修讲用会，黄虹在大会上讲用，成了连里的典型。

不久，黄虹当上了连队的卫生员。那几年报纸上起劲地宣传用针灸治好聋哑病人的事例，针灸疗法一时走红。黄虹也买了一套针，买了一本书和一张人体穴位图，时不时地在自己身上扎两针找针感，学着治牙疼治胃疼治鼻炎。后来连队再开讲用会，她又有了新的讲用内容：一根银针炼红心，讲她为了学会针灸，如何忍着疼

痛冒着风险在自己的身上找穴位。正好农场宣传科的一个人下来找典型,就选中了黄虹,指导员也表扬她说“老典型又有了新发展”。

这样黄虹就出席了分场的讲用会,又出席了总场的讲用会。她越讲越熟练,加入了技巧,有了表情有了升降调,最后达到了脱稿讲用的程度,听得全场鸦雀无声,听得全场掌声雷动。黄虹出名了,她参加了农场组织的巡回讲用团,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讲,走到她自己那个队,她说啥也不讲了,她说她那点事迹连里早都听腻歪了。

后来她又作为农场的典型参加了地区的讲用会,参加了地区的巡回报告团,到各个县各个团去讲用,足足走了两个月。

黄虹她们连的知青有时在一起嘀咕:她不就是一个刨粪一个银针吗,她在连里一共呆了不到三个月,有多少事迹好讲的?也有人说,反正她在外边讲,外边的人不知道她在连里都干了些啥,咱们也不知道她在外边都讲了些啥,管她呢!

两个月后黄虹讲用完回来了,她被调到团部卫生队去了。连里的知青都说黄虹的运气好。

有家难回

丽莎打从1968年10月一下乡,就盼着过春节,农场接收知识青年的同志在介绍情况的时候说,一年一次探亲假,往返路费都是农场报销,当时丽莎就计划好了:春节就请假探家,她是这么打算的,家里也是这么安排的。

过完了元旦,她就开始做准备,一边托人买蘑菇买木耳,一边在心里琢磨着找个什么样的时机,找个什么样的理由,怎么样启齿去向连长请假。晚上躺在被窝里,她想的全是回家的事儿,她们宿舍里的十几个女生议论的也全都是请探亲假的事儿,这时她才发觉:原来都想着回家过春节呀。她感到事情不妙,因为不可能批准

那么多人同时回家，她想好了，得先下手，明天就去请假！

第二天还是场院上的活儿，扬场，入囤。午休的时候，丽莎匆匆吃完饭就走进连部。连长正在卷烟呢，丽莎刚说了两句，他就硬邦邦地把话截住了，随手拿过一张《兵团战士报》来：“给你看看吧，这是刚来的，知识青年给你们发倡议了，过年不回家，过革命化的春节，团里刚才也来了电话通知，过年一个也不准假。你拿报纸回去好好学学吧，就你们女生事儿多，好几个人都找过我了！”

《兵团战士报》上登着独立三团青年向全体兵团知青发出的倡议：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倡议书里号召全体知识青年“春节不返城，不下斗批改战场，坚守战斗岗位，就地闹革命”。

从2月6日开始，每期《兵团战士报》上都有对倡议书的响应，知识青年表态“过年不回家”，知青家长也表态“支持儿女安心边疆建设”。三师的北京知青王玉锋接到父亲寄来的一个邮包，用木盒子装着，大家都以为里边装的是年货，好吃的，有人猜是酱肉，有人猜是糖果，等小木盒子打开，里面是几个饭团子，用玉米面、豆腐渣和树叶做的。父亲在信上说，这是特意给他做的忆苦饭，让他别忘了本，坚守岗位，好好工作。连队加强了这方面的教育，天天组织学习报纸上的文章，让每个人都表态，丽莎也表了态，她知道不表态是通不过的，她对回家的事情彻底失望了。

刚下乡的知青都盼着能回家过第一个春节，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反差，强烈地引发了他们对亲人和家的思念，女孩子尤甚，她们想躲回到那座熟悉的、已经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里边去，哪怕是短期的暂时的也好，她们实在害怕眼前这个陌生的新环境。

为了稳定军心，每到春节之前，兵团的报纸上总要大造“坚守岗位过春节”的舆论，这种舆论不是以上级机关发布强制性命令的形式出现，而是以知识青年自己发倡议书的方式刊出，这样说服力就更强，连队干部做工作也就更好做。“知青发出的倡议，你们能不响应？”

1970年1月13日的《兵团战士报》上,除了一封二师17团“坚守战斗岗位,春节不回家”的倡议书,还刊登了两封信,一封是母亲写给小虹的,教育女儿要像李铁梅那样,“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另一封是知识青年杨淑珍写给团组织的,坚决表示“先保国后探家”。这两封信都未写明单位,令人对它们的真实性生疑。

1971年的春节来得早,所以舆论工作也抓得早。还在上一年的12月15日,《兵团战士报》上就登出了14团16连和23连全体知青的倡议书,倡议书不仅提出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而且提出“过一个革命化战斗化的冬天”!这项宣传并未就此而止。上海知青李援朝,下乡8个月想家想得厉害,又请不下假来,就给哥哥写信,让他弄一份假证明寄来。1月23日的《兵团战士报》上,刊出父亲给他的一封电报,电文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守边疆,不许擅自离开战斗岗位”。这电文更像是一句政治口号,究竟是实有其事,还是杜撰而出,已不得而知,但当时知识青年为了请假回家,让家里寄来假证明的事情确实不少,这些证明的内容大多是父母亲病重之类,所以这封电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兵团里的现役军人

兵团曾经辉煌过,在兵团中真正辉煌过的是现役军人和知识青年。

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员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现役军人、知识青年、复员转业军人、内地支边青年。前两部分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才蜂拥而至的“后来者”,后两部分则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开垦荒原的“创业者”。现役军人数量最少,却担任了自兵团、师、团一直到营的几乎所有正职领导,内蒙古兵团的连队主要领导也全都由现役军人担任,真正是“大权在握”。知识青年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在一些新建团新建连占了绝对多数,他们充满了热情、朝气和活力,给兵团带来了“城市季风”,那是一股浸润着丰

厚的文化知识、思想素养、生活习惯甚至衣着打扮在内的城市文明之风。

正是由于现役军人的到来，兵团才有了半军事化组织的性质，也正由于兵团是一个半军事化的组织，才来了那么多的现役军人。黑龙江兵团的现役军人有 4400 人，而内蒙古兵团的现役军人则达到近 6000 人，他们随着兵团的组建而来，又随着兵团的撤消而去，功过是非留给农场的人去评说，至今众说不一。

在许多描写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中，现役军人大多被描写成不懂农业生产瞎指挥，用军阀作风管理知识青年，捆绑吊打，奸污女知青，而在调离兵团时又狠狠地大捞一把，几乎一无是处，一片漆黑。但事实并非如此，各个兵团的情况不一样，但不论在哪个兵团，绝大多数现役军人都是好的。一些知青与现役军人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是现役军人给了他们机遇，他们至今难以忘怀。

1969 年 4 月的一天，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干事林甸被领导找去谈话，领导正式通知他，抽调他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

当时刚刚 30 岁出头的林甸，在政治部有“才子”之称，这个才子年轻气盛，甚至有些恃才自傲，“文革”中给领导贴过大字报。在讨论去兵团人员的名单时，好几个人出来替他说话，包括组织处长、干部处长、秘书处长等关键人物，但林甸还是被列入了名单。上午找他谈话，下午他就收拾东西，第二天就启程出发，林甸说走就走，啥话也没说，自然，他心里不会痛快。

1995 年 9 月 19 日，我在哈尔滨一所大专院校的院长办公室里见到他，此时他戎装已去，老百姓打扮。他说，当时兵团组建需要大批现役军人，派哪些人去？“文革”中部队也有所谓的路线斗争，在沈阳军区机关，炮轰某某的就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批人里有相当一部分去了兵团。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现役军人，有从沈阳军区机关来的，也有从各野战军抽调来的，大多数是六八年和六九年来

的,整个兵团大约一共来了 4400 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很有才干,素质相当不错。当然,现役军人干部里边也有出了问题受到处理的,在我印象中大概一共处理了 30 来个,枪毙的有两个,16 团的团长和参谋长,团级干部受处分的有六七个。这些人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责任不能完全由他们来负,所以“文革”后大部分人的问题又重新处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只占整个现役军人的一小部分,代表不了大多数。

林甸至今非常怀念兵团那段生活,怀念兵团的那些知识青年。他说,我六九年到兵团,一直到兵团解散,七八年的时间,刚来的时候只有 30 多岁,那时知青只有 20 岁左右,兵团机关大楼里,充满了生气和朝气,我觉得每天的生活都非常愉快,非常有意思,非常充实。我这个人性子直,有啥说啥,跟有些知青的友谊是打出来的。1970 年,22 团的 23 名工人,用了 7 个月时间,造了一条载重量 150 吨的自动驳船,这在 22 团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开着大船到兵团来报捷。22 团组织股的青年干事是个北京知青,她打前站,兴高采烈地到兵团机关找到我,要先商量一个报捷的仪式。我向来反对报捷庆功这类的形式主义,就给她泼冷水说,你们的大船万一在半道上出了故障怎么办,说严重点万一沉了怎么办,还报什么捷?她一听特别不高兴,我们俩闹了一场小矛盾,当时搞得很僵。这一打倒打出了交情,以后我们成为很好的同志。那个时候人都很单纯,人际关系也都比较简单,所以很好相处。那个年代是解放军威信最高的年代,知青对现役军人非常崇拜,把他们当成学习的榜样;现役军人也很爱才,提拔了大批有才干的知青,所以在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同现役军人的关系和感情是不一般的。我一直很怀念那些同志,很怀念那段生活,兵团撤消的时候,我们都感到非常可惜,应该说,当时现役军人经过五年的锻炼,已经走向成熟,也取得了管理农业生产的经验,在走向成熟的时候撤消了,非常可惜。

林甸曾经帮助过许多知青,在工作调动上,在提拔使用上,甚

至在返城上大学问题上，他很理解这些知青，办事通情达理，有些跟他并不很熟悉的知青有困难找到他，他总是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好事做完，他就忘掉了，什么礼也不收，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听见，因为有些知青从自己所在的团直接回城了或是上学了。多年之后知青找到他向他表示感谢，他都不记得自己做过的事情了。

1969年12月至1976年2月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师长的王少伯，离开兵团以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终生难忘第二故乡》，这位不善词章的军人，用实实在在的语言，倾吐了他对建三江的深切思念之情：

“我怀念第一故乡，因为她给予我生命的机会，她培育我13个春秋，她使我流连忘返，然而第二故乡更使我难忘。第二故乡——建三江，她虽然没有家乡般秀美，但却有她独特的风采。在建三江创业八年，从头至尾每件事都记忆很深，因为在这里有一段艰苦的创业史。建三江的全体同志经过八年如同大庆人一样艰苦创业，也是头顶蓝天，脚踏荒原，把亘古荒原、原始沼泽地开拓成为全国的商品粮基地，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这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小包的两块“敲门砖”

——知青与现役军人的关系之一

与插队知青不同，兵团的知青主要面临的人际关系是与“兵”的关系，一种是现在的兵——现役军人，一种是过去的兵——复转军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现役军人和知识青年的关系，大概是各路建设兵团中最好的了。现役军人大都爱才重才，真正有才华的知青常常能够得到提拔和重用，担任连队的连长或指导员，还有相当一批人被调到机关，团部、师部、兵团司令部，各级机关里都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年人，机关是人才荟萃的地方，是令人向往的地方，机关里的青年是令人羡慕的，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环

境,可以看到更多的文件,听到更多的信息,有更多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机会,他们可以接触到一些水平比较高素质比较好真正堪称“师长”的人,所以他们提高得更快一些。

人们都说小包有两块“敲门砖”,凭了第一块“敲门砖”,她进了团报道组,凭了第二块“敲门砖”,她进了兵团报道组。但小包自己说:“不是我的敲门砖头有多硬,是我遇到了两个非常有水平的现役军人,这两个人对我有知遇之恩。”

1969年春天,她刚下乡不久,连队里就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她那个排里有一个老职工,姓刘,是个贫农,因为在“文革”中跟队长打过派仗,就被打成了阶级敌人。小包很有些愤愤不平:老刘每天老老实实地干活,为什么把他打成阶级敌人?她初出茅庐,不知深浅,提笔就写了一份材料,说老刘虽然有缺点,但决不是阶级敌人,把他打成阶级敌人是错误的,这件事提醒我们,清理阶级队伍要防止扩大化。

材料刚刚写好,正赶上团里政治处的李主任下来检查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小包就把写好的材料交给了他。李主任看了材料,又在连队开了一个座谈会,回到团里不久,就把那份材料以简报的形式下发了。老刘平反了,队长撤职了。不久小包就接到通知,抽她到团宣传股去写材料。伙伴们都向她祝贺,她自己也感到突然,欣喜之中又有些惴惴不安。

她惴惴不安地敲响了李主任办公室的门,惴惴不安地坐在李主任的对面说:我家里有些情况您可能还不太了解,我父亲现在还在受审查。李主任笑了:你的档案我都看了,那不算什么大问题,你不要想其他事情,好好工作吧!

小包是重点学校的高材生,文字基础好,爱思考问题,脑子很灵,所以李主任很欣赏她,很多材料都交给她去写,写典型材料,写总结报告,写新闻报道,常常是他先讲一个思路,小包再提出自己的想法,经过一番争论,形成最后的提纲。小包拘谨的心情渐渐放松,她思想活跃,爱争论问题,李主任喜欢有独立见解的年轻人。

既出于政工干部的敏感，也凭借了多年做政治工作的经验，李主任一直在琢磨这样一个问题：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究竟该怎样搞法？这是兵团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他带着小包到了20连搞调查，在那里住了近半个月。20连是个北京知青集中的连队，团支部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有许多生动的例子，李主任把它们加以总结升华，由小包执笔，写成一份典型材料，20连的代表拿着这份典型材料，一级一级地讲上去，先是出席了团里的讲用会，又出席了师里的讲用会，最后出席了兵团的讲用会，成了全兵团的典型，而这份材料，也就成了小包的第二块“敲门砖”。

兵团讲用会期间，兵团宣传处的张处长把她找去，简单地问了一下她的情况，过了不久，小包就调到了兵团报道组。

张处长是山东人，三十五六岁，小包对他的印象相当深。张处长是个很严肃的人，对人要求很严格，他越是喜欢的部下要求就越是严格，轻易不表扬人，但是谈起问题却相当有水平。小包一篇稿子写好了，自己很得意，拿给处长去看。处长看了，只讲三五句话，你再把稿子拿回来看吧，你会感到他的见解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你再也得意不起来了，赶紧大删大改吧！

张处长要求小包：每天要考虑十个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是当前兵团政治工作和生产建设中带有普遍性的大问题，每个问题要有论点有论据，论据要有条理有层次，不一定要写出来，但思路一定要清晰。这是一种思维的锻炼，这种锻炼使小包获益终生，她为此至今深深感谢那位轻易不露笑脸的张处长。

高惠珠常常深情地回忆起她们那个师宣传科。她说：“我们宣传科里真是人才济济，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编辑，有在《前进报》干了15年的老军人，有金陵大学的毕业生，有解放前重庆大学的地下党员、学生会主席。我的这些老师都相当有水平，能跟他们在一起工作真是幸运。那时我们常常在一起研究路子，写典型材料，虽然其中有很多‘左’的东西，但是锻炼了我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

能力、逻辑思维的能力、抽象概括的能力,这是我在兵团那几年最大的收获,对于后来我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都很有用。我们科里学习气氛很浓,我学了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和形式逻辑等,受用无穷。还有老同志们身上那种敬业精神、严以律己的作风、坦诚相见的同志关系、过组织生活时候那种严肃认真的气氛,都是我回到城市以后再也没有经历过的,这里对我人格的塑造起了很大作用。我的能力和水平,很大程度上都是那段时间锻炼出来的,是老同志们传帮带出来的,在他们真挚的爱护和严格的要求之下,我觉得我那段日子一点都没有荒废,过得充实、快活。”

她常常回想起那些日子,回想起那些朝夕相处的老同志,一想起他们,她的内心里就涌动起一股激情。他们对她不仅是传帮带,还有体贴和慈爱。高惠珠说,她在北大荒过了七个春节,结婚之前从未回上海过过年,但每个春节都过得非常快活。“从年三十到正月初五,一家一家地吃个遍,什么东西也不拿,两手空空地去了,被当成上宾,大吃一顿,吃完了饭再吃一大把瓜子,拍拍屁股就走了,上俱乐部看电影去。有一年的二三月份,我大病了一次,我们科长的爱人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去住,说宿舍里边太冷,一天三顿饭都是她做给我吃,上厕所都不让我出去,怕我受风。就是在家里我妈妈照顾我,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我常常想,我是在这些现役军人和老转业官兵的关怀爱护下成长起来的,我是幸运的。以后回到城市,虽然物质生活好得多了,但是再也没有那么好的气氛,那么好的人际关系,那么多诚心实意帮助我的人。我一辈子都要感谢北大荒!”

“三个志愿你都给我报复旦!”

——知青与现役军人的关系之二

邱柏一个人坐在宣传股的办公室里读马克思的《论费尔巴哈》。他是团党委的理论学习秘书,下个星期要给他们辅导这篇艰

深的经典之作。除了远处发动机突突突的声响，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气氛很安静，但邱柏就是静不下心来，他在等消息，等待一个决定他命运的消息。

就在此刻，在走廊另一端的会议室里，正在召开团党委会，这个会议将要最后决定一个名单，决定一个推荐上大学的知青名单，在被讨论的名单上，就有邱柏的名字。

这已经是邱柏第三次被列入讨论名单了，前两次，他还没有被调到团宣传股，还在工程三连当排长，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两次推荐的情况。

推荐上大学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推荐的程序就跟选先进一样，每个班有一个提名权，最后根据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全连的推荐人选。邱柏在连队里威信很高，但这种机会谁肯放过，谁能不争？

邱柏悬着一颗心，听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宣布“选举结果”。连续两年指导员都念到他的名字，连续两年他都是全票当选，但是连续两年他都没有走成。事后指导员找他谈话，肯定他工作出色能吃苦，对自己对战士要求都很严格，“上不上大学，并不能证明一个人的表现，有些人不能上学，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工作需要或是家庭方面的原因。”指导员闪烁其词，向他暗示着什么。

邱柏是个聪明人，他一听就明白了，父亲在解放前当过小职员，肯定是这个“小职员”在作祟。后来，父亲的问题有了结论，作为一般问题处理，“历史清楚”，这样，邱柏解决了入党问题，调入了团部机关工作，在今年的大学推荐中，他又在政治处获得了满票。

这已经是1976年的春天，邱柏已经27岁，已经大大超过了招生标准中“年龄在20岁左右”这一条，机会对于他来说格外珍贵，政治处里好心的老同志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极力举荐他的。邱柏知道，今年团里有一个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名额，那正是他所渴求的，时不我待，良机难得，他打定了主意要走。如果说前两年他是听其自然坐等别人来安排自己的命运，那么这一次他要奋力一争，自己来争取自己的命运了。他开始行动，找了几个团领导，几个决策

人,讲明他的情况,申诉他的理由,他已经得到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同情。

眼下,决定他命运的会议正在举行,吉凶难卜,他心绪不宁,焦急地等待着,留心地倾听着,走廊里任何一点微小的动静,都能牵动他那根崩紧的神经。

这次会开得可真长,一直到夜里 11 点钟,走廊里才有了嘈杂的脚步声,邱柏知道:散会了。他一下站起来,急匆匆地走出办公室,走到院子里,他看到刚刚开完会的人一个一个地走出来,嘴唇紧闭,神色严肃,副团长、副政委、政委、干部股长……他不敢上前去问,这个已经决定了的名单,在这个时候还是保密的,谁也不会告诉他。他只想从他们的表情中得到一点暗示。一位跟邱柏关系很好的副团长走过来了,他看到了邱柏,他们两个人的眼神对视了一会儿,邱柏满怀希望地注视着那双眼睛,但是那双平日里喜怒都行诸其中的眼睛,今天却是出奇的冷静,眼神里有一种意味深长的东西,邱柏忽然感到一种不祥之兆。

最后一个走出来的,是文教科长,他负责招生工作的具体事务。那是一位 1958 年来场的转业军人,处事公平,待人真诚,他低着头,走得很慢。邱柏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这是他获取信息的最后一丝希望了,老科长猛地抬起头来,一下子看到了月光下的邱柏。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冲着邱柏轻轻地摇了摇头。

邱柏后来回忆起那一刻的感觉:“就像有一盆凉水浇下来,劈头盖脑,我一下子从头到脚都凉透了,傻呆呆地站在那儿,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知道了。”

邱柏知道他是被谁否决的,尽管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那次会议的情况。从此他就起了变化,整整一个夏天,没有好好上过一天班。他每天到一个水塘里去跳水、游泳,他还有一个泳伴赵爱国,也是那次上大学的落马者,索性剃了个光头。

邱柏着凉了,感冒了,他去团部卫生队看病。他走进诊室,里面正坐着一个现役军人——古副团长,就是那个否决了邱柏的人。邱

柏看见是他，扭头就往外走。背后响起古副团长严厉的声音：“小邱，一会儿到我办公室去一下！”话很硬，冷冰冰的。

去就去，我又不怕你。看完病，拿好药，邱柏去找古副团长。他重重地敲了一下门，不等里面有反应就推门走了进去。古副团长正在看一份文件，他也不让座，劈头一句话就是：“你知不知道讨论你上大学的时候是谁不同意你去？”“知道！”“谁？”“是你！”邱柏火气很足，话说得很冲。

副团长没有说话，场面冷了几分钟。突然他猛地一拍桌子：“好你个邱柏，敢把话讲在当面，有种！你走吧！”

邱柏倒愣了：他找我究竟要干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吗？但是走出古副团长的办公室时，他的心里舒坦多了，他觉得他的怒气发泄出来了，冲着他要发泄的对象发泄出来了。第二天邱柏就开始认真地上班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年冬天，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一次不是由几个人开会讨论来决定申请上学者的命运，而是凭实力，凭分数，凭真本事。邱柏又面临着一次机会，这恐怕真的是他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初试，他考得很出色，全农场第一，初试成绩公布之后，就开始填写志愿。邱柏此时颇费踌躇。

文件上规定的招生对象条件是：“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而那一年邱柏已经28周岁。虽然招生的学校中仍然有复旦，但他已经不敢奢望，他自忖已经没有了去竞争家乡那所文科最高学府的实力，起码在年龄这一项上他就没有了竞争力。他在志愿表上只填写了黑龙江的文科：黑大、哈师院……他觉得这样更把握更稳妥些。

第二天，古副团长找他。邱柏进了办公室，古副团长正在看一张表，他仍然没有客套，没有让座，开门见山：“邱柏，你想不想回上海？”“想！”“我看你不想。”“你怎么知道？”“你这升学志愿表上一个

上海的学校都没有，你怎么回上海？”

邱柏这才看清，古副团长手里拿着的正是他的升学志愿表。“我没有那个能力。”这时他的语气软了下来。

“你不是没能力，你是没出息！”古副团长冲着他大吼。

邱柏一下子被噎住了，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心先是猛地一震，继而热乎乎地发烫，古副团长的话说得难听，但他听出了话语后面的一片好心。

“你这张志愿表作废了！”古副团长嚓嚓两下把它撕碎。“你坐下，重填一张，现在就填！”那口气不容分辩，斩钉截铁。

邱柏内心的戒心和敌意顿时消尽，他一时反倒没了主意：“怎么填？”他问古副团长。

“我说你写！”古副团长用的是一种命令的语气，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第一志愿，复旦大学；第二志愿，复旦大学；第三志愿，复旦大学。”

“古副团长，”这是邱柏一年多来第一次这样称呼他，“这可不行，万一考不上，我连条后路都没有了。”

“要后路干什么，你有实力，你能考上，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我都28岁了！”

“所以你更要珍惜这次机会，回不了上海你要后悔一辈子！”

邱柏被古副团长的话震住了，他无言以对。古副团长是个真正的军人，他的话里充满了胆量，而邱柏现在缺少的恰恰就是胆量，他想要稳稳当当地取其下，而古副团长坚决地要他去冒着风险“争其上”。这半年多来邱柏一直以为自己是条硬汉，现在他才明白，现役军人古副团长才是一条真正的硬汉。他的胆量也被这条硬汉激发起来了，热血涌上胸腔，他要破釜沉舟地去做一次“最后的斗争”！

“好小子，上一次你敢当着我的面讲真话，我就看你不是个孬种！赶紧回去抓紧复习吧！”

邱柏也是个讲义气的人，他被古副团长的义气打动了，征服了，他要拼命了，为了自己能回上海，也为了不愧对古副团长。

他感觉良好地参加完全部考试，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最后结果。

录取通知书开始发下来了，有人拿到了，拿到的人欣喜若狂，没拿到的人忐忑不安，邱柏就在这忐忑不安的日子里苦苦地煎熬着，这时他接到了古副团长找他的电话。

邱柏第三次走进古副团长的办公室，这一次古副团长“史无前例”地站起身来迎接他：“坐下吧，等急了吧？告诉你，好消息来了！”古副团长的脸上也“史无前例”地带着笑意。

“什么好消息？”邱柏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复旦大学录取你了！”

“谁说的？通知书来了吗？”

“已经到了师里了，我刚跟师里通过电话，这几天我是每天一次电话。让你考复旦是我的主意，你要是再考不上，还不得跟我拼命啊！”

“古副团长，太谢谢你了！”邱柏此时满肚子的感激之情，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我还要谢谢你呢，你要是考不上，我这责任可就大了，我就成了罪人了，我已经当了一回罪人了。这几天，我比你还着急呢！”

“古副团长，你是好人，谢谢你！”邱柏站了起来，他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尽快地告诉他的伙伴们，尽快地告诉上海的家里人。

“你能考上复旦，是你小子自己有本事！坐下坐下，再坐一会儿，以后我们再要见面可就难喽！”古副团长的话里忽然染上了一种伤感的色彩。

“我还会回来的，学校放假，我就回来看农场，看你们。我会永远记着你们。”

“这话我信，可是你再回来的时候，我就不在了。”

“你也要走了？”

“我也要走了。兵团撤消了，现役军人要回部队了，我的调动命

令已经下来了,把你送走了我就开拔。你考上了复旦,我就了却了一桩心事,这是我在农场的最后一桩心事。好小子,别忘了我,以后走到哪里都别忘了我!”这位硬汉脸上笑着,语气里带着一种深挚的感情。

激情在邱柏的胸膛里汹涌着,他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他有许多话要说,他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两个硬汉对立着,两双眼睛对视着,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怨恨,他们今天却想紧紧拥抱。他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他们两人都要离开这里,就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候,他们才真正地彼此了解,或者准确地说,邱柏才真正了解了现役军人古副团长,他曾经误解他。正是这个曾经被他误解的人,在最为关键的一搏中,激发了他的胆量和勇气,使他找回了自我,重新认识了自我。

这是一个知识青年和一个现役军人的友谊,这是两个硬汉之间的友谊。

“你是首长的什么亲戚?”

——知青与现役军人的关系之三

假期一天天过完了,归期一天天临近了,如今上海已经不是孙英的家,她自己的家在建三江,上海仅仅是她母亲的家。她回上海来探望母亲,同时接走自己四岁的儿子。

母亲和弟弟忙着帮她整理要带走的東西,鼓鼓囊囊的四个大包,每一个都沉甸甸的。这么多东西,还要加上个四岁的孩子,对于一个已经不是知青的女人来说,负担实在不轻。要是在早几年,即使东西带得再多一些她也不怕,不论坐火车走还是乘轮船走,她在出发的时候准能碰上同伴,即使不是一个师的,即使互相不认识,几句话一说大家就都熟了,因为都有“上海知青”这个相同的身份,都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嘛!一路上换车买票照看行李,大家都会互相帮忙互相照顾。但如今不同了,大返城的疾风已经刮过,只

有零零星星南来的雁，绝少可以搭伴北归的友。孙英看着堆在房间一脚的几个大包，心里犯愁了，她坐船走，上船的时候好说，有家里人送，但是到了大连要买车票换火车，没有人接送哪行呢？她试着给几个熟人发去电报，可这几封电报无一例外地都被退了回来，有的是“查无此人”，有的是“地址不详”。孙英简直是无计可施了。

情急之中她忽然又想起一个人来。此人姓延，在兵团最为鼎盛的时期曾经担任过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孙英跟他并不熟悉，只有几面之交。孙英那时是六师党委常委，分管青年工作，延副司令员来检查工作的时候，她曾经向他作过汇报，以后又曾在几次会议上见过面，延副司令员记得她，主动跟她打招呼。后来兵团撤消了，延副司令员就回了大连。孙英想，延副司令员级别高名气大，找他准好找。这么想着，她就往大连卫戍区发了一封电报：“原兵团六师常委上海知青孙英探亲带孩子归队，拟于某月某日乘坐某班轮船抵达大连，如有可能请接站。”这封电报没有被退回来，孙英想，可能是收到了。

她带着小儿子和四个大提包上路了，一路上她心神不安：延副司令员是否真的接到了电报？延副司令员是否还会记得我？延副司令员能否安排人来接我？要是没有人接站，我该怎么办？小儿子睡得很香甜，孙英却一点睡意也没有，就在她忐忑不安的思虑中，轮船鸣响汽笛驶入了大连港。

她把最大的两个旅行包一前一后地搭在肩上，一个旅途中相识的妇女帮她领着孩子，孙英艰难地下了船。她焦急地用眼睛扫视着穿军装的人，一个穿军装的人也在用眼睛瞄着她。那是个年轻的军人，他走过来了，向她敬了一个军礼：“请问你是孙英同志吗？”“是的是的，我就是孙英。”“首长派我来接你，来，把东西给我吧！车子在那边。”年轻的军人动作利索，接过了孙英肩上沉重的大包。

一辆黑色的红旗牌轿车，把孙英母子送到了部队招待所。

安顿妥当以后，年轻的军人问孙英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办，孙英托他给买一张火车票，沉吟了一下，又试探着说：“如果有可能，

我想见见延副司令员。”

第二天孙英就接到电话，延副司令员请她到家里去吃晚饭。那次见面孙英很激动，延副司令员跟她一起回忆起许多往事，谈到当年组建六师的决定，谈到那片辽阔的抚远荒原，老将军也激动起来，眼睛里流露出神往的光彩，他说真想再回去看看那个地方。孙英告诉他，当年开垦出来的荒地，经过这几年的熟化，渐渐进入了打粮的高产期，粮食生产得多了，但是知识青年都走了，人少了，留下来的，思想也大都不稳定，有一种失落感。老将军感慨起来：知识青年，现役军人，对兵团的开发和建设是有贡献的，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有目共睹的，当然，我们缺少经验，做了一些错事蠢事，有许多教训值得总结和记取，但是那段生活是难忘的，许多很好的知识青年是难忘的。孙英看得出，老将军至今对黑龙江兵团有着很深厚的感情，而且至今在农场还有联系，他对许多情况都了解，有些事情甚至比孙英知道得还多。

那是一个愉快的晚上，席间话语不断笑声不断，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所以孙英很想能多待一会儿。时间无情，匆匆走掉，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延副司令员的老伴给孙英装了满满两袋水果，一袋是苹果，一袋是梨子，都沉甸甸的。

第二天，仍然是那个年轻的军人来送孙英母子上火车。去车站的路上，他试探着问孙英：“你是首长的什么亲戚？”孙英笑了：“什么亲戚？什么亲戚也不是！”那军人一脸的诧异：“那不可能，首长从来不用小汽车接送客人，只有对你是个例外。”

孙英一时百感交集，哑然无语。

“我最佩服的一个人”

——知青与转业官兵的友谊之一

北大荒还有这样一大批人，“他们大都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参军，满怀着对党的崇敬以及为人民革命事业献

身的精神，有的离家出走，投笔从戎，有的跟随大军南下，有的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一齐投向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里来了，年龄大都在二十岁上下，少数接近而立之年，经过战争考验和现代化军事训练，从海陆空军到炮兵、装甲兵、雷达兵、防化学兵，从营连排长到参谋、助理员、军医、翻译，真是行行俱全。有的参军前就是大学生：交大、同济、清华、北大、复旦、浙大、武大、川大、南开……几乎囊括了全国各地的名牌大学，遍及理科、工科、文科等各院系，就是缺少农机、农艺的。有的来自军事高等院校，包括哈军工、高级步校、炮校、通信兵学校、军医大学等等。仅军事翻译人员就有 1000 多名，包括英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缅文……他们不仅脱下军装，而且改行向地球开战了！”所以《北大荒移民录——1958 年十万官兵拓荒纪实》中惊叹道：“北大荒真是尉官们的世界，一下子接纳了如此众多有文化、有专长的年轻‘移民’。”作者郑加真本人就毕业于复旦大学，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在军委空军司令部任参谋，尔后于 1958 年转业，成为开发北大荒的十万官兵的一员。这十万官兵受党教育多年，有参加革命战争的经历，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他们给北大荒奠定了极好的政治基础、文化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对五十万知青进行再教育的实施主体。

兵团都有报道组，报道组这个机构是从解放军搬过来的，解放军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抓典型和舆论宣传，所以就有了报道组。

报道组主要设在团、师和兵团三级。报道组的任务主要是给新闻媒介撰写新闻稿件，考核报道组，最主要的一项指标是见报率的高低。报道组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是为先进典型写讲用材料，这项工作很有说道，参加上级机关的讲用大会，你这个典型选得上选不上，除了要看典型本身的事迹过硬不过硬，还得看你这个材料写得好不好。所说的好不好，主要是指观点新不新，境界高不高，形势

跟得紧不紧,这就要靠写稿子的人“妙笔生花”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抓典型,由此决定了报道组的地位和作用。

报道员,虽然级别不高,但却是被人高看的,因为他们是“秀才”。现已离休的黑龙江垦区《农垦报》副总编辑苏侗,在兵团时期曾经担任过三师的报道组长,他说:选报道员比选指导员的条件都高,第一政治条件要好,第二要有文字表达能力,第三还要有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能力。苏侗说,报道组是个出干部的地方,许多报道员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提拔了,有的当干事了,有的当秘书了,有的当团委书记了,然后再选一些人充实进去,所以报道组的人员流动性很大,常常更新。可以说,报道组是干部的预备队。1972年底兵团开第一次通讯报道会的时候,全兵团有513个报道员,但后来出出进进的加在一起,能有两千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对报道组人员配置要求是:大团配七名,中等团配五名,小团配三名,营里要配一名,师报道组要有七至十名。兵团的六个师里面,报道员人数最多的是三师,有164人,占整个兵团近三分之一,三师最大,人口、耕地面积和发稿率也占兵团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些报道组,常常是老农场人员和知识青年的结合体,现役军人一般不担任报道组的工作,因为那是个有职无权的机构。现役军人来后,老农场的宣传理论干部不好安排,就让他们去搞通讯报道,这些人大部分是五十年代末开发北大荒的转业军人,有的参加过解放战争,有的参加过抗美援朝,有的是从部队军事院校来的,思想素质好,又有学识水平。报道组里的知识青年是从全团的几万甚至十几万人里面挑选出来的,有头脑有思想,有一定的文字功底,自然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这两部分人到了一起,恰好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老的沉稳,小的活跃;老的渊博,小的饥渴;老的闭塞,小的灵通;老的严谨,小的毛躁;老的看问题全面,小的看问题偏激;老的大多对现役不以为然,小的个个对现役推崇备至;老的把他们多年积累的学识和优良的传统作风一道传授给小的,小

的在一种思想活跃比较自由的氛围中拼命吮吸充实自己，迅速地成长提高。这些知青在连队的时候，最大的苦恼就是找不到可以解惑答疑的师长，难以寻见一起探讨问题深交长谈的同志，他们常常为此感到苦闷和孤独；现在，这些师长和同志就在身边，朝夕相处，在连队时那种鹤立鸡群曲高和寡的孤独感顿然消释。

肖苞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18团办的那次报道员学习班，那是全师办的第一次报道员学习班。她说，我的新闻大学就是从那次学习班开始的。

主持学习班的，是一个高高胖胖的人，“文革”前是东北农垦报的老编辑。后来接触得多了，肖苞才知道他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就当过战地记者，1954年就转业来到北大荒。老编辑给她的印象深极了，对她的影响大极了，一直影响到今天。“从事新闻工作一定先要搞清楚你为谁说话”，“好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又做工作又当记者”，“记者的基本功是采访，采访的基本功是调查研究”……肖苞今天还清楚地记得他在二十多年前讲过的这些话，这都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最基本最传统的一些观点。他给她提出的要求是：“你要写10个调查报告，你必须要有10个调查报告打底，这10个调查报告写完了，你才能真正了解农场，了解农业生产，了解基层工作，你才知道怎么搞调查，你才有当记者的资格，有对社会现象发表评论和见解的资格。”

肖苞真的很认真地按老编辑的话去做了，她参加了某团基本工资加奖金“两结合”工资制的调查，参加了一个先进连队青年思想工作的调查，她还独自一人搞了某团改造白浆土的调查……。老编辑亲自带他们下去搞调查，一路上教给他们许多顺口溜。看到电线，他就说“小机关看电线，大机关看天线”，这是战争年代的一条经验，电线是指电话线，天线是指电报天线。看看天气，他能讲出一大串看天气的谚语。跟老编辑在一起，肖苞有一种特别幸运的感觉，她暗暗庆幸自己在从事新闻工作一起步的时候，就遇上了这么一位好老师。这种机会，这种运气，在兵团的知青中间，只有极少数

人能得到它。

在五师 50 团当过副政委的上海女知青刘金铭,用一种充满敬意的语气讲到当时团里另一个副政委王英武。“这个人现在已经病得很重,瘫在床上了,但这个人是我下乡以后最佩服的一个人,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原来是转业军人,领导组织能力相当强,写东西也写得相当好,团里的大报告几乎全都是他写的。现在在哈尔滨市委当秘书长的小方,是上海光明中学老高三的,文革前选定了要去法国留学的,那时在团宣传股当干事,是团里的笔杆子,但他最怕王英武。王英武对文字的要求特别高。那时每次团里开大会,报告都是张政委讲,稿子都是王英武组织一帮子秀才在一起研究提纲,提纲定下来,再让他们分头去写,写完了再讨论,再修改,常常要改好几次。他这种严格的要求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培养出一批秀才,全都是大秀才,小方是一个,现在新华分社当社长的张持坚是一个,其他还有文汇报的记者、华东师大的教授等等,真是严师出高徒。王英武不仅对工作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也非常严格,经常在下面连队跑,上山伐木他也去,结果砸了腿。他对我的教育和影响都很大,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

“我们家不怕传染”

——知青与转业官兵的友谊之二

1990 年 11 月底,一个星期天,张剑来到中国革命博物馆。他汇入门前那长长的人流,缓缓流入宽大的展厅,一进门就看到了那块醒目的牌子:《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牌子的后面,是一排白桦树,整整十棵。冬天的白桦树,枝条上光秃秃的,张剑从那稀疏的枝条上,一下子就感受到北大荒原野上的凛冽寒风,甚至嗅到了一股清冽的气息。他一下子就找回了那种感觉,那种十多年不曾有过的感觉。久违了,白桦树!

上山下乡光荣证、乘车证，割草的大芨刀、割麦子的小镰刀、棉手闷子、棉乌拉鞋、六十度的“北大荒”白酒、印着“奖”字的洗脸盆，还有那一幅幅珍贵的照片，太熟悉了，太熟悉了，一下子唤起他多少回忆，欢快的，美好的，苦难的，烦恼的……多少种滋味在他心里边翻涌搅动。他就这么看着，想着，走着。

忽然，他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看到了一张脸，一张十分熟悉的脸，他寻找了十几年的脸。那张脸也在看他，张剑急切地挤过人群，冲着那个穿藏蓝色羽绒服的人冲过去。

他们面对面地站着。

“你是王营长吧？”“你是张剑？”

“王营长！”张剑只喊了这一声，就再也讲不出话来，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扑在那个墩墩实实的男人身上呜呜地哭起来了。呜呜的哭声惊动了参观的人们，很快就有一群好奇的眼睛把他们团团围定。墩实的男人使劲劝解着：“张剑，别这样，走，咱们找个地方去！”他拉着张剑出了展厅，出了博物馆的大门。

“王营长，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你呀，我找你找得好苦！”

“我也一直惦记着你，你的病好了吗？听说你做手术了？”

“切了一个肺叶，没事，啥事也没有，你看，这不跟好人一样？”

“唔，看着气色还不错，比那时候胖了，也成了大老爷们儿了，我都不敢认你了，站在那，心里嘀咕了半天，要不是你认出我，我还真不敢跟你打招呼。成家了吧，孩子多大了？”

“王营长，走，上我家去，这就去，认认门，我爸爸跟我妈一直说想见见你，要好好感谢你呢！”

张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16年前的那个中午。他在营部食堂吃完了午饭走出来，地上铺盖着一层刚下过的白雪，太阳反射在雪地上，晃得他把眼睛眯了起来。他最喜欢这种雪后初晴的天气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冽新鲜的空气。大概是凉气刺激了气管，紧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止不住的咳，他已经这么咳了一个多礼拜了，从卫生所拿了一些止咳药，都不管用，一点儿也不见好。咳

着咳着,他忽然感到从胸腔深处有一股热乎乎的液体涌上来,涌到了嘴里,滋味有点咸,还有点粘,他吐了一口,洁白的雪地上出现了鲜红的颜色,真正是雪白血红。“我吐血了!”脑子里反射出这个信号,他的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赶紧上卫生所!”他加快了脚步。

他越是紧张,越是加快脚步,咳嗽就越是剧烈不止,咳得那带有咸味的液体不停地往上涌,不停地往外吐,一口接着一口,在皎洁的雪地上离离拉拉地连成了一条线,张剑越发慌乱,他向四周看看,正是吃午饭的时间,一个人也没有,他忽然想:要是一直不停地这么咳下去,血咳完了人不就死了吗!走到营部招待所的门口他停住了,在水泥台阶上坐下来。

招待所的老戎隔窗看见他,慌忙跑出来,把他搀扶进屋,找了张床让他先躺下,然后打电话找卫生员。很快,卫生员小姚背着个药箱子急匆匆跑来了,小姚看见痰盂里的血吓了一跳。她当卫生员才一年多,还是头一次遇上这种情况,有些手忙脚乱。“哎呀糟糕,我没带止血药,我还得去拿止血药!”

小姚取来药,给张剑打了一针,又让他吃了两片镇静药,咳嗽终于停息了,血也被止住了。张剑松了一口气,小姚松了一口气,屋子里的人全都松了一口气。

走廊里响起咚咚的脚步声,门猛地一下被推开了,王营长火急火燎地冲进来,直奔张剑的床边:“怎么了张剑!你怎么了!”他又转向小姚:“张剑是什么病,要紧不?赶紧上团部吧!”

“是得赶紧上团部,我估计他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支气管扩张,一种可能是肺结核,咱们这里药不多,我又没经验,要是再咳血就麻烦了。”小姚真是很着急。

“我这就去找车,你赶紧收拾一下,咱们马上就走!”他又俯身安慰张剑:“别害怕,有我呢!”王营长办事雷厉风行,是有名的急性子,不一会儿,张剑就听见了“东方红”28 拖拉机“突突突”的发动机声。王营长挟着一件军大衣返身进来:“来,把它穿上,穿暖和点,咱们上团部!”

张剑是营部的通讯员，小伙子机灵，勤快，干活办事都有“眼力见儿”，所以营里的几个领导全都喜欢他。王营长几乎走到哪儿都带着他。王营长是1958年转业来的老铁道兵，原来是农场的副场长，搞生产相当在行，兵团组建后安排他当了营长，“营长”是军队的官衔，但干的还是生产上的事，他这个营是全团生产搞得最好的一个营。王营长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也漏不下张剑，有人开玩笑说王营长待张剑比对他自己的儿子还好。王营长身体好，轻易不得病，偶尔有个小毛病也不吃药不休息，挺两天就过去了，所以张剑这一阵先是发烧继而又咳嗽他也没大当回事情，“就是着凉了，伤风感冒，几天就好！”可是非但不好，反而厉害了，王营长一想到这，就觉得张剑的病他有责任，心里一阵内疚：“怪我，都怪我！”他懊悔不已。

到了团部卫生队，一透视一检查，果然是肺结核，肺部有大面积阴影，浸润型，活动期。“你这病传染，得住院！”。医生戴着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凭口音张剑能听出来：她也是知青。

王营长一个劲儿地刨根究底：这病历不厉害，好不好治，住院得住多久，吃点什么好？女医生的回答不冷不热：“这说不好，要看他自己的抵抗力。”“这很难说。”“当然吃些有营养的东西好了，像鸡蛋豆腐牛奶。”她似乎有些不耐烦。

“她是怕我传染她。”张剑想，“还是知青呢！”

护士把他们领到走廊最尽头的一间病房。这屋子一面是火墙，一面是冷山，靠火墙的两张床上都住了病人，靠冷山的两张床都空着，墙上有一层洁白晶莹的霜花。王营长看了看说：“这屋子怎么住，还有别的病房吗？”他又翻了翻床铺：“就一条褥子，这么薄，还不得把人冻死！”护士说：“传染病房就三间，都满了，就这两张空床了，隔壁有个病人要转院了，等他走了你可以调过去。”王营长叫着小姚，把床往屋子中间挪了挪：“先将就两天，明天我给你拿张皮褥子来。”

第二天上午，医生刚查完房，王营长的爱人就来了，一手挟着

条皮褥子一手提着个包。“老王今天开党委会，来不了啦。没车，我等了半天才截了个14连拉砖的车。先把这褥子铺上，瞧这行李，多单薄，没病也得冻出病来。这是给你煮的鸡蛋，这是奶粉，营里小卖部就剩这两袋了，一会儿我再上团部商店买去。老王让我给你炖只鸡，我说你这时候八成吃不进去，缓两天再说。你说呢？要是想吃，我回去就给你炖。营部就是离这太远，要不我天天给你做饭菜送来。哎，好好的，咋得这么个病，都怪老王，对你不上心，昨天他一夜也没睡好，那个后悔呀！”她又转向同屋的两个病友：“这医院的伙食怎么样，吃得好不？”“好啥，馒头老是粘的，天冷，面发不起来。”“倒是天天有肉，比连队强。”

王营长的爱人姓金，是鲜族人，待人真诚热情，待知青尤其好，只要有知青到她家去，就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她到走廊里走了一圈回来说：“行，烧火墙这个炉子能热饭，我给你炖个小鸡，现在天冷放得住，坏不了，你吃的时候，舀出来点搁炉子上热热，一只鸡够你吃些日子。”第二天老金就端着一只小铝锅来了，里面是一只刚刚炖好的鸡。

从此，王营长两口子是“两天不来，三天早早的”，奶粉、鸡蛋、白糖、炖小鸡，一直到老金腌的朝鲜咸菜，张剑的床头都堆满了。过年了，张剑的病情也稳定了，王营长对医生说：我把张剑接回去过年。营部来了个“东方红”，把他拉走了，拖拉机一直开到王营长家门口，王营长跳下车说：“到家了，下车吧！”张剑说：“营长，我这病传染，我回宿舍住去。”“啥传染不传染的，我们家人抵抗力都好，不怕那个，快下车！”老金也闻声跑出来了：“你们宿舍里探家的探家，返城的返城，人都快走光了，可冷了，就住这吧，小屋我都给你收拾好了！”

张剑在王营长家过了他兵团生涯中最温馨的一个春节，也是他兵团生涯中最后的一个春节。过完春节，他就回北京去治疗，先住了半年医院，由于肺部有个空洞不能愈合，最后做了肺叶切除手术。他怕王营长家里为他担心，手术前后有将近半年时间没给他们

通信。而在这半年时间里，王营长一家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先是调到另一个团去当副团长，不久，湖南老家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给他办好了返乡的一切手续——他只有这一个儿子，固执的老人又说什么也不肯来北大荒。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王营长只得遵从父命，挥泪告别了他撒下过18年汗水的黑土地。从此，张剑和王营长音信阻断，失去了联系。

他们有16年不曾见面了，16年里他们一直彼此思念着。王营长对张剑的病一直怀有内疚：“要不是我粗心大意，张剑得不了那么重的病！”张剑对王营长一家则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要不是王营长一家人照顾，我这病好不了！”

兵 团 的 结 局

许多人至今回忆兵团，怀念兵团，但兵团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衰落下去。兵团毕竟不是军队，兵团的本质仍然是国营农场，兵团的任务是生产经营种地打粮，而不是什么四好运动政治建军。把握兵团领导权的现役军人们不懂得这一点，也不懂生产经营和种地打粮，这就决定了兵团的必然衰落。林甸说，他们把指挥部队大兵团作战的那一套办法搬过来，用于指挥农业生产，做了一些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比如，不顾各团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差异，统一规定在某月某日之前播种、某月某日之前开镰，还要进行检查，有的连队为了应付检查，一个晚上就把还没熟透的玉米全部放倒，结果影响了产量。

当时兵团的一个普遍问题是生产下降，经营亏损。全国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建师，1971年粮豆总产量是50亿斤，1972年下降到46亿斤，1973年又下降到41亿斤；粮豆的亩产量1971年是194斤，1972年是175斤，1973年是167斤。1973年5月，周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兵团机构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等问题，指出兵团要逐步把工资制改为工分制。1973年10月，李先念副总理在

一份《关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粮食生产和预计交售情况》的调查报告上批示到：“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明年要吃国家的粮食呢。”语气严厉，语言尖刻。

1972年的五六月间，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国务院农林部联合派出三个小组，对黑龙江、新疆、内蒙古、浙江和安徽等五个兵团进行了调查研究，他们在打给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关于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管理体制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写到：“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兵团建设方向和领导管理体制问题。……1969年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其他新组建的兵团，突出了军队性质，过多地采取军队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这样，便和人员组成的社会性（随着兵团职工家属的不断增长，这种社会性将越来越大）、生产经营的企业性不相适应。”

此后不久，就是一个一个兵团的相继撤消。《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一书中写到：“1972年，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首先撤消了武汉军区湖北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兵团只存在一年时间，是组建最晚、撤消最早的一个兵团。1974年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又撤消了云南、福建、广东生产建设兵团和广西、宁夏农建师。1975年邓小平副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提出进行全面整顿的方针，加快了改变生产建设兵团管理体制的步伐。这一年中，相继撤消了内蒙古、江苏、安徽、浙江、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和江西、西藏、甘肃、青海、陕西的农建师。1976年春季，撤消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各地生产建设兵团撤消后，省、自治区成立农垦局，各团改称农牧场，农场集中的地区成立了地区农垦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撤消后，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统一领导全省国营农场，按农场地区分布成立了11个国营农场管理局。”

第十章 绿草原：蒙古包内外

走进锡林郭勒

坐火车走京包线，从西北方向出北京城。火车过南口过居庸关，过青龙桥过八达岭，这些地名听着都那么熟悉，小学六年级语文书里，讲詹天佑的那篇课文里都讲过，有的学校组织春游也来过，可是此刻，整个一列火车的中学生们，没有几个对车窗外的景色发生兴趣，他们都在想自己的心事：离别的悲痛，对未来的憧憬，第一次出远门的兴奋……各自沉浸在不同的情绪里。

延庆、怀来、宣化，一路上尽是山。到了张家口，火车停下了，一列火车的知青全部在这里下车。站台上已经有许多解放军在列队欢迎，敲着锣鼓，喊着口号。他们是4618部队的，肖萌心里感觉很亲近，因为他们学校的军宣队就是这个部队的，据说整个东城区的军训团都是这个部队的。

解放军的大汽车把他们拉进解放军的营房，热水预备好了，饭菜预备好了，夜晚就睡在战士们的床铺上。第二天早上换乘汽车继续赶路。这一批北京知青的目的地，是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是整个内蒙古水草最丰美、畜牧业最发达的地

区,自从1967年曲折那一批知青去了锡林郭勒之后,人烟稀少的锡林郭勒就成了北京知青蜂拥而往的地方。

汽车开始爬坡,开始进山,沿着公路盘旋而上,绕来绕去绕上一座山,前面又矗立着一片山,连绵不断的山,望不尽的山,长长的汽车队就在这群山之间盘旋绕腾,越走越远,越绕越高,绕出了华北平原,向着内蒙古高原攀援。

远远的,群山之间出现了一片断壁残垣,车上的小战士是个四川兵,很爱说话,他指着那片破败的残墙高喊着:“快看,长城!”车上的知青们都呼啦一下站起来,大睁着眼睛朝远处看。汽车越驶越近,长城也看得越来越清楚。“嗨,这也叫长城啊?”“这跟八达岭根本没法比!”大伙正这么议论着,忽有一阵劲风从两山之间的豁口迎面吹来,肖萌不禁打了个寒噤:好清凉的风,好干爽的风,把北京带来的一身暑气,把一路上颠簸的汗水,顿时吹得干干净净。“狼窝沟,这里是狼窝沟!”四川籍的小战士大声报着地名。这地方肖萌听说过,再往前不远,就是张北县了。张北,顾名思义就是张家口以北,多通俗的名字,张北高原俗称“坝上”,海拔已经比北京高出了1000多米!张北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分界点,从华北平原上内蒙古高原,这里是一个高台阶。

出了长城,就是塞北,到了坝上,就进了草原。塞北的风是凉的,塞北的天又蓝又高远,塞北的景色跟北京大不一样:北京此时还是一片浓绿,树冠上繁茂的枝叶遮挡着火辣辣的太阳,而塞北已是一片枯黄,黄叶开始衰败萎缩,就要走完它们的“一岁一枯荣”;北京的风还是热的,吹得你心烦意躁,而塞北凉凉的风吹得你清醒而冷静;北京还是酷热的夏,坝上已是清凉的秋。造成这种种差异的,就是那个1000多米的海拔差。

虽然还没进入内蒙古,但草原已经过早地把它的真面目展现在知青们的面前。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们,看惯了楼房、树木和汽车的孩子们,视野在这里一下子打开了,真正是一无遮拦,一马平川。什么叫“辽阔”,什么叫“广大”,这些早就念滥了写滥了的词

儿,今天才真正明白了它们的含义。从一辆辆汽车上发出了一阵阵惊讶、赞美、感叹、欢呼的声音,但在肖萌的心里,却一下子浮现出两句古诗文:“凉秋九月,塞外草衰”。这是哪篇文章里的?他努力在脑子里搜寻。啊,对了,是《李陵答苏武书》,接下来的几句是:“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不知是被眼前的景色所感,还是被李陵的诗文所感,肖萌的心里罩满了一种悲凉,他就怀着这种悲凉告别了生养他的华北平原,进入了陌生的、在他心中充满了浪漫情调的内蒙古高原。

来内蒙古牧区插队,是肖萌自己的选择,他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完全是由于读了一本著名的苏联小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1967年的秋冬和1968年的春天,在那些百无聊赖的日子里,肖萌读了好多书,他的父母都在出版社工作,他有很好的读书条件,自己家里的书,邻居家里的书,同学家里的书,凡是能找得到的中外名著,他几乎都找来读了。他每天沉浸在一个个故事里,故事的主人公不同,发生的国家和地区不同,情节和格调也各不相同,有美丽的,雄壮的,崇高的,伤感的,浪漫的,诙谐幽默的。那些书里面,最使他着迷的,是发生在顿河流域的那些故事:辽阔的大草原,静静的顿河水,河边上那个300来户人家的鞑靼村,村里那些生性彪悍的哥萨克,哥萨克人那种豪爽奔放的性格、无拘无束的生活,厚厚四大本书里的故事,充满了异族风情,充满了浓艳厚重而又斑斓纷呈的色彩,引得肖萌心驰神荡,心向往之。故事里那种丰富的生活与现实中单调乏味的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恰在此时,去内蒙古插队的消息传来了,肖萌怦然心动:内蒙古不也是大草原吗?不是也有豪爽的牧民和高大的骏马吗?他怀着急于摆脱乏味和平庸的急迫,怀着对草原生活的憧憬,兴冲冲地报了名。

汽车驶过了张北,就开始折向东北,折向锡林郭勒,1967年底和1968年初、中期到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几乎全都安排在那里,到肖萌他们去的1968年秋天,锡林郭勒的北京知青人数已有

4000 之多。

在蒙古语里，“郭勒”是“河”的意思，锡林郭勒，意为“丘陵之河”。《地名志》里说：“清顺治、康熙年间，在锡林河一带的 10 旗均设札萨克，会盟于河北岸的楚古拉于敖包岗上，故命名为锡林郭勒盟，沿用至今。”全盟的总面积有 20 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 80 万，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 4 个人。难怪肖萌说，不少大队，地界比内地一个县还大，人口却比内地一个生产队还少。

锡盟当时有九县一旗，北京知青主要安排在北部靠近中蒙边界的东乌珠穆沁（简称东乌）、西乌珠穆沁（简称西乌）和阿巴嘎等几个旗。盟相当于地区，旗相当于县。这几个旗都是牧区，都有良好的草原，而乌珠穆沁草原尤为著名，它有丰足的水源，有肥厚的土壤沉积层，以“乌珠穆沁”命名的马、牛、羊，都是著名的优良品种。“乌珠穆沁马体态匀称，线条舒展，耐粗放，耐劳苦，并以独特的‘快走’见长，骑起来极为平稳舒服。在东乌珠穆沁，这种马的毛色多为青色，在西乌珠穆沁，则多见雪白的‘走马’。”而乌珠穆沁羊则以肉鲜味美而闻名，大量出口国外，是餐桌和宴会上的佳品。

蓝天之下，大地之上，惟有望不见边的草原，惟有健壮肥美的牛羊，惟有蒙古包和骑在骏马上的牧人，草原像绿色的潮水，随风涌动，绿潮之上荡漾着放牧者的歌声，歌声随风飘荡，嘹亮而悠长。这就是锡林郭勒，这就是乌珠穆沁，这就是北京知青所融人的新家园。

虱子 的 故 事

肖萌和他的五个同伴住进了一座蒙古包，这里是他们新的“家”。他们平生头一次走进了蒙古包，虽然一路上已经看到过不少蒙古包。包里很宽敞，很高大，不像肖萌原来想的那么拥挤。地上铺好了羊毛毡，厚厚的，足有两三寸，散发着一股膻味，地中间有一个小炉子，炉子上坐着锅。他们急不可待地把行李扔在羊毛毡上，

解开，铺好，然后重重地把身体抛在上面，啊，好舒服，好解乏！一路上，光是汽车就坐了三天，路不好，七高八低的，骨头架子都快颠散了，再加上坐火车、牛车，足足折腾了近一个星期。一颗颠簸不定的心这时才算有了着落，才踏踏实实地安顿下来。

肖萌开始打量起他们这个新家：白白的羊毛毡是新铺的，炉灶是新砌的，铁锅是新买的，就连整座蒙古包都是新的，新的东西看着就是舒服，给人一种整洁的感觉。这里就是新家了，他们就要在这里长久地住下来了，跟牧民一样，骑马，放牧，喝奶茶，整天在一种浓重的膻味里，日出而作，日暮而归。这种日子要过多久呢？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肖萌忽然有些害怕，他不敢再想下去。门敞开着，茫茫的暮色和草原的气味从那里悄悄地漫进来，老额吉的咳嗽声和器皿碰撞的声响也从那里传进来。还有一股燃烧的烟味，这种烟味很特别，不是烧煤，不是烧草，也不是烧木柴的味道，他们烧什么呢？景色是新奇的，声响是新奇的，气味也是新奇的。

肖萌扬起手臂，看了一下手表——那是离京之前爸爸送给他的——五点三十五分，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已经下班了，他们是已经到家了，还是正在蹬车回家的途中？奶奶这会儿都把晚饭做好了，如果天气好，她会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门口，手上总是有干不完的零碎活，嘴里跟邻居们聊着天，可心思却在胡同口上。那是肖萌最熟悉的一个场景了，每天放了学，他一走进那条胡同，看见的就是那个场景，从小学到中学，只要天气好，一年四季奶奶都会坐在那里等他。现在奶奶再也等不到自己的孙子了，她还会每天坐在院子门口，冲着胡同口张望吗？思绪一转到奶奶身上，肖萌的心里一下子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奶奶，一切的情绪，一切的回忆，全让奶奶一个人给压下去了，紧接着，有一种酸酸的味道猛烈地从心底里翻涌上来，涌到嗓子眼儿，涌进眼眶里……

有个身影走进蒙古包来了，肖萌从那瘦小的轮廓认出来，是大娘，不，应该叫额吉。额吉的脸是黑红色的，草原上的风在她脸上刻满了长短深浅不一的皱纹，黑白相杂的头发，编成两条细细的辫

子,那辫子一定有好长时间没有梳理和清洗过,乱蓬蓬的,上面沾着些干草棍儿。

几个小伙子一下都坐了起来,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打招呼,应该说些什么。他们听大队书记介绍过,因为知青的安置费还没拨下来,这蒙古包是额吉家里给买的,那么这包里崭新的羊毛毡和铁锅,一定也是额吉家里给买的了,炉灶一定也是他们砌的了,这么大的蒙古包,得好几百块钱吧!几个北京学生怀着感激的心情,友好地注视着走进来的老额吉。

额吉的嘴里唠唠叨叨地说着什么,手里还拿着东西,她说的是一种蒙汉间杂的语言,蒙古语词汇和汉语词汇交替着从她嘴里蹦出来。肖萌认真听着,努力理解着,那意思大概是说,走了这么远的路,一定走累了,一定饿了,好好歇一歇,该吃一顿饭了,这么小的年纪,就离开了家,跑到草原上来,可怜见的,可怜见的,额吉家里就是你们的家,有什么难处只管对额吉讲好了,额吉会关心你们、照顾你们的……

老额吉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手上不停地干着,她用带来的干牛粪点着了炉火,蒙古包里立刻弥漫起一股肖萌刚刚闻过的那种怪味。额吉又用锅烧上水,放进一些切好的羊肉干,开始烧羊肉汤。她那双抓过了牛粪和羊肉干的老手,现在开始和面、揉面,把面团撵成面片,再切成面条。她干得不快,但是很熟练,嘴里的话始终没停过。她谁也不看,眼睛只盯着羊肉干、白面团和手里的刀,仿佛这些话不是讲给六个小伙子,只是自言自语讲给自己听的。她不说一句客气话,也没有一点过分亲热的表示,就跟每天在她自己的蒙古包里、在她自己的儿女中间一样。

一阵忙活之后,蒙古包里溢满了一股诱人的香气,羊肉面条做好了。老人又从自己的蒙古包里拿来一摞碗,满满地盛了六大碗。“吃吧,吃吧!”然后,她坐在羊毛毡上,眯起眼睛,心满意足地看着孩子们那副狼吞虎咽的吃相,眨眼的工夫,一锅面条就吃得干干净净。老人转身出去,又给他们端来了奶茶。

额吉把香喷喷的羊肉面条和真挚的亲情带进了知青的蒙古包，此外她还给知青的蒙古包里带来了别的东西。

小伙子们吃饱喝足，再也懒得动弹，倒头便睡，甚至连衣服都不想脱，一路上他们太兴奋太乏累了。宋明家忽然感到腿上一阵奇痒，他迷迷糊糊伸出手去挠，过了一会儿还是痒，挨着他睡的陈星也被一阵刺痒闹醒了。两个人气急败坏地坐起来。

“是受风了吧？”宋明家说。他以前得过风疹，那是一片红色的小疹子，也是痒得厉害。找出手电筒来照，挠过的地方确是红红的，但是没有疹子，红的是一条一条的红道子，刚刚被指甲挠出来的。

躺下再睡，还是痒。陈星的手忽然抓住一个小虫子，他赶紧打开手电筒一照，白白的，中间黑乎乎的，肚子圆鼓鼓的，气得他用手使劲一捏，肚子破了，里面冒出红色的血，沾了他一手。宋明家叫了起来：“虱子！”他哥哥去农村劳动，回来的时候衣服里面就有虱子，所以他认得。

“怎么会有虱子？谁身上的？”

“不会呀，咱们从北京来，哪儿会有虱子呢！”

“我知道了！”宋明家恍然大悟了：“额吉，准是额吉带来的，刚才她正坐在咱们俩的铺位上！”

他们俩这么一闹腾，蒙古包里的几个人都醒了，睡眼惺忪地起来看虱子。陈星和宋明家火烧火燎一般，把衣服全都脱了下来，仔细翻找，连陈星捏死的那只在内，一共是五只。“我的天，额吉身上至少有一个连的兵力！”

“以后不让她进咱们的蒙古包！”

“咱们的蒙古包？这是额吉家里花钱买的，你不要搞错了！”

“不让她进来不可能，谁帮咱们做面条、烧奶茶呀？”

“咱们自己学着干，自力更生！”

“说得倒轻巧，明天就让你干，你干得了吗！你给做一顿面条试试！”

“既然你这么欢迎额吉，让她来了坐你那儿，你愿意吗？”

“只要额吉愿意,我没意见。还说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呢,见到几个虱子就大惊小怪,吓成这个样子,要是连个虱子都怕,干脆回北京算了,北京没虱子!”张一军不愧他的绰号“将一军”,他这几句话一说完,谁也不吭声了。

肖萌一直没吭声,尽管额吉身上有虱子,但他心里就是喜欢额吉,看见了额吉,他就想起了奶奶。虽然额吉跟奶奶长得一点都不一样,说话的声音也不一样,但是额吉脸上的神态和说话的语气像奶奶,那股絮絮叨叨的劲儿也像奶奶,最重要的是她跟奶奶一样,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慈祥。慈祥这种东西是从内心里自然流淌出来的,既装不出来也做不出来。慈祥的额吉使肖萌感受到一种信赖感和安全感,有额吉在,他那颗忐忑的心踏实多了。

这是他们到草原落户的第一天,既感受到了蒙古族老额吉的慈爱,也尝到了挨虱子咬的滋味。虱子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产物,是蒙古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的产物。从这一天起,肖萌他们就走进了这种生活方式与文明,很快,他们几乎人人都长了虱子,不论男生还是女生。两种文明、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交融就从这时开始了,对于牧民来说,他们只不过是沿袭着千百年来的传统,而对于知青来说,他们却要改变十几年来的生活传统,衣食住行全要改变。

最可信赖的朋友

虽然乌力吉一家对知青相当好,但董黎明却感觉日子一天比一天难捱。嘴唇起泡了,喉咙肿痛,脸上也起了小疙瘩。她上火火了。她没法不上火,天天吃的是上火的食物,天天是羊肉炒米奶皮奶豆腐,就连喝的茶也是奶茶,她家是浙江人,在家里喝的是清淡爽口的绿茶,每顿饭桌上都少不了绿叶子的蔬菜,可是下乡快四个月了,没吃过一根菜叶子。董黎明在家里是最能吃菜的,妈妈叫她“菜扒子”,洗好的黄瓜西红柿,她空嘴能吃满满一大盘子。现在倒

好，不要说鲜灵灵的蔬菜根本见不到，就连点葱花也没有，她真纳闷儿：草原上这么多地，阿妈阿加他们为什么不种些菜呢？一年到头不吃菜怎么能受得了呢？

菜吃不上，用水也难。董黎明他们刚来的时候，吃的用的都是泉水，离蒙古包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泉眼，水从那里汩汩流出来，很凉，很清，还有一点甜，但水量很少。那里原来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凹坑，知青来了，把那个坑挖大，使它有更大的容量，能盛更多的水。可是，一昼夜渗出的水至多不过三四桶，阿妈一家要吃要喝要用，七八个知青要吃要喝要用，那一点水哪够呀！女知青爱干净，刚来的时候还时不时地洗呀涮呀，很快她们就发现这种生活方式在草原上根本行不通，有限的水资源不允许，毕竟吃喝是第一位的，保证做饭煮茶之后剩下的水，才能做洗涮之用，剩下多少，就只能用多少。

后来，天凉了，风紧了，草衰了，泉水也一天比一天少了，终于有一天早晨，整个草原都冻僵了。当董黎明和她的同伴穿着厚厚的蒙古袍，提着水桶来到泉边时，看到泉窝窝里空空的，土是僵硬的，泉眼干涸了。董黎明感到一种恐惧：老天，没有水可怎么活呀！她惊惶失措地跑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额吉，额吉正在点火，她头都没有抬一下，坦然地安慰董黎明：“别害怕，孩子，老天爷马上就会给我们送水来，快下雪了，快了！”

就像老天爷听见了额吉的祈祷一样，天一下子就暗下来了，奶茶还没烧好，细碎的雪花就飘落下来，纷纷扬扬的，像轻盈的白蝴蝶。这是草原上的头一场大雪，从这天开始，雪水就替代了泉水，成为最主要的生活水源。每天早晨，董黎明用一把大饭勺子满满地装上雪，就着炉子上的一点余热把雪融化了，化好的雪水只有半勺多一点，嘴大的人还不够一口喝的。她用胳膊和身体挟着勺子，把那点可怜的雪水倒在手上，抹在脸上，再用手胡乱地擦两下，算是象征性地洗了把脸。男知青更干脆，抓两把雪，在脸上一抹，一擦，省事了。

来到草原快四个月了,四个月里没有洗过一次澡。可是牧民一年到头都不洗澡,这事董黎明一想起来就觉得可怕。在家的時候,大院里就有浴池,每个星期洗一次,夏天就要天天洗,当然大部分是在自己家里洗。一想到洗澡这件事,董黎明就觉得全身有一种粘粘的感觉,甚至有一种小动物在皮肤上蠕动爬行的感觉:别是我也生虱子了吧!没有水,洗不了澡,洗不了衣服,不生虱子才怪!董黎明想起乌力吉一家人天暖的时候坐在太阳下,夜晚挤在油灯下抓虱子的情景,简直不寒而栗。一个吃菜,一个洗澡,要是熬上几个月还行,如果一年到头都是这个样子,怎么受得了哇!董黎明后悔了,后悔当初没听哥哥的话,跟他一块上黑龙江兵团去。

同在东乌旗,分在额吉淖尔公社插队的夏航同学则在她的日记中这样写到:“我已经学会了骑马、放羊、赶牛车、用缸车拉水,还会用牛粪点火做饭。我们会像牧民一样,祖祖辈辈地不吃菜不洗澡,学习贫下中牧的优秀品质,连这些也在内,才是彻底地学。”

虽然董黎明和夏航的态度不同,想法不同,但她们对环境的感受是相同的,她们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差异,这不仅是城市文明与农牧文明的差异,而且有汉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的差异、农区文化与牧区文化的差异——这是到牧区插队与到农区插队的一个重要区别。

牧区与农区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牧区与农区的景色不同。草原上,见不到茅草屋泥巴墙,听不见公鸡打鸣鸭子嘎嘎叫,没有猪圈、场院和粮食垛,没有成群结队出工的人群。这里只有牧草、牧畜和蒙古包,牧畜的数量远比人多。

牧区与农区的生产方式不同。牧民的主要劳动对象不是庄稼而是牲畜,主要的劳作不是种植而是牧养,收获的不是植物而是动物,他们的生产季节不是依春播、夏锄、秋收和冬藏来划分,而是依接羔产仔、药浴防疫、剪毛、配种、宰杀而划分。牧区的生产周期不是庄稼的生产周期,而是马牛羊的生产周期。

生产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生活方式的不同。牧区不是定居,而是

逐水草而居，牧民承袭着祖祖辈辈几千年传下来的游牧生活方式，一块草地吃完了，再去寻找一块新的草地，所以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须简单而轻便，随时能够拆卸运走，包括他们最主要的财产马牛羊，也包括他们栖身立命的蒙古包。

农区也养禽畜，养的是鸡犬豕，农家的鸡犬豕叫家禽，家畜是靠人喂养的；牧民的牲畜没有那个“家”字，牧民的马牛羊是驱赶到大草原上放养的。牧民不但自己是自由的，他们的牲畜也是自由的，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视野极其广阔，活动天地极其广阔，这种广阔的生存空间和自由自在的生存方式，形成了蒙古民族开朗豪放刚健直爽的性格，也改变着知青们的性格。

在农区插队的知青，一年四季永远有干不完的农活，各种各样的农活，而牧区一年四季只有一项最主要的活计，就是放牧。牧区知青不必在夏天四五点钟就被钟声或哨声喊起来去锄大田，或是在三四点钟就迷迷糊糊地下地去割小麦，他们没尝过那种苦滋味。就劳动强度而言，牧区大大低于农区，而就经济收入来说，牧区知青又明显高于农区知青。肖萌在内蒙古呆了五年多，他说那五年里从来没有缺过钱。想想也是，一头牛羊值多少钱，一斤小麦玉米又值多少钱？

如果说农区插队知青感觉到的艰苦主要是劳动强度方面的，那么牧区插队知青感觉到的艰苦则主要是生活习惯方面的。城里人的衣食起居与农村相近而与牧区迥异，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而非畜牧业大国，城市与农村联系的紧密程度，远甚于城市与牧区的联系程度。用一句不甚准确却十分通俗的话说，农区的衣食住行是取之于土地上生长的庄稼，牧区的衣食住行则取之于草原上放养的牲畜。“让我们最不习惯最难适应的就是这一点。”董黎明说。

知青在牧区插队的组合形式，一般是一两户牧民，加上一两个蒙古包的知青，成为一个生产集体，放养几十匹马、几百头牛、一两千只羊。要是在夏季和秋季，放牧是一件让人高兴的，甚至带有浪漫色彩的工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是望不见尽头的绿

草地，悠闲的牛儿羊儿遍地散开，吞嚼着多汁的鲜草。阳光是明亮的，空气是清新的，草原是宁静的，气氛是安详的，除了单调乏味的风儿在轻声哼唱，牛羊在咯吱咯吱地吃草，什么声音也没有。在城市里哪曾见过这样的意境。城市是自然的人化，而草原却是“人化”痕迹极少的自然。放牧的知青，可以放开喉咙唱歌，可以躺在草地上遐想，只是没有人可以说话，只是寂寞常常袭上心头。在旷野之上，董黎明常常产生一种特别想说话的欲望，找不到人，她就跟牛说话，跟羊说话，其实她是在自己跟自己说话，倾吐内心的独白。她有一肚子话要说，对父母的思念，对城市生活和中学时代的留恋，对未来的茫然，还有隐在内心最深处但时时发作的抱怨和后悔。不便对人讲的话，找不到人可以讲的话，她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向牛羊倾诉，尽管它们对她的倾诉无动于衷，但它们永远不会出卖她，它们是最可信赖的朋友。可惜这些朋友只能单向倾诉，不能双向交流。日子久了，董黎明对牛羊渐渐地生出一种亲近感和依恋感，只要跟它们在一起，她就不寂寞，不孤独，连她自己都觉得奇怪。辽阔的草原上，太缺少人了，太缺少可以交流情感的朋友了。

牛羊的确是知青最可信赖的朋友，它们无私地把自己整个儿地奉献给了知青。知青们每天吃的是牛羊肉，喝的是牛羊奶，穿的是皮袍皮裤，烧的是牛羊粪，住的是用羊毛毡搭成铺就的蒙古包，运输工具是老牛拉的勒勒车——衣食住行，哪一项离得了牛羊，哪一天离得了牛羊？青草本是不能烧的，但是青草在牛羊的肚子里走了一遭再排泄出来，就变成了燃料，真是奇妙！在茫茫的草原上，牛羊真正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但是董黎明和她的伙伴们是经过了多少么长的时间，才逐渐地适应了这种崭新的生活方式。

奇特的解手方式

董黎明穿上那件足有 30 斤重的老羊皮得勒、那双齐膝的毡疙瘩，几乎迈不开步，走不了路。她恼了，一屁股坐在毡子上就要脱靴

子。老阿妈一把抓住她：冬天冷哩，风雪大哩，不穿靴子要冻坏哩！董黎明还没见过草原上的风雪，不知道草原上的风雪到底有多厉害，但阿妈的话总不会错的。她试着走了几步，走出了蒙古包。

夕阳的余晖把草原染成了金子的颜色，在一片金子的背景之上，她看见几个同伴都是这副打扮，都在跌跌撞撞地学走路，不禁觉得十分滑稽，噗哧一下笑出声来。严灵瞥了她一眼说：“笑什么，看看你自己，整个一个小狗熊！”一群女孩子哄然大笑。这时，从男生的蒙古包那边又传来了小提琴拉出的“梁祝”，几乎每天在这个时候都能听见这支曲子，那旋律十分的缠绵委婉，似有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哀怨。严灵说：“这几个多情的梁山伯，又在那儿想他的小九妹了。要是他们穿上羊皮袍子和毡疙瘩拉梁祝，那才好看呢，非把祝英台吓跑了不可！”

这边几个女孩子嘻嘻哈哈地笑着，那边三位男子汉却毫不理会，依旧聚精会神，旁若无人，在草原的夕阳下，在暮秋的凉风中揉弦、运弓，不知他们是沉浸在古代美丽的爱情故事里，还是沉缅于思乡的柔情中。董黎明什么话也没说，她喜欢这旋律，以前在家里妈妈放这张唱片的时候她就喜欢，但此时的感受与那时的感受决不一样，她觉得只有在这远离家乡的地方，她才对这早就熟悉的旋律产生了深切的共鸣，才真正理解了这首著名的曲子。

肖萌也喜欢这支曲子，虽然他不会拉小提琴。他总是双手交叉抱臂，站在一旁，看他的伙伴们全身心投入地拉琴。这曲子让他忽而悲凉忧伤，忽而欣喜激动，一颗心忽而提起忽而落下，忽而轻松忽而沉重，种种复杂奇妙的感觉从他后背上一阵阵涌过，他却找不出一个词儿来准确地说出这种感觉。每天，当他独自一人面对着草原的时候，脑子里总是浮现出一个词：茫茫。他觉得，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虽然创造了那么丰富的词语，但此时此地，只有这个词最准确最合适最恰如其分了，它不仅准确恰当地形容了草原，而且准确恰当地表达出入在面对草原时的内心感受。“茫茫”里面，包容着无边无际的“辽阔”和“广大”，包容着未被开发的“原始”与“荒凉”，“茫

茫”中还透散出一股“野”味。当肖萌默念着“茫茫”这个词的时候，内心里就会升腾起一种豪放苍凉的感觉，一种孤独凄怆的感觉。面对草原，他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样的诗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那是曹操面对大海发出的慨叹，眼前这随风涌动的大草原，不就像那汹涌起伏的大海吗，所不同的，只是颜色。

有吃喝就要拉撒，有摄入就要排泄。草原上没有厕所，也没有可以遮挡身体的树木、房屋或是土墙，男生不在乎，随便找个地方都能解手，女生就不同了，她们胆小，羞涩，总要找个隐蔽的地方才行，于是就借蒙古包当掩护，躲在蒙古包的后面去解手。天气热了，日子长了，渐渐地从蒙古包的后面散发出一股不雅的味道来。一天，严灵和董黎明正在蒙古包后面“例行公事”，忽然阿妈大喊大叫着跑了过来，两个惊慌失措的姑娘虽然听不大懂阿妈的话语，但她们从阿妈愤怒的表情上已经明白：东窗事发，她们不该选择这里作为“排泄”的场所。她们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脸上是一副愧疚的表情。

她们都见过蒙古族妇女的解手方式，蒙古族妇女都是走到草原上，走到离蒙古包远远的地方，她们不需要什么“天然屏障”，蹲下来的时候，一袭长长的蒙古袍就是最好的遮挡，蒙古袍宽大的下摆，把她们身下的那块土地遮挡得严严实实，这就足够了，不管四周有没有男人。这就是草原上的厕所，这就是草原文明。没过多久，这些女知青们也都接受和学会了这种奇特的解手方式，而且运用得很熟练，她们都觉得这种方式很方便，这也是“入乡随俗”吧。

知青们在改变着自己原来的生活习惯，向牧民们学习着草原生活的新规矩，他们努力要让自己靠近牧民，变为牧民，在衣食住行方面都像一个真正的牧民。

可爱的牛粪

天变得真快，国庆走进蒙古包里吃饭的时候，还是一片湛蓝湛蓝的晴天，吃好饭出来，天空就被一片厚厚的铅灰色的云彩遮盖得严严实实，一丝蓝颜色也看不见了，好像是一个画匠，拿着一支巨大如椽的画笔，饱蘸着浓浓的色彩，飞快地把整个天空给涂抹了一遍。这个气势恢宏的画匠就是风，一阵紧似一阵的风，在天地之间呼啸作响的风。

10个知青都来自呼和浩特，四个女生六个男生。场里拨给他们一大一小两个蒙古包，还有47头牛，大都是些老弱病牛。一个老牧民领着他们和那群牛在白雪覆盖的草原上走呀走，走了好久，最后指着一个地方说，就把包扎在这儿吧。他又指着周围的一片雪原说，就在这片牧场上放牛吧。他帮着知青们铲去厚厚的积雪，在冻土地上把两个蒙古包扎起来，就掉头走了，雪原上撒下了10个知青。从那天开始，男生住大包，女生住小包，10个人开始了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放牧生活。没有人管他们，也没有人帮他们。少年不知愁滋味，10个人白天放牛，晚上吃过饭就聚在一起唱歌讲故事，自由自在的日子，好开心的日子，那群衰弱的病牛整天听见歌声不断笑声不断，也受到了鼓舞和感染，眼睛里有了光彩，增强了求生的欲望。

可是眼下毕竟是严寒的冬季，是草原上最冷的季节，是草原上最可怕的季节。果然，从西伯利亚刮来的风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

天变得很快，风来得很猛烈，国庆自从来到草原，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风，如果光是刮风倒还罢了，风中又挟裹着雪花，雪花一会儿密密地落下来，一会儿又被风夹带而起，在狂风中飞舞，在雪原上旋转，像一片白色的蛾子，越聚越多，越来越密，遮盖了天空遮盖了雪原，天地之间只剩下这片狂飞乱舞的白蛾子，别的

什么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

10个城里长大的孩子，被这场巨大的暴风雪骇呆了，他们躲进了蒙古包，把门关紧，把每一个漏风的缝隙堵严实。他们惊魂未定地坐着，听着包外呼号的风声，听着夹在风里面的“哞哞”牛叫声。那些可怜的弱牛，那些本来就弱不禁风的瘦牛，它们已经被暴风雪打倒在地，趴卧在牛栏里，只有凄凉的哀鸣，没有反抗的力气。知青们想起了那两头顽皮的小牛犊，他们勇敢地冲进白毛风，冲进牛栏，把两头小牛犊拉进了女生住的那座蒙古包，至于别的牛，他们实在无能为力管它们了。

“虽然孤零零地被暴风雪围困着，但我们正值不知愁的年龄。”20年后国庆回忆说。

暴风雪在蒙古包外肆虐地狂叫，蒙古包里的故事会和歌咏比赛却渐渐进入高潮，10个不知愁的孩子聚在羊油灯那摇曳的光亮之中，怀着又兴奋又害怕的心情，听“故事篓子”鸿革讲鬼怪的故事，讲福尔摩斯的故事，“绿色尸体”、“一只绣花鞋”、“四签名”……听完了，女知青吓得不敢回自己的蒙古包去，可是听完了还想听，越害怕越刺激越想听。

有一天下午，故事会开得正热闹。宝来出去解手，好半天也没回来。宝来本来就是个大不爱说话的小伙子，他在不在场都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加上大伙又都听在兴头上，所以谁也没察觉。后来，有人说：“外面好像有人叫唤。”他这一说，大家都竖起耳朵来听，果然，在狂风的呼啸声中确实有人在喊，声音很凄厉，像是遇到了危险时的呼救。“宝来不在了！”有人惊叫了一声。每个人都飞快地扫视了一下包里的人头，“一定是宝来！”这一说，大家才如梦初醒，脑子里都不约而同地飞快闪过一个字：“狼！”九个人迅速穿戴好，掀开包门冲了出去，有人还顺手拿了打狼的家伙。“宝来——宝来

”九条嗓子一起扯开了喊，那声音刚出口，就被风吹得无影无踪，他们使足了力气放声再喊：“宝来——宝来——”喊完了，用手拢着耳朵细听，终于听见了微弱的回声：“哎——”大家高兴坏了：

还好，人还在。他们喊喊走走，走走再喊，终于见着了人影，一伙人惊喜万分地冲那人影扑过去。宝来什么事情也没有，没有狼，在这种天气里狼也躲在自己的窝里不敢出来了。宝来只是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蒙古包了。其实他离蒙古包只有十几步远，但暴风雪把蒙古包整个地遮盖了。有了宝来的教训，再出去解手，都是几个人搭伴儿去，谁也不敢一个人出去，既怕迷路，又怕故事里的那些鬼，男生女生都怕，连讲故事的鸿革也怕。

三天过去了，暴风雪一点停的意思也没有，四天过去了，暴风雪更加凶狂了。知青们倒不在乎，他们有吃有喝有说有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安排得既充实又多彩，他们甚至有点喜欢这种天气，正是这种恶劣的天气给他们创造了这种热闹欢乐的气氛和生活，不用放牧，不用干活，蒙古包里整天笑声不断。

他们也常常想起那些弱牛，有时也去看一眼那些弱牛。“牛真可怜，牛栏里的雪都这么深了！”国庆回到蒙古包里，用手在膝盖处比画了一下。

“我们也没有办法，救不了它们。”

“咱们是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呀！”

是呀，这种鬼天气，到哪里去找草料，到哪里去找个背风暖和的地方？只能听天由命了！

其实，牛如此，知青也如此，只不过开始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人在自然面前，永远是渺小的。”能言善辩的鸿革把他的故事撂在一边，忽然发出一阵感叹。

“不对，毛主席讲过，人定胜天，人的因素第一！”立刻有好几个声音反驳他。

“这种天气，你能战胜得了吗？你怎么战胜？你不是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蒙古包头，连那几头老牛也救不了吗！”

刚才那几个拉出一副雄辩的架式，准备用“最高指示”进行“大批判”的人不做声了。任何大道理在这场暴风雪面前都没有用，都

显得那么软弱。还是马克思说得对：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晚上，吃完了世奎做的热乎乎的羊肉面条，大伙的精神头又上来了，正议论着今晚的“文娱活动”怎么安排，世奎忽然冒了一句：“牛粪快没了。”这句平平常常的话吓了大伙一跳，浓浓的兴致一下子全没了。他们忽然从多日的浪漫情调中回过味来：生活可不光是整天唱歌讲故事，还要吃饭，还要取暖，第一位的是生存哪！在这暴风雪的天气里，黑乎乎的牛粪比什么都宝贵比什么都重要，没有牛粪，吃什么？烧什么？

“哎呀妈呀，”有人叫了起来：“这白毛风不知得刮到哪天才能停，这冰天雪地的，没牛粪不要了命了！”

歌也甭唱了，故事也甭讲了，赶紧先研究牛粪问题吧。几个女生勇敢地提出：“我们那个小蒙古包白天也没人，就晚上回去睡觉，干脆别点火了，停一个炉子，能省出不少牛粪呢。”

“那你们夜里多冷啊！”

“我们多盖点呗！”

“把我们男生的皮袍子也拿去！”

蒙古包外的温度有零下40度，不生火的蒙古包里，温度比包外高不了多少，简直就是个冰窖。国庆她们四个女生，把被窝铺好，把能压能盖的衣服物品全都压上盖上，然后穿着衣服钻进去，再把头严严实实地蒙住，要不然脸就冻坏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头发上挂着一串一串的小冰溜子。要刷牙，转身去找牙膏的时候，牙缸里的水就冻上了，连牙刷都冻住了。

女生的蒙古包里还有两个“小客人”，那两头可怜的小牛犊。它们除了冷，还有饿，它们已经好几天没吃草，一点玉米料也早吃光了。饿极了，它们什么都吃，什么都咬，咬衬衣，咬被子，吃女生的腰带，够着什么吃什么。

看到女孩冻得那副凄惨可怜的样子，男生大动恻隐之心：“干脆，搬到我们蒙古包里来住吧，人多了还暖和。”几位女生先是面有

难色，扭捏了一会儿，就答应了。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候，还顾及什么呀，反正都是穿着衣服睡觉，白天大家伙不是都嘻嘻哈哈随随便便地呆在一起吗？谁的心里都很纯净，谁的心里也没有那些个肮脏的东西。男同胞十分热情地欢迎，他们让出蒙古包里最好最暖和的地方，又全体出动，帮着女生搬行李，搬羊毛毡。小蒙古包里更加冷清了。两只小牛犊用可怜巴巴的眼睛看着知青们有说有笑地走了，厄运却一步一步地离它们近了。

声嘶力竭的老天爷终于感到乏累了。当日夜不停的暴风雪呼喊到第六天的时候，它的底气不足了，它的势头减弱了。10个青年人一起走出了蒙古包。

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怎样一副景象啊！暴风雪在五天里把一切都改变了：草地没有了，营盘没有了，牛栏没有了，沙丘没有了，只有一种东西，就是覆盖了一切的雪，只有一种颜色，就是银子一样的洁白。草原是白的，营盘是白的，牛栏是白的，随便你往哪里看，全都是白色的。那一群牛已经荡然无存，甚至看不出它们身体的轮廓，大雪先是覆盖了它们，然后狂风又把覆盖它们身体的积雪抹平，一米高的牛栏整个地被大雪填平了，已经与茫茫的雪原连成了一片。暴风雪这个残害生灵的屠夫，把屠杀的现场完全掩盖起来了，不露一点屠杀的痕迹。那些可怜的牛！

对知青来说，最可怕的是最后一点牛粪也已烧光，最值得庆幸的是恰在此时雪住风停。10个人全体出动，寻找可以烧火的东西。在雪原之上，露出一些干枯的野草，稀稀落落，孤零零，衰弱地在寒风中摇晃。草棍很细，只有毛衣针般粗细，但它毕竟是可以燃烧的，大家就分散在雪原上，去折那些干草棍，一根一根地折，凑够了一把，就放到麻袋里。风依然很硬，天依然很冷，肚子里饥肠辘辘，手冻得不好使唤，可是为了吃饭，为了取暖，为了生存，他们不能不干，不得不干。天黑了，打着手电筒继续干，一直到11点多，他们才精疲力竭地拖着三麻袋草棍走回蒙古包。谁也没有心思说笑话了，谁也没有力气讲故事了，10双饿疯了的眼睛紧盯着地中央的那口

锅,恨不能就把那口锅吃下去。

草棍不禁烧,所以只能做一顿最经济最简单的饭。世奎先在大黑锅里放了一块羊油,白色的羊油块慢慢融化为清亮的液体,当受了热的液体开始冒烟时,世奎又放进几碗小米翻炒起来。蒙古包里渐渐有了一股炒米的香味。唾液在青年人的嘴里泛出来了,他们都使劲忍着,急不可耐地等着。

“午夜12点,我们一人分到一小碗炒米吃起来,干硬的小米味虽香但难以下咽。剩下的草棍化了一点雪水,我们就用温吞水把粘在喉咙里的小米送下去。”国庆回忆说。

那是他们10个人插队生涯中最难忘的一顿饭,恐怕也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顿饭。

风雪的余威又持续了两天,一直到第八天夜里才完全停息。这八天里,10个知青体验了许多,领悟了许多:无忧无虑的欢乐,生死相依的友谊,断炊断火的恐惧,对牛群爱怜而又无力救助的愧疚与自责……他们看到了大自然的威风、神奇和凶残,感觉到自身力量的微弱与渺小,他们一下子成熟了,长大了。

“如果暴风雪继续刮上几天几夜,我们会不会像那群牛一样呢?”事过之后,他们心有余悸,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

在暴风雪中

草原上最可怕的敌人是狼,最可怕的天气是暴风雪——对牛羊如此,对知青也是如此,如果单凭自己的力量,他们很难战胜凶残无比的天敌,草原上的知青绝对离不了牧民的帮助。

草原的春天来得晚,已经是五月了,嫩绿的小草才出土冒尖,高的也不过两三寸长,刚刚没过脚脖子。新出土的小草嫩嫩的,茸茸的,水分足足的,味道美美的,嚼了一冬天干草的羊儿,头一埋下去就再不抬起来,只顾香甜地吞食嚼咽。但是草太小了,羊吃得太快了,所以春天放牧常常要跑很远的路。

凤鹃和珊珊看护着羊群，一个在左一个在右，防止那些贪吃而又不守纪律的家伙走散了。她们要不停地轰赶不停地吆喝。要是在夏天就好了，草长高了长密了，找一块草地，让它们可劲儿吃去吧，吃上一天也吃不完，放牧的知青往草地上一倒，聊天也行，看书也行，哪用得着这么费心费力气！

中午的时候，她们看见了两座蒙古包，一座是乌力吉家的，一座是知青的，那里住着五个男生。凤鹃和珊珊跟乌力吉一家和那几个男生都很熟，常来常往——到蒙古包里去喝碗热乎乎的奶茶吧！

知青的那座包里是空的，乌力吉家那座包里有阿妈在，她热情地欢迎两个姑娘，忙着在锅里添上水，开始烧茶。草原上的牧民向来好客，而阿妈又格外喜欢这两个姑娘，她问她们饿不饿，要和面给她们做羊肉面条吃。真想吃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肉面条，真想阿妈的蒙古包里多待上一会儿，到了阿妈的蒙古包里，总会有一种“家”的感觉、“家”的亲情，阿妈那慈善可亲的话语和面容，常常让她们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妈妈。

蒙古包外的风声更响了，雪花从包顶飘进来了，落在铁锅里，落在地毯上。“都五月了，还下雪？”珊珊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可别小看这五月的雪，一边下一边化，化完了再冻冰，比冬天的雪还厉害，能把人和牲畜都冻死！”

听了阿妈这几句话，凤鹃一下慌了，赶紧跑出去看羊，可是哪里还有羊的影子，旷野上，除了白茫茫的大雪，什么也看不到了。

“珊珊，快走，羊不见了，得赶紧找羊去！”

珊珊一听也急了：“咱们往哪个方向去追呀？”

阿妈这时也赶了出来：“羊群准是顺风跑，顺着风追！”她返身又从蒙古包里找出两件旧皮袍子，大声命令着：“穿上，赶紧穿上，要不你们会冻坏的！哎，这天气，连碗奶茶也没喝上。”阿妈唠唠叨叨地叹息着，看着两个姑娘跑远了。

珊珊和凤鹃在蒙古包里坐了不过几分钟，连锅里的水还没烧开。“羊群不会跑得太远。”珊珊在心里祈盼着，可是两人追了半个

多小时,依然见不到羊群的影子,真是急死人!茫茫旷野之上,蒙蒙风雪之中,只有两个姑娘在奔跑,她们不辨东西南北,不知羊在何方家在何方。退,退不得;追,追不上。“我们会不会迷路,我们会不会冻死?”凤鹃和珊珊两个人的脑子里都闪过相同的念头,但是她们谁也没有说出来,谁也没敢说出来,她们害怕说出来会吓着对方也吓着自己,其实她们自己已经很害怕了,一只恐怖的大手紧紧攥住了她们的心。可是她们还是在跑,她们不能不跑,她们必须要把羊群找回来!

“看,羊蹄印!”珊珊惊喜地叫起来。的确是羊蹄印,还没被风雪盖住。“一定就在前边,不远了,咱们快追!”两个跑得精疲力竭的姑娘这下又来了精神,她们看到希望的火光在前面跳闪。

终于听到“咩咩”的羊叫声了,看到顺风傻跑的羊群了,两个姑娘一阵狂喜,拼命追上去,大声地吆喝叫喊拦阻,挥舞着牧羊鞭在风雪中跑动。可羊群就是不肯停下,不肯掉转头。她们急眼了,用鞭子使劲地抽打羊群,羊群终于停下了。它们使劲拥挤在一起,不安地叫着,慢慢把头掉转过来。现在它们面对着暴风雪,她们也面对着暴风雪,风雪的势头一点也没有减弱,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到脸上,落到皮袍上,落到羊身上,融化了,化为雪水,再慢慢地凝固,结为晶莹的冰粒。最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它们跟她们一样,对暴风雪也有一种恐惧,在暴风雪面前它们只想逃跑,不想反抗,因为逃跑要容易得多,而反抗太难了。

凤鹃和珊珊此时心里倒踏实了许多,因为她们追上了羊群,拦住了羊群,跟一大群羊在一起,要比孤零零的两个人在一起胆子壮。在风雪弥漫的草原上,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中,这群有生命有血肉能呼吸能跑动的羊,是她们的同伴她们的慰藉她们的依靠。可是这群羊又是这样不听话,不配合,不解人意,它们有时慢腾腾地走几步,风头一大就想掉过头去顺风跑走,按这个速度,什么时候才能走回家?

天色一点一点暗下来了,风雪的势头也稍稍小了一点,珊珊看

了一眼手表,已经三点半了。“天黑了怎么办?草原上没有参照物,很容易迷路的,要是迷了路,要是再碰上狼……”珊珊不敢往下想了,她的泪水流出来了:“今天怎么这么倒霉!”

凤鹃则感到了饿。早晨她什么也没吃,中午去阿妈家喝奶茶是她的主意,那时她就有些饿了,她很想喝碗奶茶,吃些炒米。“阿妈干什么总是慢慢腾腾的,”她在心里边埋怨着,“要不然,也不会耽误那么半天。”肚子一饿,身上就越发觉得冷,啊,还是阿妈的蒙古包里好啊,可是阿妈的蒙古包在哪里呢?

两个人一边赶羊一边想着各自的心事,虽然谁也不讲话,但彼此都心照不宣,她想到的,她一定也想到了。不管怎么害怕怎么着急,她们只有一条路:往回走,把这群该死的羊赶回去,除此没有别的出路。

突然她们听到了喊叫声,那声音被风刮得时有时无时断时续,“是狼!”珊珊脑子里首先闪过的就是这个念头。“一定是狼,狼发现我们了!”珊珊要哭出声音来了。凤鹃此时倒沉得住气,她用手拢着耳朵仔细听了一会儿,高兴地叫起来:“是喊我们呢,喊咱俩呢!”珊珊也拢起耳朵来,没错,是一个男子汉的声音,听得越来越真切了:“嗨——喝咿,珊珊,凤鹃——”

“哎——我们在这呢?”两人一起扯开嗓子,声嘶力竭地大叫起来。

白茫茫的风雪中出现了一个黑点,那黑点越来越近,越来越大,马蹄声也越来越响了。看清了,终于看清楚,是乌力吉,阿妈的儿子乌力吉,他骑在马上那么高大英武,就像从天而降的天兵天将。两个几乎绝望的女孩子一起朝他扑过去,满满一肚子的委屈这时“哇”地一声喷涌而出,在亲人面前,可以痛痛快快地大放悲声了。

“别哭了,咱们赶紧把羊群赶回去!”乌力吉立在马镫上,熟练地用手里的套马杆套上一只头羊,那头羊此时毫不反抗,乖乖地跟乌力吉往回走。这些欺软怕硬的畜生!

羊群踏上了回家的路，乌力吉在前面领路，凤鹃和珊珊在后面轰赶。天渐渐地黑了，风渐渐地小了，雪渐渐地停歇了。两个姑娘看不清乌力吉的身影，但能清楚地听见他不断发出的呼喊声：“嗨——喝咿！嗨——喝咿——”多好的乌力吉呀，有他在，就什么也不怕了，不怕天黑，不怕迷路，不怕有狼，更不怕对付不了这一群羊！

知青跟牧民的感情就是这样结下的，这岂止是莫逆之交，这是生死之交啊！

草原上的牧民在影响着知青，辽阔的草原本身也在改变着知青，城里来的知青在草原上变得成熟、开朗、豪放、胸襟坦荡，只有在大草原上他们才能够变成这样，所以他们感谢草原，怀念草原，回城以后又一趟趟地跑回去看望大草原。他们把对草原的殷切思念写进一本书里，当时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布赫，给这本书题词说：“草原上的人们永远记着这一代青年”。

第十一章 黄土高原：到革命圣地干革命

一年里头最冷的是一月，在1969年的一月，二万六千名北京知识青年分几批踏上了陕北高原。

尽管地广人稀，但是就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而言，陕北远谈不上优越。北京安置知识青年，绝大部分是向东向北，向着黑吉辽肥沃的黑土地，向着内蒙古绿色的大草原。1967年和1968年都是如此，为何在1969年开年之初，选中了西北这块植被稀少、土质贫瘠的黄土地？在采访和交谈中，一帮子知青大都推测说，这恐怕主要是出于“再教育”的考虑。陕北是老根据地，老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当年陕北人民用延河水和小米养育了工农红军和党中央，现在工农红军和党中央再把他们的孩子送回陕北来，让陕北老乡养育革命的“下一代”。党中央对陕北老乡们寄予着厚望，陕北知青里也的确出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有不少从政的，一直当上了国家部委的司局长。难道真的是陕北老乡擅长再教育？

走 进 圣 地

火车只通到铜川，再往北，就得坐汽车了，不是那种有座的客车，而是解放牌大卡车，在北京城里只用它拉货。知青们一个紧挨

一个挤坐,开始还说说笑笑,还有歌声,慢慢地,一股寒意沿着伸不直的两条腿往上窜,脚麻了,脚僵了,车厢里歌声消了,语声少了,只有陈旧的马达发出的吭哧吭哧的声响。汽车满载着知青,吃力地驶入宜君、黄龙、黄陵、洛川、富县、宜川、甘泉,驶入延安、延长、延川、志丹、安塞,大片起伏的黄土地也驶入了知青的视野。这一带恰在凤翔、铜川、韩城一线以北,按照地理划分,正是黄上高原的中部,俗称陕北高原的地方。

赵小阳进陕北的那天,正值一场大雪,大片的雪花静静地飘洒,天地之间茫茫一片,不见村庄,不闻犬吠,只有向前奔驰的汽车和向后奔驰的高原。赵小阳脑子里蓦地跳出两句诗:“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对了,眼前看到的,正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啊,他兴奋地喊了起来!

33年前的冬天,诞生于长江以南湘江之畔的毛泽东,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来到陕北,他看到的,可能就是这种景色。北方独有的大雪,高原独特的地貌,与长征结束之后就像一个历尽艰险的疲惫旅人终于寻到一块可以立脚生息之地的那种喜悦,全都融在了一起,四十岁出头的毛泽东豪情大起,诗兴大发,填写了那首气势磅礴的《沁园春·雪》;33年之后赵小阳踏上这块向往已久的传奇土地,这块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发生过极其重要作用的土地时,内心里不仅响起了毛泽东的诗句,还升腾起一种庄严神圣、兴奋激动的感觉。他望着那些绵延不断的丘陵和纵横交错的山梁在想,如果它们会说话,每一座丘陵每一道山梁都能讲出一段二三十年前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经历,都能讲出一个著名的战役,都能指给你看元帅和将军们当年留下的那些遗迹。它们就是见证人,它们就是历史啊!

但是真正的历史见证人是陕北老乡,这是赵小阳在以后才体会到的。

陕北吸引着知青,在那些上山下乡十分积极的北京中学生心目中,陕北的诱惑力丝毫不亚于黑龙江和内蒙古的生产建设兵团。

这里是红色根据地呀，这里是党中央住过13年的地方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就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司令部啊！论历史，论资格，谁能比得上陕北，谁能比得上延安？！早几个月去了山西的燕陵生后来听到去陕北的消息，又急又气地在日记里写到：

“……听说下批人到延安，气死了。自己红祖宗的老家，见也见不到更出不了什么力。延安人、延安地多好啊，从小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它，结果差一点没去成。黄黄的土，红红的脸，白白的头巾，蓝蓝的天，减租减息，闹土改，婚姻自主，我爱它。没法子，闹革命不分地区，好好干吧！延安，我一定去看你。”

但是极目所望，千山万壑，树木冷落，人烟稀少，视野开阔，景色单调，知青的心头又浮起一种苍凉的感觉。

陕北高原山沟交错的地貌，是远古时代冰川冲刷的结果，而植被稀少水土流失却是人为所致。一些陕北老乡说，过去这里的树也不少，后来人多了，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人，这么多人要吃粮要烧柴，渐渐地，陕北高原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富县往北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过去在学校里学地理，只知道陕北一带是黄土高原，到了陕北才知道，黄土高原的地貌还有塬、梁、沟、川之分。这区别都是雨水冲刷切割造成的。有的地方，沟壑很深，立陡立陡的，垂直高度可达几十米，如果不小心，会失足从塬上跌下去，称为“掉崖”，北京知青就有好几个掉崖摔死的，像延长县安沟公社的张大力、宜川县云岩公社的常翠等。

河谷两岸平缓的地方叫川，气候较湿润，水源又充足，是种粮的好地方，日子自然也要富裕一些，因此人称“米粮川”。

夏季沟里常发洪水，所以老乡大都住在塬上，但塬上用水紧张，常常要到沟里去担，一上一下有时要走一里多路，远的甚至有三四里路。

朱玉娟回忆起插队的日子说，最难的是用水，最怕的是担水，

担水这活主要的倒不是累,而是险,今天想起来都后怕。你想啊,那种路不是修出来的,而是人在崖坡上踩出来的。崖坡很陡,又都是黄土,下雨下雪,就成了光溜溜的“滑梯”,即使空着手走都要小心翼翼的,何况再压上几十斤的一副水桶。坡是斜的,要是把担子撂下了,小半桶水就洒没了,所以担上水桶就得一口气担到底。朱玉娟说,每次挑水,我们都是几个知青一块去,如临大敌。后来村里用毛驴驮水,毛驴活忙,还得拉磨拉庄稼,这样水要限量分配,队长想了个办法,发水票,一张票是一驮,两桶水。开始队长照顾我们五个知青,两天给三驮水,后来毛驴活多了,改为三天两驮水,合一天一桶多一点。这些水首先得保证做饭和饮用,除了吃喝,只能剩下个桶底子。我们刚下乡时爱干净,下了工回来就洗呀涮呀,后来用水紧张了,早晨沾一块湿毛巾,几个人挨排在脸上抹一遍,就算是洗脸了,一两个月洗不上一次头,洗不上一次衣服。生存环境的改变,把我们的生活习惯都改变了,把我们的尊严也改变了,整天蓬头垢面的,刚下乡的时候笑话村里那些婆姨,现在样子还不如婆姨们体面呢,虱子也生出来了,每天晚上几个人凑在油灯下抓虱子。有一次毛驴病了,两天没拉水,我们累得实在不想下沟去挑水,就跑到牲口棚里舀了两盆喂牲口的水做了一顿饭。现在讲起这些事来觉得好笑,但那时心里只有一种悲凉和凄惨。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到了那个时候,那种环境,只想着能吃饱肚子睡个好觉,别的什么干净啦卫生啦脸面啦仪表啦,统统都顾不上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正对面地坐在王府井南口的麦当劳餐厅里,桌上有干净的托盘、雪白的餐巾纸和精美的巨无霸,还有奶昔、啤酒和可乐,都是当今世界流行的饮料。朱玉娟似乎对这些吃食都不感兴趣,她的神思荡回到25年前的黄土高原上去了,荡回到那两盆饮牲口的水上去了。

齐立航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常听爸爸妈妈讲延安,当年爸爸是中央党校的,妈妈是鲁艺的,有时他们的老战友来了,几个人一

道坐在客厅里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四十年代，聊到了延安。妈妈的好朋友廖阿姨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那段好听的旋律。廖阿姨的嗓子真好，齐立航和姐姐最爱听她唱歌，妈妈说她当年在鲁艺里头就是个“名角儿”。只要廖阿姨一起头，爸爸妈妈就会随声附和着唱起来，他们的眸子变得越发明亮，闪着光彩。姐姐悄悄地告诉齐立航：他们是在回忆自己的青春呢，回忆他们青年时代最美好的那一段时光呢……

令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那么怀念、那么神往的延安究竟是什么样子呢？父辈的回忆引发了晚辈的遐想，齐立航内心里早就涌动着—个愿望：一定要上延安去，看看延安，领略延安，感受延安。现在如愿以偿，终于来了。类似齐立航者不在少数，许多知青的父辈曾经在延安工作过、学习过，在陕北打过仗甚至流过血负过伤，现在，这些青年人怀着一种“老革命后代”的优越感觉，到爸爸妈妈当年干革命的地方干革命来了！

窑洞里住进了北京娃

知青中还有一批志向更宏大的人。

清华附中有一批全国最早的老红卫兵，他们由于较早地介入了“文化大革命”，有一种较浓厚的参与政治的兴趣和较强的救国救民意识。陶正谈到他们当初到陕北插队的初衷时说，他们是带着“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志向下去的，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先进的，根本就没打算什么“接受再教育”。他们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先从一个村、一个生产队做起，先搞社会调查，摸清那里的阶级状况和经济状况，然后“看准机会”夺取生产队大权，搞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样板，再以此作为试点进而“改造中国”。陶正说，我们上山下乡的动机很明确，就是要改造中国。他们到陕北时，还带去了红卫兵的旗帜和印刷工具，办起了《红卫兵通讯》，白天干活，收工回来写稿子刻钢板搞印刷，然后发到全国各地去。

毛泽东在 1958 年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在 1968 年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在毛泽东看来，劳动人民比知识分子更高明，生长于穷乡僻壤的农民比浸润于城市文明的知识青年更高尚。

知识青年可不以为然，不论在上山下乡之前，还是在上山下乡之中，他们都没把自己看得那么低，也没把农民看得那么高。这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有的人外溢于言表，有的人深藏于内心，有的人即使在道理上对毛泽东的指示坚信不疑，在潜意识里也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其中干部子弟尤甚。

知青们高看自己，老乡们也高看知青；知青不相信“接受再教育”，老乡也并未认真思考过“实施再教育”。原因很简单：知青是读书识字的“文化人”，知青是“城里人”，尤为重要的一点，这些知青是“北京娃”，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娃，陕北老乡把对毛主席的崇敬之心，不自觉地融入了对知青的印象之中。

许多地方都郑重其事地举行了欢迎仪式。在延川县关庄公社举行的仪式上，清平川里几十个村庄的老乡们，除了不能行走和离不开身的都来了，大华代表知青上台讲话，他往下一看，黑压压的一片，“把这山下村庄所有的空地都挤满了。孩子们脸上抹了些紫红的颜色，几十支队伍兴奋地跳着，大鼓、腰鼓、锣鼓插得轰天价响，会场上空弥漫着一片黄尘，看得出人们是由衷地高兴。”这场面像是过节，这场面比过节还热闹。这么高的规格，哪里是迎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分明是隆重接待“上面”来的“贵客”。

知青的到来能引得老乡们如此动情还有一层重要的原因：陕北太闭塞了，生活太单调了，能够让他们兴奋欢悦的事情太少了。事后大华听人说，除了 1935 年红军到达陕北，1947 年胡宗南军队重点进攻延安，这是第三次外地人大量到此。有意思的是，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时候人数不足三万，而 1969 年来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也是不到三万人，这不到三万人的知青里

面，有一些就是那不到三万人的红军的后裔。

欢迎会开完了，知青整体被一块一块地分解开安排到各村去。不是村村都有，一般只选那些条件稍好的村队，而位置过于偏僻环境过于恶劣的地界儿无缘。分到了知青的大队，就敲着锣鼓，簇拥着把知青接走，好像那些“贵客”一般的知青给他们争来了脸面争来了荣誉似的，分不到知青的村队就只有羡慕的份儿，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兴高采烈地把知青接走。

从进村的那一刻起，从真的置身于陕北老乡之中的那一刻起，这些优越感极强的青年人，内心里那股子热情和兴奋劲很快地暗淡下去了：怎么是这么个穷地方？怎么是这么帮子傻老乡？叶公好龙的故事在这里重演了。

赵小阳他们还没进村呢，远远地，就看见村子口黑压压地站了好些人，渐渐走近了，看清楚了：抱孩子的婆姨，头上围条黑乎乎羊肚手巾的汉子，拄拐杖的老人，流鼻涕的娃娃，恐怕全村的人都来了，眼睛定定地看着他们。赵小阳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他把头掉转过去，碰上的还是傻呆呆的眼睛。“真傻，这帮人！有什么好看的！”赵小阳在心里说。

村里人的眼神跟着这十几个知青的身子挪动，脚步也跟着知青们挪动，前呼后拥的，一直把他们送到一孔窑洞前。

还是在半路上，赵小阳问接他们的村长：这地方能不能听广播？半导体收音机效果好不好？村长说去年拉过一次广播线，响了没几天就断了，半导体收音机还从来没见过，一会儿进了村得开开眼。

这会儿他来了，要赵小阳把那“会说话的小盒子”拿出来看看。赵小阳就坐在炕上，把半导体收音机拿出来调试，这一下把人引来了，一个拥着一个，把他团团围定，后面的看不见就大声嚷嚷，往前推搡，推得前边的人站不稳当。外面的人还在不断往窑洞里拥，一村子人都想拥到这小窑洞里来。赵小阳被一群黑黑的脑袋和一

股强烈的呛人气味熏裹着，心里直恶心。村长急了：出去出去，都出去看去！

场院上摆了张小桌，桌子上还垫了一块红布，红布上“供”着那个神奇的“小盒子”，老乡们跟敬神似的，围成一圈看赵小阳摆弄。“小盒子”偏偏不争气，兴许是挪了个新地方，认生。赵小阳拨了半天只拨出两个台，还不清楚，杂音很大，一会儿呜呜地响，一会儿尖声地叫。不管怎么说，总是听见了声响，老乡们的眼睛里都透射出敬畏的目光，有个小伙子自以为是地解释开了：那尖叫声是狼，那呜呜响是哭，狼要吃人，把人吓得直哭。知青们都乐了，他们彼此挤着眼睛，会心地开怀大笑，笑的是老乡的无知。围着看的乡亲们也跟着笑了，他们不明白知青们笑个啥，只是跟着傻笑，两个抱孩子的女人咧开的嘴里露出一口黄牙。“可能一辈子也没刷过牙！”赵小阳想，“这就是贫下中农呀，就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呀，那还不都得让他们给教育傻了呀？”

刘莉莉她们五个女生，进村的头一顿饭是在队长家里吃的，队长的婆姨是个手脚麻利的女人，灶台上支起了饴饴床子，细细的灰白色荞面饴饴从床子上压出来，落入开水翻滚的锅中，几个女生觉得新鲜，一边看一边议论一边猜测着那细面条的滋味。这时，队长的婆姨拿起一块黑黑的布，就是当地自家织的那种粗土布，但已经看不出布的本色和纹理，她先用那块布擦锅台，然后又用它擦饭桌，最后拿着那块布十分麻利地擦饭碗擦筷子，她擦得很仔细很卖力，把每个碗的里里外外都擦到了，这是待客呀！擦完了，饴饴也煮好了，每人盛上一碗，摆在桌上，桌上还摆着拌面的稍子、辣子，看着那冒热气的饴饴，看着擦得干干净净的碗和筷子，莉莉一点食欲也没有了。

赵小阳他们村，7个知青里有4个是干部子女，虽然家长有的靠边站了有的被打倒了，但家里日子还算宽裕，下乡头一年知青一切花销都要家里边寄，赵小阳他们花钱的手脚都很大。下乡不久，他就学会了抽烟，上供销社买烟都买高档的。“那时村里最好的也

就是‘飞马’和‘黄钟’，”赵小阳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手里夹着“红塔山”对我说，“我们知青买烟都是整条整条地买，村里的老汉都是抽卷烟，农村青年有时显阔气买一盒纸烟，也是拣最便宜的，九分钱一盒的‘晨鹤’。二队的知青更牛，他们嫌推磨太累，就买一头老毛驴磨粮食，老毛驴便宜，十几块钱就能买一头，买了也不好好喂养，用上一两年，死了再买，反正他们对十几块钱也不大在乎。”在生活水准上，知青比老乡优裕，这一点连狗都能分辨得清，即便穿得再破，那狗也能分得清哪是知青。

由于水土不好，加上近亲结婚，所以“憨憨（即傻子）”很多，几乎哪个村里都有几个，有本村长大的，有外村嫁过来的，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只会定定地看着人或是吃吃地傻笑，这些个憨憨，使知青心中的陕北老乡形象更加暗淡。知青们每天晚上躺在用老乡打来的柴禾烧的热炕上，听着西北风夹着沙土打着窗纸沙沙作响，议论着这些天的见闻和感受，其中的一个话题就是老乡的呆气、傻气、穷气、臭气，“汉”们和“婆姨”们成了某些知青嘲笑的对象，有时是背后窃窃耻笑，有时就当着脸放肆地大笑。

知青们是自视清高，老乡们是自惭形秽，知青们是居高临下地俯视老乡，老乡们是自下往上地仰视知青，这是下乡之初一种十分普遍的心理。

老资格的放羊汉

自以为高贵的赵小阳们错了，他们大错特错了，陕北这地方绝对不能小看。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到1948年3月23日党中央领导机关在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解放区，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住了13个年头，经历了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这里是新中国建立之前党中央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这里的土地上演出过威武雄壮的史诗，陕北老乡在这些史诗里担当过重要的角色。日子长了，听得多了，慢

慢熟了,知青才察觉到:土里土气的人堆里,藏着龙卧着虎呢,相貌不扬的老乡里,有些人具有将军般的革命资历呢。

队里分派赵小阳跟着一个姓刘的老汉去放羊。开头一阵子他嫌那个老汉身上有股子味,晌午的时候把衣服脱下来抓虱子,还一口一口地吐粘痰,就老是躲得他远远的,老汉喊他他装听不见,拿着本书看。有一天老汉问他看的是啥书,他说是毛主席写的书,老汉一听到“毛主席”三个字眼睛放亮了,咧开嘴笑了:唉呀,毛主席可是能人呀,对我们可好哩,过年的时候还到我家里来,给我拜大年哩!赵小阳嘴上没说话,鼻子里“哼”了一声,心里说:吹牛吹得也太离谱了。老人看他那副神态,急了:咋?你不信?我还给毛主席送过信呢!红军刚到陕北那年在瓦窑堡开会,我还给毛主席站过岗呢,毛主席开会开累了,抽着烟出来溜达,还问我叫啥名字,是啥地方的人,毛主席可好了,老是笑呵呵的。那次会开的日子可是不短,有七八天,开完了会,彭德怀就领着红军过了黄河,上山西去打日本……嚯,这老汉还知道党史呢,赵小阳半信半疑地赶紧翻毛选的注释,老天,一点不差!这老汉了不得呀!一个多月来赵小阳头一回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大爷”。老汉高兴了,话匣子也打开了:“1945年那一回,毛主席要去重庆,跟蒋介石谈判,我们都不愿意让他去呀,我大(爸)说,那是蒋介石使的计谋呀,要害毛主席呀,可不能中他的奸计呀!毛主席不怕,非要去,谁劝也不听。临走那天我们都上飞机场去送他,也有部队的,也有乡亲们,毛主席戴着个白帽子,圆的,挺老大,上了飞机,走到门口,他就站在那达,把帽子摘下来了,用手拿着,冲着大伙一挥,我们知道,他是跟我们告别呢!毛主席自打1935年来陕北,10年了,没离开过这地方,这一次要走了,我们真怕他这一走就回不来了,替他捏一把汗呀。到底毛主席福气大,蒋介石不敢动他一根毫毛,他跟蒋介石签了协定,又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赵小阳心里渐渐升起敬意,但仍未打消疑虑,就问他:你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1935年么,就是毛主席他们来陕北的那一年

么，瓦窑堡会议就是那一年年底开的么。那年我就入了党了，村子里不少人都是那阵子入的党……”赵小阳吃了一惊，乖乖，比我家老子资格还老呀！傲气十足的赵小阳这一回被镇住了。

晚上他说起这回事，几个人其实早都掌握了一些情况，1934年入党的这村里还有三个呢，民生他爷爷就是跟着程子华的部队从河南过来的。给八路军、解放军当过挑夫、向导的就更多了。彭德怀、朱老总甚至王明、高岗，他们都见过，都能讲出一堆故事来，谁和善，谁不好说话，谁架子大脾气大好训人，谁口才好能做报告……搞不清他们的故事里面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掺进去的水分。

在延安县插队的马苏元，年三十的晚上到大队饲养员张文德家里去过年。张文德的婆姨60岁上下，问他认识延滨不，她说她奶过延滨。原来延滨是许光达的孩子，这让小马吃了一惊。接下来的话更让小马吃惊，她说她还给主席佬奶过娃，她说那女娃瘦瘦的，娃她娘可讲究了，每次奶娃都喊人端盆净水让她先洗干净。马苏元问她：那你能见到毛主席了？婆姨点点头说，主席佬大高个，待人和善，不爱说话。马苏元惊诧不已，那婆姨却讲得随意平淡，没有一点炫耀的意思，没有一点居功自傲的味道，甚至也没有一点光荣自豪的感觉，就像在讲一件普通的家常事。马苏元问：您老怎么不去趟北京，看看延滨，也看看那女娃？她摇摇头，挺坚决地说：奶个娃算甚了，人家当年给了咱钱，吃喝也好，咱不去麻烦人家！延滨来看她时给她留了一个记地址的纸条，她也没有收好，因为她压根就没想去，“咱不去麻烦人家！”她把这些事讲得越平淡，她那张掉了大半口牙、布满了皱纹的脸在马苏元心中就越不寻常越显高大。几天后马苏元为了印证这件事，又问过村里几个年岁大的老汉，他们说：咱庄当年驻的是军委总供给部，大概有这么回事。他们对这件事的评价是：受苦人婆姨给人家奶了个娃，算个甚！

在延安延长延川志丹等几个县，许多村里都有老红军，老八路，有的还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云南贵州四川走过来的，他们从不主动提起那段光荣史，也不觉得自己比村里其他人有

什么特殊，他们跟别人干一样的活，拿一样的工分，过一样的日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

这些个货真价实的老革命，把那些自命不凡翘尾巴的知青镇住了，光是他们的资历就足以让知青们惊讶，他们那种漠视资历的态度，更是大大地震撼了知青们的心灵。“比咱老子资格还老呢，人家不自傲，咱们有啥可狂可傲的？人家才是真革命真高人呢！”老乡们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平和，把知青们锋芒毕露的傲气打倒了，至少是部分地打倒了。事后赵小阳写了这样一篇日记：

“自打进村以后，我一直不把那些满身土气的老乡放在眼里，自以为父亲是部级干部，三八年的老革命，出身高贵，自命不凡，今天我才知道，这村里比我父亲资格老的人多着呢，光老红军就有八个，其中有老陕北红军，也有跟着毛主席长征到此的江西苏区红军，他们从不居功不自傲，从不吃老本，只想着立新功。我却以父亲的老资格做为自己骄傲的资本，相比之下太渺小了，太可笑了，我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小学生，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我在敬佩的同时，又为他们愤愤不平，他们为革命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今天却依然过着苦日子。张老汉告诉我，当年陕北红军要过黄河解放全中国，有些陕北籍的战士恋故土，不想过黄河，就领了两块大洋回家种地去了，村里好几个老红军就是这么留下来的。唉，当年一念之差，今日天壤之别，张老汉说他的战友里面，如今有当军区副司令、副省长、市委书记的，还有当中央委员的，他们留在村里的几个却依然是住窑洞点油灯的老农民，这公平吗？我跟张老汉说我要写信反映这个问题，他却跟我急了，一个劲说使不得使不得，说他们过得挺好，有粮食有婆姨，知足了。这些人，让我敬佩，又让我无法理解，他们完全有过好日子的资格和权利，他们为什么不去争，也不肯让别人替他们去争呢？”

这就是陕北老乡的思维方式、人生哲学。

知青们先是被“陕北老乡”显赫的资历镇住了，继而又被他们那种漠视资历的态度镇住了。一种无言的“再教育”就这样开始了。

“陕北老乡”们那种安于贫穷、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开始对知青们施加着影响,这种影响在“陕北老乡”一方完全是无目的无意识的,而在知识青年一方却感受到它的厉害。

饿着肚子咋搞阶级斗争

快过年了,过年是陕北农村一年中最大的喜事,因为一年到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把各种好吃的东西吃个够,吃个遍。不管男女老少,过年的最大心愿就是一个“吃”。房东家的立柱对张立昌说:“想要日,啥日子都行;想要吃,就得等过年。吃比日还难!”张立昌听了心想:老天,怪不得老祖宗说“食色性也!”

家家户户都在忙活着蒸白馍,炸油糕,酿米酒。上边有指示,让知青在农村跟贫下中农一块儿过年。小吴拎着半口袋刚磨好的白面走进窑洞,告诉张立昌:“唉,要饭的又来了,在场院那儿呢,大毛他们想撵走,老乡还不让,护着要饭的不说,还给他们拿粮食呢。”

这几天村里老有要饭的,有吹着唢呐来要的,有抱儿带女来要的,一拨一拨的。知青最讨厌这些要饭的,大家讨论过,一致的看法是:城里人还不在城里吃闲饭呢,要饭的肯定大部分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不劳动者不得食,对这些人不能可怜迁就!那些要饭的也害怕知青,躲着知青,看见知青过来就远远地绕开了。张立昌是插队知青的头儿,他怕大毛他们跟老乡发生冲突,急匆匆地说了声“走!”一帮知青去了场院。

场院上,村里的几个老人正围着两个要饭的汉子说话,张立昌一眼就看见房东大娘——立柱他娘。立柱他娘正在问话呢:“咋?又没收下?”

汉子答:“嗯,没收下,遭了雹子,噻里啪啦,庄稼全打光了。”

“就来你们两个?老人孩子跟来了么?”

“老人走不动,婆姨在家照看着,孩子在那边废窑里等着呢。”

另一个汉子说:“拉扯着孩子,像啥样子呢?”

“咱也是汉子，出来要吃食，脸红哩！”

“老人婆姨在家里吃啥呢？”

“等着我们要下，拿回去哩。”

这时立柱他娘看见了张立昌，赶紧一把拉住他：“他们带着证明哩，不是坏人，都是贫农！”

那两个汉子惊恐地赶紧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张立昌接过来：“兹有我公社×××、×××贫农成分，因遭灾外出要饭，特此证明”。

要饭的也有证明，真是新鲜事。张立昌仔细打量那两个汉子：黑黑的脸上有刀刻斧凿般的皱纹，拿证明信的那双手上老茧，有裂口，腰里掖着一个黑不溜秋的毛巾口袋，从那毛巾上还能看出几个字：“×动模范”，张立昌想，前边肯定是一个“劳”字。他又抬起头来看那汉子，汉子也正怯生生地看他，张立昌的心一震：那汉子的眼睛里装着多少愁苦！

房东大爷端着一升谷子来了，还有几个老乡也都拿来了粮食，有一升的有半升的，大部分都是玉米，也有端着大碗拿着几块干粮的。房东大爷倒完了粮食往回走，张立昌跟上了他：

“大爷，咱们村粮食也不富余，这个给法给得起呀？”

“遭了灾，有啥办法？就靠乡亲们帮一把，要是不帮，他指望谁哩？都是人哩，都要吃饭哩。”

大娘也跟了上来：“他们家里也有老人婆姨孩子，都饿着肚子哩，咱过年，他们也要过年哩。”

这几句话重重地敲打在张立昌的心上，他跟旁边一个知青说：“把咱那没磨的玉米也拿两升来。”大娘赶紧拦住他们：“可不能哩，给一升就不少了，还有来的哩，上头人，年年有灾，比咱苦哩！”

默默跟在后头的大毛一直没开腔，这时他喊了一句：“我去！”撒腿跑开了。

后来知青才知道，延安以北的安塞、榆林、绥德几个县，被称为“上头的”，那些地方无霜期短，雨水又少，几乎年年有灾，雹灾、霜

灾、旱灾，所以年年都有出来要饭的。

房东大爷大娘那些话，让张立昌他们知道了要饭的都是些啥人，为啥有这么多要饭的，该怎样对待要饭的。陕北要饭的多，陕北要饭的好要，走到哪家门口，也能要块干粮，老乡吃啥，就给要饭的拿啥，老乡心善，尽管自家也不富裕。他们没有那么些争啊斗啊的阶级斗争观念，他们有一副富于同情怜悯的慈善心肠。在对待要饭这个问题上，知青认同了、接受了老乡的看法，也模仿起老乡的做法。

农民的命运、农民的遭遇，在打动着知青，感化着知青，在这打动和感化中，知青身上悄悄融入了农民的血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观念却变得淡薄了，他们开始站在农民的角度上来看问题，用农民的眼光来判断是非，标志着这个重要转变的是，他们终于懂得了这样一个真理：吃饭穿衣问题比路线斗争问题重要！

知青身上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与他们对饥饿的体尝与感受是分不开的。在一次座谈会上，李锐同志谈到他六十年代初在北大荒度过的那一年半劳动改造的经历，他说，我体验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挨饿，我对饥饿有了一种恐惧感。那些过去在城市里每个月按照粮本上的定量吃供应粮的插队知青，同样有了这样的认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无霜期短，灾多，尽管知识青年分粮受到照顾，但他们在灾年里也吃过麦麸、谷糠。吃不上肉馋得慌，知青把满身臊腥味的狐狸肉也炖着吃了。刚下乡时他们慷慨地把两合面的馍馍和路上吃剩的面包都给了要饭的老乡，很快他们就体会到当时老乡对他们说的“莫送，留着，上了山就没得吃了”这话的丰富蕴意。有了挨饿的体验，才能真正理解“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样一个哪个国家哪朝哪代概无例外的真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即种地，比一切革命活动都更为重要，从事这一生产的生产者，也比一切生产者都更为伟大。在挨

饿的体验中,知识青年学到了真正的唯物论,懂得了真正的马克思,他们的立场、观点,他们的思想深处那个被称为世界观的东西,由此而发生了变化。

安贫乐命的陕北老乡

陕北老乡身上所体现的是农村文明,知识青年身上带来的是城市文明,这两种文明在陕北高原这块黄土地上,既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融,又互相对立,互相抵制、互相排斥。知青对陕北施加着影响,陕北也对知青施加着影响,究竟哪一种影响更厉害?

江宛柳她们七个女孩子不顾县里的规定,历尽千辛万苦冲破层层封锁逃回北京去过年,回来之后公社通报,并要队里对她们进行严格的教育。“黑瘦矮小的队长举着那根盛满莫合烟叶的大烟袋,脸上没多大表情地说,教育个啥呢,回来了么,回来了就好么。”江宛柳决心用行动弥补过失,她拼命地干活,干活时不慎用镢头刨了队长的手,队长三天没出工三天没有一个工分。乡亲们用不满的眼光谴责她,队长却“用那缠了纱布的手举着莫合烟袋,难得地笑了一下说,没啥,受苦人么,好活。”他到公社去为知青请功,特别提到江宛柳,说她年纪最轻表现最好。

冯家村的人到高家洼来砍柴,知青梁亚明领命去“挡柴”截道。他一手拎棍,一手持菜刀,还带着一条狗,蛮横地截住了打柴的队伍,蛮横地截下了一捆捆柴禾,蛮横地抡起菜刀把捆柴的绳子砍断,烧柴散了满地。那伙打柴的人里,有一个年轻的壮汉是复员军人,他要夺回柴禾,被一个老汉拦住了。

半年多之后,梁亚明为了抓住一个招工的机会,赶夜路奔县城,偏巧碰上狂风大雨,河水暴涨,梁亚明从山坡上跌下,摔伤了腰腿,瘫倒在河滩上,雨越下越大,河水越涨越高,梁亚明却一动也不能动,任凭河水漫过脚,漫过腿,漫上了腰。这时他看到一道手电筒的光亮,听到一个老汉跟一个年轻壮汉说话的声音,天,竟然是到

高家洼打柴的那父子俩。他们也认出了他，那壮汉说，你不是去年冬里挡柴的“英雄”吗？小伙儿，你也有今天？你狗日的还敢从冯家村过？老汉却催促他说：还不快救人，还啰嗦个啥？老汉和壮汉把他架上河岸，扶进上窑，给他喝热乎乎的开水，吃焦黄的烤玉米，给他烤干了衣服，老汉想留下梁亚明，壮汉却知道招工是件急事情，知青就盼着早点招工走呢，他抄起一根木棍递给梁亚明，就护着他走进漆黑的夜幕里，一直把他送到县城。第二天梁亚明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不久就离开了陕北。他至今也不知道那父子二人的姓名。

知青毕昆在批斗会上，打了所谓的“叛徒”邢荣儿一个嘴巴，夜里，他听见隔壁邢荣儿的娘和婆姨在呜呜哭。过了些天，队里分派毕昆跟邢荣儿一块干活，邢荣儿主动抢了重活干，毕昆他们知青虽然干的是轻省活，但一天下来还是累得不行，晚上回到窑里连饭也不想做。这时，邢荣儿的娘打发邢荣儿的婆姨端着一个瓦盆走过来，里面是一盆热汤面，白白的薄面条，绿绿的莴苣叶，上边漂着油花，底下卧了鸡蛋。吃完了，毕昆过去还瓦盆时，看到他家里晚上吃的是黑乎乎的糜子馍，“据说是最不好吃的东西”。邢荣儿家对毕昆没有一个埋怨的字，毕昆自己却内疚得不行。

知青刘丹华是队里的赤脚医生，社员二海有个胃疼的毛病，一犯病就疼得蜷缩在炕上起不来，刘丹华每天上他家里给他扎针，二海总觉得过意不去，总是一脸的歉疚。一天晚上下小雨，天黑路滑，刘丹华不小心滑倒了，裤脚沾了些泥，二海见了慌得手足无措，好像做了多大的错事，扎完了这个疗程他说什么也不肯再扎，说心口一点儿也不疼了。从此他到处宣传说知青把他的老胃病治好了。一年之后二海死于胃癌，原来他的胃一直疼得厉害，他宁愿忍受病痛的折磨，也不愿意再让刘丹华每晚来给他扎针。这是自我牺牲，还是迂？应该赞扬、同情，还是谴责？谁也说不清，反正只让刘丹华的心一阵阵地颤抖。

这就是“再教育”，这是非常厉害的再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没有说教，只有身教，声称要改造农民的那些人，被农民打动了、震撼

了。知青没能改变陕北,陕北却深深地影响了知青。

陕北老乡安于贫困的生活态度更让知青们吃惊。

陕北老乡真苦,一眼土窑一铺土炕,灶台上一口铁锅,窑洞里两个木箱,加上几口盛放粮食的缸缸罐罐,就是全部家当,一家六七口人,只有一两床棉被,孩子们就靠着烧热了的炕席过夜。除了年节,一年四季炕桌上的菜总是老三样:一碟盐,一碟辣子,一碟酸菜,客人来了,把那碟酸菜添得上了尖,就算招待客人了。为了省灯油,灯盏里常常是半截子油半截子水,水沉到底下,油浮在上头。延长一带出石油,老乡们就找一个油矿,挖些黑乎乎的油底子来代替灯油。粮是队里种的,布是自己织的,现钱是很难分到手的。到年底分红的时候,有的队里把分钱户跟欠钱户一一相抵,就算平账了,因为欠钱户永远拿不出钱来,所以分钱户也就永远拿不到现钱,大家都习惯了,谁也不说啥。吃粮靠队里,零花钱只能靠喂鸡养猪,猪要到年底养肥了才能卖,就好像银行里的零存整取,平时的花销只能靠鸡下的蛋。婆姨临做饭时发现没有了盐,就用碗端着几个鸡蛋上代销点去买,娃娃们要买上学用的铅笔本子,也是揣上几个鸡蛋去供销社。小媳妇大闺女要进城赶集了,也是拎着十几个几十个攒下的鸡蛋,上供销社去变卖成现钱。那时候鸡蛋的收购价是每斤4角8分,鸡蛋生得小,差不多要20个才能卖上一块钱。1972年周总理视察延安时流着眼泪说:“没想到解放这么多年,延安的人民生活还这么苦,甚至比党中央在延安的时候还苦,那时候家家户户还都有几缸小米几瓮酸菜。”

老乡的生活状况令知青们震惊,但更震惊的是老乡对待贫穷的那种态度,那是陕北老乡的人生哲学。

身处困苦之中的陕北老乡,对生活从不抱怨,更无愤慨,不管是收成不好缺粮吃,不管是娃娃病死无钱治,自留地上长的洋芋玉米被公社的检查组一古脑收走了,他们也只会冲着检查组的背影骂上一句“我日他先人!”毛主席说穷则思变,可他们并不想变个活法,只是循规蹈矩地承袭着祖辈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贫苦中

始终坚守着一种乐观平和的心境，不羡慕谁，不妒忌谁，不想模仿谁，“前辈子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咱咋不能这么过？”这是他们战胜一切物质欲望的精神武器，他们说：“没有是个爱，有了是个害”。

他们的另一个精神武器是认命。清华附中的胡镇江有一次在一个瓜地里吃瓜，跟看瓜的老汉聊了起来，嘿，那个老汉当年跟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是一个团的，两人一个当团长，一个做政委。攻占榆林之后，老汉想老婆，跑回家住了几天，以后再去找部队就找不到了，从此解甲归田。胡镇江深深地为老人惋惜，老汉却十分认真地告诉他：娃，这是命！“那你现在可以去找冼司令员嘛，让他给你安排个事干，即便看大门也比你看瓜地强！”“娃，这是命，命里没有的，求不得啊！”胡镇江的心震撼了：我的天，这就是陕北老乡，这就是陕北老乡用以抵制物质诱惑保持内心平衡的精神支柱。

到了这时知青们才发现，他们跟陕北老乡最根本的区别正在这里：老乡们认命，知青不认命，老乡们不争，知青却拼命去争，要上学要招工要回北京，就是不甘心在这里埋没在这里沉沦在这里过一辈子。老乡们把内心的物欲一个一个掐死，知青的心里整天翻腾着各种各样的欲望，苦心积虑地寻求机遇寻找门路去改变自身的处境——一切的烦恼、焦虑都由此而生。知青可以钦佩陕北老乡那种安贫认命的处世态度，但永远无法认可和接受那种处世态度，在乐命安贫这一点上，他们永远无法与陕北老乡达到契合。

也有达到这种契合，在精神上真正融入陕北老乡群体的知青，尽管数量极少。他们永远留在了陕北高原上，永远留在了农村文明之中，他们像陕北老乡那样过日子，也完全接受了陕北老乡对于人生的看法。二十多年前下乡的时候他们被称为知识青年，被老乡称为“北京娃”、“公家儿的”，但是今天他们从外到里从形象到内心，都几乎无异于一个真正的陕北老乡。

周强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北京知青”。

他下乡的时候是老初一，资质不高，在学校时就留过两次级。

母亲早就不在了，父亲有病，是很重的病，家里房子小，兄弟姊妹又多，回京探家，家里连回陕北的路费都拿不出，他骑着父亲的一辆旧自行车蹬回了陕北。家里根本没有重新接纳他的可能，返城的希望在他面前十分渺茫。他招工进了县办水泥厂，两年后水泥厂停了产，他没啥本事，有病，又有点窝囊，就到北京知青户去蹭饭吃，周围百十里的知青户都吃遍了。再往后就豁出脸面上街要饭吃。

有一天，从米脂县下来个要饭的婆姨，男人死了，带着两个孩子，水泥厂的工会主席帮助一说合，给那知青做了媳妇。他有了家，他得养活这个家，他背石头、推车、当小工，干些力气活，勉强维持着过日子。天气凉了，活也难找了，婆姨跟孩子没有户口要吃高价粮，他实在撑不起这个家了。这时他想起了他还有最后一点资本：他是个北京知青。他揣上仅有的五块钱，一家四口走了100多里路来到延安。周强见到他的时候，说他“没一点精气神儿，脸墨黑，下巴巴的，一张嘴，牙掉得不剩几颗。身上穿件破旧的黄衣服，光脚套双旧懒汉鞋，脚趾头就伸在光天化日之下。”周强的感觉是：“这哪像是北京知青，连山沟里的农民都不如！我没法想象，农民都脱贫致富了的今天，北京学生竟还有沦落到这种地步的！”

周强给他找了个挣钱多的活儿，挖电线杆的坑，每个坑一米见方一米五深，挖一个给10块钱，管这项工程的也是个北京知青，把剩下那七个坑的工钱加到20块，都给了他。可是期限快到了，他连两个都没挖出来，又找了个人来帮忙，那个后来的挖了4个，他才挖了3个，周强看着他那营养不良体力不佳的样子，说不清是怜悯他还是恨他，一个能从北京骑着自行车蹬到陕北的汉子，怎么混到了这个份上！

后来周强带他找到延安行署接待处，要求解决工作问题，又找到知青处，要求解决他老婆的农转非问题。两个部门早都听说过他的情况，答应想办法解决，分手的时候，周强把身上的20块钱全都掏给了他。一年之后，他又来看周强了，这一次穿了件人造毛的防寒服，人也胖了，精神多了，他说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县里给他安排

了工作，在一家工厂烧锅炉，每月 70 块钱，他媳妇也解决了农转非，在镇上一家商店当售货员，每月 60 多块钱，他们在镇上租了间房住。可是从镇上到县里有 30 多里路，他两头跑太累，也增加了经济负担，这一次他来找行署，想把他的工作也从县里调到镇上去，“他说如果这件事办成了，他就再没有什么要求，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他脸上露着自信与满足的微笑。”

能守着婆姨和娃娃，在陕北的一个小镇上，住在每月 15 元租来的房子里过日子，这就是他最大的愿望，最高的要求。他在陕北高原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能凭借“北京知青”的身份，过上优于陕北老乡的生活，但是他的精神世界无异于一个陕北老乡。他那满足的微笑，却激发起周强的一番感慨：“按说我该为他高兴，毕竟他从最艰难的处境中摆脱出来了，可那会儿我的心情反倒一下子沉重起来。我想起刚刚收到的北京老同学的信，告诉我谁正在办出国，谁当了公司经理，谁为了评高级职称和领导干了一架。人是要往高处走的，当然这高处的意义很宽广，那是新的目标，新的天地，我了解我们这一代人，只要冲出去了，目标定在多高的位置，都不过分。他也是我们的同龄人，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把工作从县城调到家门口的要求，这是他最大的奢望。”

寄希望于下一代

小雅走到村口的时候，那场面使她惊呆了：前面不远的地方，黑压压地站着一大群人，有扛着锄的，那是要下地去的，有牵着驴的，那是要驮水去的，有拄着拐的老人、抱着吃奶娃娃的婆姨，那是平时很少出村的。井家大队第二小队能走动的人，怕是全都来了，就是队里开会，人也难以来得这样齐，小雅一出现，谁也不讲话了，七八十双眼睛一齐射向她，望着她，目光随着她的脚步一点点地移动。怪不得她从窑里出来，这一路上都显得那么安静，见不到个人影，原来人都跑到这里来了，都等了她一阵子。小雅这时才知道，她

在村里人心目中的分量有多么重,她的心里有一阵热乎乎的东西往上涌,涌到了嗓子眼儿,涌到了眼眶里,眼眶里顿时一片湿润……

不知怎的她一下想起两年前她送她的好友连连回北京去治病时的情景,也是这个季节,也是这个村口,也是这条路,只有她、连连和一个赶毛驴的老汉。连连骑在毛驴上,浑身上下打不起一点精神,两条小辫像两把经了霜的小草,蔫蔫地耷拉着,两只眼睛里也毫无光彩。连连什么话也没说,不知是她病得没有力气说话,还是沉重的心情压得她说不出话。毛驴驮着她瘦削弱小的身影渐渐远去,渐渐消失在长天之下莽原之上,消失在从西边压过来的浓重的乌云之中。她就那么孤零零地走了。不久北京传来消息说连连死了,死因是恶性伤寒。

在所有的插队知青里面,连连是小雅最要好的朋友。

那一次是小雅在村口送好友,这一次是乡亲们在村口送她,好友是回北京治病去的,她是回北京上大学去,连连是蔫头耷脑孤零零走的,她是全村人眼巴巴送走的。乡亲们的真情让她感动,连连的遭遇又引发了她的伤感,这两种本来互不相干的情绪搅在一起,小雅有点受不了啦,她真想放开嗓子,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乡亲们迎过来,往她手里、书包里、口袋里塞东西,几个煮鸡蛋,两个白面馍,几把红枣,一些核桃……老乡家里头穷得拿不出更好的东西。小雅使劲推让着:“拿不了啦,吃不了这么多,留着给娃娃们吃吧。”她操着一口陕北话,她是全村知青里头第一个会讲陕北话的,到现在她还随口就能冒出几句。但推是推不掉的,只能拿着。口袋里塞满了,书包里塞满了,两只手里也塞满了,她腾不出手来掏手绢,只能任眼泪尽情地往下淌,像两条小溪,轻快地滑过她的面颊。

其实她跟老乡已经告别过了。她要上大学的消息一传开,家家都来找她吃饭,争着抢着拉她去,仿佛谁家请不到小雅是件丢脸面的事情。她把全村的人家吃了个遍。她买了20张宣传画,签上自

己的名字，也挨家挨户地去送过了，所以她没有想到今天还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场面。是因为她干活舍得出力气？是因为她是大队的妇女主任？是因为她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收了工跑前跑后地去给病人打针送药？是因为她拿出自己的钱从北京给村里买来一大堆药，老乡家的孩子生急病她半夜起来跑到公社去给我大夫？……反正，这两年半时间她给乡亲们做了许多事情。

全村六个女知青，第一个学会挑水的是她，第一个学会砍柴的是她，第一个学会推碾子磨面的也是她。冬天的早上，没柴了，饿着肚子，拿根麻绳往腰里一扎，到很远的沟里去打山枣刺。山枣刺长得比人还高，好不容易砍了一捆，背起来从沟底往上爬，快爬到沟沿上了，脚一滑，一捆柴就全散了。一早上白干了，坐在那里真是想哭也哭不出来。

老牛慢腾腾地运，架子车发出吱吱的响声，车上放着小雅的行李。从村里到公社这段路有15里，队长张志荣亲自来送她。张志荣有四十多岁，话语不多，但小雅能感觉到他那颗实实在在的心。缸里没水了，上他家去舀，灶里没柴了，上他家去要，水和柴在村里都是稀罕物，吃水要到沟里去驮，一去一回要一个钟头，烧柴要到很远的沟里去砍，近处的早都砍光了。插队第二年那个春节小雅是在村里过的，因为过完了春节就要整党，她当时已经是大队的妇女主任。六个知青走了五个，就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一孔空荡荡的大窑里。张志荣说，住到我家里去吧！他家院子里有一孔放杂物的小窑，他把那孔窑收拾出来，把炕烧得热热的。陕北的冬天很冷，那一年雪又很大，夜里小雅起来上厕所，张志荣听到了，第二天就拿了个瓦罐过来。“夜里就别出来了，外头冷，冻着！”就这么两句话，一个表示关心表示亲热的字眼也没有。

那个春节，小雅过得很快活，几乎家家都来给她送东西：这家送块豆腐，那家送两个糜子面做的米黄，有人送一块肉，有人送一些包好的饺子、几个馍馍，她把这些吃食都放进面缸里边，常常打开盖子看一看，光是看一看心里也觉得很舒坦。

小雅上学走了，一走就是13年。这13年里，每到春节她都收到一个包裹，包裹鼓鼓的，沉沉的，里面装的是红枣小米芝麻核桃，分装成一个个小包，再缝成一个大包。邮包裹的布，是陕北农民自家织成的那种土布，粗糙，结实，针脚缝得很密。邮包裹的是张志荣，常常连封信也没有，就是这么一个包裹，一年一个，年年都闹腾得小雅心里头好几天不安生，她想陕北，想老汉，想飞玲子……

1985年5月，延安地委出面，邀请了二十几个当年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回延安，其中也有小雅。小雅高兴坏了，她一接到通知就往村里写了封信去，告诉张志荣说一定要回村去看看。

到了延安，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座谈，参观，访问……旧地重游，旧事重忆，二十几个人整天沉浸在欢乐和激动里。第三天吃中午饭的时候，有人喊：“小雅，外头有人找你！”小雅很奇怪：我插队的地方是在宜川，延安没有熟人呀！她疑惑着走出来，门外站着一个小老汉。头上包着一条半旧的白羊肚手巾，身上穿着一件黑棉袄，脸上刻着密密的皱纹，他一把就把小雅拉住了：“小雅，还认得我不！”

“怎么不认得，张志荣嘛！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知道你要回咱村，你十几年不回来了，怕你寻不着路，来接你呢！”

从村里到延安有二百多里路呢，又没有顺脚的汽车，老汉是走一程路搭一程车，倒腾了几次才赶来的。这一片情啊，又让小雅受不了啦！

小雅跟着老汉回村了。进村的时候天都快黑了。他们走的是一条驮水的小路，可老乡们远远地就认出来了：是小雅吧，小雅回来了，小雅回来了！一会儿全村就都传遍了。

又是家家户户请吃饭，每天早上一起来，院子里已经有好几家人站在那里等了，抢新郎似的，实在吃不过来。有时就这家吃半顿那家吃半顿，一顿饭吃两家。

小雅心里边惦记着一个小女子，满村里寻不着那个小女子。她

问张志荣：“飞玲哪？咋见不着飞玲？”“嫁了，离这里有十几里地，都生了两个娃了！”

小雅真想象不出，生了两个娃的飞玲是个啥模样，她记忆中的飞玲，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子，聪明伶俐，手脚勤快，干活的时候老是干在头里，骂起架来也是伶牙俐齿，谁也不是她的对手。但飞玲的日子不好过，爹妈都死了，跟着哥哥嫂子过，哥哥参军去了，家里只有个精明刻薄的嫂子。小雅同情飞玲，飞玲也喜欢小雅，冬天，一个窑里的知青都回家了，小雅就把飞玲找来跟她作伴，给她补棉袄，还教她认字。

有一天割麦子，收工回来又累又饿，小雅连话都懒得说，进了窑洞就想吃饭。掀开锅盖，锅里是空的，摸摸灶台，灶台是凉的。那个值日做饭的知青正在炕上躺着，冷冷地甩过来一句话：“我没做饭，今天累得慌，你们谁爱吃谁做吧！”

小雅心里这个气，她是个好强的人，转身就去缸里舀水，可缸里也是空的！吃水要到沟里去挑，来回要一个小时，背一背水要歇六歇，水背回来只剩一半。小雅此时哪里还有背水的力气。她心里真有一肚子的气。这时飞玲来了，悄悄塞给小雅一块窝窝，就是玉米面发糕。小雅心里一热，她知道，飞玲的嫂子决不会让她把家里的窝窝拿给人吃的，飞玲是偷偷从家里拿出来的。

小雅惦记着飞玲，她跑了十几里路去看飞玲。走到飞玲家的窑背上，她叫人把飞玲找出来，离着老远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小雅嘛！”飞玲一眼就认出来了。飞玲把三岁多的孩子扔在家里，先把小雅送回村，又走了二十多里路把她送到汽车站。飞玲跟小雅有说不完的话，她一直记着小雅，小雅在她心中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子，把她带进了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但小雅看到已经成为一个陕北婆姨的飞玲，心里有一种深深的遗憾和歉疚：她没能把飞玲带出来，没能改变飞玲的生活道路，飞玲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跟其他的陕北婆姨没有多大区别。“这就是命运啊！”小雅的心里感叹着。

小雅把对陕北老乡的挚爱、感激和同情，把对陕北的希望，寄托在陕北的孩子们身上，她每学期给张志荣的孙女交学费，因为张志荣的孙女上不起学。1993年她得了新闻出版编辑的最高奖——韬奋奖，她从中拿出1500元钱，资助宜川县五个上不起学的孩子念书。去年她那个村里盖学校，盖了一半没钱了，她也解囊相助。

小雅说：等我女儿长到15岁的时候，我们一定带她回陕北去一趟，因为我是15岁下乡的，我爱人也是。

把对陕北老乡的情谊倾注在老乡的孩子们身上，这种例子还有。

王新华在延安县插队，他那个队里有个老汉叫米怀如。王新华在他回忆陕北插队生涯的文章里这样描写米怀如：“土改时把米怀如划成上中农，而后他个脾气更是海来和善，眉脸上有人没人常挂个笑。倒运左眼生疾，角膜炎，常年累月淌水，红愣愣价像个烂桃子，须每几分钟用脏手揉搓。告诉他，只要一瓶氯霉素眼药水就包他好，他笑笑：管他，受苦人命才值几个钱，等不到眼瞎，早到死展了。且说且又从烂桃中挤出一股水。这情景，真让人心颤。”王新华这样评说米怀如：“我不知他是怎么个活法，见病认病，见命认命，只要死不下，来什么横，什么逆，也无哀怨，也无愤慨。”

后来王新华上了大学，又考上研究生，再后来他出了国，去了新加坡。可他就是忘不了陕北，忘不了长着烂桃眼的米怀如，他一趟一趟地回去看陕北，结婚的时候把爱人也一起带回去，前后总有六七趟。后来米怀如老汉死了，留下个孤零零的小孙女桂莲，桂莲跟着哥哥嫂子过，每天给哥嫂拦羊，一年才挣15元钱，特别可怜。王新华把桂莲带到了北京，又带到了广东，最后落户蛇口。陕北的小姑娘在经济特区找到了一份工作。

勇敢的饥饿者

紧挨着陕西的是山西，陕西和山西之间隔着一条黄河。黄河分

开了两个省，却隔不断黄土高原，黄土高原越过黄河向东延伸，就到了山西。山西的自然条件不好，但是山西有大寨，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代表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几亿农民学习大寨，知识青年也向往大寨，他们天真地以为，孕育出了大寨的山西农村，一定充满着浓厚的政治空气，充满着革命的大寨精神。那就去山西！

在整个上山下乡的浪潮中，山西农村一共吸纳了 50 万来自北京和天津的知识青年，他们从北向南分布在雁北、忻州、晋中、临汾、运城等几个地区。

山西有着三千多年的农耕历史，早在春秋时代就是有名的泱泱晋国，但是山西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并不好：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山地高原和丘陵占了全省面积的七成以上；太行山、太岳山和中条山阻隔了来自东面和南面的暖湿气流，加上地势又高，所以与纬度相同的山东河北相比，山西气温偏低，降水偏少，许多地区十年九旱。只有发源于宁武、汇注于黄河的一条汾河水，自北往南穿省而过，流经的忻县、太原、临汾、运城几个盆地，是全省的主要农业区。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山西仍然是一个农业比较落后的省份，山西的土地开垦程度在北方几个省区中处于比较低的位置，雁北一些地方的无霜期只有 120 天，五月飞雪，九月挂霜，只能种莜麦、土豆和一点春小麦，宁武县有民谣说：“上了宁武山，少吃又无穿，除了莜麦面，就是山药蛋。”

劳动是艰苦的，但与劳动比起来，更苦的是吃饭问题，当年到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头一大难事莫过于一日三顿没着落了。

谢建民回忆说：我们刚到陈家庄时，头一顿饭是队上管的。村里宰了只羊，馒头、羊肉粉条，那几乎是村里最好的饭了。第二顿还是队上管的——糠窝窝就咸菜——忆苦饭，只掺了很少一点玉米面的谷糠做成的窝窝怎么也嚼不烂，只能像喝中药那样用白开水往下送。再往后就是把我们分散到社员家去吃派饭了。

但派饭是吃不长的，倒不是农民小气，山西的农民虽然穷，但

为人豪爽热情,知青去了,许多人家都拣好饭做。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是能吃的时候,天天吃顿顿吃,谁家也养不起。再说,知青不是来做客的,而是来受教育的,总不能天天在社员家里吃派饭呀。于是,买了做饭的锅,买了盛水的缸,买了刀勺碗筷,请社员帮忙盘了炉灶,知青的集体灶开伙了。

下乡头一年,知青的口粮由国家拨给。给多少?谢建民说:头半年县上给每个知青100公斤粮食,都是原粮,要我们自己进城找磨坊磨成面。戈西赛夫说:插队的头一年,国家供应每个知青264公斤原粮。退皮碾磨之后,每月合20公斤成品粮,每天约0.65公斤。前两个月,我们没好好计划,吃超了。开春后,尽管采取女生支援男生、干稀搭配,多掺麸皮等办法,但由于劳动量大,仍然不够吃,经常饿得睡不着觉。几位女同学说地里长的“刺菜”(一种野菜)能吃,我们就在上工休息和收工后挖刺菜,用玉米面包菜团子,果然十分好吃,肚子也填实了些。后来刺菜的刺越长越硬,就不能吃了。

在家里,每月有国家定量供应的商品粮,只知道饿了就要吃,吃就要吃饱。在家里这么吃行,到了山西,粮食分的少,肚里油水小,每天的劳动量大,再这么吃就不行了。这些建国后出生的孩子们,体验到了啥叫“挨饿”,啥叫“恐慌”。

戈西赛夫回忆说:三夏大忙的季节,各生产队都办起了农忙灶,蒸的白面馍馍管够吃。第一天吃下来,同学们个个眉开眼笑。这个说一天吃了五个四两的大馍,那个说吃了七个八个,女同学们都不好意思报数,只是低头哧哧地笑。我也算了算,从天不明跟大车拉麦,到天黑拉完最后一车,竟吃了13个大馍馍。一直到三夏结束,我每天都吃10个以上。到了冬天,我们才尝到了挨饿的滋味,每天只能喝稀玉米面糊糊,男同学每顿能喝两饭盒,至少有3斤水,女同学也能喝一饭盒。我经常跟大车出村卖石灰,早晨喝了稀糊糊,再带上两个墨水瓶大小的玉米面饼子。这两个小饼子,就是我装卸三四千斤石灰,在寒风中跑几十里地的全部干粮。

魏光奇插队的沁县后泉村，坐落在太岳山脚下，四面环山，除了沟就是坎，全村没有一块水浇地，农民每年的平均口粮不到150公斤。知青每月只有22公斤原粮，吃超了就要挨饿。22公斤原粮，去皮去糠后只能剩18公斤。好心的农民叮嘱他们：吃饭可不能放开肚——这就是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

山西小麦少。宋明那个村，每人每年只能分上三四十斤麦子，而傅作梅下乡的定襄县山村，第一年每个人只分了4斤麦子，合3.2斤白面，春节吃一顿，中秋端午吃一顿，就没有了。每次探亲回来，大家都从北京带些大米，不过那时大米紧张，每次也就带二三公斤，舍不得吃米饭，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熬点大米粥喝。

那时白面是稀罕物，面条是最好吃的佳肴，难得吃上一顿白面条，难于在家时吃饺子。朱维红在榆次县呆了一个星期也没吃上一顿面条，食堂里只给他们吃掺了榆皮面的红面饹饹，吃了很不好消化。后来到了石圪塔公社的杏林塔大队，才吃了一顿大队招待的面条，还是浇肉的，那是来榆次吃的第一顿好饭。

宋庆光他们从县城步行了十多公里路，进了村，安顿好行李，天就擦黑了。民兵队长根喜对大伙说，天太晚了，欢迎会改在明天开，现在准备吃饭。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宋庆光，坐在一块青石板上想，这是进村的第一顿饭，肯定差不了，准有肉吃。结果怎样呢？

“开饭了，我们鱼贯走进厨房，只见先进去的人端着一大海碗很快折出来，碗里热腾腾地冒着气，是面条汤。或许是正餐的前奏吧？我想。待走进门，早有一位大爷乐呵呵地将一碗面条汤双手捧过来。我接过碗迅速地向四周搜索着，昏暗的灯光下，除灶台上这锅面条汤外，再无别的什么可吃的东西。我悻悻地走出，同大家一样蹲在地上吃汤。我不大甘心，用筷子在碗里翻找，希望能发现点肉丝肉片之类的‘精华’，但完全让我失望了。”

这顿叫宋庆光大失所望的面条，却在围观的孩子和村民中引发起另一种热烈的议论。

“喝面哩！看，大学生们喝面哩！”

“啧啧,真个香哩!”

“伢婆(妈妈),我也想喝面!”

一碗没有荤腥的面条汤,让宋庆光大失所望,却引来村民们惊羨的目光,两种不同的估价不同的感受,折射出两种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后来,在年终只分到几斤“金贵的麦粒”后,宋庆光们才懂得了那顿“接风”面条汤的价值。

面条是待客的,刚进村的知青是“客”。可他们毕竟不是来做客的,而是来当学生、当社员、当劳动力的。他们应该跟社员们一样下地干活,一样评工记分,一样起伙做饭。自己做饭,就得算计着吃,调剂着吃,不光没有那么多白面,甚至没有足够的粮食。他们想起了贫下中农老师的再教育——吃饭可不能放开肚。

魏光奇发出感慨:人的适应能力之大是无法估量的。几乎是一夜之间,我们这些北京的“大学生”们便学会了山区老百姓的吃饭方式,每日三餐,一干两稀。两稀是指山西的合子饭:几把小米,加上些瓜菜,煮成一大锅汤,开锅后下点玉米面或高粱面的“擦疙瘩”。主食是定量的,每顿饭都要过秤,不够吃就多加些水,直到可以灌饱为止。有一次,大号搪瓷碗他灌了五大碗,放下碗拍拍肚皮,好像猪八戒,当时魏光奇就想,人的胃肯定要比人体解剖图上画的那个大多得多。灌得多,排泄就多,男女生宿舍夜间用的便盆,都由小号换成了大号,每天早上都是满满的。最好过的是秋天,秋天的合子饭里有豆角、红薯、南瓜、土豆、萝卜,品种多,分量足。最苦的是春天,村子里凡是能吃的树叶全都被吃光,连小脚老太太都会上树,真是一大奇观。

粮不够,菜来凑,水来凑,只求一时填饱肚子,不论质量如何,不论什么东西。但是菜也并非永远充足。夏天多一些,尽管品种不多,什么菜下来了,就整天吃什么菜,青茭下来吃青茭,西葫芦下来吃西葫芦,天天吃,顿顿吃。到了冬天,就只有窖藏的白菜萝卜。冬去春来,白菜萝卜也吃光了,就剩下沾满了白盐花的咸菜,与其说是吃菜,还不如说是吃盐。有一年春天傅作梅他们到大桥工地上去

当民工，每天干的是超强度的体力活，收了工只能吃盐醋饽饽，就是在菱子面上洒点盐，再浇点醋。知青点的菜基本上只有一种做法：熬，或者叫做白水煮，原因很简单——没有油。直径一米的大铁锅，熬一锅西葫芦最多也就放半小勺油，或是学着老乡的样，用油布刷蹭蹭锅底就炒菜，菜里边见不到一点油星星。

到了夏天，干活的地方远一点，中午赶不回去吃饭，就得带几个馍，天热，有时候带的馍一捂，就发馊了，起粘了，拉丝了，知青们照吃不误，什么卫生啦，生病啦，这个时候都顾不上去想，饥不择食，填饱肚子最要紧。

陈家利他们青年点没柴烧了，六个男生天刚刚亮就奔了离村二十多公里的龙王庙。砍柴倒还容易，背柴就难了，一百多斤疙疙瘩瘩的柴禾捆背在背上，火辣辣的太阳头顶上晒着，脚底下的路细得如羊肠一般，路两边全是荆棘、酸枣棵、苍耳子、羊角菱，把两条裤腿划得吱吱啦啦的响。山坡陡峭，石多路险，六个小伙子汗水杀得眼睛疼，几趟柴背完，解放鞋底的花纹都磨平了，鞋里面血、汗和泥混到了一起，脚跟成了黑紫色，人累得躺在地上就不想再起来。该吃饭了。解开装馍的口袋，口袋里冒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拿出馍来用手一掰，粘糊糊的已经拉了丝。坏了！昨晚把馍蒸好，就放到面口袋里，捂了一夜，又晒了大半天，馍全馊了。有人说：“正好带着大蒜，能杀菌解毒。”六个人大蒜就馍吃起来。

久不沾荤腥，极馋肉。但是，不到逢年过节或是婚丧嫁娶，全村根本见不到一点肉星星。李正果他们知青点，一次打赌，赌注是鸡。那时候，穷山村里的鸡真是便宜，10元钱买了大大小小11只鸡，22个人，正好两个人一只。鸡还没煮熟，诱人的香味就从铁锅里飘逸而出，溢满灶间。年轻人急不可耐了。有个同学拿大铁勺捞起一块鸡肝，烫得直咧嘴，也还是吞下去了，大家一看，都等不及了，围着锅边捞鸡杂碎、鸡血块吃，不一会就把这些零碎都捞吃完了。这时高三年级的一个大个子同学来了，他没吃到鸡杂碎，就从锅里拎起半只没有煮熟的鸡说：“不管熟不熟，我就吃这半只了。”别的同

学一看有人吃鸡了,也都纷纷下手捞自己的那半只鸡。没有煮熟的鸡,肉不离骨,得费很大劲才能把鸡肉啃下来,半天也嚼不烂,干脆就囫囵着吞下去,有的地方还有红色的血丝,有股腥气。第二天,有的人恶心,有的人呕吐,好几个知青闹了病。

那个年月,知青们真是馋,什么肉都敢吃。山西虽然地方穷,吃东西说道还挺多,不吃鱼头,不吃蛇,不吃青蛙,知青们可不管那些。邢小群说:那年夏天,我们七个知青齐出动,到15里外的水田里捉青蛙。男生下水,用棍子打,女生蹲在地埂上收拾,太阳没落山,我们就剥了多半篮子田鸡肉。回村,点火支锅,放些油,用红糖一炒,再放些葱、姜、黑酱,肉没烧熟,香味就飘散开了。村里的孩子边跑边喊:“知青吃蛤蟆哩,知青吃蛤蟆哩!”我们让孩子们尝尝,他们都吓得往后缩。从此村里传开了:知青啥肉都敢吃。

知青说:吃一次肉就好像过一次年,过去在家里做一桌菜,也不如在乡下吃一次肉有滋味。

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过年吃饺子了。不管男的女的,一个人少则五六十,多则过百,听了真能吓人一跳。王治平他们青年点,22个人包了1600饺子,平均一人70多个。她回忆说:我负责烧火,风箱拉得呼嗒呼嗒作响,红红的火焰窜得老高,一会儿工夫水就开了。一次煮200多个,一出锅就一扫而光。大家吃着,聊着,伙房里热气腾腾,每个人都吃得鼻尖上冒了汗。张崇菊吃完后,把我换下来吃饺子。我最爱吃刚出锅还没瘪肚的饺子,一口咬下半个,真好吃,从离家到现在,还是第一次吃饺子呢!我5个一组数着数吃,一口气吃了12组,60个大饺子,才觉得肚子差不多了,放下碗筷,1600个饺子只剩下十几个了。

谭新国他们那里更厉害,杀了一口猪包饺子吃,13个人吃了1800多个,平均每人140个,其中还有6个女生。

饥饿像一块巨大的乌云,紧紧地笼罩在知青们的头顶,他们同饥饿展开了斗争,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代价,不同的结果。一位北京知青饥不可耐,偷了30斤玉米,被看场院的狗发现,追得满山

跑，不小心跌进山沟摔死了。

饥饿与贫穷是连在一起的，农民的收入完全取决于粮食产量的高低，粮食打得少，工分值就低，到了年底，没有多少“红”可分。有些地方，劳做一天只挣几分钱，日常花销、回家的路费，常常要靠家里寄来，所以，邮递员总是受欢迎的人。

知青苦，农民更苦。但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农民自己不觉苦，在甜水中长大的知青一眼就看出农民的苦。

196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知青王国全跟农民一起下地去撒粪。吃早饭了，王国全的早饭还是玉米面饼子。对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也在吃早饭，他的早饭是掺了谷糠的窝头。由于谷糠掺得太多，窝头很松散，他只得用两只手捧着那窝头吃，嚼上一会儿，才艰难地咽下一口。吃窝头的汉子并无异样的感受，看着他吃窝头的王国全，却在受难般地想象着咽糠下肚的感觉，他说：“我看着他终于吃完了那窝头，才深深舒了口气，并且暗自庆幸我们插队知青享受着每年264公斤口粮的待遇，有纯玉米面饼可吃。”

知青们的生活即使再苦，比起农民来还是要好得多。第一，他们的口粮有基本保证；第二，他们有后援，回一趟家，就要带回几大包沉甸甸的各种吃食，偶尔还会有邮包寄来。他们有指望。农民指望谁呢？都是穷亲戚，都是乡下人，谁也差不多，谁也靠不上，那就只好受穷，穷得连分得的那一点小麦和棉籽油也舍不得吃，要拿到集上去换食盐换火柴。

混迹于乡土之间，知青每天都在观察着农民，认识着农民，追忆当年情景，最让他们难忘的是农民给他们的关照和帮助。

在白田村插队的方晓黎，邻居是一户老实巴交的农民，老汉已近花甲，大娘极富同情心，独生子二牛的年岁跟知青一般大。寒冬之际，几个知青粮已不多，柴已烧尽，断顿了。打这以后，二牛常常把知青盛情邀至其家，饱餐一顿“菜饭”。柴禾嘛，二牛家的柴堆任知青拿取。二十年来，方晓黎常常回想起山里人的那句话：“咱山里虽穷，可人性好哇。”

陈家利他们上山打柴，带的馍吃光了，又累又饿，六个小伙子连合拉一辆车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户老乡家。一个汉子招呼知青进屋，屋子里黑乎乎的，女主人坐在锅台前，怀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旁边站着两个小男孩。案子上摆着一屉黄色的玉米面馍，两屉黑色的红薯面馍，那汉子二话不说，就把刚蒸熟的玉米面馍往他们怀里塞。小男孩扯着女人的衣服说：“娘，我也要吃黄馍。”女人说：“蛋蛋听话，娘一会儿给你压红薯面饴饴吃。”

能不感激乡亲吗？能不怀念乡亲吗？艰苦之中磨难之际结下的友情，是最真挚最难忘的友情。

第十二章 红土壤：惊心动魄的最后一幕

西双版纳：决不仅仅是个种植橡胶的地方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后一幕，是知识青年大返城。整场戏在这里结尾，整场戏也在这里达到了高潮。所有的矛盾都在这里爆发，所有的怨气都在这里发泄，最根本的问题也在这里得到了最根本的解决。高潮过后，硝烟散尽，风暴平息，一切复归于平静。而这场戏演得最为惊心动魄的地点，是在云南的国营农场。

《中国知青部落》的作者郭小东，借书中“知青领袖马司令”之口，讲了如下一段话：“我敢说，云南知青在促使全国知青返城这件事上，是作出贡献的。没有我们云南知青的请愿，豁出命来争取中央对知青问题的注意与重视，知青那么快地大规模回城似乎不大可能。”

知青大返城，实质上是全国的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后一场斗争，最后一次反抗。

在云南下乡的知青共有十余万人，他们主要来自上海、北京、重庆、成都和昆明，其中上海青年 4.76 万人（包括郊区农村青年近两万人），成都和重庆青年 4.1 万人，昆明青年 3.3 万人，北京青年

的数量最少。兵团接收了 9.5 万人,占了绝大多数。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1970 年 3 月 1 日正式成立,兵团司令部没有设在省会昆明,而是设在西双版纳的思茅,下辖四个师,一师在西双版纳州,二师在临沧地区,三师在德宏州,少数团场在保山地区,四师在红河地区。其中一师最大。兵团的现役军人有 2700 多名。1974 年 9 月昆明军区发出撤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的命令,10 月 29 日兵团撤消工作结束,改为国营农场。

西双版纳是一个傣族自治州,在傣语中,“西双版纳”是“十二”的意思,“版纳”是明朝时傣族统治者划定的提供负担的单位,一个“版纳”是一个单位。西双版纳位于滇南澜沧江两岸,气候湿热,林木茂盛,属亚热带季风区,曾有“绿宝石”之称。西双版纳的土壤绝大部分是红壤,《辞海》上说,红壤是“在暖湿气候和常绿阔叶林作用下发育而成的土壤,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土中铁铝丰富,呈红色,一般酸性强,有效磷少。红壤地区气温高,雨量多,生长季节长,是我国稻、茶、丝、甘蔗的主要产区。”

西双版纳是继海南岛之后的第二个橡胶林生产基地。橡胶树最早产于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大英百科全书》中说,它的生长带仅限于赤道南北 10 度以内的热带地区。橡胶树最怕两样东西,一个是寒流,一个是台风,常常是台风一扫,倒伏一片。西双版纳地处北纬 21 度以北,纬度偏高,而且海拔高达 1000 米左右,但它北有高原,挡住了南下的寒流,又没有台风的危害,这是比海南岛优越的地方。西双版纳是我国第二个橡胶生产基地,但它决不仅仅是个种植橡胶的地方,它还曾经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首脑机关的所在地,在云南兵团撤消之后,在这块红土壤上,知识青年又演出了整个上山下乡大戏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最后一幕。

到云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虽然北京来的最少,但北京却来的最早,时在 1968 年初,伍穗平他们那批,俗称“北京五十五”。55 个人全都安置在西双版纳景洪州的东风农场,后来改为云南生产

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全团 2.3 万职工中知青有 1.7 万人，占 74%。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团一直是先进团。

上海第一批去云南，时在 1968 年末，1000 人，就是吴鹤翔他们那批，也是全都到了西双版纳的国营农场。那支千人大军审查挑选都很严格，所以素质很好。第二批进滇的上海知青是 1969 年 3 月 2 日离沪，就是陈洪范他们那批，数量比第一批大得多，原定要去三万人，实际去了一万多一点。这一批是插队，也是到云南插队的惟一一批上海知青，在 1971 年秋天云南省大招工中，这批上海知青绝大部分进城当了工人，以文教和服务行业为多。当时在思茅县革委会工作的陈洪范说，思茅县只有一条街，从这头到那头，除了一家民航售票处以外，商店、银行、加油站、电影院、旅社、饭店、汽车售票处，几乎哪家单位都有知青。到 1970 年末 1971 年初，上海知青赴滇下乡就基本停止了，后来，在云南插队的上海知青朱克家出了名，当上了党的“十大”代表，上海又掀起一股要求去云南的小浪潮，但最终只批准了几个人。

到云南下乡最多的是四川青年，来自成都和重庆，他们直到 1971 年才姗姗迟来，那时北京和上海的知青已经停止进滇。重庆姑娘陈际瓦回忆说，从 1971 年的 3 月到 8 月，重庆知青开始出发，几天走一批，每批千人左右，一共走了 24 批，总计有两万多人，先坐火车，经遵义、贵阳、六盘水、曲靖到昆明，再换乘汽车，分赴在西双版纳的一师和在红河的四师。

独身穿越原始森林的姑娘

陈际瓦，这个名字很怪，她是 1954 年出生的，那一年召开日内瓦会议，父亲就给她起了这么个怪名字。1971 年，她刚刚 17 岁，初中毕业，赶上下乡，四川省的上山下乡绝大多数是在本省插队，惟一出省的兵团就是去云南。青年人，谁不向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谁不向往去抗美援朝的前线，报名要去云南的人排起了长队，

审查自然也格外严格。陈际瓦得知自己被批准的那天,既高兴又自豪。

她是第11批,四月份走的。她到了西双版纳,被分在一师二团。汽车一直把他们拉到营部,营里杀了一口猪,高高兴兴地吃完了猪肉,嘴巴上的油还没擦干净,又要上路,这一次汽车换成了拖拉机,拖拉机一直把他们拉到四连,但四连仍然不是他们的终点,前边还有很长的路,前边的路一直伸进了大山,窄窄的,弯弯的,不能走车,只能靠两条腿一步步地量。

这段路要过一条沟,翻两座山,沟里有条小溪,小溪里有一些大石头,人就踩着大石头一跳一跳地走过去。好在每个人的行装都不多,他们以为兵团跟解放军部队一样,服装被褥脸盆茶缸什么都发,所以都是轻装简从。陈际瓦她们几个女生把裤脚高高地挽起来,把鞋子脱下来,提在手中,踩着石头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走得很慢。后边的男生不耐烦,一个劲儿地催,陈际瓦心里一慌,一脚踩空跌入水里。水不深,刚刚没过脚踝骨,溪水又清凉又清亮,看得见水里的小鱼和砂石,陈际瓦感觉很惬意。这时她看见一个瘦瘦的姑娘,肩上扛着一个大麻袋,步子走得很急,从后边赶了上来,她一脚踩在滑腻的石头上,麻袋失手落进水中,麻袋里边装的是满满的卷心菜。陈际瓦刚想过去帮她一把,姑娘却很有力气地提起麻袋一悠,就势扛在了肩上,歇也没有歇一下,继续快步向前走去,叫陈际瓦心里好生佩服。到了连里才知道,那姑娘原来是上海青年。

“五一”节很快就到了,知青们一直在盼着“五一”节,以为过节了总能改善改善伙食,解解馋。可11连是个新建连队,没有养猪,自然也没有猪肉吃,上海姑娘扛回来的那一麻袋卷心菜,吃得还剩下一棵半,一棵半卷心菜煮了一锅汤,全连五十多个人,喝着一锅卷心菜汤过了一个“五一”节。

“五一”节晚上营里演电影,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全连列队去看电影,电影演完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离连队还有八九里路呢,还得一步一步走回去。老战士路熟,

走得快，手里的马灯忽闪忽闪地在前边闪，一会儿就没影了。陈际瓦她们是头一次领略西双版纳的夜景，觉着新鲜，觉着神秘，有点恐惧，又有点刺激：那黑黝黝的树林里藏着什么呢，那硕大的树冠上藏着什么呢？大树后面有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像是躲着一个人，几个姑娘停下来，心里嘀咕，踌躇不前，每人找了一根棍子，壮着胆子走过去，哈，原来是一根粗壮的青藤！姑娘们哈哈一阵大笑，笑声荡过一条小溪，又荡过一座大山，荡近了连队，而从连队的方向，却传来一阵哭声。

陈际瓦急匆匆地推开了宿舍的房门，第一眼看见的是正在流血的两条腿，接着看见了一张哭泣的脸。她急忙问：“怎么了？”

“蚂蟥，蚂蟥咬的！”

“我这里有酒精棉球！”说着她就翻自己的提包。

“没用的，”副连长马红泽冷冷地说，“蚂蟥吸了多少血，伤口就要流出多少血，血不流完是止不住的。”马红泽是云南知青，她的经验要丰富得多，她像一下想起了什么：“际瓦，快看看你的腿上有没有挨咬？”

“不会的。”陈际瓦的两条腿不疼也不痒，什么感觉也没有。可是当她就着昏黄的马灯提起两条裤腿，才看见自己的大腿也在流血，一道一道地往下淌。她最怕血，也最怕蚂蟥，她觉得蚂蟥就藏在衣服里边，吓得一边大叫一边脱衣服，把脱下来的衣服卷成一团，狠狠地扔了出去！副连长帮着陈际瓦一处一处地数，一共有17处，也就是说，有17条蚂蟥爬上她的腿，吸了她的血。尽管副连长说那血是止不住的，陈际瓦还是用酒精棉球不停地擦，一会儿，地上就扔满了一堆殷红的酒精棉球。

后来陈际瓦明白了，夜间涉溪水走路，走在前边的人把蚂蟥惊动，走在后边的人就要挨咬。自从那次叮咬过之后，她就不再害怕蚂蟥，蚂蟥也很少叮咬她了。她过了蚂蟥这一关。

西双版纳大山多森林多，大山和森林对陈际瓦来说也是一关。当她面对着大山和森林的时候，心情复杂而又矛盾：她热爱山林宏

伟壮美的景色,深深地被它们吸引,她又害怕山林中的毒蛇野兽,对它们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1971年秋天,营里搞生产大会战,陈际瓦那时已经调到营部做宣传报道工作,两个人办一张简报,一星期要出四期。他们白天跑连队搜集素材分发简报,晚上写稿子刻钢板挑灯夜战,好不紧张。夜里的紧张陈际瓦倒不怕,她打怵的是白天走山路跑连队,全营有13个连队,虽然两个人分头跑,也常常要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跑得完。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单身一人在原始森林里转悠,也实在难为她,何况陈际瓦胆子小,在家里连猫都害怕。刚开始的时候,她老觉得后边有人跟着她,不停地回头看一眼,后来胆子渐渐大了,甚至还打死过几条蛇。有一次,天快黑了,她在山道上遇到一个傣族汉子,脸黑黑的,眼睛怪怪的,背着一只背篓,样子有点凶,从前面走过采。陈际瓦停下来,她真希望此时能再有一个人出现,她向四处张望,可是除了飒飒的山风,除了越来越暗的树林,再也没有别的人,只有这一个越走越近的傣族汉子,只有这一条狭长弯曲的小路。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陈际瓦的每一根神经都崩紧了。

那汉子张口了:“天快黑了,你一个人走路要当心!”冷冷地甩过来这一句话,他又冷冷地走远了。陈际瓦忽然感受到一颗温暖善良的心灵,她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加快了脚步,几乎飞一般地朝营部跑去。再后来,她找了一顶军帽戴在头上,帽檐压得很低,把头发全部遮盖住,让人分不清她是男是女,这样她觉得更安全些。

陈际瓦今天的职务是重庆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回忆起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度过的日子,她充满了怀念之情:“那段经历对我最大的影响有两点,一个是使我了解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真诚和淳朴,一个是我从几位优秀的基层干部身上懂得了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待人。”

她那个连队的副连长马红洋,个子矮矮的,人瘦瘦的,只比她们四川知青大三四岁,但显得很成熟,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她宿舍里的马灯总是全连灭得最晚的一盏,晚上她要看书学习,如果半夜

下大雨,她一定要爬起来,打着手电,到女生宿舍里查看有没有漏雨;早晨她又起得最早,带着知青出操。她有妇女病,一到例假期就肚子疼,但是参加劳动总是干最重最累的活,每次上山回来,都要给伙房扛两根枯树做烧柴。她还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连队里的许多事情都要她来张罗。“她真是能干,我们那时都有些怕她,但是遇到麻烦事又总是去找她,觉得连队里只有她最可靠。”

还有一个人是营里的教导员陈阿甲,他从来不在办公室里坐着,天天下连队,参加劳动。他随身带着一把刀,没有路走的地方,他就用刀砍出一条路来。有一次,他爱人和孩子都病了,他又要下连队,爱人死死揪住他的衣服不撒手,陈阿甲抽出刀来,把爱人揪住的那块衣襟一刀割断,又下连队去了。营里的知识青年,没有一个不佩服他。陈际瓦至今忆起这些还很激动:“我从他们身上懂得了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当干部,怎样对待工作和事业。一个社会,只有每个人都少索取多奉献,这个社会才能进步,如果大家都光想着怎么多捞一把,这个社会就糟糕了,就要衰落了。”

陈际瓦1979年顶替退休的母亲返城,从一个区党校的普通办事员干起,一直不停地努力工作,勤奋学习,先是到市委党校进修,又考入省委党校学习,直到今天还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把每周的两天休息日全都搭在听课上。她工作很忙,常常要加班,家里孩子又小,负担很重。她说:“我活得很累,这个累是我自找的。想一想兵团的那段生活,兵团的那些基层干部,我就觉得应该这么干。”

京沪渝昆四地知青的恩恩怨怨

陈际瓦的经历、体验和认识,只是云南知青中的一部分,陈卫国则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体验和认识。

陈卫国坐在河边用石子打水花,他专拣那种薄薄的片状石子,尽可能水平地向河面上打去。石子飞快地擦过水面,弹起,落下,再弹起,再落下,在水面上溅起一串水花。他数着:一、二、三、四……

最多的一次竟打了13处水花。他得意了，一屁股在河边上坐下来，这时他才发现，在他周围已经围了一群小孩子。他越发得意起来：“告诉你们，我打水花在八连就是第一，到了你们三连肯定还是第一！”

几个孩子都不说话，只用一双双好奇的眼睛盯着他，他们觉得这个知青好奇怪：头发留得那么长，一件衬衫是花的，连女知青也没穿过这么花的衣服。还有，他为什么不上山去砍坝，一个人在这里打石子玩？这时，从河对岸的山上传来呼喊声，接着是一声沉闷的巨响：又一棵大树被砍倒了，这棵树一定不小。

一个男孩愣愣地问了一句：“你咋不去砍坝？”

陈卫国认出来，他是指导员的儿子，刚到三连那天指导员找他谈话的时候，这个孩子来找他爸爸要钱买本子。他心里腾地窜起一股怒火：你爹管我，你这个小毛孩子也来管我！为什么不去砍坝？就是你爹不让我去，你爹让我在家写检查，你爹光看见我用铁锹剁掉了张福奎的脚趾头，他怎么没看见那一伙四川知青打我一个人！哼，别以为我陈卫国好欺负，我陈卫国在八连怕过谁，哪个四川知青敢惹我！你爹找我谈话说这里不是八连，三连是先进连队，先进连队又怎么样，今天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陈卫国一把拉住指导员的儿子，那个男孩只有八九岁，挣扎着要跑，可他哪里拗得过气力蛮横的陈卫国。陈卫国一直把孩子拉到了河中心，那里的水几乎没到了孩子的胸口。孩子害怕极了，哭喊着，尖叫着，陈卫国用力按住孩子的脑袋往水里扎，哭喊声和尖叫声听不见了，水面上冒起一串水泡，孩子手脚一顿扑腾，渐渐没有了反应。陈卫国这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赶紧把孩子拖上岸，孩子已经处于昏厥状态。远处传来女人的哭喊声，陈卫国抬起头来，看见一个妇女正往这边跑来，“大概是指导员的老婆。”他这么想着，转过身，朝另一个方向快步走去。

陈卫国知道指导员决不会放过他，他多次尝过连队干部的厉害。在八连的时候，他领着一帮上海青年同重庆青年打群架，气得

红了眼的连队干部就经常冲着他嚷：把他捆起来！一个小时之后，陈卫国再次听到了这句话。指导员把这句话一说完，就有几个人拿出一条在水里泡过的棕绳，结结实实地把他绑了起来，那绳子真厉害，一直勒进了皮肉，他疼得使劲喊叫，可是毫无用处。指导员狠狠地骂了他几句，就匆匆回家看儿子去了。

在云南兵团曾经流传过这么几句话：上海知青掌权把子，北京知青掌笔杆子，昆明知青掌算盘子，重庆知青掌枪杆子。曾经在临沧地区耿马县二师八团下乡的上海知青刘忠定解释说：北京知青最关心时事政治，最爱议论政局形势，笔杆子又强，所以在机关当秘书的也最多。四川知青个子矮，但是体力好，最能吃苦耐劳，他们讲义气，抱团，谁要是有了难处受了欺负，别人就会挺身而出拔刀相助。四川姑娘泼辣，爱讲话，整天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嘴巴厉害不饶人，有句话叫“三个四川姑娘可以赶条街”，只要有她们在就热闹了。她们手也巧，会做菜，喜欢自己动手改善伙食。闹返城的时候，四川知青闹得最厉害。上海知青干活不如四川知青，但是脑子灵活，有一种优越感，不大看得起四川和昆明的知青。昆明知青帐算得精，在连队当司务长的昆明知青最多，但是他们不抱团，个人顾个人，比较松散。四川和昆明的知青都喜欢让上海知青从家里带东西，带得最多的是服装。当时上海时兴一种“经济领”，就是假领子，昆明知青开始嘲笑，说上海人买不起衬衫，穿半截子衬衫，不到半年，他们也穿起来了，他们说这种领子好看又好洗，本来昆明知青是不大穿衬衫的。

在各路知青里边，重庆知青打架最厉害，邓贤在《中国知青梦》中也写到：“与年纪稍长的北京、上海、昆明知青相比，四川知青（含成都、重庆）尤以性格蛮勇和好打架斗殴著称。‘文化大革命’全国武斗，成都、重庆造反派曾经创造出陆、海、空三军立体战争的壮观局面，遥遥领先于全国武斗水平。”重庆知青最主要的打架对手，是上海知青，他们有时是在一个连队里打，有时是几个连队合起伙来

打群架,也曾动过棍棒,也曾出过人命。打架之风盛行,与管理方法不当有关,连队干部捆绑吊打知青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有些连队里知青与干部的矛盾相当尖锐。若论管理水平之差、打架风气之盛、人际关系之紧张,云南兵团恐怕是全国各生产建设兵团里边最突出的了。

负重的探亲

云南农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之差,在全国也是十分突出的。

云南农场以种植橡胶为主,当时橡胶是国家十分紧缺的战略物资。好几个知青向我们介绍过种植橡胶树的全过程:先是砍坝,用斧子和锄头把一片森林砍倒,其中不乏两人合抱的大树,不乏十分珍贵的原始森林;接着是晒坝,砍倒的大树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暴晒两三个月,把滋润的枝条里面的水分晒干;然后是烧坝,点一把火,把晒干的大树烧掉。这时,一片茂密的森林就变成了一片焦黑的土地,在黑色的灰烬下面,是酸性的红壤。在酸性的红壤上面整地,修梯田,挖橡胶树穴,这是最苦最累的活,然后栽上育好的树苗,精心侍弄,一般要到5~7年以后才能割胶。伍穗平说他一到连队就种橡胶树,在连队里呆了六年,从没割过胶。

西双版纳草长得飞快树长得飞快,就是菜长不好。有人说是因为地下水位太高,烂根,有人说因为从五月到十月都是雨季。常年吃的只有卷心菜、茄子、韭菜、辣椒等单调的几种,伍穗平说最好长的是南瓜,满山都是,吃得见了就恶心。刘忠定说,三分之一时间有菜,三分之二时间喝韭菜汤,知青戏谑当时的伙食是“九(韭)菜一汤蛋炒饭”,因为白米饭里边加着三分之一的玉米,知青开始把黄澄澄的玉米当成了鸡蛋。没有泪,茄子是蒸了吃或是用炭火烤了吃,小辣椒也是用炭火烤软了,撕开,加点盐拌着吃。在云南不吃辣椒不行,因为太潮湿,有瘴气。《词典》上说,瘴气就是“热带或亚热

带山林中的湿热空气,从前认为是瘴疔的病原”,而瘴疔则是“亚热带潮湿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等传染病”。许多人到了西双版纳都烂腿,先是红肿,发痒,越挠越厉害,流黄水,特别是雨季最厉害,他们的腿上至今还留着疮疤。

住的房子是竹子搭成的,睡的床是竹子搭成的,放木箱的架子也是竹子搭成的,如果箱子长时间不开不晒,里面就会发霉长毛。开荒的时候蛇很多,蚂蟥很多,有的蛇还爬到宿舍里,盘在竹床下,一些女孩子怕蛇怕得要命,夜里不敢起来解手。就连云南的小虫子都欺负知青,土蜂蜇人,蜇死过一个女知青,蚂蚁也有毒,皮肤挨了咬就红肿。

对于北京和上海知青来说,云南还有一苦,是交通苦。去云南的路途太遥远。“北京五十五”之一的陈光说:从北京到昆明,火车要走五六十个小时,那时成昆线还没通车,要从广西那边绕着走。到昆明下了火车,还得坐三天半的汽车才能到景洪,从景洪到农场还有60里,单程也要走一个多星期。上海知青吴鹤翔回忆说,到昆明下了火车,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找长途汽车。那个时候带的东西多,要从家里带许多腊肉猪油咸菜什么的回来,两年一次探亲假,有的人要把两年用的东西都带回来,因为云南东西太少,市场空空的,还得给别的同学捎一点,至少要带三个人旅行包,都是鼓鼓囊囊,死沉死沉的。把两个旅行包系起来,往肩上一搭,手里再提一个,要跑着步去找汽车,抢座位,那股紧张劲,跟打仗差不多。从景洪到我们下乡的那个地方还有100多里路,路不好,一下雨就不通车,我们就截拖拉机,吓得拖拉机看到知青就跑,我们就追,追上了,先把旅行包甩上去,人再爬上去,要不然,就得在景洪住上两三天。

物质生活的艰苦,精神生活的单调,加上管理不好,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在知青中间就出现了男女同居的现象,开始是个别的,后来发展得很普遍,男生和女生,晚上睡到一个蚊帐里边去。在兵团没有撤消的时候,这种事情连队干部还管一管,以后越来越

多,大家都习以为常,就很少有人去管了。我们在采访中听到一个个关于知青同居的故事时,心里边是沉甸甸的,那决不仅仅是年轻人在生理上的一种需求,更表现出知青当时的绝望心情,那是他们在绝望之中的一点欢娱,一种自毁,一种自暴自弃。他们不可能没有想到后果,但他们已经不顾后果,“豁出去了,管他呢,反正是没有出路了,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了,何不苦中寻乐呢!”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在那些原本十分规矩的知青们纯洁的内心里,男女同居未婚先孕是一件丢人可耻的事情,但凡还有一些上进心,但凡还想到今后个人的发展前途,他们也不会那样肆无忌惮。当这些十分珍惜脸面的人已经不再顾及脸面的时候,当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已经完全失望的时候,爆发那样一场震动全国的大事件,就完全是在情理之中了!

上海女知青死于医疗事故

西双版纳最早种植橡胶的地方在橄榄坝。橄榄坝在景洪县境内,1948年,一位华侨在这里种下了从泰国带回来的橡胶苗,从此西双版纳才有了橡胶树和橡胶林。后来橄榄坝成为一个农场。再后来橄榄坝成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

距第一次栽种橡胶树苗30年后,橄榄坝又因知青的一次大举动而再次闻名。一起偶然的医疗事故,成为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的导火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小萌博士写到:

“1978年8月,橄榄坝农场发生上海女知青徐玲先因医疗责任事故导致难产而死的恶性事件,引发了知识青年抬尸游行示威,游行向州委所在地、西双版纳首府景洪进发。西双版纳垦区党委对这起事件迅速作出以下决定:一、医生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作深刻检查;二、尸体要马上处理;三、对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和聚众闹事的首要分子,要坚决打击,决不手软。试图用高压手段迅速

平息这场风波的做法，反而起到激化矛盾的作用，情绪激愤的知识青年不断加入到游行行列中，队伍如滚雪球般扩大，对死者个人的沉痛哀悼，已经演变为对知识青年集体命运的抗争。

“云南省委决定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立即采取了三项措施：一、对农场领导的严重官僚主义和失职行为给予严厉批评，责成他们向知青们检查道歉；二、答应知青们的合理请求，并为死者举行追悼会；三、请州委及农场通知死者家长及上海市知青办，请他们来西双版纳共同料理后事。在省委的直接干预下，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下来，但是诱发知识青年聚众请愿的病灶没有去除。不久，一场风暴崛然而起。”

这场风暴，是知青要求返城的风暴，返城才是他们的最高要求，医疗事故不过是一个引子、一个借口。后来云南省革委会和国务院调查组的《调查报告》中也说：“知青请愿、罢工的惟一要求是返回城市。这个要求普遍、坚决、强烈。东风农场的知青对调查组说：你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一是让我们回去，一是派兵镇压，没有其他办法。勐捧农场有的知青说：不回家是死路一条，宁可杀头，也要回家。勐满农场二分场八队一知青串连了五六个人，准备好汽油，声称五一节前不解决他们回家的问题，先离婚，然后到上海市最繁华的地方自焚。当调查组到勐腊、勐捧、勐满、勐定、盈江等几个农场时，都发生知青向调查组围攻、跪哭不起、哀求回家的事。”

累积成山的问题

背景之一：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城市，想慢慢解决知青返城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对“文化大革命”当中的许多错误做法加以纠正，知识青年们面临着一个改变自身命运的契机，他们想要抓住这个契机返城。

当时曾经任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的沈宝英向我们介绍说：

1978年和1979年,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对知识青年的问题都非常重视,因为社会上对这个问题呼声很高。当时有这样两句话,一句是李先念同志讲的,叫“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还有一句是“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这句话是指从1962年到1979年,国家财政花在上山下乡上的钱累计有70个亿,实际上是75亿多。这样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上山下乡的路子对不对,一个是对那些还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如何解决。知识青年当然希望返城,家长也有这个要求,呼声很高。1978年的9月和10月,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开了三次重要会议,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当时总的意见是:第一,上山下乡的方向还是要坚持,这样才能稳定大局;第二,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少下乡或不下乡;第三,要调整政策,做好稳定知识青年的工作。对于知识青年大批返城的问题,当时中央还是想要适当地控制一下,因为城市里一下子解决不了那么多人的就业问题。

1996年春天,在北京三里河的一幢公寓里,赵凡同志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大批的知识青年下乡,引起了四个不满意:一个是知识青年不满意,一个是知青的家长不满意,一个是接收知青的农村和农民不满意,因为安置知青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最后一个社会不满意。国家花了很多钱,却招来这么多人不满意,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但谁也不敢在会议上公开批评这件事,谁也不敢讲知青回城这句话,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讲的,当时还是“两个凡是”占上风。另外还有一个实际困难,就是当时城市的安置压力很大。1978年的时候李先念同志讲话说,全国整个工业多了两千万人,如果知青再返城,就更难以招架。特别是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觉得知青一下子都回来,要吃要住要就业,这些问题难以一时解决,解决不好就会给社会增加不安定因素,所以他们想缓一缓,拖一拖,慢慢来。不是不想解决,而是想要慢慢地解决,城市接收部门想慢慢来,下乡知青想快点来,这样知青的不满情绪就增加

了。云南知青闹事，实际上就是这么个原因。

当时在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里边，在新闻舆论的宣传上，对上山下乡都是肯定的，认为“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上山下乡的方向完全正确。”《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也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推迟了近两年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终于在京举行，会议开了40多天，最后形成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会议纪要》，一个是《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2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了知识青年的问题，并批准了这两个文件。中央在要求各地立即传达贯彻这两个文件的同时强调：解决知青问题要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形势这个大局着眼，小局要服从大局。《纪要》中提出：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但下乡人数将逐渐减少，城市中学毕业生分配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留城面要逐步扩大。

背景之二：以病退、困退、顶替等途径返城的人数迅速增加。

与此同时，返城的政策也在稍稍地松动，返城的口子在悄悄地打开。

先是1977年11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通知》中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病残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符合国家规定，需要返回市、县家中的，经市、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审查同意，准予落户。此后，病退、困退返城的人数迅速增加。

接着，《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的评论员文章中，在讲了一番“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确方向”的大道理之后说：有一部分知识青年将要继续升学，或者回到城市参加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工作。但是，大多数知识青年将要继续留在农村。

1978年6月2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其中第十条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招收的子女,可以是按政策规定留城的知识青年,也可以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个月以后,国家劳动总局又对这个《办法》制定了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中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需要招收的子女,原是城镇知识青年,现已是国营农林牧渔场正式职工的,可以商调,国营农林牧渔场应给予照顾。自此,有了“顶替”一说。按“顶替”政策回城的,以上海知青为多。

此外,1977年底大学恢复高考招生,一大批知青参加了高考并被录取。

越来越多的同伴,通过上大学、病退、困退、顶替等途径走掉,越来越多的返城信息,一刻不停地搅动着那些无法走脱者的心。

到1978年的秋天,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上山下乡的1600多万知识青年,留在农村的只有800多万人,大约一半人都通过各种方式走掉了。而在云南下乡的十万余知青中,走掉的不足四分之一,到1978年底,云南省国营农场还有知识青年7.55万人,其中最多的是上海知青,有3.7万人,占49%;其次是四川知青,有3.2万人,占42%;昆明知青还有3600人,占5%;北京知青有2900人,占4%。

背景之三: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积累成山。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和国务院调查组在1979年1月22日《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的调查报告》中,分析了“引起知青闹事的原因”。《调查报告》这样写到:

这次闹事有它的历史原因,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积累成山,长久未得解决。

(一)有些地方动员知青来云南时,不实事求是。去四川省动员知青时,有人把经济落后的西双版纳吹成天堂,把“建设兵团”说成

解放军,说什么“西双版纳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伸手就是满把花生”。还说在建设兵团“穿军装,发被褥”等。许多人在这一片美好的宣传中,满怀激情来到农场,有的连被褥也没有带。来了一看,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但也回不去了。

(二)生活条件太差。现在知青住的房子还有不少是阴暗、潮湿、漏雨的茅草房。东风农场四分场九队、十二队有些知青住的房子,全部没有门,女知青用塑料布遮一遮,男知青干脆不挡。由于各种副食、日用品很少,知青回家探亲时,都带一些生活必需品回来。有些知青每次要带足两年用的东西,旅途艰难不说,还常常因为超重被罚款或没收。东风农场一个知青因带的草纸、肥皂、榨菜超重,被昆明车站检查人员罚款74元。还有个青年带了20斤食油,因超重,要没收,虽经苦苦哀求也不行,青年一气将油统统倒掉。知青谈到这些情况泣不成声,说这些食品都是爸爸妈妈一家人嘴上省下来的。农场的惟一文化生活是看电影,但在边远的分场、生产连队长期看不到电影,有时为看一场电影往返要跑几十里路,回来时天已经亮了。

(三)少数基层干部对知青的管理简单、粗暴,个别的还贪污受贿,违法乱纪,打击报复。“兵团”时期的生产连队干部,多是现役战士担任,方法简单,强迫命令,捆绑吊打知青的事,时有发生。知青纷纷反映他们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受到的虐待,由此造成了一些冤案、假案、错案,仅东风农场就达400多件,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该场八分场二队知青吴语龙,1977年4月被诬为盗窃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遭到捆绑吊打和游斗,以致打成残废。事后公安部门查清,偷东西的是当地的一个傣族盗窃集团,和吴语龙根本无关(已做处理)。有些基层单位还制定了一些不恰当的管理办法,例如有的规定加班劳动迟到一小时记事假一天;到了下班时间,地里活未干完,拒绝继续干的,全天不算出工;政治学习不参加,扣发工资;因病未愈超假的,按事假处理;探亲超假十天的不报销旅费,有的还扣发工资,不予报销探亲期间的医疗费等等。

有的基层干部勒索知青从家里带来的东西,发“知青财”。还有少数坏人调戏、奸污女知青。不完全统计,仅东风农场从1970年至1974年就有30名基层干部因奸污女知青,情节恶劣,受到刑事处分,遭到他们迫害的女青年有100多人。这种事情虽做过处理,近几年少了一些,但还时有发生。

(四)社会歧视。探亲途中旅馆不愿安排知青住宿,常常被迫露宿街头;即便接受,也是安排在被褥很脏、又阴又暗的房间。

(五)交通不便,探亲困难。有的生产队没有公路,回趟家要步行,搭牛车、马车、汽车,几经周折,约七八天才能到达昆明。逢年过节,交通拥挤,在昆明往往还要等上一个星期,回来又是如此。遇到雨季,困难更大。旅途受阻时间长了,钱粮用光,只得步行回农场。有的青年是一路哭着回家,又一路哭着回来。东风农场12分场上海知青张建荣,来场三年后才回家探亲,批给59天假,路上花了33天,因怕超假,提前离家,到达农场还误了两天,因为超假,农场不给报销路费。由于生活条件太差,就是原来一些满怀革命豪情主动报名来边疆的青年,也感到难以忍受。他们说:“刚来时,满怀豪情,热血沸腾,而现实生活如冰水浇身,苦上二三年还可以坚持,如今七八年甚至十年了,实在不能再忍受了。”

上述种种,积怨很深。过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对提意见的动辄打击报复,因此,知青敢怒不敢言;而今发扬民主,允许讲话,按他们的话说,“蕴藏在心底的火山爆发了”。我们深深感到,这次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闹事,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决不是少数几个人煽动起来的。

在此之前,1976年7月,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在写给上级的《关于橄榄坝农场八分场现状的调查报告》中,就曾经发出过“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再发展下去,真要出大事”的警告。但是警告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1978年11月景洪农场开始罢工

由橄榄坝刮起的风暴，中心很快就转移到了邻近的景洪农场。之所以会转移，是因为一个上海知青的登场。他叫丁惠民，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的庶务员，素来默默无闻，几天之内却成为风云人物。1978年10月底，由他执笔，起草了一封《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信中反映了知识青年的窘困处境，诉说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信中这样写到：“我们农场知识青年以最诚挚的心情向您

邓副总理恳切呼救，请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吧！”这封信征集到近千人的签名，可是寄出之后没有回音。11月16日，仍由丁惠民执笔，又发出了第二封给邓副总理的联名信，这封信同样没有回音。

他们没有就此罢休，他们的活动在步步升级：写信不行，那就上北京，找中央领导接见，当面陈述我们的要求和理由！四十几名知青代表，秘密地在景洪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北上请愿团，进京请愿。他们起草了一份写给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请愿书，广泛征集签名，并以募集捐款的形式，为进京请愿团筹措经费。与此同时，知青罢工也开始了，丁惠民所在的景洪农场十分场最先贴出了“行动起来，大罢工，大返城”的《罢工宣言》。罢工迅速蔓延，很快就波及到除黎明农场之外的西双版纳垦区七个农场，还波及到河口、金平、文山、临沧、德宏等地的五十多个农场。

云南省革委会和国务院调查组的《调查报告》中说：“11月下旬，省委派常委农林政治部主任带工作组到西双版纳各农场劝解无效。11月30日筹备总组确定发动捐款，准备经费，要求州委批准到北京请愿，州委没有同意，进行了劝止。12月2日东风农场七、九两个分场开始罢工，并烧掉生产工具。12月7日筹备总组开会，9日发出罢工宣言，有7个农场的知青参加了罢工，只有黎明农场没有参加。12月12日罢工人数达到3.04万人，占知青总数

的70%。”

蓄积已久的能量在爆发出来的一刹那是相当猛烈的。

云南知青王瑞林讲起他们那个农场的情况：知青把多年积压下来的气都撒出来了，有些连队的知青把菜全部吃光，把猪全部杀光，到场部游行，打着小旗子，上面写着“打回老家去”，“树高万丈落叶归根”。当时我在场部工作，有一天夜里，听见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拉来了好几车知青，要找场长。到场长家里找不到人，就砸东西，又到场部食堂，把鸡杀掉，把猪杀掉，饱餐一顿，然后走光。第二天早上我们起来，看到食堂周围是一地鸡血一片鸡毛。有一天农场的保卫科长说，知青要炸大楼，他给我们都发了枪和棍棒，24小时轮流值班，保卫大楼，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几乎各个连队都闹，只是程度不同。真正大闹的是少数，反对闹事的也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内心里支持闹，希望闹成了能够返城，但又不敢大闹，这种人是大多数。

《调查报告》中说：“罢工期间出现了一些打砸抢的行动，伤害了一些干部，给国家财产也造成一定损失，仅东风农场就有16个干部挨打，其中重伤一人。东风农场场长王文希的家里被砸。黎明、东风、勐满农场，以及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都发生过大批知青抢饭吃的现象，有的吃过饭以后，把饭碗也摔掉。至于围斗干部，各场都有发生，有的还强拉住干部和他们一起绝食。有的知青还散布了一些反动言论。”罢工还造成了经济损失，“仅西双版纳州八个农场，由于知青罢工，去冬今春应开荒11万亩，只完成了一万多亩；已定植的橡胶树，有90%左右没有管理；橡胶苗圃4800多亩，也有60%左右没有管理；备耕工作（拟种黄豆二万亩、花生2.2万亩、玉米5.6万亩、甘蔗一万亩）基本上未动。勐捧农场六分场知青在国务院三条指示广播以后，还把锄头、砍刀等劳动工具架在一起烧掉，并把40亩已经发芽的油菜全部毁掉，损失有三四千元。有的生产队还把母猪和小猪杀光了。”

12月12日，由省农垦总局张泽民同志带领省委工作组到达

西双版纳，找罢工带头人丁惠民等谈了话，劝止北上。

当年在云南省知青办工作的上海知青陈洪范，曾经参加了由张泽民带领的工作组，去西双版纳解决问题。他回忆说：

工作组的组长是省农垦总局一个姓张的局长，成员有农垦总局的三个同志和省知青办的三个同志，一共有七个人。当时省委催得紧，从昆明到景洪，正常情况下少说也要走三天，我们坐车一天半就赶到了。一到景洪，当天晚上就听汇报，州委书记和州里的农垦局长作汇报。当时知青已经把州政府围起来了，导火索是孕妇死人的事件，知青认为农场不把知青当人看，生孩子出了危险都不去抢救，于是组织罢工，要上北京告状，提出要回家。当时丁惠民不露面，上边也摸不清知青的组织底细，只听说有一个八人的勤务组，他们身边都有保镖。后来我了解到了惠民是景洪农场10分场的小学老师，我弟弟原来曾经跟他在一个连队，我就托人给他带话，说我是某某的哥哥，如果有可能的话想见个面。当天晚上丁惠民带了几个人来，悄悄地把我找出去，他们谈了知青的许多问题，我说这些问题都要解决，但是你们不应该闹，闹也闹不回去。后来丁惠民提出一个方案，他说，我退一步，你们也退一步，我不上北京去告状，但我们罢工期间的工资要照发。我把见丁惠民的情况跟张局长讲了，他很高兴，在开会讨论丁惠民方案的时候，我提了个意见：不要讲知青罢工，讲他们停工，停工期间我们不发工资，但是发生活费，一天大约是一块八毛多，这样知青的要求也满足了，罢工的问题也回避了。这个意见在会上通过了，但是向省委汇报以后，省委不同意。这样知青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认为我们工作组说话不算数，又闹了两三天。这时，赵凡同志带领国务院的工作组来了。

1978年12月昆明火车站上剑拔弩张

由知青组成的两批北上请愿团从景洪出发，先后抵达昆明，人数有数十人之多。云南省委十分紧张，组织省农场总局、知青办和

团委出面与知青代表座谈,做说服劝解工作,但是一点效果也没有。昆明市的街头上出现了大标语、大字报、慷慨激昂的演说者和募捐者,省城一时风紧。就在这越来越紧的风声中,12月22日晚上,一批北上请愿团的知青代表登上了开往北京的62次列车。昆明火车站先是百般阻止他们上车,阻止不成,便停开火车。12月24日晚。当清愿团的知青无法登上火车时,便铤而走险,采取了卧轨的过激行动。卧轨持续了一天一夜,火车无法开出。

当昆明火车站上剑拔弩张、硝烟渐浓的时候,丁惠民却使用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他带领另一批北上请愿团,12月23日晚上,在昆明以西18公里的一个小站,悄悄地登上了由昆明开往成都的190次火车,四天以后,到达北京。

1978年12月末赵凡飞往昆明

1978年12月25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第三天。当赵凡急匆匆地赶到北京西苑机场时,飞往昆明的专机已经启动。他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匆匆登上舷梯,机舱内已经坐了几个人,除了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还有贵州省委书记马力。赵凡同他们简单打了个招呼,就挨着安平生坐下,想更多地从他那里了解一些情况。安平生告诉他:省农垦局的领导认为这件事的背后有黑手,是坏人闹事。赵凡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的心情有些沉重。处理这样的问题,在他看来还是头一次。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刚刚结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接到省里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告诉他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情:国营农场的知青无票强行上车,要去北京请愿,铁路公安人员进行阻止,他们就在昆明卧轨,不让通往北京的火车开出!问题重大,安平生马上将此事报告中央。

中央指定刚刚在全会上增选为政治局委员的王震同志负责处

理此事，他多次通过中央办公厅和国家农垦总局了解事态的发展，并及时向中央报告。中央经过研究，作出安排，决定派调查组火速赶往昆明处理此事。调查组的组长，一个是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组长赵凡，他一身兼二任，既管农垦又管知青，另一个是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许法。

一到昆明，赵凡首先解决知青卧轨的问题，他带着调查组和省革委会的同志赶到火车站看望知青，又会见了他们的代表，苦口婆心地讲道理，答应尽快解决有关问题，很快与知青达成了协议。持续一天一夜的卧轨知青撤走了，火车通车了。紧接着，调查组分赴西双版纳、临沧、德宏、红河、保山等地区的国营农场，进行调查和说服教育知青的工作。赵凡率领的一个小组昼夜兼程，驱车直奔西双版纳。

赵凡是从小察冀边区出来的干部，从1946年党组织派他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开始，他的工作一直没有离开北京。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第一个职务，是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接着做农村工作部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一直主抓农业。1978年2月他重新恢复工作，仍然是抓农业，所不同的是由抓北京市的农业变为抓全国的农业，由抓人民公社的农业变为抓国营农场的农业。农业问题是种地打粮的问题，而眼前面临的却是知识青年的处境问题，它比单纯的农业问题要复杂得多棘手得多。

吉普车在山野间驰骋，忽而旋下低谷，忽而又盘上山颠，此时北京正值数九隆冬，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最萧条的景色，而西双版纳却繁茂如春，各种奇异的植物擦车而过，向北京来的贵客炫耀着姿色，油绿的叶子在亚热带的阳光下闪着光泽。赵凡对这一切都无心欣赏，他全神贯注地思考着面临的难题，思考着该如何回答知青返城的强烈要求。

《调查报告》中说：“去西双版纳的调查组于12月30日到达景洪，听取了自治州党委关于知青闹事情况的汇报。12月31日到1

月2日,在景洪召开了八个国营农场党委书记会议,研究了如何妥善处理知青闹事,以及国务院调查组开展工作的问題。1月3日调查组分头进入各个农场。1月13日、14日又召开了农场党委书记、调查组长会议,汇报了情况,总结了经验,部署了下一步工作。去德宏的调查组于1月2日到达芒市,与知青进行了30多次座谈,接触了3000多人次。去临沧、红河、保山的调查组,也和知青、农场干部、广大职工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接触。通过十几天的调查,基本上弄清了知青闹事的情况、原因,研究提出了一些解决农场知青问题的措施。”

1979年1月勐定农场千人绝食

勐定农场在耿马县境内,是滇西各农场中规模最大、种植橡胶树最多、知青最集中的一个农场,共有知青7000多人,其中成都知青最多,有5000多人。从西双版纳点燃的大火,很快就燃烧到这里,这里的情绪甚至比西双版纳还激动。

当西双版纳的局势渐趋稳定的时候,一封中央办公厅的急电送到了赵凡同志的手上,电文说,勐定农场的知青已经绝食三天,要求见国务院调查组的人,要求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他们说见不到国务院调查组的人决不吃饭,电文要赵凡火速赶往勐定农场解决此事。

赵凡同志回忆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我说连夜走,我们调查组的几个人,坐了一辆军队的吉普车就出发了,整整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下午赶到。当时绝食的知青很多,有上千人,气氛很紧张。知青们对全国知青会议的两个文件有意见,特别是对关于国营农场的知青不再办理病退、困退这个规定表示不满,认为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回城的希望。农场的干部也很紧张,我对他们说,知青不可怕,知青有什么可怕的,跟我的孩子一样,我的四个孩子都是知青,两个在山西插队,两个在甘肃。我们先

到招待所，找了七八个知青代表谈话，他们全都是诉苦，生活苦，劳动苦，离家太远，交通不方便，超了假还要受处罚，还有不正常死亡的现象。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要求返城要求回家。有苦嘛，就要让他们讲出来，发泄出来了，心里才好受些。我跟几个知青代表谈了一夜，把他们的要求、他们的情况都摸清楚了。

“第二天上午，绝食的知青全都集中在一个大广场上，坐得满满的，大约有千八百人，黑压压一片，知青见到我们中央调查组的人来了，就喊口号，喊‘我们要回家！’有许多人还大哭起来，哭得很响。我先亮明身份，我说我是国务院派来的，我是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是专门来调查知青问题的。国务院对知青问题很重视，要我们来了解情况，你们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讲，但是要吃饭，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也是知青家长，我有四个孩子在农村下乡，所以我完全能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不吃饭，我们心里很着急，因为我们关心你们的健康，党中央很关心你们的健康。对你们的要求，党中央很重视，会认真研究处理，但是你们要给我们一个时间，因为我们要向中央和国务院汇报，还要同你们所在的城市商量，你们这么多人，返城这样一件大事，我们这几个人也决定不了。你们给我们一个时间，我们一定解决好处理好。我把这些话讲完，谁也不哭了，都觉得我们是解决问题的态度，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当时我们就感到，知青返城的要求不解决是不行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再怎么样做工作也没有用，事态就无法平息下去。我们一方面向国务院汇报，一方面就同北京、上海、成都、重庆这几个城市联系，希望他们在接收知青返城这个问题上能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我们的调查组里就有这几个城市知青办的代表，他们赶紧给家里打电话商量。开始几个城市的态度都不积极，都不同意大批知青返城，因为当时各地都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哪个城市都有一大堆问题要处理，一下子回来这么多知青，要就业，要吃饭，要住房，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城市也确实有很大的实际困难。最后是四川省先表态，省委经过讨论以后，说我们四川的知青我们负责，凡是

按照政策应该回来的,我们都接收安排。当时国务院是李先念主持工作,国务院把四川的态度告诉上海,上海谈到接收知青的压力太大,因为数量太多,当时大量搞病退,已经批了三万,待批的还有八万,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当时云南的国营农场里边,最多的就是这两个地方的知青。

“当时我们调查组处理知青的问题,感到最不好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云南省农垦部门有人老想从知青里头抓坏头头,老想用搞阶级斗争的那一套办法去解决知青的问题;再一个就是上海和四川的代表一发言就说知青不能回去,回去不好安排,城里非大乱不可。当然这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是市里的意见。当时我的看法很明确,这绝对不是坏人闹事,不能当成闹乱子,那样肯定处理不好,我们是用疏导的办法,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只有理解了知青的心情,才能处理好知青的问题。处理完之后调查组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我和安平生都签了名。”

知青大返城

赵凡同志所说的那份报告,就是《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由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和国务院调查组共同起草,报告里提出了解决知青问题的六条处理意见:

“知青闹书的情况,已基本查清,根据中央(1978)74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好云南知青闹书问题,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云南省委和调查组一致认为,由于这些农场均处于边境民族地区,为了稳定边疆,适应当前反修斗争和战备的需要,应根据云南边疆农场的特点和条件,采取以下措施。

“(一)云南国营农场是国家的重要橡胶生产基地,发展前途很大,应当切实搞好各项建设事业,使广大知识青年感到在农场大有可为。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尽可能多的知青自愿留在农场。坚决不愿留场的,经与有关省、市协商同意,采取如下办法解决:(1)

办理病退、困退；(2)父母退職、退休，由子女顶替；(3)劳力多余的，进行调工；(4)上海郊区农民，按上海市意见，回去当社员；(5)参军复员的，回到父母所在地安置；(6)农垦部门在当地办中专和技校招收一部分知青。分期分批处理解决。

“(二)已婚知青，处理不好影响也大。和当地青年结婚的，应尽量动员留下，不回城市；各城市的男知青与女知青结婚，应相互照顾，允许到一方城市落户。但应说服少回上海。

“(三)知青当中的一些冤案、假案、错案，还没有解决的，要切实加以解决。有错必纠，这是关系到实现安定团结的大问题。

“(四)有的知青提出要清算过去积存下来的经济帐，例如超假的探亲路费和回城看病医药费的报销问题，以及一些不合理的罚款等等，这些事情，都应实事求是地由农场妥善解决。

“(五)对这次知青闹事中，少数有打砸抢行为的人，一般应着重批评教育。但对情节特别严重，并造成恶果的，应当切实查明事实，追究法律责任。对这些人不加追究，不足以保卫社会主义法制，亦不能平民愤。

“(六)对被打的干部，要进行慰问、鼓励和表扬，经济上有损失的，应追究退赔，还有困难的由国家给以补助、救济。”

这六条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坚决不愿留场的知青”，同意“办理病退、困退”，这就打开了知青返城的口子，这是知青们最大的胜利，实质性的胜利。

大的原则决定了，下一步进入实施阶段，而实施阶段的工作重点在接收知青的城市方面。为了协调，1月21日，在昆明市召开了有北京市、上海市、四川省和云南省几个方面的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在会上讲话说：现在情况已明，办法有了，解决问题按照中央、国务院的六条决定，对全省七万多知识青年，尽量做工作，愿意留下的都欢迎，不愿留下的都返城。

知青是急不可待，欢喜若狂，开始了场面壮观的“胜利大逃

亡”。陈洪范说,开始办理手续的人排起大队盖公章,后来大家等不及,就用一根绳子,把一颗公章吊在日光灯下面,谁都可以盖,随便怎么盖。王瑞林说,有些知青,把门窗拆了钉箱子,把电话线剪了捆箱子。也有的人什么东西都不要了,害怕政策有变,搭上一辆汽车就往家里跑,说实在话,那时知青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当时知青返城的问题能够得以较快解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越边境的局势很紧张,中央已经决定要打一场自卫反击战,为了准备打仗,必须保证边境地区的稳定,必须保证一个安定可靠的后方。战争的需要,促进了知青返城问题的解决,加快了这一问题解决的速度。2月17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陈洪范回忆说,那些天,在通往中越边境的公路上,白天跑的是交通车,晚上跑的是军车,交通车往南开,军车往南开,交通车上拉的是返城的知青,军车上拉的是军人和军火。

由于惠民率领的一批请愿团到了北京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和西单等地贴大字报,后来国务院有关部门同他们接谈,达成了复工以后发工资的协议。1979年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长程子华接见了请愿团。王震虽然对知青的处境表示理解,但他更主要的是批评了知青的请愿活动。他说:现在要大治了,再也不能允许那种动荡不安的无政府状态了,这样闹影响不好,回去以后要作自我批评。他还意味深长地要求知青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安定团结实现四化贡献力量。

中央表示出来的态度大大出乎请愿团的意料,接见的当天晚上,他们就给云南发去复工的电报,这封电报一月七八日才传到西双版纳,但是没有产生多大效果,有人说丁惠民代表不了他们,不听他的。第二天,请愿团就乘车返回云南。后来,王震副总理接见了惠民等人的消息在报纸上刊登出来。1月23日,在昆明紧急会议已经召开、知青返城的决策已定的形势下,丁惠民等请愿团成员给王震发了一封电报,对前一段的所作所为做了自我批评。

由云南省开始的知青大返城波及到全国，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返城，也在1979年达到了高潮，通过病退、困退先后返城的有35万人之多。到1983年统计，垦区尚有知青两万人，其中本省知青居多，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知青仅有7000余人，到了九十年代，留下的知青还剩下万余人。在山西省下乡的50万北京、天津知青，到1985年4月，只剩下1.5万人。

第十三章 在希望的田野上

知青大返城的浓烈硝烟散尽了，头顶上还是高远的蓝天；知青大返城的汹涌浪潮卷过了，脚底下还是坚实的土地。这块土地上还有知青在，尽管他们显得孤孤零零，形只影单，尽管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已经消散在老职工的队伍中。

两个境遇悬殊的女知青

1995年的秋天，我在黑龙江省建三江垦区采访。建三江有一个农贸市场，投资150万，一年的成交额有两千多万，是整个黑龙江垦区最大的农贸市场。农贸市场归工商局管理，工商局长是个哈尔滨知青，叫崔玉亭，他带我去参观他的“势力范围”。

农贸市场大门口，有几个摆摊儿卖菜的，他指着其中的一个妇女问我：“你猜，她是什么人？”

那是一个矮小瘦削的女人，身高不到一米六，面色发暗，皮肤粗糙，眼角堆满了鱼尾纹，鱼尾纹向上下扩展，清晰地刻在发际和额头，她上身穿一件半旧的红毛衣，下身穿一条黑裤子，她显得憔悴，甚至有些枯槁，连那两条细细的辫子也乌秃秃的没有光泽。她正在向一个存放自行车的人收费，身旁还有一个菜摊，一块塑料布

上摆放着几棵大白菜、一些青椒和大葱。

“她是个知青，还是个北京知青，你能想象到吗？”

老崔的话让我的心先是猛地一沉，紧接着腾起一股悲哀：她身上哪里还有一点知青的影子？既看不出“知识”，也早已经不年轻，即便在那一溜排开的卖菜的妇女里面，她也是比较土气，毫不起眼出众的一个。我一下子就被击中了，被这个面容憔悴、存车卖菜然而却有着“北京知青”眩目光环的女人击中了，被她的处境和命运击中了。

“他们两口子都在工程连，连里没活干，开不出工资，照顾她，给她找了这么个事儿，让她上这儿来看自行车，一天给10元钱。”老崔说。

她姓金，是六九届，海淀区的，下乡不久母亲就死了，家里生活困难，她就在农场成了家，爱人是本地的，返城的时候她就没有走。现在两个孩子都大了，一个18岁，一个20岁，都是大小伙子，按北京的政策，允许有一个孩子把户口迁回北京，可是继母不同意，写信来说：要是孩子自己有地方住，可以把户口落在我这儿；要是没地方住，我这里也不接收。“这样也好，大人孩子都在这儿，谁也走不了，都在这儿死守着吧！”她解嘲地说，“就是孩子没工作，他想做买卖，又没钱，过日子都困难，哪儿有钱给他做买卖呀！”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神情和语气跟她旁边那些卖菜的女人一样，没有丝毫的抱怨，“知青”头衔已经不能带给她任何特殊的照顾。不，应该说还是有一点，她比她们还是有优越的地方：毕竟她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这使她能有一份相对固定的收入。

老崔对我说：“走，我再带你去看一个知青。”

农贸市场里是一片热闹的景象，国庆节和中秋节都快到了，家家都要置办过节的货物。我们到了一家肉食店，招牌上写着“高家香肠店”，门口用大字写着：正宗哈尔滨红肠。推门进去，店铺不大，一排柜台把屋子一隔两半，更显得狭窄。有几个客户正在嘻嘻哈哈地跟店主人侃着价钱，说话很随便，看样子都是这里的老主顾。店

主人是个女的,看上去40岁左右,穿一件绿毛衣,戴一条珍珠项链,一边应酬一边算帐,手指灵活地在计算器上按来按去,报出一个价钱:“六百零七块四毛!”

“就把那零头抹了吧!”上货的男人一边掏钱一边说。

“行,六百零七块,四毛不要了。”

“四毛钱还值得一抹,六百块,凑个整,行不?”

“你这小子就会占便宜,行,过节了,给你个优惠。”

“大姐,我这钱没带够,刚才上了点别的货,花冒了,先赊着你的吧。”

“那不行,我这儿都是现钱买卖,一手钱一手货,从来不赊帐!我这儿的规矩你也不是不知道。”女店主脑瓜灵活,精明干练,干净利索地处理着店里的业务。她一眼看见我们:“呀,局长来了,你看我这屋里乱的,也没个地方坐。”

“这是北京来的记者,专门来看你的,听说你发财了,要采访你。”老崔也跟她开着玩笑。看来他们也熟。

“哟,我这有啥好看的,谁说我发财了,比我有钱的多得是。再能算计还能算计过你们,挣点钱也都让你们给收走了,一会儿这个税一会儿那个费的。”她把手里的事情交给旁边一个小伙子,走了过来。

“你这里生意不错呀,多少钱一斤?”我问。

“我这都是批发,五块五一斤。”

“一天能卖多少斤?”

“也就二三百斤吧。”

“不止吧,”老崔知道她的底细:“平均下来算,怎么也得五百斤。”

“哪有那么多呀!”女店主嘻嘻哈哈地把话题岔开:“他们都说我这儿的红肠好吃,都爱上我的货,这倒不假。”

“她这儿的红肠是好吃,可好卖了,这市场里这么多卖红肠的,我还就认她这块的,别的地方的不行。”一个来上货的人插嘴说。

“你是从哪里来的？”

“饶河。”

“饶河也跑到这里来进红肠？”我有些惊讶，因为饶河离这里有二三百里地。

“这算啥新鲜，到我这里来的哪里的人都有，饶河的，抚远的，勤得力的，因为就我这里正宗，真是从哈尔滨肉联厂学来的。我大爷就是哈尔滨肉联厂的，他给我们当技术指导。这市场里卖红肠的都说是哈肉联的，蒙人！真正哈肉联的就我这一家！”

老崔了解情况，他说这个店的红肠的确好，市场里头卖肉制品的，就数她这里的生意最好。

“你这里的红肠都是自己加工的吗？”我问。

“我爱人管加工，我管销售，全都是自己做的，保证没假货。”

“一天做多少斤？”

“这两天快过节了，卖的好，一天得做四五百斤。”

“他做得过来吗？”

“雇了五个帮工的，他一个人哪能做得了那么多！”

我在心里粗算了一下，她一天的营业额至少也有四五千块，一个月在十万元以上，加工厂有帮工，店铺里也有帮工，她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了。

这也是知青，一个几乎看不出一点知青味的哈尔滨知青，她那种跟客户周旋的本事，很有点阿庆嫂的风度。她跟大门口那个看自行车的北京知青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一个红红火火，一个冷冷清清，一个大展鸿图，一个一筹莫展，一个脑瓜灵活善于经营干起了一摊兴旺的事业，一个无计可施无可奈何无望地面对着遥远的前途。二十几年前她们是一样的：都是兵团战士；二十几年后她们也是一样的：都留在了北大荒这块土地上。但她们的生活，她们的结局又是那么的不一样。还有我身边这个老崔，他也是知青，他又是另一种命运，另一种结局。就跟返回城里的知识青年一样，留在黑土地上的知青也是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各

自走向不同的结局。

七星农场幼儿园园长吴美英讲起话来老是笑,露出白白的牙齿,虽然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妇女,模样还像个俊俏的小姑娘。她下乡后干了八年农工,但她就是爱唱歌,想唱歌,可惜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这个机会在1978年知青大返城以后才姗姗来迟,降临到吴美英的头上。她当上了学校的音乐老师。仅仅一年以后,领导又让她上幼儿园工作。她是哭着去的,心里很不情愿,但是很快她就爱上了这个工作,爱上了幼儿园里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吴美英说,干啥我就想干好啥。每次回上海探亲,她都通过各种关系去参观幼儿园,学习他们教育孩子的方法,为了参观上海市幼儿玩教具展览,她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到一张入场券。回农场路过哈尔滨,她听说市教育局正在举办幼儿智力全能竞赛,又徒步走了三个多小时的路跑去观看,回到农场就仿而效之。经过几年的钻研,幼儿园的六门课程、七种教育手段她样样得心应手,成了省级优秀教师,她领导的幼儿园也成了垦区一类园所、全省儿童工作先进集体。

吴美英的爱人是鸡西知青,他们有两个女儿,老大按照上海市的政策回了上海,老二在农场上重点中学。她开朗地笑着说:“我到哪里都碰上了好领导,总是有人关照我,所以我一直比较顺利,没受到太大的挫折。我这个人就是一直往前走,一直很乐观,苦点累点不算啥,我不灰心丧气。我每次回上海,弟弟妹妹他们都说,你快点回上海来吧,农场的东西都别要了,回上海肯定比在农场挣钱多,日子过得好。可是我跟农场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跟这里的孩子有了很深的感情,十年里我教育了多少孩子,现在这些孩子上小学了,上中学了,见到我都很亲热。我舍不得这些孩子,我在这里挺满足。”

留下不走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曲伟丽说：七九年大返城的时候，我的一切病退手续都办好了，各种诊断都齐全了，为啥没走？一个是当时我在团部商店当调拨员，别人都走了，我要是再走，工作就撂下没人干了；再一个是我正好怀孕，哈尔滨家里条件不好，没房子，回去以后再一时没工作干，连生孩子住院都没地方报销，所以想想还是不走了。

崔玉亭说：七七年我在工程连当副连长，招工返城的指标下来了，开始定的是我，我把机会让了。连里有个女知青，外号叫“珍妃”，家里特困难，没有父母，就俩弟弟一个妹妹，我让给她了。

许军国是一个农场公安分局的教导员，开始也想走，可是回上海了解了一下情况，就改主意了。他在农场的地位不错，住房条件相当好，如果回上海，公安局肯定进不去，他身体又不好干不了体力劳动，家里的居住条件也很紧张。左右一权衡，他决定不走了。

茅春：这一辈子心灵都不会安宁

有留下不走的，也有走了又回来的，千方百计使了好大的力气返城了，又千方百计使了好大的力气回来了。

1979年的春末夏初，上海金陵路上的一家饭店里，来了一个小伙子。他叫茅春，机灵，勤快，能干，他是顶替他退休的母亲，刚刚从北大荒回来的。饮食服务行业向来是女多男少，能干的小伙子一是不愿意来，二是来了留不住，而茅春是白天干完晚上干，别人请假他顶班干，有时一天干两班甚至干三班，什么条件也不讲，什么要求也没有，这个能干的小伙子很快就引起了领导的注意，被提拔作门市部的主任。

茅春也引起了姑娘们的注意。他有文艺天才，1971年一下乡就到团部的文艺宣传队，跟如今成为著名作家的肖复兴在同一个队。他演过京剧《沙家浜》，演过话剧《艳阳天》，吹拉弹唱都能来上两下子。返城以前，他是农场管理局商业处的团委书记，返城不久，他就参加了上海财贸系统的文艺宣传队。茅春成了个抢眼的人物，

一些年岁大的老职工打听他有没有对象,要给他当红娘,他很爽快地回答:有了,也是农场的。他的回答让老职工失望,更让那些瞩目于他的姑娘们失望,她们有些嫉妒那个农场的姑娘,但是很快她们就看到了那个姑娘。

那姑娘姓刘,是农场管理局商业处的卫生员。细说起来她也应该算是上海人,她父亲是上海奉贤人,母亲是宁波人,后来转业到了北大荒。大概是秉承了父母的遗传基因,小刘姑娘长得苗条清秀,亭亭玉立,她跟茅春好了两年多了。自从茅春回了上海,她就六神无主,心绪不宁,她怕他变心,怕他毁约,这种事情在“大返城”中实在太常见了。她很快就追到了上海。她看到茅春他们饭店里尽是小姑娘,跟他很随便地开玩笑,就更加担心。茅春说,既然你这么不放心,干脆咱们结婚吧!他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1979年10月,简单而匆忙地把婚事办了。

父母和亲属本来就不同意这桩婚事,小刘又没户口没工作,她的处境可想而知。茅家住房很紧张,父母和弟弟睡在下面一间大房里,小两口住阁楼。阁楼很小,茅春的工资又少,两个人还要给家里交伙食费,日子过得挺紧巴。茅春买了一台缝纫机,让小刘学绣花,绣衬衣领子,绣台布枕套。小刘白天在家里绣,茅春下了班就拿出去卖。他怕同学和同事们看见,就戴上一顶破帽子,上车站上码头。车站和码头有戴袖标的执勤人员检查,抓住了还要罚款,茅春整天提心吊胆的,一天也卖不了几个钱,小刘绣了一大摞,都压在家里。她白天在阁楼上蹬缝纫机,阁楼上光线很暗,她图省钱又舍不得开电灯,日子一长眼睛也花了,看不清东西。难啊,过日子好难好难!手头紧,住房紧,家里人又不欢迎,小两口没有尝到蜜月的甜美,却懂得了生活的苦涩。

晚饭后和休息日,有事没事他们都一道出去走走,反正总比呆在小阁楼上强。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店铺里眼花缭乱的商品,处处透散出大都市的气派。上海真是繁荣,建三江绝对没法比,可这繁荣不属于他们,他们也不属于上海,他们每天在触摸着现代的物

质文明，却难以享受这现代的物质文明。他们身居于上海之中，却游离于上海之外，只有当回忆起兵团往事的时候，他们才感到一些欢娱，只要话题一转到现实，两个人就再没有了说下去的兴致。他们不敢往下想，他们不敢怀孕，不敢要孩子，他们没有抚养孩子的经济能力和物质条件，他们的前途一片渺茫。终于有一次，小刘试探着说出了那句她憋了很久的话：咱们回农场吧？茅春没说话，两只眼睛死盯着黄浦江。

有一天，农场管理局商业处的冯处长找到他家里来了。冯处长到上海出差，小刘的父母托他来看看这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冯处长没有想到他们过得这么难，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茅春也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只有小刘一个人讲话。这是自打来上海以后她第一次尽情地倾吐，诉说着自己的委屈，诉说着生活的难处，说着说着，眼泪掉下来了。冯处长说，不行就让小刘回去吧，还回商业处，还当卫生员。小刘一听就说：“那我回去！”语气很坚决，语调中充满着喜悦。她在上海呆了不到一年，走了。

接着就是两地分居，她一年来两趟上海，一趟探亲假，一趟事假。工资本来就不多，为了攒路费，她天天早上不吃饭，中午和晚上吃馒头夹咸菜，她似乎只为了这一个目标生活：去上海看茅春！他在上海的日子同样清苦，天天吃一毛钱一碗的阳春面，清汤面条里只有一点绿色的葱花；抽烟抽最便宜的飞马牌，两毛八一盒，再买一盒三毛五的大前门，同事和朋友来了就抽这个。小刘一年跑上海两趟，坐火车要花钱，给公公婆婆同事朋友买东西要花钱，两口子啥钱也攒不下，焦头烂额，经济上紧张极了。

有一次，茅春回农场去探亲，商业处领导知道他的难处，关心地说：茅春，不行你也回来吧，你走了以后团委也没再配书记，回来了还干你的团委书记。茅春没吭声。嘴里没吭声，心里却在嘀咕，回上海这一路上他都在思考这件事情：小刘来上海几乎毫无希望，她来不了，老是两地分居，大老远的来回跑也不是个事，回农场也有回农场的好处，那边人熟，办什么事情都方便，可父母绝对不会

同意,为了给我办返城,他们使了多大的力气。真苦闷啊!

回到上海以后,这个爱说爱笑爱唱的小伙子变得寡言少语,整天忧心忡忡的。一天,有个人来到饭店找他,来人是管理局的工会主席孙英。孙英也是上海知青,他们很熟,他一直把孙英当成一个可信赖的大姐。茅春见到孙英喜出望外,他可找到了个说心里话的人。孙英说,管理局党委让我来看看你们,看看你们返城的知青日子过得怎么样,如果太困难的话,就把你们接回去。孙英的话不多,就是这么平平常常的几句,茅春的眼泪却流出来了,“就把你们接回去”,这不是还把我们当成自家人吗,当成农场的孩子吗!在大姐面前茅春终于把话匣子打开了,把他在上海无人可讲的苦闷烦恼忧虑一股脑地倾吐出来了,末了他也表了个态:我想回农场去!他就这样决定下来。

一家人都反对他的决定。他们家亲戚多,每天晚上都有人来,一拨一拨地,连说带劝,跟开批判会似的,没完没了地数落他。姑姑说,你就不该在那里找对象,你还怕在上海找不到对象!父亲说,你在兵团,人家对你好,姑娘来了,你给买点东西,陪她玩玩,就算报答人家了,就把你们的事情了解了,结果你不听我们的话,硬是要结婚。你走错了第一步,现在又要走第二步!他的一帮子要好的朋友听说了,骂他:你缺心眼啊,哪有你这么傻的!

茅春只有一个弟弟,家里就这哥俩,父亲气得饭也吃不下,天天骂他,但是茅春已经下了要走的决心,他琢磨着怎么去做老人的工作。

一天下班回家路过电影院,他看了一眼贴在售票处窗口的海报,那上边写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茅春心里一下有了主意,他买了三张电影票,硬拉着两位老人去看电影。散了场出来,老头老太太眼圈都红红的,眼睛里都湿湿的。

茅春问他们:“这个电影好看不好看?”

“好看,那个张忠良太坏,忘恩负义的东西!”

茅春赶紧因势利导:“你们不让我回黑龙江,不就是让我学张

忠良吗！人家姑娘对我那么好，我不能害了人家呀！”

父亲一时无语，他恼了：“你走，你走，你要是真的走了，以后就再也不要登我家的门，我不认你！”

上海这个地方，进不好进，出也不好出。茅春把请调报告打上去，第一关饮食服务公司就没通过。饮食服务系统历来是女多男少，像茅春这样能干的小伙子尤其少，上边已经看好了他这棵苗子，打算重点培养他，怎么肯轻易放过他。公司不放，茅春就把报告直接打到市劳动局，可是几个月过去，仍然没有消息。他心里着急，跑到劳动局去问，他说：我不是要调进上海，我是要调出上海的，是给上海减轻负担的，你们怎么还不批！接待他的是一个上了年岁的女同志，她觉得很奇怪：到这里来办调转的，全都是要进上海的，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要调出上海回农场呢！她问清了事情的原委，被茅春感动了，说你真是个好小伙子。她从高高的一摞材料里找出茅春的材料，说下个星期例会，第一个先讨论你的问题。

茅春的报告终于批下来了，茅春拿着批文到派出所去办理手续。那是他最难受的一天。十年前他第一次把户口迁出了上海，那时他还不懂得户口的珍贵，随着人流稀里糊涂地就迁走了，走了之后他才懂得了“户口”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城市户口，上海户口。为了重新取得上海的户口，他盼了十年，想了十年，十年后当他终于拿到了上海户口，却又要亲手丢掉这个户口。上一次迁出户口，他是被动的盲目的，而这一次他却是主动的自愿的，上一次是人家要他走，这一次却是他自己要求走，如果这一次再走掉，他的户口可能就永远也回不来了！

他手里拿着户口本，在派出所的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想过来想过去，就是不敢进派出所的门，此时他才感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他干脆坐在人行道边上，整整坐了一上午。他心里好矛盾好难受。事情就是这样怪：办不成的时候，你千方百计要办成它；真的办成了，反而又迟疑了犹豫了。此时打退堂鼓还来得及，因为户口还拿在他的手里，但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他怎么能再打退堂鼓呢！他

狠了狠心,推门走了进去。

户籍员是个年轻的姑娘,那姑娘看完茅春的材料后用诧异的眼睛看了他一眼,然后从桌子上的几个图章中挑选了一颗,图章是长方形的,上面只有两个冷冰冰的字:注销。姑娘把这两个字蘸上了红色的印油,小心地盖在户口本上茅春的那一栏里,轻轻用手按了按,然后把它拿起,于是茅春的名字下面留下了“注销”两个红色的字。茅春的眼泪随着那颗图章忽地一起落下,哗哗不止,他躲开姑娘诧异的目光,接过户口本,逃跑似地走出了派出所。

1971年10月,茅春随着大批知青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57团,1981年底他揣着自己迁出来的户口又回到了黑龙江国营农场总局建三江管理局。1995年深秋,我在建三江管理局的一次知青座谈会上,见到了这个因为重返农场而出了名的“上海知青”。

座谈会的召集人、管理局工会主席孙英这样介绍茅春:“茅春忠实于他的爱人,为了爱情又从上海回来了。”一位哈尔滨老知青打趣地插了一句:“户口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一屋子人轰地一下笑起来。随着轰然而起的笑声,我心里荡起一股敬意:为了真挚美丽的情感,宁愿舍弃大城市的优裕生活,这种在五十年代经常可以听到在六十年代偶尔可以听到的故事,今天听来却仿佛是一个传说,一个神话,在青年人越来越看重实际和实惠,理想主义的色彩越来越发暗淡的今天,茅春显得多么稀少,多么可贵,多么崇高。

我问他:你回来之后过得怎么样?

“刚回来的时候没房子,商业处给了我一间青年宿舍,后来当上科长,才住上科长房。刚回来时啥也没有,在上海的东西送人的送人,变卖的变卖,回到建三江,等于是重打鼓另开张,真正安家立业。”

“回来还是当团委书记,后来当政工科长,搞政工、搞新闻报道,我对搞新闻报道很感兴趣,每年发稿量都挺大,最多一年在省级以上新闻单位发稿300多篇,挣的稿费足够全家过日子了,包括

抽烟都够了。1988年商业局建了个华夏宾馆，局里看我能张罗，让我去当经理，现在又回商业局了，搞工会工作。最近总局要组织文艺汇演，管局成立了一个演出队，把我抽出来专门搞排练。”

孙英说：这几年管局搞文艺汇演都是他张罗，导演、策划兼创作，全能！

“爱人哪？”我想起了那个把他从上海拉回来的魅力十足的姑娘。

“她原来在商业局当调拨员，去年我说你下来吧，干点别的，她就承包了一个舞厅。”

“你回来以后有没有后悔过，想没想过，如果不回来你现在会怎么样？”

“咋没后悔过呢！说实在话，也许如果不回来情况会比现在好。我回来的第一个损失是两级工资没有了。我在上海干得不错，拼命干活，当了门市部主任，长了两级工资，回来以后，上海的工资在这里不好使，重新套级，一套就把那两级工资套没了。”

“我当时在上海基础打得挺好，在饭店里是个小干部，在杨浦区饮食公司团委也挂号了，刚回去时上海组织职工文艺汇演，我得了创作和表演的一等奖。后来家里为了照顾我，把房子也调了，把原来的一大间换成了两处，我父母和我弟弟住一处，另一处小一点的给我，虽然面积只有七平方米，但位置相当好，在淮海路上，那里是上海最值钱的黄金地段，父母他们住到浦东去了，他们为了我，真是没少操心没少吃苦，当时他们的心情就是：只要能把我留在上海，让他们怎么的都行。我对不起他们！”

“原来两地分居不敢要孩子，回来以后生了个儿子，今年13岁了，上初一。孩子的户口在上海，但我们没把孩子放到上海去，我妈我爸年岁都大了，我爸八十多了，我妈七十多，跟我弟弟住在一起，弟弟的孩子也小，住房又不宽敞，孩子如果送回去，住没地方住，管也没人管，上海那么繁华的地方，如果学坏了咋整，那时更后悔。我是这么想：孩子如果有出息，到哪里都有出息，他以后可以考学考

回上海去；如果没本事，走不了，也就只好在这了！”

建三江管局长征小学校的校长吴玉芬是哈尔滨下乡的知青，她接上去说：“他们家孩子可好了，在学校是班长，在这里生在这里长，特别朴实，地地道道北大荒的儿子。孩子随他爸爸，爱好文艺，是我们学校鼓号队的指挥，就是个头矮点。”

“我个头就不高，‘三等残废’嘛！”茅春揶揄地接了一句。

“对，孩子的个头也随他爸爸！茅春是我们学校家长委员会的主任，组织能力强，对我们学校的工作支持特别大！”吴校长说。

“我儿子是大年初七生的，我媳妇说你给起个名字。我想，孩子是冬天生的，生在东北，就给起了个小名叫冬东，一个是冬天的‘冬’，一个是东北的‘东’。大名叫茅瑞，瑞雪兆丰年，象征孩子以后有个好前程。我们的希望都在他身上了！”

“现在还想不想走？”我又问。

“如果说不想走那是假话，但是想走也没有机会了。我回来已经十多年了，十四年了，这么多年里知青返城就没断过，一直有人走，走一个心里动一次，走一个动一次，走的人越来越多，留下来的越来越少。但是回去先得有地方住，如果花一二十万买房子，我们是没那个能力。我在这里住100平方米，上下水，两个卧室，客厅24平方米，还有书房、厨房、餐厅、卫生间，外边还有院子，前后院，还有20多平方米的小仓房，虽然不是楼房，但比上海的局长住的条件都好！”

“他家装饰得可好了，跟宾馆一样。”

“茅春手巧，他家是我们这些人里边装修得最好的。”

“你父母来过这里吗？”我又问。

“我爸不来，跟我赌气，我妈想来看看又来不了，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茅春可能忽然勾动了心底的哪一根弦，情绪低落下去。他用这句话结束了他的谈话：“我们延东中学一起来了28个，走了27个，现在就剩我一个。”

茅春命中注定了不得安宁：没返城时他不得安宁，返了城他还

是不得安宁,从上海再返回农场他仍然不得安宁。他一直在寻求着安宁,为了安宁而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空间,每一次改变都使他得到了安宁同时又失去安宁。他一辈子都不会安宁,命中注定了他那颗焦灼、骚动、不安的心灵。

那次座谈会上我才发现,不安宁的岂止是茅春一个人,几乎到会的每一个人,都装着一颗不安宁的心灵。

张志香:退休了还得回哈尔滨去!

那是一次留在农场没有返城知识青年的座谈会,建三江管局工会主席孙英把这些人召集到一起,在留场的知青里面,她是级别最高的、年岁最大的,是热心肠的“老大姐”,是留场知青的“头儿”。

48岁的张志香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现在的职务是建三江管局直属学校的教务主任。她父亲原来是哈尔滨一家大工厂的工程师,当初不同意她下乡,她不听,坚决报名下来了。父亲不让她在这里找对象,她也不听,跟一个六六年转业的小伙子把喜书办了。给人的印象,张志香是一个主意很正,性情开朗,肚子里边装不住话的人,她一讲起来就打不住,话跟流水似的哗哗地往外流。

“我们是八月份来的,坐船到大兴农场,一下船心就凉了。那天正好下小雨,蚊子可多了,咬人可厉害了,我们一起来170多人,好多人抱头痛哭。我没哭,哭啥呀,哭也回不去了。我分到四队,正好赶上麦收,在场院干了两个月。我能吃苦,反正人家干啥咱干啥。第二年我就到学校当老师,一直当到今天。我采这工资没亏着,老师的工资挺高,现在啥都算上,一个月能有750块钱。(孙英:比我挣的都多!)我爱人没我多,别看他是检察院的副院长,他才七百零点。我仨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姑娘(茅春:大丰收!)这你比不上。现在老大的户口办回去了,家里在哈尔滨给我留了一套房子。我家姊妹六个,就我一个在外头,他们觉得我挺亏,最苦的是我。(茅春:你还苦,家里一个月1450块钱的收入,要在过去至少是富农!)我父

母都去世了,孩子回去没人照顾。后来托了人,让他到轴承厂上班,上班先要培训一个月,刚学了半个月,他跑回来了,说啥也不上哈尔滨。前年让他去上学,学费都交了,上了半年,他又跑回来了,说上学没意思,要自己单干。这老大真是不省心,他不听你的。我也管不了他,顺其自然吧!他要做买卖,我给拿了一万块钱做底子,到现在这一万块钱也没给我。

“老二在哈工大上学,去年连学费带吃饭将近八千块,前两天开学刚走,我又给拿了五千,啥钱也没攒下,挣点钱全给孩子了。(茅春:我们挣点钱,留下不都是给孩子的?孙英:等你老了,孩子都挣钱了,你就比我们有福了!)我们四个月没发工资了,这次一下发了三千多块钱,我寻思给存起来,刚要存,老张他家里又来电报了,父亲病危,三千块钱全拿走了,到现在他也没回来。

“最小的是姑娘,18岁,在这上高二,后年考大学,谁知道能不能考上?我跟她说,姑娘你好好上学,你要考上大学了,我就啥也不愁了,我省吃俭用砸锅卖铁也供你!”

我问:“你还想不想回哈尔滨呀?”

“咋不想呢!我想退了休回去,等退了休我也想做点买卖,因为我这人闲不住。现在放假的时候我也找点事做。有人说,张老师呀你给我整点麻袋,我颠巴颠巴也去,有人说张老师你给整点黄豆吧,我颠巴颠巴地也去,反正干成干不成也不用咱拿钱,不就是费点口舌吗?我教过的学生对我都挺好,我下农场他们都帮我忙,给我找车,跑完了回来还给我接风。我都是放假去,也不影响工作,做点买卖也挣点钱花,现在虽然说都强调要讲奉献,可是没有钱你走到哪里也玩不转。将来要是回哈尔滨买套房,得十几万,我上哪里弄这十几万去!就得拼搏!我今年48岁,要是现在让我退休我都干,只要百分之百给我开工资,我跟校长都说了,退休了做点买卖还能挣点钱,等我老二毕业了有个好工作,姑娘再考上大学……”

茅春接了上去:“咱们就都回哈尔滨了!”

“哈哈……”一屋子人都乐了,张志香也乐了,乐得好开心。

她还没说完,她还有话说:

“其实七八年大返城那时候我也办回去了,关系全办完了,我跟我爱人办的假离婚,到现在假离婚证还在呢,那时候不假离婚不行啊,走不了啊!(孙英:那你们还得再举行一次婚礼!)我把包装全打好了,米了面了粉条了豆油了,装了一大箱子,都运回去了。我跟我家老张商量,我说你自己在这吧,我得走了,我先回去。那时候我们老张在创业农场当干事,齐参谋长跟我们住邻居,齐参谋长来做我工作,说你们俩不愁吃不愁穿,回去干啥,在这不也挺好吗,你把老张一个人扔这你舍得呀!我说人家都回去就我不回去,好像就我没本事。后来这个做工作那个做工作,我就软心了。(孙英:还是舍不得你家老张!茅春:老张拉后腿把你给拉回来了!)反正现在说心里话还是想回去,我姊妹六个就我一个人在外头,在这啥亲戚也没有,人家过年的时候亲戚拿着大包小包地串门,我家冷冷清清的,要是在哈尔滨,那该多热闹!”

过去是父母替咱们担忧,现在咱们替子女担忧

袁桂芳跟张志香一样,也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两个大的都拿到了大专文凭,一个小的有中专文凭,她自己现在干个体,租了个柜台卖日杂和建材。她爱人也是转业兵,在管局公安局工作,是劳动模范。袁桂芳说,我下乡这20多年吧,情绪一直比较稳定,即使现在也不想回去,为啥呢,一个是年岁大了,在这生活习惯了,要是回城,有些条件还真不如在这里,像住房、菜园子;再一个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挺安心,也想得开。现在惟一发愁的就是孩子。现在有政策,知青子女户口可以回城,我老二大专毕业户口回去了,但是工作落实不了,他又回来了。要是没有这个政策吧,一家人都死心了,都消消停停地在这过日子了,啥想法也没有,现在是有政策,政策又到不了位,整得心里头两头都不踏实。我的想法就是:我们自己这辈子是献给北大荒了,但是应该给我们把孩子的政策落

实好,把工作给安排好。我们现在整天辛辛苦苦到处奔波,为了啥呢,还不就是为了儿女!

“谁说不是呢,要是没有孩子,咱们也就不犯愁了,咱们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建三江这个地方建设得也不错,某些方面比哈尔滨还好呢,这地方住房宽敞,环境好空气好,也没有那么多人呀车呀乱乱哄哄的,吃得也不错。回城的也有的住房挺紧张,还不如咱们呢。现在关键问题是为孩子前途着急!”说这话的,是管局工会的女工部长王鸿雁。

“唉!”一位脸庞圆圆的女同志发出一声叹息,“我们挣的那点钱,都给孩子铺了铁路了,不是孩子跑回来,就是我们跑回去,最起码一年也得跑两次!”她叫熊爱宝,是管局基建处的处长,上海知青。她头发剪得短短的,又戴一副眼镜,满屋子里头,就数她身上的知青味保留得最多。

话题渐渐转到孩子身上,在座的都是父母,都有孩子,都有一颗慈爱的心,操不完的心,一讲到孩子,他们的心就沉重起来,屋子里的气氛也沉重了。茅春用低沉的语调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哈尔滨知青的女儿返回哈尔滨,在一个宾馆里工作,工作条件很好,收入也不低,就是想农场的家,给她爸爸妈妈打来电话说我好想你们,你们也不来看我,前几天偷偷跑回来了,在家住了三天,跟爸爸妈妈上歌舞厅去玩,又是唱又是跳,卡拉OK一气唱了八首歌。她说我在哈尔滨从来也不唱,根本没那个心情。前天晚上走了。两口子说,我们一听她打电话就掉眼泪,她在那头掉眼泪,我们在这头掉眼泪。

茅春的故事触动了孙英心里那根最脆弱的弦:“我小孩在上海读书,期末考试还没考完呢就吵着要他舅舅去买火车票,一天一天地算日子,着急要回来。一见到我们就说,可想你们了,可想建三江了!”她的眼圈红了,她不敢再往下说了,她怕控制不住,自己把自己那根脆弱的心弦拨断了。

“咱们这一代人吧,什么都赶上了,文革下乡的时候父母为咱

们担忧,现在改革开放了,咱们又得为咱们的孩子担忧,整天牵肠挂肚地……”张志香哽咽了,说不下去了。每个人的心里都荡起一阵悲凉。

“咱们这些人现在想啥呢,惟一的想法就是子女能比咱们好,别跟咱们似的,他们能有个理想的工作,有个幸福的家庭,咱们就心满意足,啥也不求了!”袁桂芳说出了一个人母亲最朴实的愿望。

王鸿雁说:“我们班下乡的都回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在外头。全班五十多个同学知道我在哈尔滨学习,就一块搞了个联谊会。他们问我:你在北大荒干啥呢?你咋不回来呢?我回答不出来,确实无话可说。七九年我返城的表都填好了,但是孩子小,我爱人也不同意,说你要是走咱俩就离婚,我也不能因为要返城就破坏我的家庭,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呀!我有一个好家庭,有一个好丈夫,这是我最大的幸福。我原来是连队指导员,他是拖拉机手,我是党员他是团员。有一年连队推荐我上大学,他一听说就急了,说你要是走咱俩就吹。我没走,表态要做扎根派。后来他有上大学的机会,是八一农大,他也没走。我们俩为了爱情都牺牲了上大学的机会。”

返城诚珍贵,爱情价更高。茅春如此,张志香如此,王鸿雁也是如此。

王鸿雁讲到了她的儿子:“我儿子小时候住在我妈家,我妹妹的孩子也在那,都是小男孩,两个人打架啊,我一回去都告状,我儿子告状,我妹妹告状,我妈妈也告状。我说把孩子带回来吧,我妈又不干,说好像姥姥家容不得这个外孙子,一直到了上学的时候才接回来,今年又考上哈尔滨技工学校走了。昨天来了封信,说可想家了。我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就尝过想家的滋味,现在我们的孩子又来尝这个滋味,唉,一想起这些我就想掉眼泪,我们苦也就苦了,谁成想孩子也要受苦,亲戚家再好,毕竟不是自己的家。有时候想孩子想得不好,就想干脆让孩子回来吧,可要是回来,孩子不也得一辈子都呆在这了吗!”王鸿雁已是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

熊爱宝说:“返城的知青就体会不到这些苦处,他们父母在身

边,子女也在身边。我们就希望他们返城了不要忘记我们留下的,特别是有点能力有点实力的,也为北大荒的建设尽点力,搞点项目,让这些留下的知青也能富裕起来。”吴玉香接过这个话题:“现在报纸上使劲宣传返城的知青又回来参观农场了,回来探亲来了,农场怎么隆重地欢迎,又是开大会又是接见、照相、拍电视,可是怎么不宣传宣传咱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呢,宣传宣传留下的人怎么为北大荒的建设贡献光和热呢,好像回城的才光荣,留下的就无能。”

时光从会议桌上悄无声息地溜走,太阳匆匆地沉落下去,孙英这个会议的召集人,来为会议做总结了。

“今天我们知青到一起聊一聊,这种机会现在已经很少了,所以就显得很宝贵。过去一讲知青有多少多少,现在只占很小的比例,知青已经混合在职工当中了,1984年管局统计还有2000多人,八四年到现在,十年过去了,可能只剩下1000多人了,而且现在还在走,还在动荡,这对我们留下的人肯定会有影响,但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又经过20多年风风雨雨的磨炼,我们这些人是越来越坚强了。说实在的,即使真的能走,那心情也是很复杂的,最近有一个知青走了,上火车之前,他在地上抓了一把土带走了。这里也是祖国的一片土地,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出过力流过汗,甚至还流过血,这片土地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深的感情。如果有人说,你是因为你爱人是北大荒的所以才没有走,那我觉得这样评价是很不公正的。咱们这些没有走的,不管干什么工作,还得拿出知青的劲头来,干就要干好,干得像个样,为我们的第二故乡献计出力。另外我们对有困难的知青要多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我们这些人都在机关,应该说是留下知青里边的佼佼者,有些在连队的知青,条件比我们要差得多。咱们都有一顶共同的帽子,就是‘知青’,将来即使我们成了老头老太了,这顶知青的帽子也还是要戴下去,我觉得这顶帽子很光荣。”

在建三江管理局的领导层里,知识青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孙英给我数了一下:局长孟吉昌两口子是五十年代的老知青,跟杨华

同时代的人,哈尔滨庄的;党委书记董世明两口子也是知青,六八年下乡的双鸭山知青,此外还有广播电视局长是天津知青,商业局长是哈尔滨知青,粮食局长是鸡西知青……副处级以上知青有十多个。还有一批在农场里担任场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像前进农场的场长、七星农场的场长,都是知青。他们是留场知青里边的佼佼者,这里面当然少不了孙英。

孙英:留场知青的老大姐

十年前我就见过孙英,那时她是建三江管局的宣传部长,朴实、平易,一点架子也没有,什么事情都是她亲自动手亲自张罗,脸上总带着微笑……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微笑;十年后再见孙英,她还是那个样子,还是那么朴实平易,脸上还是那种让人一眼就能看到心底的微笑,不同的只是职务的变化:由宣传部长改任工会主席。

1968年,孙英在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师范学校当时没有下乡的任务,但是她们十几个同学联名给上海市革委会写信,要求上山下乡,要求去北大荒。这些热情而又激动的姑娘为了能使她们的书信引起充分的重视,在信封上还插了一根鸡毛,表示“十万火急”。这封鸡毛信果然起了作用,不久这些姑娘就来到了七星农场。分配工作时,领导要把孙英留到场部,她却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她到了37队农工班。

孙英从连队的排长干起,一直干到了六师的党委常委……全师知青中间职务最高的一个。1978年,当大批知青返城以后,领导说她年龄比较小,让她做团委书记,几年后又让她做宣传部长,又过了几年让她担任工会主席,虽然变来变去有升有降,但她总是平静地对待这一切,总是带着微笑接过新的职务新的工作,她老是那一句话:“干啥都行,咱们挺满足的,真的。”

我听到关于孙英的许多故事,有工作方面的,家庭方面的,同

志关系方面的,讲故事的人,语气中有敬重之意,听故事的人,心中渐起敬重之心。孙英的爱人原先是兵团的现役军人,有几年身体不好,孙英一直尽心照顾他。又要干好工作,又要安排好家里的生活,她的担子很重。后来公公婆婆又接过来一起住,孙英仍然承担了许多家务,只要她在家,饭常常是她来做;晚上,洗脚水都端到了公婆的面前。老公公有时精神不大好,犯起病来谁的话也不听,只听孙英一个人的。黑龙江垦区的著名作家、曾经担任过省农场总局宣传部副部长的郑加真,有一次在说到孙英的时候赞叹道:她身上集中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贤慧、俭朴、能吃苦能忍耐、富于同情心等等,可以说她是中国妇女的一个典范。

孙英说,我们一起下乡的那批总共有200多人,现在剩下的连10个都不到。这几年陆陆续续地还一直有人在走,我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都走掉了,她们都替我惋惜,因为我走不了,我自己倒不觉得怎么样。说这些话的时候她依然显得十分平静。我感觉孙英的内心深处是一泓清澈博大的湖水,静谧安详的湖水,不论多大的苦闷多大的烦恼多大的怒气多大的忧愁,都会在这泓湖水中消释溶解,荡然无存。孙英能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有一位著名的女作家曾经写过一句著名的话:人的意志和坚强在于自身内心的平衡。孙英就具有这种平衡,所以她是真正坚强的,尽管她在外表上显得柔弱单薄。

20年前孙英当过七星农场八连的指导员,八连有个老任头,建国前就参加了工作,按政策规定应该享受离休待遇,但是他60岁那年农场给他办了退休手续。后来老任头明白了离休和退休的待遇不同,一年一年算下来,加在一起少拿好几千块钱,他就开始找,找到农场,找到管局,他别人不认识,就认准了孙英,一到管局就找孙英,找得孙英的同事见了都烦,说这老头又来了。可是孙英不烦,每次老人来找她,她都乐呵呵地接待。上了年岁的人,有时脑筋糊涂,说话啰嗦,耳朵又背,孙英就耐着性子听他说,大着嗓门跟他说,帮他出主意,帮他打电话,帮他申诉。我去找孙英的那天,84

岁的老任头拄着根棍子又来了，颤颤巍巍地走上二楼要找孙英。办公室的同志怕他又缠上孙英说起来没完，就骗他说孙英不在，孙英却闻声自己走了出来。老人说：“孙英啊，这回问题解决了，给我补了两千块钱，都亏了你呀！”孙英搀扶他坐下，嘱咐他把钱放好，要是不用就先存到银行里，存定期的，定期的利息多。老人走后孙英对我说：老头没儿没女，怪可怜的，咱不管谁管。

孙英决不是无忧无虑，她也有她的脆弱她的忧愁，她心里有一根最脆弱的弦，那根弦的另一头拴在她的儿子身上。“我小孩在上海读书，一年只能暑假回来一趟，寒假时间太短，来不及。每次儿子回来，我们家里比过年还热闹，每次送他走，心里头都难受好几天。真不想让他走，可是为了儿子的前途着想，还是得让他走……”她的眼圈又红了。

留在建三江的知识青年，都把孙英当成他们的头儿，有了什么难处，有了什么想法，都爱找她商量，他们不仅把她当成领导，更把她看成是可亲近可信赖的大姐，对大姐什么事不能说呢？孙英的心里，也装着这些知青，特别是那些生活困难、至今仍然在生产队里干农活的知青。“六队还有一个女知青，就住在食堂旁边。八队有几个上海青年，有点窝囊，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哪个农场哪个生产队有哪几个知青，她都在心里边装着，甚至比那个农场的干部都清楚。她在心里记挂着他们。逢年过节救济困难户，她首先想到这些人，谁家的孩子多大，该穿多大的鞋子，谁家里正缺点什么，什么东西分给哪一家最合适，她都有数。她尽其所能地帮助那些困难的知青，既出于一个工会主席的工作职责，也出于一个知识青年的同命相怜，更重要的是，她有一颗善良的心。

她告诉我说，七星农场有个上海青年叫李福根，他跟他弟弟两人是双胞胎。为了让弟弟留城，他主动下乡，现在他们队里就剩下他一个知青。有一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一看，信封信纸还是多少年前我们下乡时候用的，我想他的生活一定很困难，就给他们农场的工会主席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帮助解

决一些困难。过了几天我又给工会主席打电话,他说他还没去,他让分场给那个生产队打电话了。我一听就挺来气,马上找了个车,拉着农场的工会主席、分场的工会主席一起到生产队去。到了李福根家一看,家里收拾得还可以,菜园子种得挺好,柴禾劈成一块一块的,码放的也挺整齐,但是李福根的身体不大好,有气管炎,他爱人有点发傻,儿子也傻乎乎的,念了五年书了,至今还在念一年级。李福根原来想把孩子办回上海去,可是这个样子回去了谁给照看?李福根除了说话还有点上海口音,其他再也找不出一一点知青的影子。我看了挺难受。后来有一次召开知青座谈会,我在会上把李福根的情况说了一下,大家都很同情,凑了五六百块钱,又给他买了点衣服和日常用的东西送去了。每次上边拨下来救济物资,我都把好一点的衣服鞋子给他挑出来,他家里人穿多大的衣服多大号码的鞋子我们都知道。我跟他们农场的工会主席说,他是上海来的知识青年,还是要多照顾他。后来农场工会说每年给他买两头小猪崽,分场给饲料,李福根喂这两头小猪,就可以解决他家的零花钱了。“别的还能帮他什么?也帮不了什么。李福根在留下来的这些知青里面,也算是一个方面的代表。”孙英说。

张春娟:黑土地上的劳动英雄

同是上海知青的张春娟,则是另一方面的代表。

创业农场 19 队,是全农场最偏远的的一个生产队,连条标准的砂石公路都不通,地界搭上了邻近的红卫农场。

偏远队大都是新建队,新建队的生活条件都比较差,大返城的时候,19 队的知青呼啦一下子几乎都走了,68 个知青里头就剩下一个,24 个上海知青里头就剩下一个。张春娟眼看着一起来的或是脚前脚后来的战友们、伙伴们,一个个,一拨拨,欢天喜地急不可待地离去,心中若有所失,泛起一股子酸酸的滋味。他们返城了,她却留下来,孤零零地留在了偏远的 19 队,留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

上。

不，她不是孤零零的，她有她的丈夫张宪金，还有她的一对千斤、宝贝女儿。她舍不得宪金，她不愿假离婚，所以她不走。

张春娟是坚决的，下乡八九年了，什么活没干过，什么苦没吃过？她当班长，带着七个女知青盖房子，光着脚丫在泥水中蹚估、和泥，她一天挑过100多担水，累得手里拿着个馒头嚼着嚼着就睡着了。八个女知青，八天时间，堆起一栋房子。后来，她又当过司务长，柴米油盐酱醋全管，连队的食堂搞得红红火火，那时一到吃饭时间，食堂里满满当当一屋子人，叽叽喳喳有说有笑。如今，食堂空了，食堂散了，在食堂里吃饭的那些人都回城里吃饭去了。张春娟就去种地。

1984年搞联户农场，张春娟他们八户职工联在一起，每户亏了1470元。种地还是靠天吃饭，收成好坏要看老天爷的脸色。恰在此时，家里给她办好了返城手续，又有了知青子女户口可以回城的政策。那就走吧，回上海去，在哪不是干，回上海兴许能过得更好。家里给了她一间30平方米的房子，临街，是门面房，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房子就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就是发家致富的依靠。走！她决定了。

到场部去办手续，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走过去，在材料上盖上一颗颗红印章。她敲开一个办公室的门，里面坐着一位分管财务的副场长。“你就是张春娟？你要走？你还欠着1400多块钱呢！账不还清不能走人，这是规矩！”语气强硬，没有商量的余地。

张春娟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哪个地方不是呆，哪的黄土不埋人！我不能就这么窝窝囊囊地走，我得干出个样子给你们看看！我不走了不行吗！两句话，一股火，把返城的念头烧没了，想的全是明年怎么争这口气。事情变化就这么快，只在一瞬间。

第二年，垦区开始办家庭农场，前一年欠了账的职工心里都没底，不敢多包地，只是二三十亩、三五十亩地试探着，张春娟可不，她跟宪金一下子包了450亩！自己办农场，选料、翻地、耙地、播种，

哪一步也不敢懈怠,播种的时候,他们早晨三点钟就起来,在播种机上一站就是十八九个小时,抢时间,抢季节。她又养了20头猪,到年底一算帐,盈利一万七!一年就翻过来了,欠的钱都还上了,还买了电视机、录音机。当时交了粮食拿不到现钱,农场反过来给她打白条。张春娟很得意:我比谁都不差,我行!

这事如果发生在一个普通农场职工身上,本来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事发生在一个知识青年的身上,还是一个南方大都市的女知青,一下子就有了新闻价值。张春娟上了《黑龙江日报》的头版头条,上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天,正在家里择菜的老父亲,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还不敢相信那就是自己的女儿。

张春娟出名了。1986年当上了省劳动模范,1993年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听李鹏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坐在会议室里,跟省里的领导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农场想调她到城建科,她不去,调工会女工部,她也不去,她就愿意种地,养猪,干活。

张春娟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她的魄力更大了。她是全队第一个包地最多打粮最多的,现在她又是全队第一个贷款种地的。1993年,他们家种了900亩地,开始搞大规模经营,大豆亩产280斤,逼近垦区制定的300斤高产目标,那年她家盈利七万二!1994年,她家又包种了800亩地。

1995年,张春娟的心气儿更高,种了1100亩,占到全队旱田的六分之一,其中600亩大豆,亩产达到450斤,按19队安队长的话说,是“创业农场头一号”。农场在她的大豆地里开现场会,场长书记都来了,各队的队长都来了。我也去那块地看过:一条条长垄伸展过去,一直跟远处的蓝天相接,好大的一片地!大豆长得有齐腰高,叶子已经脱光,豆荚已经干缩,变成了黄褐色,衬出里面鼓胀饱满的豆粒,在秋风中骄傲地摇头摆脑。豆荚一层层数上去,有12层,密密地挂满了植株。这么高的大豆,这么密的豆荚,实在少见。

张春娟骄傲地站在地头，站在九月的阳光下，听着人们的赞扬和惊叹，心里一定很得意，她是这一片大豆的主人，她是这成绩的创造者。那些如今已在城里上班的战友，恐怕很少有人能干得像她这样出色，尽管他们生活在繁华的闹市里。这是她和他们的差异，她和他们的差距。

张春娟干起活来相当泼辣。养猪是她的拿手活，每年至少养20头。她喂养的一头老母猪，去年春产仔时正赶上春节，她顾不上看春节晚会的电视，顾不上一家家去拜年，连着五天没有脱衣服睡过觉，一直守候在母猪旁，怕它翻动笨拙肥胖的身体时不小心压了它的孩子。猪舍太冷，她就把猪搬进屋里，在屋里吃屋里拉。母猪一般每次产仔十个左右，产多了奶头不够吃，就扔掉了，她家的母猪一胎产18个仔，张春娟一个都不扔，奶头不够，她就买来奶粉冲了，拿着奶瓶子喂。奶粉都是“完达山”牌，最好的。猪崽喝着牛奶长大，18个猪崽个个成活，个个健壮。秋天，母猪一窝又产了13个，同样是个个成活，个个健壮。张春娟成了养猪能手，连老职工都养不过她。

张春娟的热心在队里是出了名的。她的猪崽卖200元一只，本队职工买只要150元，实在没钱的可以赊账，等猪出栏了再给钱。她拿出7000元钱帮助队里的贫困户脱贫。麦收时她负责场院上的工作，从家里烧了开水，挑到场院上给大家喝。她每年都要拿出三五千块钱去帮助别人，告诉他们：啥时候有钱啥时候还！

大家选她当队里的工会主席，这个工会主席是个出了名的热心肠，队里的大事小事，喜事丧事，谁有病了，谁家的孩子打架了，都来找她，找她帮忙，找她商量，找她评个理，找她拿主意。去年队里一个妇女生孩子，张春娟坐车陪产妇上场部。半道上孩子生出来了。脐带也没法剪，张春娟就跪在车里，用手捧着婴儿，一直捧到场部。她已经不再是一个上海知青，谁也不把她当成一个上海知青，她就是队里的一个普通职工，一个北大荒的女人，她和他们完完全全地融为了一体，他们是他们中间必不可少的一员。

张春娟有钱了,这几年每年都有几万元的净收入。她的钱完全是凭力气挣来的,每一个钢镚儿里都有她一家人的汗水。那么她的家是什么样,她自己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她的家很简单:两间住房,两口子住一间,女儿住一间,此外还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客厅。地是水泥地面,墙是白灰墙面,除了一台冰箱和一台彩电,屋子里没有任何贵重物品。家具都是在队里打的,一个自家做的小沙发已经修过好几回,还醒目地摆放在那里。张春娟是不讲享受不会享受的那种人,她对生活的标准很低很低。她家是一排红砖房紧把头的一家,房山头有两个大猪圈,每个猪圈里都有一头大母猪。旁边有一块菜地,地里种的萝卜,张春娟笑笑说,这里空地多的是,只要你有力气,随便种一点,饲料就有了。她这话讲得随意而又轻松,好像这种活轻松得在她眼里不值一提。她有的是力气,她又积蓄了一笔资金,所以她充满了自信:什么都不在话下,什么都难不倒她!

她有两个女儿,大的22岁,户口已经办回上海,小女儿20岁,跟她住在一起。父母弟妹都来过这儿,都觉得她日子过得太苦太累,可张春娟对自己的日子很知足。她不想回上海,起码现在不想。“上海那么多人,我又不是什么尖端人才,回去干什么,还不如在这种地呢!”的确,论种地她绝对是一把好手。这里说的种地,不单指体力的付出,更主要的是对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张春娟正在成为一个优秀的土地经营者,她在黑土地上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一个得心应手挥洒自如的位置。“将来等我老了,干不动了,再回上海养老去,反正我在上海有房子!”

张春娟穿一件紫色外套,里面是一件蓝毛衣,她的皮肤是那种非常健康的黑红色,原野上的太阳和原野上的风把它染成。一头短发,没有用心梳理过,耳朵上有两个金色的耳环,手上还有一只做工不精的戒指。她的装束、气质,跟队里的其他女职工没有什么两样,知青的气息在她身上消失殆尽。从下乡到现在,张春娟始终在北大荒上一个新开发的农场里,一个最偏远的生产队里,一干就是

25年,四分之一世纪没有挪动过地方。北大荒把她留下来了,北大荒把她熏陶改变了。她终于真正地、协调地与北大荒融为一体,成为一名寥若晨星的、完全工农化了的知青!

第十四章 牵肠挂肚一片情

大批返城的知青,通过各种不同途径重新取得城市户口的知青,面临着就业和住房这两大新问题。他们中间有家境好的,有家境差的,有顺利的,有坎坷的,有成功的,有苦苦求索而无果的,有洋洋自得的,有自惭形秽的。有一位知青说:真正优秀的知青,是那些回城以后重新创业,重新一点一点地站稳脚跟干成事业的人。但这样的人所占的比例实在是太少了。

刘红英:还在思念那片橡胶林

当年云南国营农场有一个四川姑娘叫刘红英,她以出色的业绩赢得了很高的荣誉——她是四川和云南两个省的先进知青代表,她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刘红英是农场的割胶工,她最突出的事迹就是非常能干,一天到晚地干,一年到头地干,她出勤最多的一年达到363天,一年里只休息过两三天!她一个人管理27亩橡胶林,她管理的橡胶林里一棵杂草也没有,梯田修整得跟城里的马路一样平。她爱橡胶树爱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年冬天,三棵橡胶树苗被牛撞伤了,她每天端一盆清水,给树苗清洗伤口,又从自己的棉衣里扯出棉花,用布条

细心地包裹在树苗上,隔几天换一次。她自己的脚上被刀砍过一条二寸长的口子,她都没有这么精心地护理过,她把树苗看得比自己还重要。

每天天蒙蒙亮,胶林里就传出她挖土的声音,晚上天黑尽了,她才一个人摸索着下山,偶尔营部演一场电影,她从来不去看。刘红英为了这 27 亩橡胶林,几乎牺牲了自己所有的业余爱好、文化学习、娱乐活动,她的生活变得很单调,好像除了侍弄橡胶树,她没有任何喜好。西双版纳那一年四季灼人的阳光,把刘红英的头发照晒得金黄金黄,一张娃娃脸上老是一副疲惫不堪的形象,她的衣服上经常结着一层薄薄的盐晶。

那时一般连队的橡胶树幼苗成活率是 80%左右,刘红英侍弄的 27 亩胶林达到 97%,是全农场几万亩橡胶林中最好的一块。

刘红英最美好的年华在橡胶林中逝去,后来她也返城了。返城以后干什么?城里没有橡胶树,城里不需要种树能手,城里需要的是有文化的人,而刘红英缺少的恰恰就是文化,她没有上大学,甚至也没有读完中学,她除了种橡胶树也没有其他的劳动技能。下力气活吗?当年她倒是不怕,80 多斤体重挑过 120 斤包谷,连小伙子都服气,可现在不行了,她的身体已经在长期的辛劳中垮掉了。她还能干什么呢,只能到一所学校里去搞搞收发。搞收发是一个清闲的工作,刘红英多少年都没有这么清闲过,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了,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片橡胶树,那片橡胶树苗早已长大成林了,早已经能割胶了,它们长得壮实吗,它们的出胶率高吗,有没有生病的,有没有被风刮倒的?她还会想到她自己,她没有文凭,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没有适应城市生活的技能,甚至也失去了常人所有的健康,她把这一切都留给了橡胶树了。她悲哀吗?她后悔吗?如果人能再生,她还会这样过一辈子吗?她说不清。

小雨：在上海打工的外省人

她既不是一个返城的知青，她也不是一个留下来的知青，她是一个在上海打工的外省人。

她叫小雨。妈妈说，一家人里最苦的就是她了。

她家兄弟姐妹四个，她是老二，到江西农村去插队，后来招工到县里当了老师，结了婚，生了孩子。爱人是当地的，返城时她失去了机会，谁让她找当地人呢！但是为什么就不能找当地人呢，感情还分地域吗？

孩子长到11岁的时候，送回上海去读书，住在姥姥家里。姥姥很心疼这个外孙女，但是毕竟年岁大了，姥爷身体又不好。小雨探家的时候听说爸爸住过两次医院，妈妈也住过一次，她心里边感到一阵内疚，认为是自己拖累了父母。她跟爱人商量：我们回上海吧！她在镇教委里当干事，托了人，送了礼，走了后门，终于办了个停薪留职。

“上海，我回来了！”这是她跟爱人提着沉重的行李走出火车站时，内心里涌出的第一句话。多么熟悉的上海，多么陌生的上海，多么亲近的上海，多么疏远的上海，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如今却没有上海市的户口。上海容得下我？上海容不下我？她心里没底，不得而知。那一点淡淡的欢乐转瞬即逝，前途未卜的沉重又重重地压在了心头。

亏了有父母，亏了有小妹和小弟，他们都来帮她，这是上海给予她的最大慰藉。开始她挤在家里跟老人一起住，后来妹妹分到了一间新房，让给她，总算暂时有了一个“家”，虽然这个“家”并不属于她自己。孩子上学也是亏了妹妹，妹妹去找母校的老师，知青的孩子，不能让他们也走知青的下场，在异省他乡过一辈子吧？那老师知道很多知青的故事，乐意帮这个忙。

她到一所中学去代课。她工作踏踏实实，教了一个学期，那个

班的成绩就上升到第二名。学校对她很好,但她还是离开了:一个星期12节课,一节课4块钱,一个月是192块。这是校长权限内所能给予她的最高标准了。她说我喜欢这个学校,我喜欢这个工作,但是我要生存呀!校长爱莫能助,无限惋惜地看着她走出学校的大门。

弟弟介绍她到一个外商老板那里去打工,他说那里的收入肯定比学校多,但是要苦一点。她说我们下过乡的人什么苦没吃过,什么苦不能吃?挑着百十斤的蜂箱走七里山路,稻谷挑过120斤,修水利挑担子,肩上磨出血来。

皮肉吃苦她不怕,但是她容不得齜齜,咽不下委屈,她看不惯老板娘的俗气和势利。那又能怎么样,这种苦也得吃,打工嘛,生存嘛,否则就适应不了上海。她咬紧牙关,去吃那种过去不曾吃过的苦。

过去的同学,过去的“插友”,听说她回来了,都很高兴,找个机会聚一聚。她看到了好多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他们有的当教授了,有的当经理了,有的是报社的记者或出版社的编辑,一张张名片递给她,热情地让她“有事情就来找我”。他们替她惋惜,为她叹息:当初你本来是留城的,本来是不用下乡的,要是你不下乡……

是呀,当初她在班级里是尖子生,那时她是他们羡慕的对象,但是今天坐在一起,他们衣冠楚楚,志得意满,她遍体鳞伤,顾影自怜,他们在他们面前生出一种自惭形秽的自卑感。“我没有机遇,如果命运给了我机遇,我不会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入差!”即便她没有得到机遇,她是不是也比他们更强一些呢?她吃过的苦比他们任何人都多,她的肩膀比他们任何人都硬,她也点了一支歌,她喜欢那歌词:“这一张旧船票还能登上你的客船……”

她在上海奋争,跟不公平的命运奋争。一个很巧的机会,我意外地见到她,听她用沙哑的嗓音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这一切,她的语速极快,底气十足,这语气和底气中透出一种自信。她的经历使许多人叹惋伤感,但是她自己并不叹惋伤感,她说我不抱怨也不后

悔,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圆我的梦想,我跟她说我们不能给你创造什么条件,你的前途只能靠你自己去闯,孩子还算争气,自己考上了重点中学。我们自己是不行了,学业已经荒废掉了,虽然也想学外语学电脑,但是已经没有那个条件了。我还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只要有条件我就会去拼去争。

她没有城市户口没有自己的住房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在大上海茫茫人海中,她跟那些来自外省的打工妹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上山下乡使她失去了很多很多,但是她不抱怨,她凭着在上山下乡中磨炼出来的意志,不屈服地去跟命运抗争。

雁莎:搅乱了宁静的心绪

跟刘红英和小雨比起来,雁莎回城后的境遇要好得多,路子要顺得多。

自从1978年她随大批知青返回北京之后,就像从风狂浪急的大海驶进了一个平静的港湾,不,简直是风和日丽下的湖泊,平静得没有一丝涟漪。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位副部长的儿子,很快他们就结婚了,她住进了两间一套、带有管道煤气和浴缸的舒适公寓。经公公的一位老战友帮忙,她被安排到某家报社做记者工作。上班第一天,她忽然感到一阵惶惑和恐惧,爱人却满不在乎地说:报社里像你这样的人有得是,怕什么,他们干得了,你就能干得了!果然,雁莎凭她原来的一点文字基础,凭她的聪明,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写出了能让编辑不皱眉头的稿子。不久,她自己也成了编辑,因为丈夫不愿她经常往外跑,她呢,也有些跑腻了。她总是服从丈夫,因为什么事情在她来说都是无可无不可。她干工作,不冒尖也不落后,她编采的稿子,不出众也挑不出大毛病。他们有了孩子,是个女孩,于是家里增加了人口,不是一口而是两口,还有一个是请来的阿姨。雁莎每天上班、下班,回到家里逗逗孩子,看看电视,然后洗澡、睡觉,她几乎没有什么烦恼,一切都有人安排好了,安排得

顺顺当当。生活就像一条小河，缓缓地，不慌不忙地流淌。

然而她宁静的生活还是被搅动了，仿佛湖水里投入了一颗石子，泛起了一圈一圈的涟漪。那是五月里的一个晚上，电视里播映了一部电视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题材，那里面的生活、人物，对她来说是太熟悉了，更让她意外的是，片子里的一些外景镜头，竟是在万山红农场拍的，那里是她劳动生活了整整十年的地方。屏幕上出现了一条小路，她忽然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就是这条路！”丈夫不满地瞥了她一眼：“嚷什么！”他理解不了她的心情，是呀，因为他没下过乡，可她就不同了，她下过乡，种过地，修过这条公路，还当过小学教员。这部在艺术上毫不出众的电视剧竟使得她激动不已，那天晚上她失眠了，这在她说来是少有的事情，她忽然忆起许多往事，忆起了许多人……

在修路队那半年的生活，是雁莎一生中经历过的最苦的生活。她们每天拿着斧子和大锯，把线路内的大小树木砍断、锯倒、清走。许多地方是水洼地，有时一脚陷下去，拔出来的只是一只光脚丫。蚊子、瞎蠓、小咬三班倒，肆无忌惮地围着你嗡嗡地叫，赶也赶不跑，又气人又可怕，刚干了一天，雁莎就觉得受不了啦。她先是一天一天地捱日子，后来简直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捱着过，她盼望家里能打来一封诸如“母病速归”的电报（连里有人就是接到这种电报请了假回家去了），或是自己能得一场重病，住进团部医院的病房。可气的是，长得并不结实的她，虽然每天累得筋疲力尽，但就是不生病。后来还是好心的指导员看她可怜，分配她到炊事班去做饭。

真是奇怪，当年那段苦得使她几乎不能忍受的生活，今天回忆起来，却是那么甜蜜、温馨，甚至让她怀念和留恋。感情这东西是多么奇妙和复杂啊，让你无法说得清楚。她再也无法平静，终于，她跟几个战友一道，回农场去了一趟，又看到了那条公路，又看到了公路旁边的那条柳毛河。

陈兴桥圆梦

陈兴桥回云南去,只是为了圆一个梦。

陈兴桥下乡的时候只有16岁,还是个贪玩的孩子,在家里他最小,特别淘气。他随着上山下乡的人流,高高兴兴地报名去了云南。他插队的那个地方叫嵩明县,离昆明不远。他为什么要去云南,因为他经常听他舅舅讲过云南,在他的印象里边,舅舅骑在一匹马上,马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声响,树上挂着熟透了的香蕉,树下面是诱人的菠萝,散发出阵阵香气,那副情景浪漫极了,令陈兴桥心向往之。所以他没有跟哥哥一道去黑龙江。

妈妈把家里的两个樟木箱子都给他装满了东西,以为她这一去不知道哪年才能再回来,可是刚刚过了三个月儿子就回来了,他说那里条件太苦干活太累,吃不消。妈妈又惊又喜,问他回家买票哪里来的钱,他高兴地说队里把每个人的安置费都发给他们自己,一下去就给了一个存折,上面有200多块钱,花钱很方便。妈妈一听就来气了,把他一顿骂,骂回云南去了,可是过了没多久陈兴桥又跑回来了,一年里头他回来过七次,把那点安置费都扔在铁路上了。

嵩明县的干部把这些上海来的知青看得很高,去上海接知青的一个副县长回来以后说,上海那个地方真是好,到了晚上就跟天堂一样,真是好看!这些青年,要不是毛主席一句话,你拿八台大轿去抬他们也不会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照顾好他们!

陈兴桥那个队里有五个上海知青,都是男孩子,都爱恶作剧,他们一起去赶集。农民卖鸡蛋,可以用粮票换,一斤粮票换六个。几个男生故意捣乱,拿着农民寻开心:“我拿一斤三两粮票换鸡蛋。”“我换四斤九两粮票的鸡蛋。”农民脑子慢,算不过账来,很着急,知青却在那里一个劲地催,说着说着两边就打起来了,打得很凶,陈兴桥用二齿子打伤了一个人。结果,打架的农民受到处理,罪名是

“殴打知青”，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惹这些知青。

如今已经在上海开了好几家饭店的陈兴桥回忆起 20 多年前的那些往事，心里充满歉疚：“我们那个时候太调皮了，县里边越是护着我们，我们就越是调皮。没柴烧了就去偷，农民家里有一辆马车，他家里边一年的花销都在这辆马车上，可是我们就把这辆马车偷来，用斧子劈成柴禾烧掉了。这一下闯了大祸了，那个农民要跟我们拼命啊，整个村子里的农民都来了，有的手里还拿着家伙，我们也急了，手里操起铁锹，两边的人就这么对峙着，非常紧张。我们当时心里边很害怕，因为我们只有五个人，他们有好几十人，动起手来我们肯定要吃亏，但农民不敢轻易动手，因为上边规定不许殴打知青。后来公社的领导来了，才把这件事平息了。”

陈兴桥在云南呆的时间并不长，1972 年他就转到黑龙江兵团他哥哥那里去了，但是他一直忘不了他们劈掉的那辆马车，忘不了他打伤的那个农民，那辆车和那个人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上，他觉得欠了云南一笔情。

1994 年他去广西开会，开完会想去云南，可是买不到飞机票，只能绕道广州。在广州他买了许多学习用品：练习本、圆珠笔、铅笔、橡皮、文具盒，全挑好的买，还买了一些儿童食品和儿童玩具，装了满满几个大纸箱，托运到昆明，又从昆明转车到了他插队那个地方。他把带去的东西分成一包一包，挨家挨户地去送。他找到了那辆马车的主人，那个主人已经衰老了许多，几乎认不出了，陈兴桥给他带去了一辆车，一辆解放牌大汽车，花八万元买来的。马车的主人先是不敢收，接着是再三感谢，陈兴桥则是再三道歉，说当年我们把事情都给做绝了，一点也不懂得生活的艰难。

陈兴桥他们下乡时候的房东，是个地主，当时村子里数他家的房子最多最大，五个知青一人住一间，每间屋子里有一张睡觉的木床，一个盛粮食的木橱。老太太心眼很好，有时烧了好菜，就悄悄地给每个人的屋子里放一点，可是知青不敢接近她，因为她是地主婆。陈兴桥旧地重游，老太太依然健在，用慈祥的眼睛看着他，就像

看自己的儿子，一件一件讲述当年的事情，记得还那么清楚。陈兴桥给她买了一台 25 英寸的大彩电，她感叹地说可惜我家老头子不在了。

他还去看了那个当年到上海去接他们的副县长。他走进他的家，问：“你还认得我吗？”副县长看了他一会儿，准确地叫出了他的名字，让他好感动。

陈兴桥在云南只呆了三天，他是报恩还愿去了。云南之行他花了十多万。

跪拜父老乡亲

返城知青成了城市里分布得十分广泛的一个群体，它们几乎分布在每一个行业里，每一个机关里，每一个工厂里，他们开始经常聚会，或是以下乡的地区为圈子，或是以下乡之前的学校为单位，这种聚会主要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络，感情上的需求。杭州市老三届酒家的经理张洛平对我们说：人到中年必怀旧，我们搞这样一个酒家，就是要给他们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

在上海，有一次我参加过一个小型的知青聚会，聚会的参加者，都是一些下了海发了财的知青，酒桌上的话题，也大多是生意方面的。酒桌上有一个女知青一言未发。回旅馆的路上，她缓缓地说，现在知青也在分化，也在重新组合，有的人是利用知青的关系来赚钱，他们的交往是有选择的，选择那些对自己有用的关系，对自己有用的人，我很讨厌这种聚会。

除了各种各样的知青聚会，还有一些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去回访下乡的地方，探望那里的农民和农场职工。

黑龙江垦区的著名作家郑加真对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93 年 6 月，一支由 100 人组成的知青回访团，回到了宝泉岭农场管理局，管局的老职工以盛大的仪式欢迎他们，欢迎队伍有上万人，敲鼓奏乐放鞭炮，招待所大楼前面的大标语上写着：“北大荒拥

抱您，第二故乡想念您”。这场面，这标语，这真诚的情感使百名知青激动不已，他们一下子忆起多少往事。联欢晚会上，16名温州知青朗诵了他们临时写成的诗歌，虽然草就的诗歌有些粗糙，但朗诵者火辣辣的情感深深打动了全场观众。节目演完了，随着团长孙杰一声“向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们行大礼”的指令，台上的知青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齐刷刷地长跪不起，他们的眼睛里是晶莹的泪花，他们要跪拜养育过他们的北大荒和当年关心爱护过他们的老职工。台下的观众先是一愣，紧接着爆发出热烈的鼓掌声。

他们仍然是农场职工眼里的“宠儿”

1995年9月下旬，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俗称北大荒的地方。还是黑土地，还是漫无边际的原野，但是在这个季节里，黑土地已经被金黄色的庄稼所覆盖，大豆成熟了，玉米成熟了，过去在北大荒难得见到的稻子也大片大片地成熟了，原本肥硕的叶子把它们最后一点养料输给了果实，自己便悄悄地枯萎死去，而吸足了精华的果实，在秋风中得意地炫耀着饱满的脑袋，引来一片赞叹。谁都说，农场又是一个丰收年。

连接农场与农场、生产队与生产队的，仍然是那种砂石公路，公路依然是金黄色，在盛夏庄稼繁茂的绿色里，它黄得耀眼，在秋天庄稼成熟的季节里，它与金黄的原野浑然一体，浑然一色。

就在这样的一条公路上，一辆大客车疾驶而来，又疾驶而过，马达的轰鸣伴着车厢内的歌声和笑声，惊飞了路边庄稼地里啄食吃的麻雀、喜鹊和乌鸦。

这辆汽车的目的地是290农场——1969年到1976年它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汽车里坐的，是当年二师八团的兵团战士，后来返城的京津沪哈知识青年。他们来故地重游，他们来应邀作客，他们来探亲访友，他们是290农场建场40周年庆祝活动请来的嘉宾。

290 是三江平原上最早成立的农场之一。1955 年 7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农建二师五团 1700 多名官兵,奉中央军委的命令,从山东集体转业,来到这片荒原。五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 97 师 290 团。同年 11 月 21 日,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厅正式命名这个农场为“国营 290 农场”。

车窗外的景色急急闪过,似曾相识,又不相识,这些当年的兵团战士倚在车窗旁,努力回忆着,辨认着,依稀寻找着往昔的影子,但那影子怎么寻不着,找不见?“近乡情更迫”,他们好兴奋,好心焦,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长串老职工的名单,每个人心里都盛满了浓浓的怀旧情意,他们用一种甜蜜温馨的情调回忆起当年那段艰苦的时光。

上海知青陈桂英说,二十五六年前,我是一路抹着眼泪,从这条路来到 290 的。汽车跑了半天,也见不到几户人家,全是大片的荒地大片的庄稼,我的心越来越凉,后悔死了,害怕死了。十八九年前,我揣着返城的手续,心花怒放地沿着这条路离开了 290,当时真有一种大难不死逃离了苦海的感觉,我们几个人一路走一路庆幸:可算离开了,终于要回家了!可是一别 18 年,我们却越来越想念它,几个人聚到一起总是回忆它。当年迫不及待地离开,今天又迫不及待地回来,这里面的复杂情感谁也说不清楚。

场庆是农场的一件大事,场庆活动中最牵动人心的一件事是知青的回访。老职工们早就守候在招待所的院子里,众星捧月似地把刚刚走下车的知青围在中间。晚餐是第一个高潮。在招待所简陋的食堂里,在昏暗的灯光下,摆满了十几张桌子,桌子上是大碗的蘑菇炖小鸡,大盘的炒肉拉皮、大马哈鱼,满满当当的一桌子菜,散发出主人的真情厚谊。酒是肯定不会少的,农场自己做的“北大荒”!当年知青在的时候是 65 度,如今是 55 度,还是辣口辣嗓子,但是这酒哪能不喝!

肖承先场长站起来敬酒了。他今年 40 岁,建场那年生的,跟 290 一般大,他是 290 的创业者之后,他父亲就是当年从山东来此

的农建二师五团转业军人。知青在的时候，肖承先还是个学生，知青老师教过他，但那时未必会注意他，更不会想到20年后他会成为这个有50万亩耕地、2.4万人口大农场的当家人。290农场这几年经营得很有成就，一直是黑龙江垦区的十大农场之一，每年生产粮豆十几万吨，获得了国务院授予的“粮食生产先进单位”称号和省委省政府授予的“上交粮食先进单位”称号。

场部的一些老科长，一些连队的老连长也来了，跟知青坐在一起，把多少年前的老事又一件一件地翻腾出来。我们这张桌子上，也有一个老连长，黑红的脸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他不善言辞只是微笑。知青们簇拥着他，不断站起来给他敬酒。坐在我身边的一个知青告诉我说，这个老连长，可厉害了，整天板着一张脸，但心眼特别好。有一次在江边卸煤，一直干到半夜，天又下雨，干完活又冷又饿又困，回来就想睡觉。刚躺下，炊事班就给我们送饭来了，馒头和热汤面，他们说，是老连长让给送来的。热汤面真好吃呀，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热汤面，吃完了，肚子也不饿了，身上也暖和了，大伙儿都感谢老连长，说他想得真周到。他就是这么个脸上冷心里热的人。那个知青激动地冲着我讲，老连长就坐在一旁静静地听，一言不发，仍然只是笑，他不像知青们那么激动，显得很冷静，可能是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也可能是他觉得这些事情都很平常，不值一提。

我走出食堂，招待所的大门外，是一条新修的马路，今天刚刚正式剪彩通车。路很宽，修得很好，路面是水泥的，绿化带把它分割成快慢道，中间可以跑四辆汽车，来290农场这一路上，我们都没见过这么好的路！在一个国营农场里，修这样一条路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场部机关的办公楼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那个路口的四角还有商店和俱乐部，因而那里也就成了整个场部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今晚俱乐部里有一场彩排，是农场宣传队为场庆准备的一台节目。省城来的一个小有名气的相声演员，将在今晚的彩排中加演

两个段子,他明日一早就要离开,因此今晚的彩排就有了格外不同的意义。下午我在农场宣传部,就看到要票子的人一拨接着一拨,要票子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急促的电话铃声频频响起,宣传部的张部长气急败坏地说:不接,他妈的,都是要票的!此时,兜里揣着票子的,怡然地在俱乐部门前漫步,没有票子的,依然在焦急地寻找,也有许多人知道自己找不到票子,只是想一睹笑星的风采,在深秋的夜色中等待。我从那些等待的人群中想到,农场的文化生活是多么的单调。

商店早已关门打烊。十字路口的一角,支着两个烤羊肉串的摊子,另一角摆着个卖小食品的床子,这就是今晚此地全部的商业活动。生意自然不会好,但零星的也总有的做。这里没有什么流动人口,也不是交通要道,农场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单位,农场的商业活动也难以繁荣。种地、打粮,加上基本上是自给自足性质的加工业——这些就是今天国营农场主要的经济活动。

忽然我发现了一个人,一个正在横穿马路的人,那是刚刚和我在同一个饭桌上吃过饭的老连长。他走得很慢,一跛一跛地,显然一条腿有毛病。他正向十字路口四个角里最冷清的一个角走去,那是一个灯火阑珊处,一个人也没有。老连长跛着腿,避开了热闹,避开了人群,避开了簇拥他赞扬他的知青,悄悄地走进冷清,走进独处,走进孤寂。他向一扇紧闭的大门和一排黑洞洞的窗户走去,然后停下来,用一只胳膊倚着窗台,就斜靠在那里,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冷眼旁观着这个世界,等候着演出的开始。他为什么要避开那热闹的局面,避开那些簇拥他的知青,避开那一片赞扬声?此时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忽然从这个沉默的人身上,感到一种震撼的力量。

场庆活动的高潮,是第二天上午的庆祝大会。吃过早饭,锣鼓声就响起来了,中小學生组成的欢迎队伍,从招待所的门口一直排到俱乐部的大门口,三十多名知青代表神采飞扬地从这狭长的通道中走过,他们依然是农场职工心目中的宠儿,是场庆活动中最受

欢迎的角色。

会场里真正是座无虚席，在这个庄严而隆重的场合，每个人心里都涌起一股庄重的感觉。总局的代表讲话，管局的代表讲话，场长讲话，老五团的转业官兵代表讲话，最后是知青的代表讲话。代表知青讲话的是当年的副政委、北京知青杨贵箐，她是所有发言者里得到掌声最多的一个，也是惟一提到了“参加兵团建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的贡献的人。就在前一天晚上，一位早已卸任的老场长还当着知青的面，把兵团时期的一位现役领导大骂了一顿。在对现役军人的看法、同现役军人的关系方面，知青同老农场的干部有着很大的差异。

杨贵箐在发言中说：我们永远是290人！这句勇敢而豪迈的话引来一阵掌声。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知青小声嘟囔了一句：“那些留在农场的知青才是真正的290人。”然而真正的290人没有可能站在这个讲台上讲话，即便他们来讲话，也不可能有这么般自豪，他们在这些老同学面前，有一种自愧不如矮人一头的感觉，甚至不愿意到招待所里去看望老同学老战友。

老五团转业官兵的代表在发言中说：我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但是在整个大会和大会后的文艺演出之中，这些既献终身又献子孙的老军人，却把最多的掌声给了知青。他们对知青实在是太宽容，太高看，太厚待了！

最受欢迎的一个节目是表演唱《知青老师》：“你手把手教我a、o、e，一加一还有音乐和图画。做对了你就打小小的勾，做错了你就打大大的叉。我记得那天雨下得很大很大，你送我们学生一个个回家。哦，知青老师你走了，也许您回到自己的家，知青老师您走了，黑板上还留着你的图画。……”

最后一个节目是知青表演的小合唱《说句心里话》。“说句心里话，290是我的家，离别十几年，梦中常常挂念它。说句心里话，290变化大，宽敞的马路明亮的灯，人人精神焕发。啊，我们回来了，我们又回到了家，你添砖我加瓦，共同建设可爱的家。”当年团部宣传

队的青年,回来了八个人,他们又站在了当年的舞台上。韩家义说,当年我们就住在这个俱乐部里,对每个房间都很熟悉,当年我们演出的奖状还挂在那里,让我们又激动又感动。

农场专门召开了一个知青座谈会,请知青们为农场的发展献计献策。上海知青忻贤峰说,我在290呆了11年,先是在18连,后来又转到保卫股,最后到了一营。290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对我女儿来说则是第一故乡,她出生在290。分别20多年了,但是老职工一见面就能叫出我们的名字,有的还把当年知青送给他们的小礼物保存着,让我们很感动。昨天我见到一个老职工,他问我:你还认得我不?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他说,我一直记得你,七一年的时候全连开大会,要开除我的党籍,你出来说了一句话,你说,他为党做了这么多年工作,总是有贡献的,我们是否能保留他的党籍。这句话我早就忘记了,他却一直记了这么多年。哈尔滨知青韩家义说,黄金有价情无价,千里难寻是朋友。在农场的时候对这两句话体会得不深,返城以后,才真正体会到农场老职工对我们的感情有多么可贵。在我一生的旅途上,最好最难忘记的,是在农场结下的友谊交下的朋友。陈桂英说:农场第一教会我们怎么做人,第二教会我们怎么干活,第三教会我们怎么吃苦。佟文阁说,农场的变化太大了,我原来在场医院工作,一下车我就找我们原来住过的宿舍,可是已经找不到了。我们栽下的那些扎根树,走的时候还是光秃秃的,现在已经长成树林子了。陈耀钧和张剑获夫妇在他们当年栽的扎根树下照了一张相,扎根树长得枝繁叶茂,栽树的人却早已远走高飞。

老职工的子女也来了,他们对知青说:可想你们了,你们在那时候多好,老说一些新鲜事,那时候可愿意听你们说话了,听你们说话可有意思了,就愿意你们上我家来。那年呼啦一下你们全走了,学校里都没有老师了,英语、物理、数学都没人教了,多少年才缓过劲来!

是啊,说到知青大返城,多少人都说,对农场最大的打击是人

才的流失,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失:连队里开拖拉机的机务人员走了大半,会计出纳走了大半,场部医院的医生护士走了大半,而学校里的老师几乎全走光了。红红火火的事业一下子冷清下来,正常运转的机器忽然停滞下来,歌声和笑声少了,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和叽叽喳喳的南方话少了,老职工们在深深惋惜的同时也在心里反思:早知道知青要走,当初还不如培养咱们自己的家属和子女,虽然文化水平低一点,接受能力差一点,但毕竟靠得住啊!现在倒好——

农场面临的第一件大事情是重新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机务人员容易,办个短训班,财会人员也相对容易些,办个学习班,最难的是教师,那可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培养出来的,一些农场到附近的人民公社去“挖”教师,到外省去调教师,建三江管理局还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启事,以优厚的条件在全国范围内招聘教师。290的肖场长和宣传科的张科长至今还以一种十分惋惜的口气说:“当时知青哪怕能留下一半呢,就是留下三分之一也好啊,咱农场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啊!”

过去农场留不住人,今天农场仍然留不住人,290农场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先后有1000多人考入外地的大中专学校,其中有上清华的,有出国留学的,但是学习好的,有本事的,出去了就不回来,只有上八一农大的能回来几个。“咱们农场,就是缺人哪!”肖场长感慨地说,“五十年代‘好儿女志在四方’,六十年代‘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口号现在怎么也不提了呢,那个时候还讲理想讲国家的需要,现在这些好传统都快被人们忘光了!国家老说农业是基础,农业重要,可是有本事的人谁也不想来搞农业,农业能发展上去吗?难哪!”

后 记

为了撰写这部书稿。我们先后采访了 60 多位知青，他们中有的人，下乡不久就入党，上学，毕业后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风顺路坦；有的人返城很晚，拖家带口，住房、工作、收入，一道道关口横在面前，命运多舛；有些上中学时的优等生，失去了他们本该拥有的机会，另一些人却意外惊喜地得到了这机会。一位知青坦率地说：要不是上山下乡，我这辈子肯定上不了大学，念中学的时候，我一看到数理化就头疼，学得一塌糊涂。

上山下乡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写在这本书里的，就是这一代人的命运，他们中间，有的让人羡慕，有的让人同情，有的让人生出无限感慨，压得心头沉甸甸地作痛。他们自己反观那段历史，也各有各的见解，但他们的见解大多与他们今天的处境有关。日子过得舒心的，往往留恋，日子过得窘迫的，大多悔恨，这里边感性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许多知青还在迷恋于知青的聚会时，另外一些知青却从这种聚会中摆脱出来。陆小雅说：我觉得知青老是在一块回忆过去没什么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我们应该面对现实，现在社会变化那么快，竞争那么激烈，每个人都感到了压力，如果老是在那里讲有悔呀无悔的，一点都无益于现实，老在那里嚼这

这些东西实在没意思。现在需要的,是从理性的角度,对这场运动进行研究和思考。

还有一些知青,把他们的思考和研究付诸于文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小萌、史卫民和定宜庄,当年都曾经在内蒙古下乡,后来都上了大学,又读了研究生,进了社科院,研究近代史、元史和社会史,但他们忽然都有了一个念头:研究知青史。这个念头始于八十年代末,那时陆续地出了一些反映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有小说,有电影,也有电视剧,作为那段生活的当事人,作为专门的理论工作者,他们对那些作品或是感到不满足,或是感到不满意,最为主要的一点是他们认为:文学终究不能替代历史!于是他们生出一个念头:为什么我们不来写一写它。于是他们开始动笔了。

1993年8月底,史卫民和他的爱人何岚完成了一部42万字的《漠南情》,这实际上是一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史,是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广东这所谓四大兵团里面惟一比较完整的“史”。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书的《前言》中说:“无需怀疑十几万人的真诚和热情,也不必盯着结果去讨论为什么,事实本身能够表现的远比这多得多。所以,我们希望提供的,只是一个真实的记录。”

这本书刚刚付梓,夫妇二人就投入了下一个目标,依旧是生产建设兵团史,但所涉及的范围远比上一本要大得多,这是一本写“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的书,书的名称是《知青备忘录》。作者之一,当年的北京知青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讲师何岚,未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1995年4月死于癌症。

与此同时,刘小萌和定宜庄在撰写一部全景式的知青史,两人按年代分工,各有侧重,定写“文革”之前为主,刘则重在“文革”期间。这是一部上百万字的大型论著,论述内容的起迄时间是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部《中国知青史》,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四个人还有了一次合作，他们共同编写了《中国知青事典》。这是一本大型工具书，“书中选择 1953 年至 1993 年间有关史事、人物、文献、制度等，立条目凡 200 余条，用平实准确的文笔分别加以叙述和分析，可使读者对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可以说，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翔实的一本反映上山下乡运动的工具书。

对上山下乡这场运动进行思考的，不仅仅是知青。有各种各样经历的人，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对这场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央党校副校长、《求是》杂志总编辑邢贲思在思考上山下乡的问题时有双重身份，他既是一个党的理论工作者，又是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他的思考是理性的，作为一个父亲，他的思考偏重于感情。他说，我不反对知识分子要有一个锻炼的机会，因为知识分子的确有自身的弱点，这主要是软弱性，适当给他们一个机会压压担子是应该的，但是采取大规模上山下乡这种方式，我不赞同……不能把一部分人说成是教育者，把另一部分人说成是教育对象。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上山下乡也有它好的一面，绝大多数下过乡的青年人，在同龄人中间都显得比较成熟，能经得住风浪，处于逆境时也没有什么怨言。

原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认为，毛主席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要让知识分子到实际当中去锻炼，参加劳动，接触社会，这是应该的。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把中学生都大批赶下去，甚至中学还没毕业劳动力还没形成就往下赶，国家每年还要拿出大笔的经费，问题就出在这里了，这就引起“四个不满意”。

在一次知青问题座谈会上，一些老知青怀着深情，回忆起当年下乡的情形，赞叹下乡经历使他们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党史研究专家金春明在听了他们的发言之后说了一句：“今天是知青精英的聚会，是 1700 万知青中的少数人的聚会。”他问，1700 多万知青当中，能达到今天在座这些人的成就的有多少，百分之几？千分之几？实际上的比例数恐怕还要低得多。知青精英的感情能否代表广大

知青的感情？知青精英的认识能否代表广大知青的认识？他说，八年前我给团干部讲过一次话，他们说，上山下乡锻炼了我，没有上山下乡我就当不了团委书记。我说，全国有多少团委书记，难道有这么多的团委书记，就该说上山下乡好？有人讲无悔无恨，真的就那么无悔无恨吗？“文革”是一场灾难，共产党要悔，老百姓要恨，我虽然不是知青，但我在河南黄泛区的五七干校待了三年半，那三年半白过了，至今想起来我还是追悔莫及。

金春明先生是重点研究“文革”史的，他着重谈了从“文革”史的角度如何来看上山下乡运动。第一，“文革”中的上山下乡与“文革”前的上山下乡性质不同，在“文革”前是一种社会职业的选择，当时需要有一部分青年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在“文革”中带有很浓重的政治色彩，把它作为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强制性地上山下乡，不下去就断户口。第二，让城市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违反社会发展总趋向，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农村人口的减少，发达国家哪有那么多农民？美国的农民仅占人口的4%！不把农村人口解放出来，九亿人口搞饭吃，就永远没有现代化。第三，对每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情况要具体分析，有人成长了，也有人被摧残了，聂卫平如果让他一直割豆子就成不了棋圣，光讲成长的一面不讲压抑扼杀的一面，那是不公道的，实际上压抑扼杀的一面大大超过成长的一面！

在他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金春明先生用了两页纸来写上山下乡运动。

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吴象，在另一次知青问题座谈会上说，上山下乡的知青是因祸得福，了解了真正的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他说，这些青年人一下子就沉到了中国社会的底层，他们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观察问题的角度，一下子就起了变化。他们看到了真实的、没有任何修饰和遮拦的农村和农民，这同他们在报纸上，在课堂上和书本里听到的欣欣向荣、莺歌燕舞、丰衣足食的农村很不

一样,这就对他们的思想和感情起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对农村体验的深刻程度,超过了当年我们在延安,1938年我到延安的时候,那里是解放区,吃的是集体伙食,还不能代表当时中国的广大农村,而许多知青一下去,就看到了贫穷落后的农村。

北京某出版社一位编辑出版过知青作品的编辑说:上山下乡使一些平庸的青年变得优秀,使一些优秀的青年变得平庸;一些人得到了他们本不该有的机会,一些人失去了本该享有的机会。更多的,则是优秀的更优秀,平庸的依然平庸。上山下乡是既扼杀了文化又传播了文化(前者对城市言,后者对农村言),既浪费了人才又造就了人才。

王仞山是个有才气的姑娘,她16岁就去了北大荒,40岁以后她又带着她16岁的女儿去了一次北大荒,她说:我是想带她看一看我16岁时去的那个地方。上山下乡这场非常悲壮的运动我经历了,这种心情我要给她讲一讲。

王仞山一直到1978年才离开北大荒,她那十年过得很难,“最难的就是我一直追求,但总是追求不到,我一直在努力,但总是不成功,因为我家庭的问题,我父亲受到冤枉被抓起来了,他是个翻译,刚解放的时候带着全家从香港回到祖国大陆。我觉得自己应当有所作为,所以就拼命画画,搞创作,但是条件不允许,不让我搞,甚至还斗过我。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纷纷上学,有深造的机会,但是我没有。我是在挣扎中走过来的,很痛苦,生活上的苦劳动上的苦我不怕,但是这种追求不到的痛苦让我难以忍受。”

“现在留在印象里边的都是美好的事了。刚回来那几年,想起北大荒还很恐怖甚至作恶梦,说是返城的全部作废,都要回去,醒了以后吓得一身冷汗。但是多少年过去以后,留在脑子里边的就都是美好的东西了,我就是怀着这种美好的东西,带着女儿回去看我的故土。有时想想觉得很奇怪,当年那么痛苦,今天又觉得很美好。没有那段经历,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意志就是在那个环境里磨炼出来的。回北京以后,许多人都认为我比较有毅力,我也承认我有

这方面的长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能难倒我的事情,这个长处就是在北大荒吃苦吃出来的,这一点我是自豪的。”

王仞山终于事业有成。回北京后她先是在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艺术品出口部,后来调到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作艺术总指导,由她主持的中国艺术博览会,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曾经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而奠定了文坛地位的史铁生,在他那篇描写插队生活的获奖作品里,唱出了一首悠扬而又哀婉动人的牧歌。他说这是一个角度问题,“比如插队这件事情,我的经历中田园牧歌式的因素多一些,实际上苦难的东西也是有的,当然有些人经历的惨烈多些。”

著名作家肖复兴的处女作,是七十年代初发表在《兵团战士报》和《合江日报》上的一个短篇《照相》,后来他又在新复刊的《黑龙江文艺》第一期上发表了作品,这就大大激发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兴趣和信心。他说:“可以说,梁晓声、陆星儿、张抗抗我们都是一类人,都是从北大荒走出来的作家。”他说他是从生活的最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这种生活对于他的写作来说是一种宝贵的经历,不仅给他提供了写作的素材,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对老百姓的感情,“如果从事写作的人对老百姓没有感情,是很难写出好作品来的。”

1974年他被召回北京作教员,到丰台区东铁匠营中学教书,后来在1978年底又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他说:上山下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如果单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讲,那是应该否定的,因为它葬送的不仅是我们个人的前途,而是一代人的前途,它不是把社会推向前进,而是拉向后退;但要从人的成长过程来看,磨难同时也是一种磨炼,让青年人有机会去了解老百姓,养成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养成面对艰苦又不被艰苦磨碎的精神,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珍视的东西。怀旧不一定不好,这里怀念的是一种美好的东西。这一代人的青春就是在那里度过的,你让他不怀念青春怎么可能呢?这一代人对上山下乡的情感是很复杂的,有损失也有磨炼,有诅咒也有怀念。由我们来评价上山下乡,难免带有感

情色彩,因为我们毕竟是“身在此山中”的人,还是留给后代人去评说吧,他们会比我们更冷静更客观。

天津知青郭庆晨认为,上山下乡对于他个人来说,“总体上是利大弊小”。他下乡的那个农场,就是五十年代初期杨华他们建设“北京庄”的地方,郭庆晨认为,杨华他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去开发北大荒的,这个口号这种精神到什么时候都否定不了,理想主义的火光和旗帜应该永远燃烧和飘扬。对于他个人来说,上山下乡既有不堪回首的一面,又有永远难忘的一面,使他增强了尊重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的意识,这一辈子都不会看不起劳动人民。他说他从五十年代复员转业到北大荒的那些人身上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我们在农场不过待了十年八年,他们是把一辈子都献给北大荒了,跟他们一比,我们还有什么委屈什么怨言呢,我们什么都想通了,什么名呀利呀都不争了!所以,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比没有这段经历的人,要更成熟一些。”

上海知青刘忠定,如今是杨浦区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他说,我对上山下乡持否定态度。云南那个地方很落后,小农意识很强,没有什么可以接受再教育的。我在云南待了九年,那九年是最美好的年华,但是荒废了,美好的年华成了蹉跎岁月,我七九年顶替母亲返城后一直在杨浦区法院工作,业余时间还要读书,整整读了八年,一直读到大学本科,可以说我实际上一直是在弥补下乡那九年的损失。但是那段经历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讲也有积极意义,首先是锻炼了吃苦耐劳精神。下过乡的人特别能吃苦,有毅力,我们一起上业余大学的,许多人都比我们小,甚至小十岁八岁,他们没有家庭负担,但是不如我们坚持得好,有的就半途而废了,相反我们这些拖家带口胡子拉碴的人倒是都坚持下来了,有的人接着又读研究生。还有一点,我感觉下过乡的人在同志关系上处理得好,彼此之间的相容性强一些,对挫折的承受能力也要强得多。

曾经在云南兵团下过乡、现在重庆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王瑞林认为:我们这一代人跟下一代人相比较,各有所长,他们的

长处是对现代科学文化掌握得比较系统充分,我们的长处是对社会,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体验更丰富一些,更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没有经过大悲大痛的人,很难有大彻大悟。

有一位知青出身,后来以写报告文学而出了名的作家对我们讲过这样一个观点:世界上以移民这种形式开发一个不发达地区,是有许多成功先例的,比如美国、澳大利亚,都是移民国家,黑龙江实际上也是一个移民省,这块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从本世纪初开禁以后,陆续有大批移民涌入,闯关东,才发展起来。所以,通过移民这种形式来开发边疆,开发一块新土地,这种形式本身没有错。他还说,有志青年还是要不怕艰苦,志在四方,具有一种为事业献身的精神。现在全盘否定上山下乡,连学农的大学毕业生都不愿意上山下乡,把它当成一件丢人的事情、没出息不光彩的事情,这就不好了。现在的年轻人,“洋插队”可以,“土插队”就不干了,关键就是没有钱挣。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做了这样的论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几年内,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前后共达一千六百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去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一百亿元。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1996年2月20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二,正在延安与老区人民

一起过年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同仍然留在延安的 10 名北京知青代表，进行了座谈。六十年代末去延安插队的 27800 多名北京知青，只剩下 413 人，他们生活在除子长县以外的延安地区各个县市。新华社记者张宿堂、胡西生，在一篇记述李鹏与知青座谈的报道中写道：“谈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李鹏说：‘文化大革命中，许许多多城里的青年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应该说，这段历史给不少人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也发生过一些令人悲痛的事。对这段历史，要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一方面，要看到这个决策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确得到了锻炼。你们了解了中国的国情，通过劳动和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精神境界得到提高。正像你们自己说的，受益匪浅。因此，要全面地看待这件事，文艺作品也要全面反映这段历史。’最后，李鹏总理激动地说：‘那些回城的知青们是从延安这个大熔炉里出去的，在他们的心中，延安是不会被忘记的。而你们留下来的 400 多人则在陕北生根发芽了，成为新一代延安人。你们在这里奉献了青春，还要继续为这片革命圣地贡献聪明和才智。’”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上山下乡运动有了一个“说法”。

1996 年 10 月初稿

1997 年 3 月改毕

主要参考书目

张林池主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朱荣、郑重等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1993 年版。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林志坚主编:《新中国要事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年版。

刘小萌等编著:《中国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查出版社 1997 年版。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查出版社 1997 年版。

王子冀主编:《回首黄上地》,沈阳出版社 1992 年版。

智清主编:《老插话当年》,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草原启示录》编委会：《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1 年版。

《北大荒风云录》编委会：《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0 年版。

贺鹏、陈广斌编：《绿色的浪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纪实》，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

杜鸿林：《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 1993 年版。

闵云森主编：《咱们老三届》，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何岚、史卫民：《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 1994 年版。

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王江主编：《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5 年版。

郑加真：《北大荒移民录——1958 年十万官兵拓荒纪实》，作家出版社 1995 年版。

火木：《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成都出版社 1992 年版。

李广平编：《中国知青悲欢录》，花城出版社 1993 年版。

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刘中陆主编：《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难忘鄂尔多斯》编委会：《难忘鄂尔多斯》，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